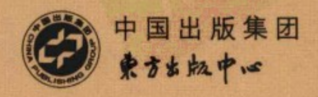


索马里史

I. M. 刘易斯 著　赵俊 译　刘鸿武 校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omali



ISBN 978-7-5473-04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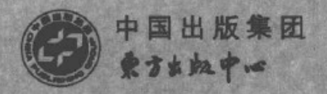
定价：36.00元



索马里史

M　刘易斯 著　赵俊 译　刘鸿武 校

History
of the Somali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09－2011－466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From Nation to State，Weidenfeld&Nicholson
1965 First Edition
A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Nation &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Longman
1980 Second Edition
A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Nation &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Westview
1988 Third Edition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omali：Nation &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James
Currey，2002 Fourth Edi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马里史／(英)刘易斯著；赵俊译．—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2.8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489－1

Ⅰ．①索… Ⅱ．①刘… ②赵… Ⅲ．①索马里—历史
Ⅳ．①K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6214号

责任编辑：欧阳敏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毫米 1/16
印 张：23.25
字 数：300千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89－1
定 价：36.00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第四版前言

vii

我是一名社会人类学家，副业是研究历史。在研究一个非洲民族（索马里民族）时，我有了一段常人没有的经历。就是这一非洲民族，其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主义孕育出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当代的“民族-国家”，还有超出“民族-国家”之外的其他内容。然而，自 1960 年正式摆脱欧洲人统治、获得独立以来，东北非局势一直动荡不定。索马里的政治命运历经坎坷、跌宕起伏。1960 年，狂热的民族主义将索马里人凝聚在一起，满怀雄心要将索马里共和国建设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然而，未曾预料的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战火却将索马里烧得体无完肤。接着，在国内外不断施压的情况下，索马里境内派系与主张分歧依然充满了强烈的火药味。

更为直接的氏族、亲族效忠所具有的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持续力量，揭示了在一个并没有政治集权传统的文化中，这些低级别的认同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着紧张关系。索马里在不同时期、在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曾做过多次努力，试图减轻甚至根除这些内部分歧。但是，这些努力往往威胁到民族团结，结果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从拒绝到政治镇压都有。可能最有意思的是，独裁者西亚德将军在其权力顶峰时期，即“科学社会主义”时期所倡导的公葬（以及其他措施）。早期的政治家们在确定人们身份上，曾寻求用语言上的策略以示其已经

超越了氏族与部落的分界，在索马里口语中以英语（或意大利语）的前缀“ex”（即“以前所属的氏族”）来表示其出身氏族。而西亚德禁止使用所有与氏族相关的称呼，甚至包括“ex”这种委婉的用法。就在那个时期，我访问了摩加迪沙。我禁不住使点小坏，向我那些在机构中工作的索马里朋友们问道，现在要是问一个人的“ex-ex”是不是安全。那些朋友并没有被这个玩笑逗乐。

坚持放弃氏族观念是如此的受到欢迎与提倡，以至于外国的学术界也卷入进来。学术界的人本应对此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当然，他们通常也对索马里语缺乏充分的掌握。因此，他们的著作有助于延续这种幻象，这种幻象在神秘化索马里政治现实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幻象也激励他们使用欧洲中心论的术语“阶级”与“阶级斗争”来错误表述索马里的情况。当然，在此背后还存在着欧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的假定，即氏族组织是一种早期的、原始的政治组织形式，与现代性不容。

一些著作者甚至盛气凌人地宣称（当然并无任何证据），是欧洲殖民者将氏族制度作为一种分而治之的手段而引入到索马里！正如最早的资料显示的那样，事实恰恰相反，索马里人很早就出现了氏族制度，完全与殖民干涉无关。人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对索马里殖民者进行责难，但这个不算。当然，外国管理机构需要了解这些本土分化情况，甚至对此加以利用：这也是索马里各个集团所需要的。每个地方分化力量都设法让殖民管理者倾向于它们的特殊事业，因此，从整体上说，索马里人极其擅长于赢取这种支持。而且，正如索马里人充分表现出来的那样，也正如我在这本书中尝试忠实记叙的那样，尽管有些力量与中央政治机构有所不同，但是氏族制度显然与现代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和兼容的，因此也不是一种固守不变的力量。因此，在我看来，那些带着欧洲中心主义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化了的世界观来研究索马里社会现象的人，漠视了索马里氏族的特殊性和活力。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类似于种族主义的东西。

当然，氏族联系依然暗藏着深刻的分裂，也与一种好战的、非中央化的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成为构建稳定的、等级化的政治实体的可怕

障碍。对此，我有些担心，但我认为这也是索马里人所珍爱的带有民主倾向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代价。正如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头十年所呈现出来的政治动荡那样，索马里政治文化中的这些特点成为未来国家(或多个国家)稳定发展的难题，且这些难题极难应对。相较于很多索马里人以及我本人早期的带有理想主义的期望，在应对这些难题上，光靠索马里文化民族主义是不够的。如果说索马里历史有许多教训需要汲取的话，那么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教训。今天(2002 年)，索马里人偶尔在谈及他们业已消逝的民族主义的时候，那种感受就像是病人被截肢，但依然“感觉”完好如初，好像索马里并没有崩溃。我认为，索马里人以截肢的观点来看其已经分裂的政治，部分是由于他们混淆了“国家”和“民族”。因为，就共同的文化和语言来说，索马里“国家”问题重重，而“民族”依然实实在在。

从 20 世纪 50 年代现代政党诞生到现在，我一直与索马里文化和一些文化代表人物有着联系。20 世纪 50 年代，我在准备博士阶段的田野研究前，曾第一次接触了一些为实现独立而斗争的索马里民族主义组织。在索马里进行田野调查期间(1955—1957)，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后来成为索马里政治精英的人物。我所使用的一些书面和口头材料主要得益于这种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1962 年、1964 年和 1974 年以及直到 1992 年期间更短期的进一步田野调查让我掌握了更多的材料。我最初的研究得到了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后来还得到了卡内基信托基金(Carnegie Trust)和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以及英国文化协会 (British Council)的支持。联合国难民署、粮农组织和其他多个机构多次资助了我的短期访问，因此也让我有机会亲身体验了援助与发展这一神秘领域。对所有的这些机构，我深表谢意。我也要感谢索马里各届政府，它们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并为我提供了便利条件。虽然我出版的作品并不总是能得到它们的称赞，但自 1960 年独立以来甚至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索马里多届政府在整体上还是对我较为宽容。西亚德将军的政权对我的宽容程度令人吃

惊。阿卜杜勒-拉扎克·哈吉·侯赛因(他被广泛地认为是索马里最有能力的总理)总理对我就曾表达出这样的一种态度,他在将我介绍给其内阁时说道:“这就是写我的家伙。我们并不总是喜欢他说的,但重要的是他在写我们!”[①]

在索马里军人政权统治时期,我曾到索马里国家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做客,我很惊讶也很高兴遇到了很多教师,他们准备用新索马里文字筹备教材。他们也正在翻译本书的一个较早版本中的一些段落。这个新版本也是对书商伊斯梅尔·艾哈麦德(Ismail Ahmed)先生的直接回应。为了满足索马里以及欧洲的索马里学生的教学需要,他在赶印本书。我很高兴地设法满足了他的需要,即要把索马里历史写出来,回馈给它的诞生地——索马里人的世界。然而,我也希望在本书出版下一个版本前,这种需要将会由一位索马里自己的历史学家来满足。在我试图理解后来年份的文化和政治上,很多索马里朋友给我提出了建议并给予了帮助。由于时间有限,这个新版本的准备工作事实上是一个“速成项目”,我尤其要感谢奥马尔·杜豪德(Omar Duhod)博士、艾哈迈德·优素福·法拉赫(Ahmad Yusuf Farah)博士、奥斯曼·艾哈迈德·哈桑('Osman Ahmad Hassan)先生、阿卜迪拉希德·赛德('Abdirashid Sed)先生、阿卜迪萨兰·伊赛·萨尔维('Abdisalan 'Isse Salwe)先生、简·哈康桑(Jan Haakonsen)先生和帕特里克·吉尔克思(Patrick Gilkes)博士。我也要感谢穆赛·加拉尔(Muse Galal)、穆罕默德·阿卜希尔·穆赛(Muhammad Abshir Muse)和赛义德·萨马塔尔(Said Samatar)教授以及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索马里历史学家谢赫·贾马·奥马尔·伊赛(Sheikh Jama' 'Omar 'Ise),感谢他们早前的鼓励和长期的支持。我也想起了一些已经故去的朋友,他们是安东尼·马利亚诺(Anthony Mariano)、B. W. 安杰耶夫斯基(B. W. Andrzejewski)和伯恩哈德·赫兰德(Bernhard Helander),我曾希

---

① 关于我田野研究环境的更多情况,参见 I. M. Lewis, “An anthropologist at large in the 'Cinderella of Empire'” in *Blood and Bone, the Call of Kinship in Somali Society*, New Jersey, 1994, pp. 1 - 18; and 'Afterword' in *A Pastoral Democracy*, new edition, Oxford, 1999, pp. i - xxvi。

望和他们就我新写的最后一章进行讨论。我的妻子阅读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并为此章成文提供了帮助。新近的历史材料来源丰富，在处理它们的时候，我更全面理解了 E. H. 卡尔（E. H. Carr）的困境，即作为一个现代历史学家在面对信息过剩以及问题选择时所遇到的那种困境是如何塑造历史观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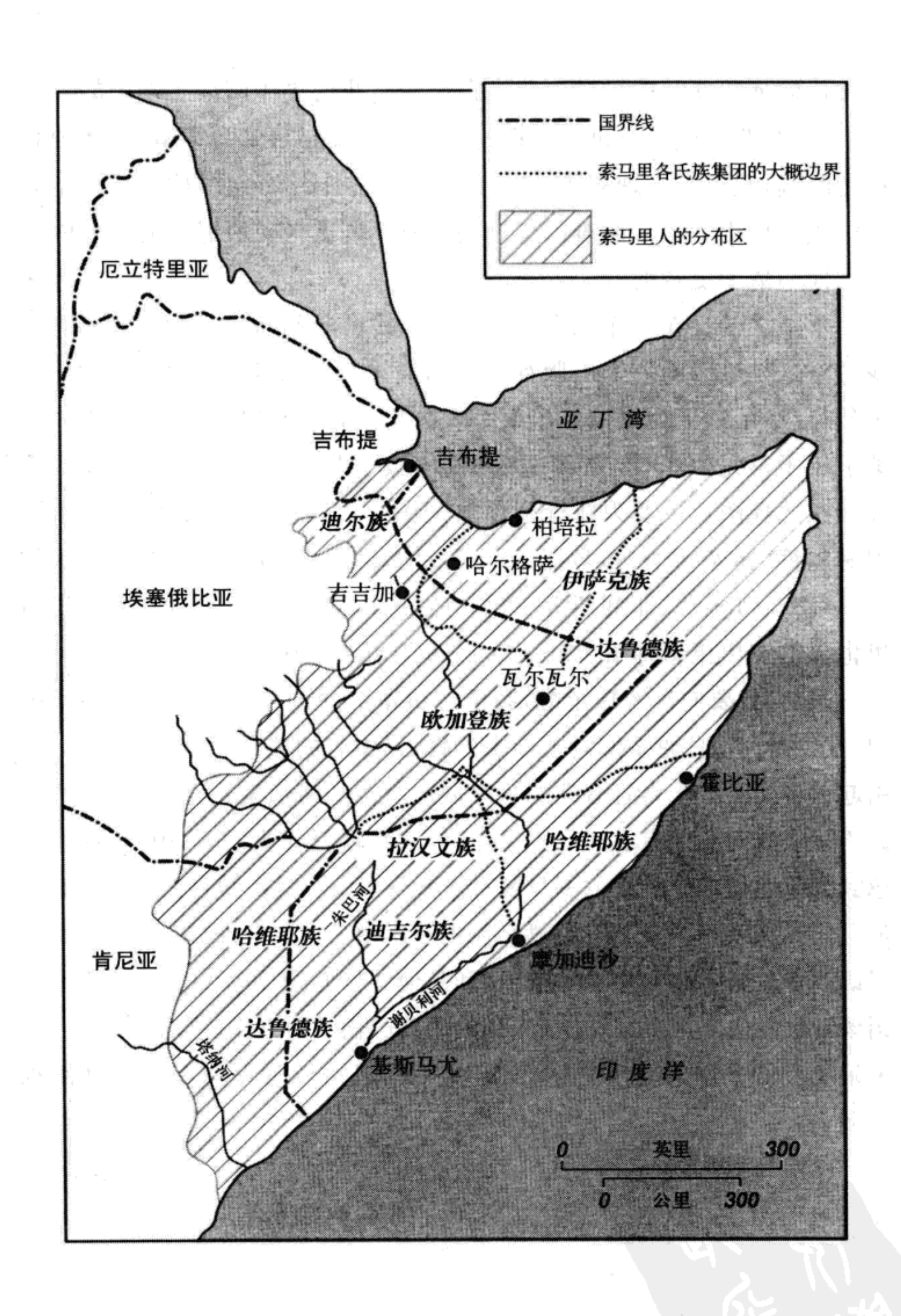
本书之前曾在三个出版社出版过，其出版历程犹如一段游牧史。我希望这是最后的一个出版社。詹姆斯·柯里是本书新发行人，性子虽然很急，不过极为热情且乐于助人。我尤其高兴地看到，本书再一次地引用了早先 1965 年的第一版和其他版本中的插图，并还配有新的图片。在选择图片以及为新近事件加配图片上，我也要感谢伊斯梅尔·阿赫默德、米歇尔·布罗菲（Michael Brophy）、阿卜杜拉希·杜尔（Abdullahi Dool）、菲利斯提·托马斯（Felicity Thomas）以及关注索马里世界的杰出摄影师哈米什·威尔森（Hamish Wilson）。

最后，我要向读者提个醒，我已经将章节中的注释限制在最小限度内，仅仅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加了注释，其中有的注释还较为详尽，以便引起读者对一些丰富且有趣的材料的注意。如果遗漏了一些材料的话，并不代表我对它们有看法。不过，这些注释还是相当的多，因此，我仍然感到如果不做一个独立的书目就有点不合理了。我在誊写索马里人姓名的时候，一般是用其英国化的姓名而不是用索马里文字拼写的名字。索马里语读者在恢复索马里人姓名全拼和其他调整上没有什么困难，非索马里语读者也能认出并读出本书所采用的用英国化了的方式拼写而成的姓名。如果我严格采用索马里文字的话，非索马里语读者可能就要感到困难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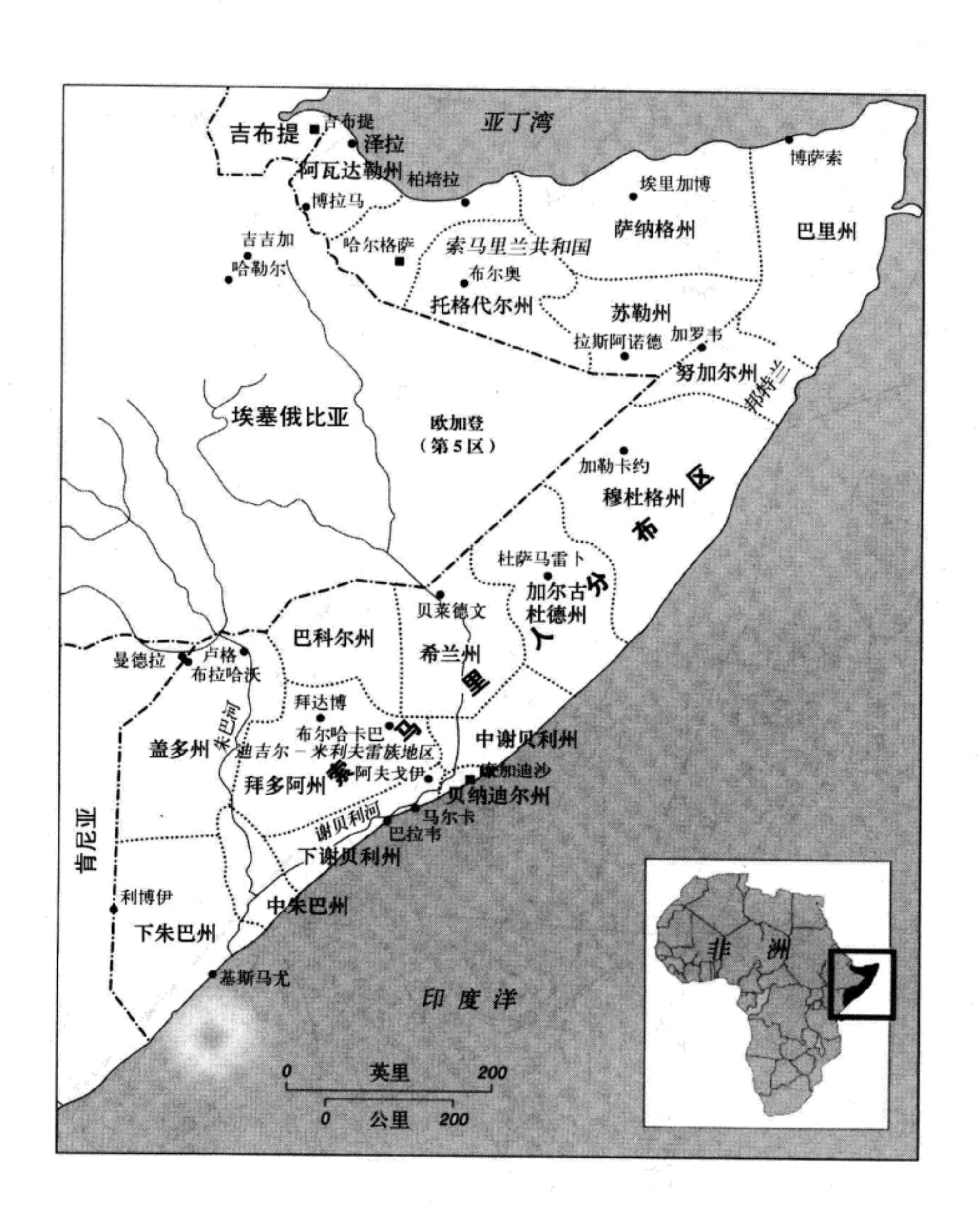
约安·刘易斯（Ioan Lewis）

伦敦，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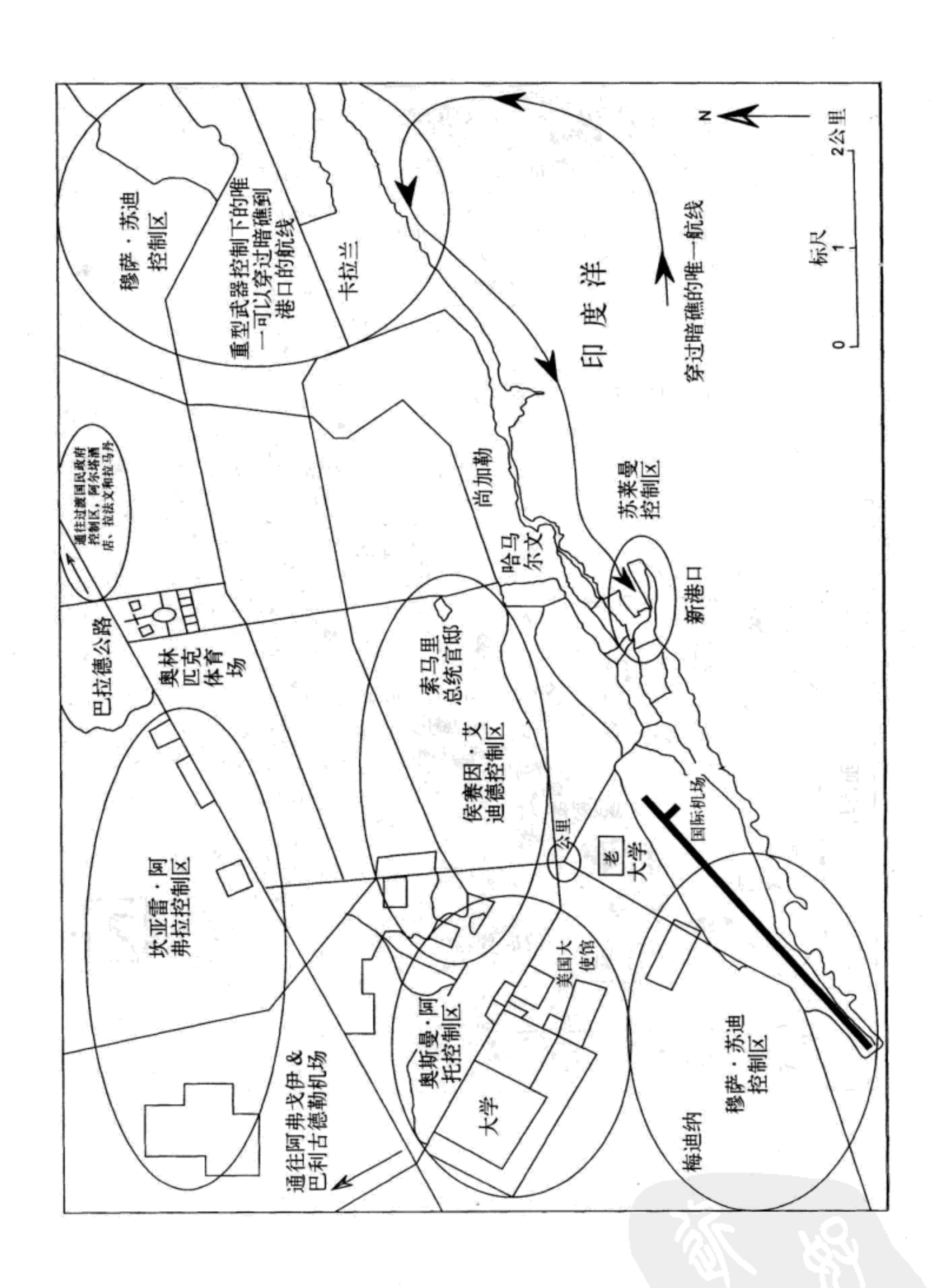
① 参见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London, 1964。



地图一　索马里的族群与氏族分布图(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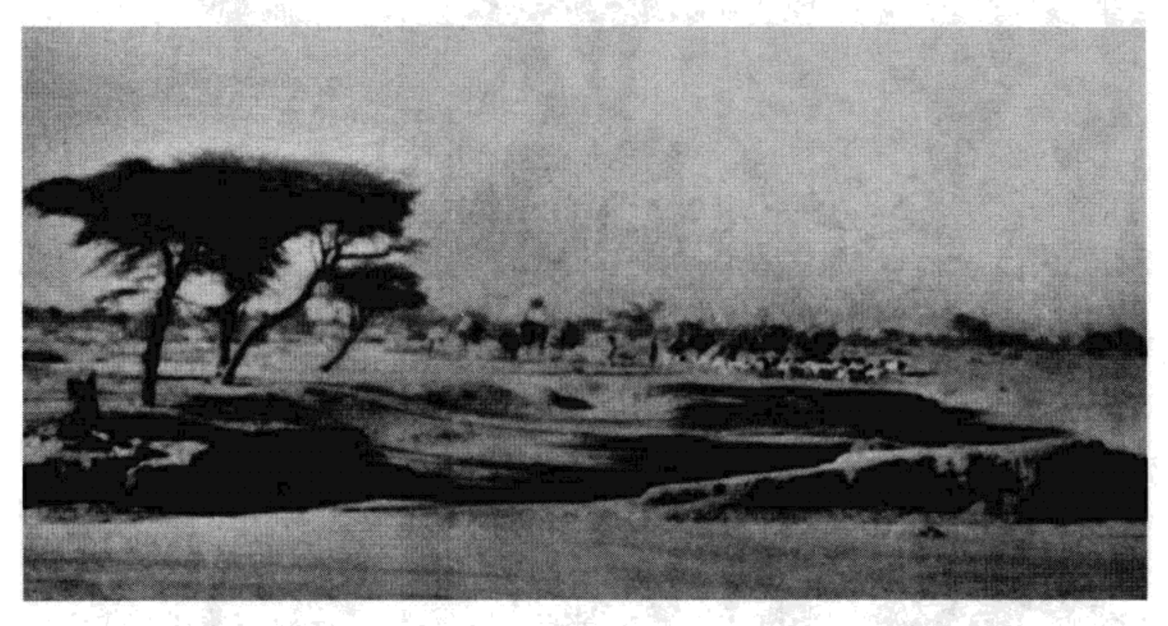


地图二　索马里国家与地区（2002 年）



地图三　军阀对摩加迪沙的割据(2001 年)

(在 Mohamed Rashid 和 John Drysdale 绘制的地图上加工而成)



1. 在清晨赶往干涸的河床的游牧家庭(索马里兰)。在干燥季节里,游牧民为了寻找牧场和水源必须经常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

2. 在索马里南部的谢贝利河畔,一个年轻的牧民和正在饮水的牛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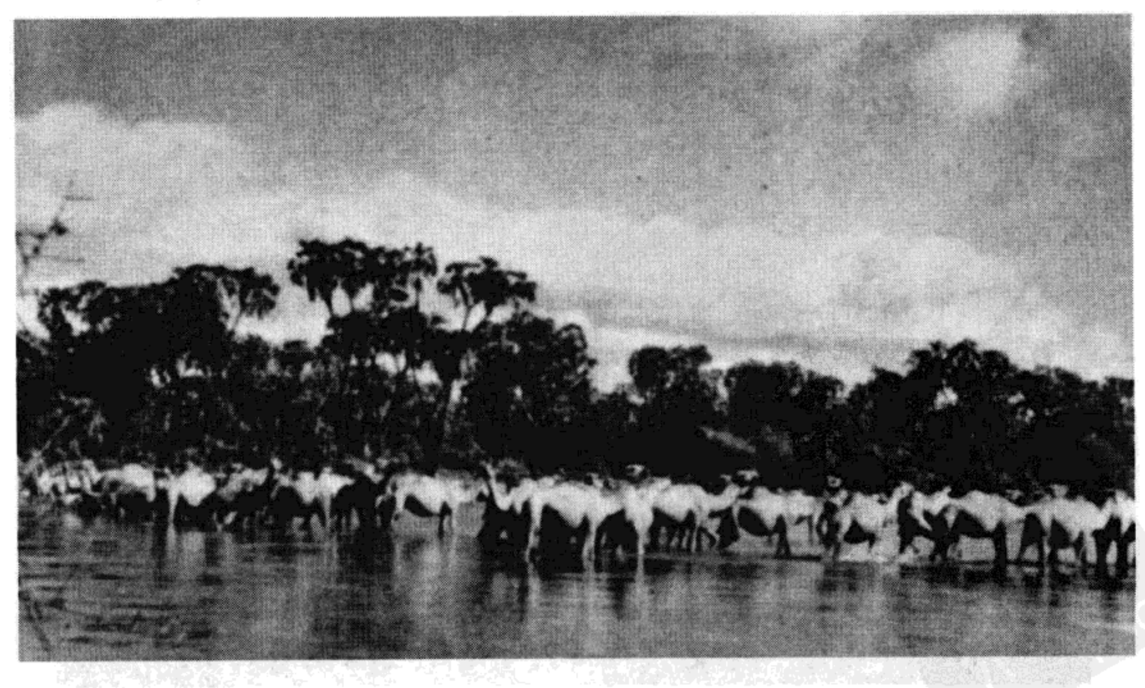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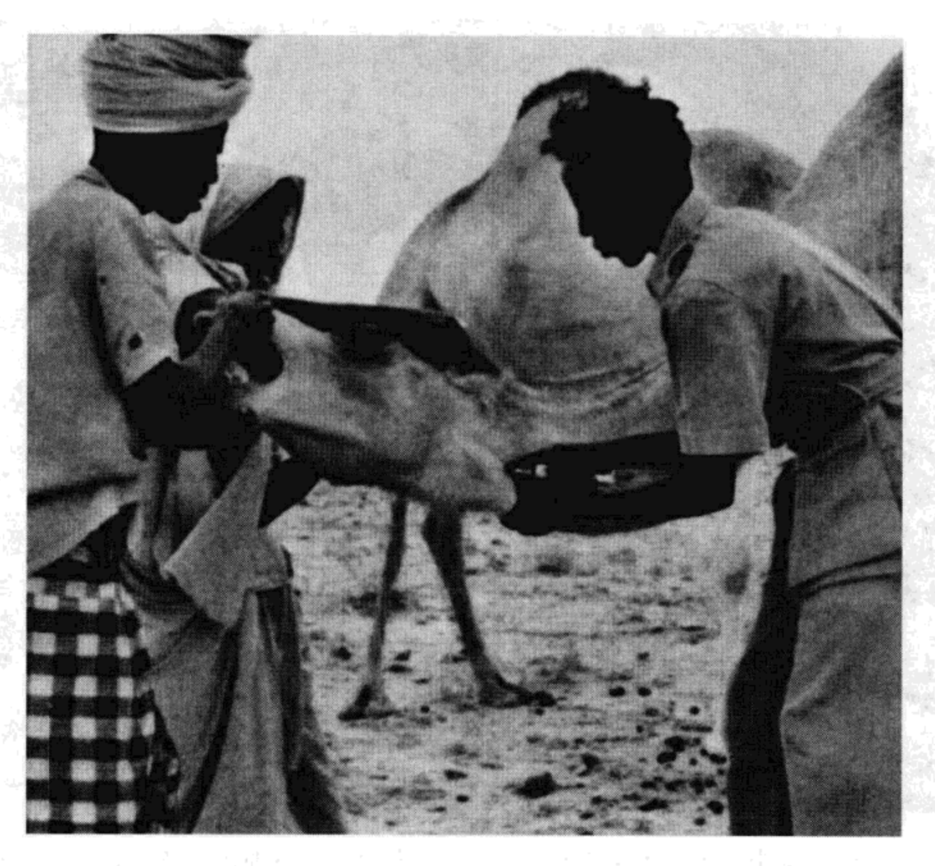


3. 索马里西北部哈尔格萨与博拉马之间可耕区上的一块成熟了的高粱地。这一地区是索马里北方种植谷物的主要区域。

4. 一位南索马里部落酋长和他的两位妻子及一名部落警察。在索马里南部谢贝利河与朱巴河之间的农业地区，典型的住房就是这种圆形的篱笆浆土屋。

5. 达瓦帕尔玛河是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西北的边界线，位于在索马里人居住的肯尼亚东北地区的最北部地区，水源较多。在这片半沙漠地区的其他地方，水是极其稀缺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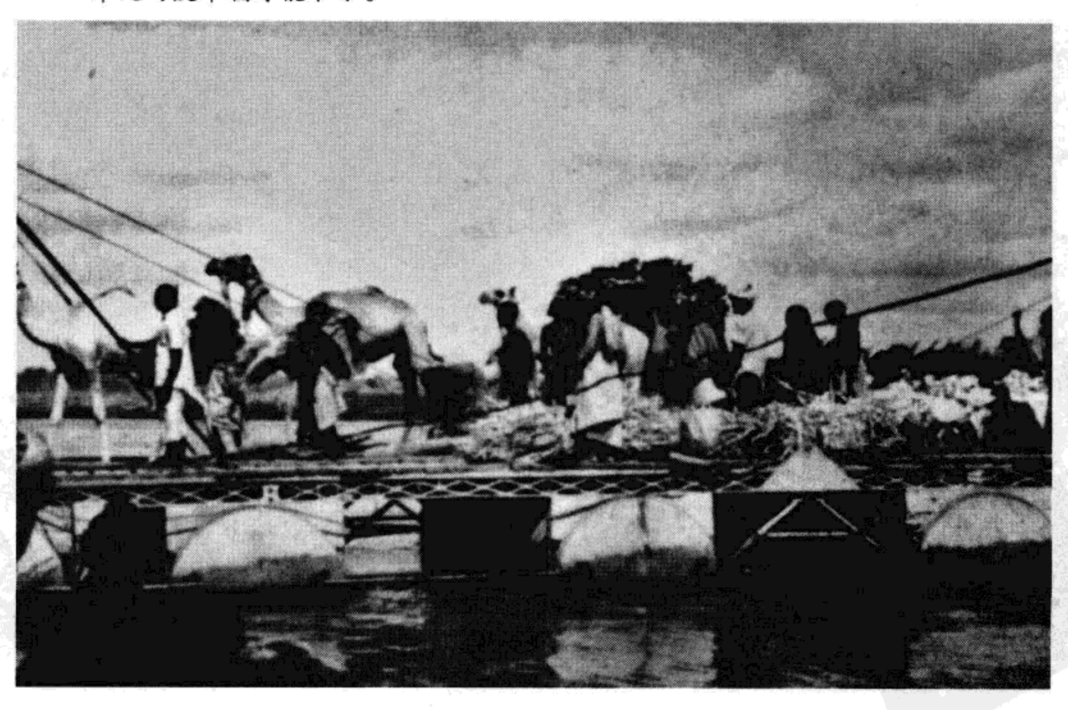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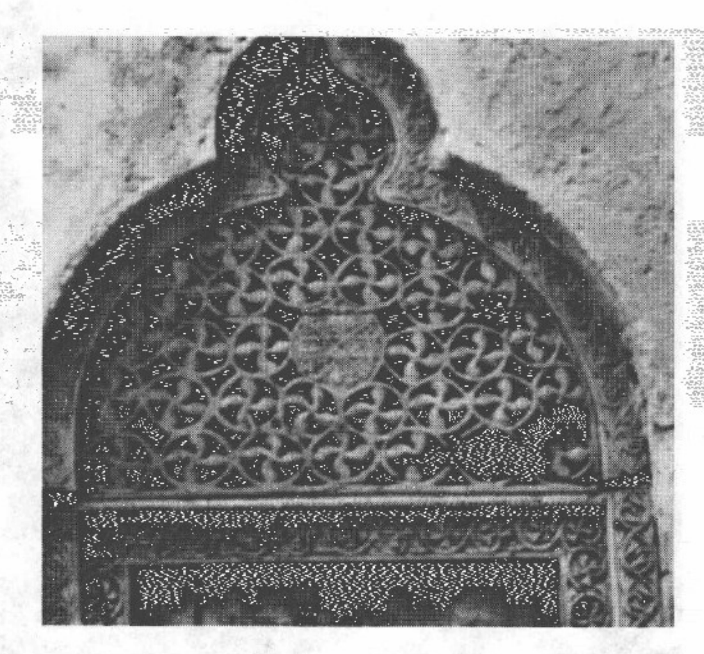
6. 牲畜检查员正在给骆驼注射防瘟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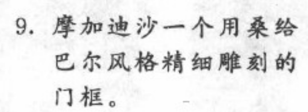
7. 将人和牲畜运送过朱巴河的人力摆渡。

8. (右页图)南索马里正在饮水的骆驼。在类似这样的深井,人们需要用带有很长牵绳的皮革桶才能取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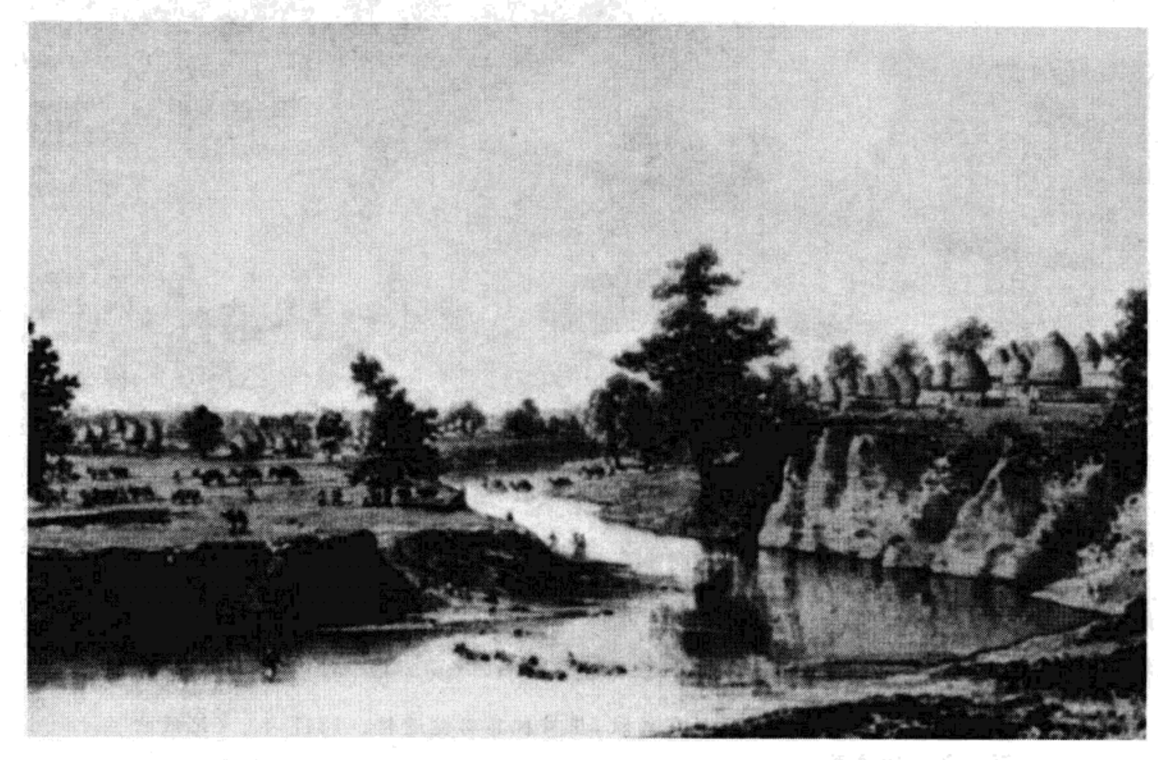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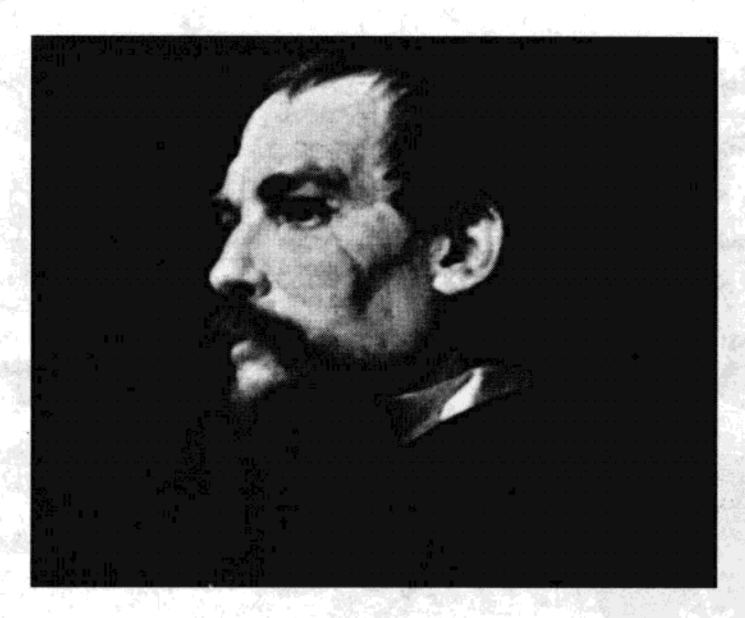
9. 摩加迪沙一个用桑给巴尔风格精细雕刻的门框。

10. 1847 年法国探险家查尔斯·吉兰所看到的摩加迪沙景象(记载吉兰探险之旅的画册中的一副图片)。摩加迪沙最古老清真寺上的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 1238 年,而摩加迪沙最早的墓碑铭文则可追溯到 8 世纪。

11. 摩加迪沙用来榨取芝麻油的压榨机,压榨机靠骆驼运转。1847 年。(记载吉兰探险之旅的画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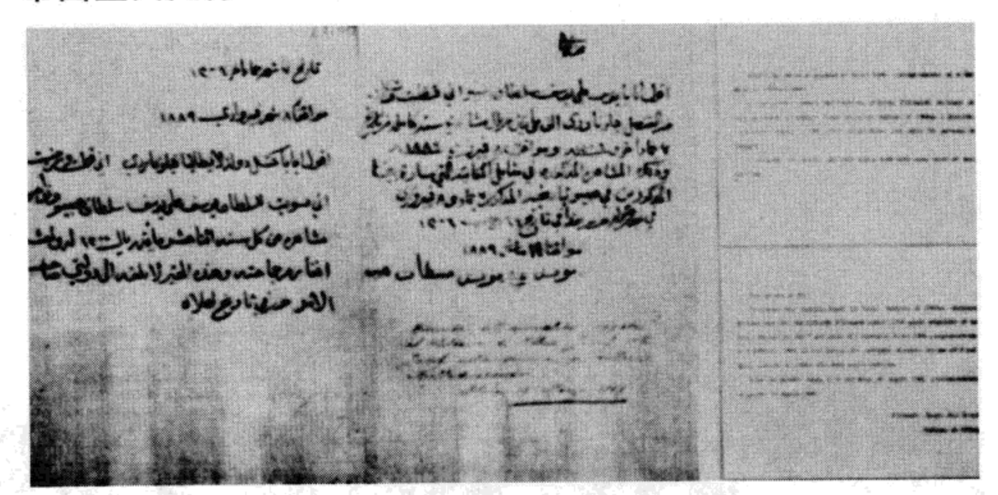


12. 1847 年吉兰旅行时期所看到的谢贝利河畔上的格勒迪(即阿弗戈伊)小城的景象(吉兰画册)。格勒迪苏丹是 19 世纪贝纳迪尔沿海一带最有权势的索马里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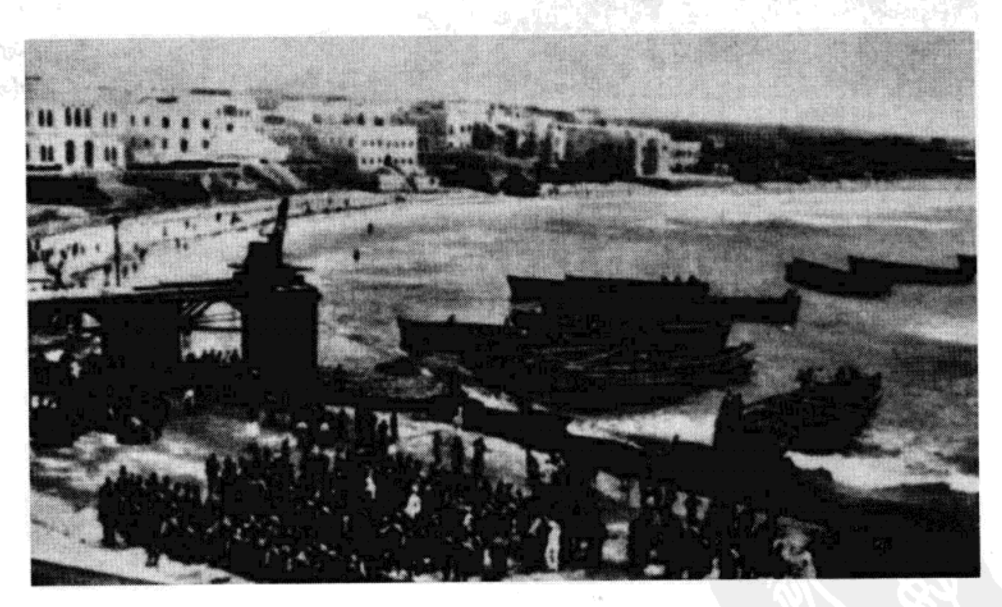


13. 理查德·伯顿爵士,对索马里进行探险的最著名探险家(1876 年莱顿勋爵(Lord Leighton)所画的肖像,伦敦,国家肖像画廊)。伯顿才华横溢地记录了其 1854 年著名的从泽拉到哈勒尔——他称之为"东非的廷巴克图"——的旅行,这本记录是官员北索马里历史与文化最具价值的早期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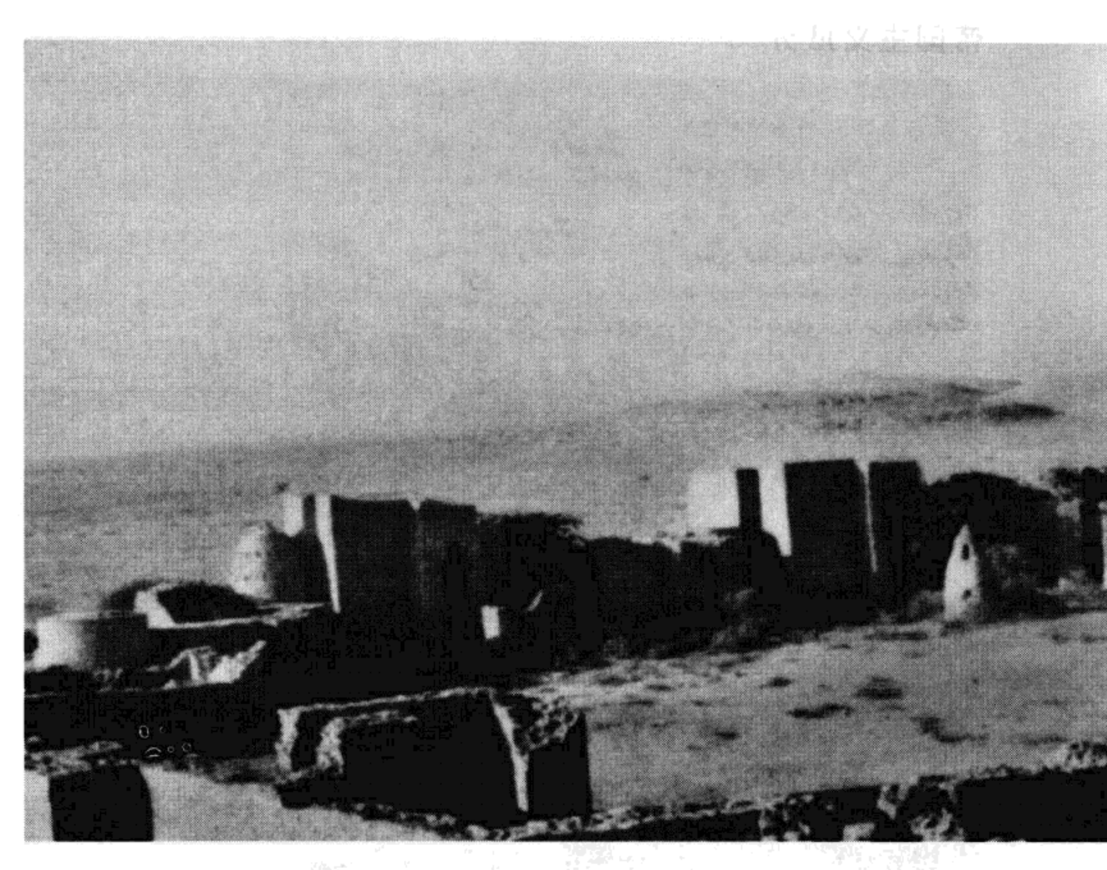
帝国主义瓜分



14. 1889 年 2 月 8 日至 3 月 19 日，霍比亚苏丹阿里·优素福与意大利领事文森索·菲洛纳尔迪之间的来往信件。为了换得意大利人的保护，苏丹每年需缴纳1 200 美元的保护费。



15. 1925 年摩加迪沙港口上正在登船将要对霍比亚和阿卢拉展开行动的军队。这两个北部意属保护地最终被并入到意属索马里殖民地。



16. 位于索马里东北部塔勒赫的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总部遗址。此处照片反映的是1950年的情形，距英国空袭和德尔维希运动失败已经有30年了。

17. （右页图）创立意索农业公司的阿布鲁齐公爵。该公司让殖民地的农业种植走向合理化，并给殖民地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发展。公爵是西班牙王位的直接继承人，死于1933年，后被安葬于谢贝利河畔以他名字命名的农业中心。



对索马里的军事托管



18. 英国军管当局最后几年期间在摩加迪沙政府办公地召开的典礼，该典礼标志着斋月的结束。面对卡迪酋长的是 R. H. 史密斯准将，他在 1948 年是索马里的主要领导人。虽然英国将几个索马里领地统一起来的计划失败了，但正是在英国的军事管制下索马里开始了现代化的起步。

19. 正在摩加迪沙附近一口水井取水的索马里立宪党。这支由英国军官领导的武装警察部队在索马里增强反部落意识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独立前的筹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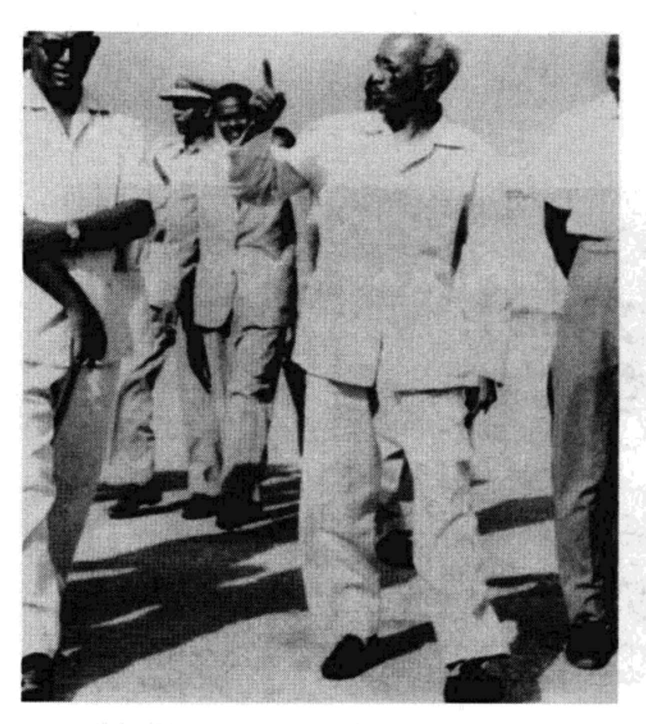
20. 1952年杰拉尔德·里斯爵士（英属索马里总督[1948—1953]）在哈尔格萨主持贸易学校的开学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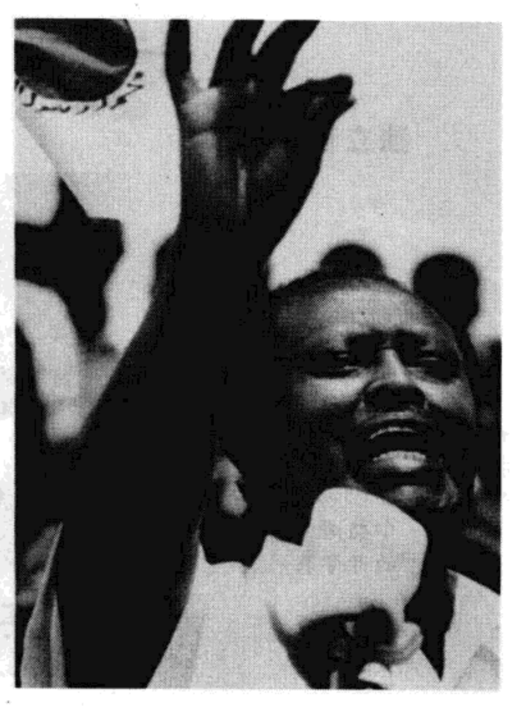
21. 索马里区专员在南部地区接见部落民众。在索马里的意大利托管当局的领导下，1956年即独立前4年，所有外籍区州专员都被换成意大利培训出来的索马里官员。



22. 1958年12月，穆罕默德·阿卜希尔上校在摩加迪沙从意大利宪兵队的阿内尔上校那里接任索马里警察部队司令。麦克风后面的是索马里当时的行政官迪·斯泰福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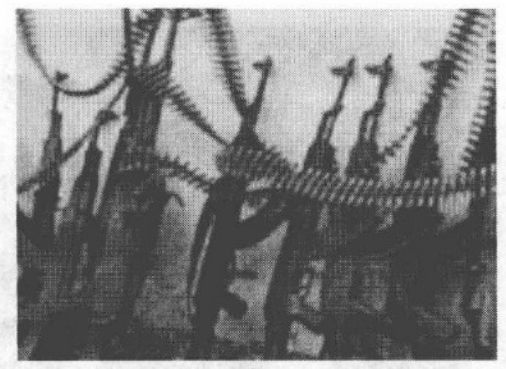
23. 20世纪60年代早期，索马里首任总统阿丹·阿卜杜勒·伊斯曼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在南索马里视察水灾。



24. 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总统在哈尔格萨的一次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讲。

25. 在摩加迪沙机场上准备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将军及其随从人员。从左至右：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将军、保镖、侯赛因·库尔米耶副总统、伊斯梅尔·阿里·阿博科尔副总统、西亚德总统、优素福·阿卜·拉斯(摩加迪沙市长)和奥马尔·阿尔特(外交部长，也是西亚德政府中唯一的文职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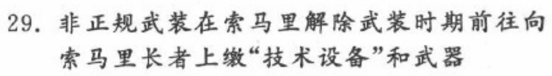


26. 阿布杜勒卡西姆·萨拉德·哈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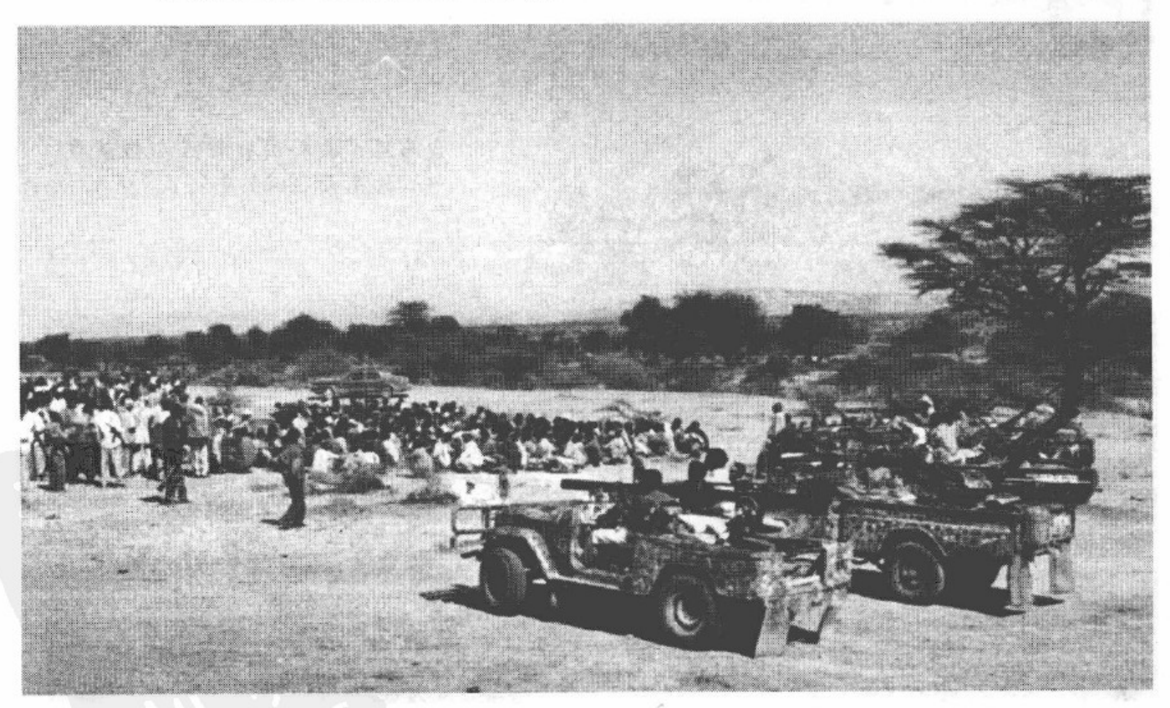


27. 摩加迪沙武器市场(2000 年)

28. 不准调用的“技术资源”,处于监管之下



29. 非正规武装在索马里解除武装时期前往向
索马里长者上缴“技术设备”和武器





30. 哈尔格萨市“埃德娜·阿丹”妇产医院门诊部正式揭牌(2000 年)。

31. 邦特兰博萨索港口正在装载用来出口的骆驼。

32. 索马里兰共和国首都哈尔格萨市中心的街景(2001 年)。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自然与社会环境

国土

说索马里语的人约为 450 万，他们算不上是个大民族（nation），然而，他们却是非洲最大的单一族群（ethnic block）之一。尽管分布松散，他们却连绵地居住在一片广阔的领地上。这片土地面积约为 40 万平方英里，地处非洲大陆的东北角，或称之为“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隔海相望。索马里地区经常干旱，该地区从西北部的阿瓦什河谷（Awash Valley）开始，沿着埃塞俄比亚高原边缘和亚丁湾与印度洋海岸一直延展到肯尼亚北部的塔纳河（Tana River）。虽然现在索马里分为四个独立的部分，但该地区地界、族群明确，是索马里人认为可构建单一主权国家的天然基础。在前法属的吉布提（1977 年独立），索马里人占到当地人口的一半多（总人口 35 万人中有 20 万索马里人）；在毗邻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人可能达到 100 万之众（主要在哈勒尔［Harar］和贝尔［Bale］州）；在索马里共和国本土，索马里人约为 325 万。[1] 在肯尼亚的东北部地区[2]，索马里人约为 25 万。此外，东非的很多城镇和港口（如内罗毕）还定居有索马里商人。索马里人在亚丁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索马里人还遍布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由于流动的海上生活，在更远的地区，在马赛、那不勒斯、伦敦和加的夫

(Cardiff)等各个欧洲港口,索马里人也形成了少量的、数量不等的社区。

索马里人的故土是干燥的大草原,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游牧民族。气候与环境迫使索马里人带着羊群、牛群不断地寻找水源与牧场。北部沿海的古班平原(Guban,源自 gub,意即火烧)尤其干旱,该地区从吉布提共和国熔岩散布的沙漠沿着亚丁湾海岸一直延伸到瓜达富伊角(Cape Guardafui)。该地区年降雨量很少超过三英寸,且每年集中在 10 月到 1 月这几个凉爽的月份。在从 6 月到 9 月这几个炎热月份,古班平原实是名副其实的"火烧之地";除了吉布提首府吉布提市(人口 18 万)和索马里共和国柏培拉(Berbera,人口 6 万)的城镇居民外,游牧部落在这个季节里通常都会离开这里而到那些较为凉爽点的、植被更多的山区。尽管古班平原常常酷热,雨量稀少,但内陆山脉的溪流还是保证了水源的供给,取水通常还是较容易的,古班特有的沙土层下几英尺的地方就有水源。由于拥有这些水源以及秋雨后有时会冒出特别茂盛的牧草,该地区成为最北部的索马里氏族的过冬之所。

雄伟壮丽、悬崖陡立的戈里斯山(Golis)和奥戈山(Ogo)耸立于海岸后面,在整个索马里地区中地势最高。这条山脉东部的一些山峰高度达 8 000 英尺;西部与埃塞俄比亚高原相接处、靠近古老的穆斯林城市哈勒尔(人口 6 万)的地方,高度达 9 000 英尺。在南部,山脉下落为一大片地势倾斜的高原,其中部平均海拔为 3 000 英尺。该高原构成了索马里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在涵盖前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首府哈尔格萨(Hargeisa)这个重要中心的山区与高原的北部地区,降雨量有时高达 20 英寸,尤其是在哈尔格萨与哈勒尔之间的西北部地区,此地种植有高粱。在这里,水源总体上丰富,干涸的河床下打有常年存水的深井,为北方很多主要的氏族提供了冬季取水的地方。在哈尔格萨南部,北部高原变为大片荆棘丛生、茅草茂盛的荒原,被称为"豪德"(Haud)。在索马里北部,"豪德"就是"南方"之意。该地区没有常年的水源,覆盖的范围也是模糊的。豪德的北端与东端位于索马里共和国境内,西部与南部地区(南部地区融入到欧加登平原)是埃塞俄比亚哈勒尔州的一

部分。

在豪德的南部，高原自西向东倾斜，一直伸展到东南方的印度洋海岸。这里的一些低洼平原与河谷将高原分割开来。这些平原谷地比在地势陡峭的北方出现的那些要大得多，且植被茂盛。南部河谷中最为重要的是谢贝利河(Shebelle)和朱巴河(Juba)，这两条河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流向海岸。这两条河常年水流不断，是塔纳河以北整个索马里地区的主要河流。

谢贝利河又称“豹河”(Leopard River)，纵横 1 250 英里，但并没有流入大海。它穿过欧加登南部地区后一直向东，最远处流到离印度洋海岸有 20 英里的巴拉德(Balad)，然后在巴拉德转而向南一直又连绵了 170 英里，最后流到朱巴河沿岸的杰利布(Jelib)，消失在一片片沼泽地与沙洲中。只有在有特大雨量的情况下，谢贝利河才汇入朱巴河进而流入大海。在谢贝利河南部的朱巴河则更为直接地从埃塞俄比亚高原流入大海。在基斯马尤港(Kismayu，人口 6 万)附近，朱巴河河宽 250 码，且水流湍急。从朱巴河河口到巴尔德拉(Bardera)这一数英里的急流流段，浅水船可以通航。1865 年，德国探险家冯·德尔·德肯(von der Decken)的“维尔夫号”轮船就是在这一河段上沉没的。索马里大部分地区都是灌木、杂草丛生的宽带状平原，平原上间或长有零星的、高大的阿拉伯橡胶树。相比较而言，这两条河流沿岸的诸多地方有狭窄的、美丽的乔木林带。在这里，索马里其他地区大量存在的羚羊类动物、小型野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象与河马。

与北部地区相比，索马里共和国南部谢贝利河与朱巴河间的地区水源相对要丰富得多。依照索马里当地的标准来看，该地区土地肥沃，是索马里最为富饶的耕作区域。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有高粱、玉米、芝麻、豆类、瓜类和木薯。此外，还有水果与甘蔗，不过它们主要种植在大公司所有的种植园里。香蕉是主要的出口作物，由大量的意大利、索马里公司依照索马里政府制定的配额制度来生产。除了南部这两条河流间的肥沃地区，在索马里找不到能与这里相匹敌的耕作区，但是索马里西北部地区现在的高粱产量可观，谷物生产、椰枣种植都在扩大。

尽管索马里北部与南部地区在自然环境与生产力上有着上述总的差别，可是它们的季节周期相同，都受到从东北和西南吹来的季风影响。除了一些地区性的雨量不大的降雨期，整个索马里地区每年有两次降雨，即 3 月到 6 月，9 月到 12 月。旱季也是每年两次，但当北部沿海地区处在每年夏季最炎热的时候，南部地区相比而言却气候宜人，较为凉爽。在吉布提共和国由火山作用而形成的地区，并没有那种常态的季节周期分布，气候除了酷热外，更是难以预测。索马里共和国的首府摩加迪沙(Mogadishu，人口 35 万)以及南部印度洋沿岸其他一些港口气候虽然潮湿，但在凉爽的季节里还是很舒适的。

民族

从民族与文化上来说，索马里人属于含族(Hamitic)。他们最近的亲缘族群是埃塞俄比亚低地与厄立特里亚周围的含族人(通常也被称为库希特人[Cushitic])，即有好战传统的阿法尔人('Afar，或称之为 Danakil，即达纳基尔人)[3]、奥罗莫人(Oromo，或称之为 Galla，即盖拉人)、萨霍人(Saho)与贝沙人(Beja)。索马里人的北方近邻是游牧的阿法尔人。索马里人与阿法尔人共同居住在吉布提，且阿法尔人一直分布到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境内。在西面的埃塞俄比亚境内，索马里人和从事耕作与游牧的奥罗莫人相伴，在南边的肯尼亚境内，索马里人与博兰盖拉人为伍。

虽然索马里人本身也有很多差异，但一眼就能辨识出来，索马里人的体格特征是：高身材、瘦骨骼且头部明显狭长。肤色有很多种，从古铜色到暗黑色不等。索马里人的面部特征尤其展示出他们与阿拉伯人之间历史悠久的联系。在南部，迪吉尔(Digil)和拉汉文(Rahanweyn)部落的体征显示出他们与该地区的奥罗莫和班图民族在过去有着接触。然而，索马里人在传统上最为重视与阿拉伯人的联系，并喜欢用一些历史传说来夸耀他们是阿拉伯世族、先知家族的后裔。虽然这些说法被今天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斥为无稽之谈，却部分地显示出索马里人过去对伊斯兰教有着较深的情感。这些说法也反映了索马里人与阿

拉伯沿海地区长期以来的联系，且这种联系给索马里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阿拉伯文化很多其他要素。

因此，索马里语[4] 中有相当数量的阿拉伯外来词汇，且阿拉伯语本身的使用也非常广泛，几乎被视为第二语言。虽然索马里语到 1972 年才有了书写文字[5]，但它具有显著的特征，是一种独立的、特别生动的语言，有着非常丰富的口头文学。在索马里境内，北部游牧民族与迪吉尔、拉汉文部落之间的方言差别最大，这种差别几乎相当于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之间的差别。南部方言也有明显的区别，但很多说南部方言的人也熟悉标准的索马里语。因此，从吉布提共和国到肯尼亚塔纳河的加里萨(Garissa)，标准的索马里语是沟通的唯一用语，也是诗歌得以流传的共同语言。应该补充说一下，从古至今，诗歌在索马里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无线电广播的广泛使用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诗歌的重要作用。一首诗歌常常不单单是作者自己的心声，更常常是一个抗争群体的集体心声。通过诗歌进行和平或战争的宣传，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要更为有效。[6]

迪吉尔与拉汉文部落在语言上与他们在北部、南部那些更具有游牧性的同胞之间的差别，是索马里民族中萨马勒族(Samale，即索马里本部)与萨卜族(Sab)之间在文化、地理和历史上更大差异的一个表现。萨马勒族是索马里民族的主体，其名称渐渐变为包括萨卜族在内的统称，或许类似于外国人用“英国人”统称不列颠群岛所有居民。索马里民族中这一更大的亚群体包括四个主要部落或氏族群(clan-families)。索马里人的血统是按照父系溯源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创始先祖，按照惯例，该群体的成员都是这个先祖的子孙，并用一个集体的姓氏。

萨马勒族包括迪尔(Dir)、伊萨克(Isaq)、哈维耶(Hawiye)和达鲁德(Darod)部落，它们基本上都是游牧部落，广泛地分布在索马里全境。迪尔部落的氏族(即伊塞[Ise]和盖达布尔西[Gadabursi])主要聚集在索马里共和国北部地区(前英属索马里)的西部区域、吉布提共和国与埃塞俄比亚哈勒尔州的东部地区。在马尔卡(Merca)南部、巴拉

韦(Brava)与朱巴河间的地区也存在人数较少的聚居区。伊萨克部落(与迪尔部落在一起有75万人)主要居住在索马里共和国北部地区的中心区域,但他们的放牧活动也延伸到埃塞俄比亚豪德高原区。在伊萨克部落东边,他们和达鲁德部落的杜尔巴汉特(Dulbahante)、瓦尔桑格里(Warsangeli)这两个支系混居在一起。达鲁德部落人口数约为150万,是所有索马里部落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部落。除了前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东部地区外,达鲁德部落还占有伊斯特恩(Eastern)、努加尔(Nugal)与穆杜格(Mudug)地区,以及豪德与欧加登的绝大部分地区,最后一直延伸到肯尼亚东北部地区。但是在索马里共和国中部插入了哈维耶部落,在两河之间又插入了迪吉尔与拉汉文部落。哈维耶部落自夸人口达50万之众,居住在米朱提因(Majerteyn)的达鲁德部落以南的穆杜格、希兰(Hiran)与摩加迪沙附近。他们还越过了谢贝利河盆地,并与萨卜部落混居在一起。与达鲁德部落一样,他们在肯尼亚北部也有相当多的人口。

萨卜部落总人口不超过50万,数量较少,分布也不广,只有上文提及的那两个主要分支。他们比索马里其他族群更倾向于耕作,他们的居住地主要局限在两河之间的肥沃地区。在这里,从事游牧与耕作的两部分不仅彼此混居在一起,还与萨马勒族诸部落氏族的游牧者混居在一块。

索马里民族这些分支的分布与各自人口数对理解今天与过去的事态非常重要,此外,也要提一下一些较小的族群。其中,人口数最多的(约8万人)是已经索马里化的班图人(Bantu),他们分散居住在谢贝利河与朱巴河沿岸以及两河间一片片从事耕作的村庄里。他们有一部分出身于早期的班图人与说斯瓦希里语族群,有些出身于19世纪末禁止奴隶制时期获得自由的奴隶。虽然他们现在依然具有原有的很多体征特点,但从社会性的角度上来说,班图群体正逐渐被范围更广的索马里社会所同化。其中,最著名的几个群体是谢贝利河沿岸的希德勒人(Shidle)与谢贝利人(Shabelle),以及朱巴河沿岸的瓦戈沙人(Wa-Gosha,或戈沙人[Gosha])与戈巴文人(Gobaweyn)。人口数量虽少,

但在经济与政治上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移民群体(索马里共和国内约4万人,在吉布提共和国内约为1.2万人),他们主要是阿拉伯人(其中,很多家庭多个世纪以来都定居在沿海地区),也有少量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与波斯人。欧洲人数量也不多(索马里有5 000人,吉布提共和国有1.5万人),主要从事贸易与商业,也有从事发展与技术援助的。极少数常年定居在索马里的欧洲人,主要是索马里南部的农场主与庄园主。

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

虽然从事某类耕作的人口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大,但固定下来从事耕作的人口数可能不到索马里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且主要是南部迪吉尔与拉汉文部落。因此,对于居住在北部干旱环境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游牧是主要的谋生手段,其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总体上受制于缺乏资源的严酷环境。在这些地区,游牧民们以家乡的水井为中心分散开去,每年都长途迁移,赶着羊群、骆驼群,在南部还赶着牛群,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从一处水源到另一处水源。

在世代牧养的牲畜中,虽然索马里小马一直是最能带来尊贵和声望的牲畜,但索马里人最看重的却是骆驼。精心饲养的骆驼可以为他们提供骆驼奶,也可以为他们提供运输服务。奶骆驼可以为游牧民提供骆驼奶,游牧民常常赖以为食,同时也是他们仅有的一种食品。用于搬运的骆驼则给他们到处迁移提供搬运服务,搬运他们可以折叠的棚舍或帐篷以及全部家当。这些骆驼通常是不让人骑的,除了病人。他们用骆驼皮制作便鞋以便在迁移各地的过程中保护双脚。但是,这些用途本身并不能说明游牧民们为何如此看重骆驼;也不能解释,尽管金钱长期被广泛使用为通货,但衡量一个人财富最主要的依据为什么还是骆驼群的规模与好坏。索马里文化中这种明显的偏好可以以这种原因来扼要地得到最好的解释,即游牧民们在其社会与经济交往中以骆驼为计算标准。因此,在缔结婚姻的时候,男女双方及其各自亲属间在互赠牲畜与其他财物时用骆驼作为媒介最为合宜,而且实际上现在也

是这样做的。[7] 而男人的生命价值与女人的从属地位也正是利用骆驼才物化地体现出来。一般来说,为一个男人偿命要一百头骆驼,而为一个女人偿命只要五十头骆驼。较轻的伤害也是同样地用数量不等的骆驼来赔偿。虽然在传统看法中,绵羊与山羊也被视为某种面值更小的货币,但男人对它们却没有像对骆驼那样上心,事实上,它们是女人所操心的牲畜。

这两种不同态度是与以下这种事实相吻合的,即奶骆驼与羊群通常是分开放牧的。男人的一个或多个妻子及小孩随着羊群迁移,羊群给他们提供奶源,另外还要有几头用于搬运的骆驼用来运输帐篷与其他物品。耐渴且持久力更大的奶骆驼则是由男人未结婚的兄弟、子侄们来放牧。骆驼群远离羊群,到处快速地迁移,且迁移范围广泛,而羊群则不得不紧紧地依附在水源附近,尤其是在旱季。在旱季,放牧骆驼是一件艰苦费时的事情,需要在不同的牧场、水井间不断地往返跋涉。放牧骆驼也能很好地培养负责放牧的男孩们,让他们具有索马里人性格中所特有的独立与机智。

由于有这种双重放牧制度,游牧民们带着牲畜到处寻求牧草与水源,他们必须使其迁移最大可能地适应这两种生活必需品的分布。人们通常将牧场视为真主送来的礼物,或说是送给索马里人的礼物,且不被认为是属于某个具体的族群。一般说来,雨后牧草新绿之时,人与牲畜就最广泛地散开了;而在旱季,人与牲畜就不得不聚集起来,离水井更近些,借着能找到牧草的地方勉强度日。只有奶骆驼群及其看管者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受季节条件的限制。骆驼不常喝水,但喝起来量很大,因此安顿骆驼的地方必须要能便利地满足这种需要。水源的控制权主要取决于水源的丰富与使用起来便利与否。只有在获得水源不便利与要费大量劳力、努力才能使用水源的地方,人们才会维护水源的独占权,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动用武力。一般说来,在游牧流动性方面,虽然游牧群体并没有被硬性地固定在某些地区,各个群体也没有公认的地域归属;但是在旱季里,各个游牧群体便经常来到“家乡的水井”周围,另外人们有时会临时聚集在某处水源周围,这里于是往往

都会形成贸易点。这样的临时贸易聚居点在索马里人生活的地域内到处可见,它们也是游牧群体常常造访的地方,与“家乡的水井”一起,为否则可能太过随意的游牧流动施加了某些限制。

由于受制于季节的变化以及雨量与牧场的不同分布,诸多氏族(这些氏族是最大的有效政治单元,人口从 1 万到 10 多万不等)往往会与某些特定的牧场有着不是很明确的联系。氏族传统上是由苏丹(索马里语称为苏丹[Suldan]、波卡尔[Boqar]、盖拉德[Garad]、乌加斯[Ugas]等)来领导的。“苏丹”这一称号会让人想起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显赫声名,却与索马里氏族领导人的实际地位并不相称。这些氏族领导人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便利称呼,并没有固定的制度化的那种权力。事实上,对索马里北部地区的绝大多数氏族来说,苏丹的地位虽然常常是世袭的,但充其量不过是尊称,其实际权力常常只相当于其他氏族长老的权力,有的可能还更小。事实上,正是这些长老(最广义上说包括所有成年男性)掌控着氏族的事务。除了几个特例外,索马里游牧社会里没有权力等级制度,其惯常的决策程序是民主的,甚至是无政府状态的。然而,必须要立即加以补充说明一下,这种明显不分等级的传统政治制度却看轻一群被称为“萨卜”(sab)的人①。这些人专门从事被游牧民视为低下的工作,如狩猎、皮革-金属加工与理发。从事这些工作的“萨卜”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且被禁止与其他索马里人通婚与共同生活,因而是与其他索马里人隔离开来的。今天,这些米德甘人(Midgan)、图马尔人(Tumal)与伊比尔人(Yibir)的权利已经大大提高了,他们过去所受到的绝大部分限制正在消失。[8]

由于没有等级制度,索马里游牧群体不是依附于首领而凝聚在一起。在非洲很多其他地区,依附首领这一治理原则非常重要,但是在索马里,这一原则却被父系亲属具有约束性的联系所取代。父系血统决定了索马里人的政治效忠;无论这种效忠的具体历史表现为什么,其家族关系决定了是政治联盟还是政治分裂。虽然索马里人有时把他们的

---

① 虽同拼为 sab,但注意这与之前提到的作为族群的萨卜人是不同的。——编者注

家系的功能比作欧洲人的住址,但要理解家系的确切意义,必须要认识到,家系远不只是家族自豪感那么简单。这些家系一般决定着一个索马里人在社会中基本的政治与法律地位,及其在社会制度中的具体地位。

尽管父系血统(托尔[*tol*])是索马里社会组织的固有原则,但它却不是独立起作用的,而是与一种政治契约(赫尔[*her*])结合在一起。政治契约的作用并不亚于父系血统,它被用来调动错综复杂的血缘联系,并让这种关系具有明确的含义。孩子们从小就牢记家谱,家谱让一个人拥有了大批亲属,并让他从中根据自己的利益考虑来选择敌友。因此,他有时以其氏族支系成员身份出现,有时以某一氏族成员身份出现,有时又以其氏族内部的一个家族成员的身份出现。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复杂从属关系中,最起到约束作用、最经常调动他效忠的关系是他从属的"血亲复仇集团"(diya-paying group)。这种集团的战斗成员有数百到数千人不等,由近亲组成,通过一种特定的契约联盟而团结在一起,契约条款规定他们集体承担与讨取血案赔偿(阿拉伯语称之为diya)。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受到别人伤害或伤害了别人,集团中所有成员根据契约都有连带关系。因此,如果一个集团中的一个人被另一个集团的一个人杀害了,第一个集团就会集体向第二个集团提出赔偿。同时,在任何一个集团内部,都会有高度合作与互相间的配合。

这个政治、法律实体的成员无需在牧场中聚集而居或共同迁移,但在游牧社会中却是个有着最明确界限的政治单元。要了解这个实体的意义,就必须知道,游牧的索马里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资源匮乏驱使他们为获取水源与牧场展开激烈的竞争。[9] 即使在现代管理体制下,自助依然作用很大,也是纠正错误、调解集团间政治法律问题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国家大部分地区缺乏足够的警力,个体游牧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最终还是依靠其从属的血亲复仇集团来维护。同时,这种界限明确的集团的存在,并不排斥某些场合下范围更大的亲族联盟的形成。因此,在一个氏族内,血亲复仇集团互相敌对;但当氏族遭到外部敌人的攻击的时候,氏族内部的各个支系就会联合起来保护集体的利益。超越氏族范围的最广泛的亲族联系是一些氏族

联合成部落。然而，在传统社会制度中，索马里民族主要分为六大部落，即迪尔、伊萨克、哈维耶、达鲁德、迪吉尔与拉汉文。总体看来，这些部落过于庞大、分布过于分散，无法有效地成为有机整合的政治单位，但是，在党派政治竞争的当前情势下，这种扩展的亲族关系却有了新的生命力与意义。

耕作

索马里共和国的西北部地区与埃塞俄比亚哈勒尔州的水源较多，且种植着大面积的高粱。在这里，游牧制度经历了诸多调整。在过去的两三代人时间里，索马里游牧民仿效近邻奥罗莫农民，转而从事耕作。固定的农业村落已经取代了游牧的临时营地。随着对土地依附感的增加，邻里关系也开始变得重要。虽然传统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正式的变革，但是这种邻里关系成为新式的组织原则。这明显表现在居住在一块的人们像亲戚一样从事诸如收割、挖掘与维修池塘(从事耕作的定居点依赖这些池塘提供水源)等农业活动。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人们对从事耕作的牲畜的偏爱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牛基本上取代了骆驼，人们训练公牛用来耕地。然而，这种转变不是绝对的，因为很多农民或者是流动的，或者虽是定居下来但依然保有骆驼群，只是让年轻点的亲属来放牧而已。事实上，农民用出售高粱得来的钱买进骆驼；除了这些区别外，一个氏族内部的游牧民与农民在文化与社会组织方面并没有什么区别。

农业在改变索马里共和国南部的迪吉尔与拉汉文耕作者传统生活方式上的影响更大。这个地方的耕地传统有数个世纪，人们用的工具是手锄。诸如该地区民族与文化的混合等因素强化了农业革新的影响。因为，除了一小部分迪吉尔人后裔之外，萨卜人是由许多不同成分混合组成的，其中最与众不同的可能是班图人与奥罗莫人的后裔。尽管今天绝大部分拉汉文人是北部游牧民的后代，但其中可以找到几乎索马里北部地区每个氏族的代表，迪吉尔与拉汉文旧有的混合文化中很多方面都保存了下来，并且成为今天这个部落的共同特征。因此，该

地区主要讲的语言是索马里语中的迪吉尔-拉汉文方言,并不是后来主要定居者的方言;虽然很多人既说迪吉尔-拉汉文方言又说北部的索马里语。同时,北部游牧民中还有一个听起来似乎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茶是所有社交场合中的饮料。在朴素的游牧生活中,茶就是宴会的同义语。而在迪吉尔与拉汉文人中间,酥油煮绿咖啡豆则是珍品。人们把盛着咖啡豆的木碟子传给客人,客人吃完咖啡豆后将蒸煮咖啡豆的滚烫的酥油擦在胳膊与头发上,然后用鼻孔吸闻,姿态独特,难以名状,满是惬意与喜悦。

对本节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与北部游牧社会相比,萨卜人的社会等级分化要大得多。一般说来,土地所有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公认的当地土著的后裔;第二类是历史上逐渐来到的移民;第三类是新近的外来移民;其中,迪吉尔与拉汉文每个氏族中的第一类人对可耕地有着最为牢固的控制权,且在礼仪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他两类人,尤其是第三类人,历来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没有那么牢靠。想要取得氏族成员资格的外来者必须承担起所有义务,包括站在其保护者的立场上进入血宗复仇体系。一般说来,只有在尽到这些义务之后,外来者才能继续耕作其主人分给他的土地。与此同时,正如人们可能会预料到的那样,这里的酋长制度更为发达,北部那种传统的血缘结构并不那么明显。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以共同居住与共同占有土地的效忠,比亲族关系所规定的效忠更具有政治意义。因此,该地区很多氏族及其支系的名称直接与土地相关,这表明他们主要是由于土地而聚集在一起的。从词源上说,"Rahanweyn"一词本身就是"一大群人"的意思。最后,过去在耕作与造房中常常使用盖拉与班图族的农奴(现在几乎全部被同化了),但如今这些以及其他需要集体举办的活动都交给了年轻人组成的工作组来完成,这些年轻人是以居住地而非亲族关系为基础招募而来的。

因此,索马里民族中最大的分界,即萨卜人与萨马勒人之间的分界,不仅是由这两个集团不同的经济利益,而且是由它们文化上的差异所决定的。在传统上,这种差别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游牧民骄傲地自认为高人一等,蔑视南方同胞,而南方人又相应地对他们产生了愤恨与隔离

所造成的。尽管如此，这两大集团之间的鸿沟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大，也不像双方有时喜欢说的那样无法跨越。正如前文所述，很多萨卜人的祖先事实上是北部游牧民，且很多人会说索马里两种方言。此外，经济上还有很多因素将这两大集团联系在一起。南部很多耕作者不仅从游牧民那里购买货物，而且也出售产品给游牧民。在旱季，游牧民迁移过程中经过耕作者土地的时候，经常会用牲畜的奶换取在农民土地上放牧的权利。双方在水井的使用上也有类似的交易。此外，萨卜人还卖给游牧民很多谷物：而尽管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放牧的很多游牧民历来轻视农业，但他们已经或正在从事耕作。这一点与西北部地区一样，农业似乎较为有利可图，游牧民正在转向耕作。最后，讲斯瓦希里语的沿河部落也同样卷入到游牧民与农民间这种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互利关系中。

共同利益意识历来在关于民族起源说中有所展现，索马里各个群体在民族起源中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共同利益意识也超越了使索马里分为两个部分的文化与历史特点。在民族起源说中，萨卜人与萨马勒人有着共同的祖先，是同宗兄弟关系，其共同祖先最终也将索马里人与阿拉伯人联系在一起，并声称他们有着同一血统。大量生动的传说趣闻把萨卜人与萨马勒人的祖先描绘为具有不同的性格，也能较为温和地解释萨卜人的耕作生活与萨马勒人游牧生活之间的差异。

宗教与社会

尽管战争、宿仇与斗争盛行，尤其是在游牧民中间，但并不是每个索马里男人都是战士。那些献身于宗教或某种意义上以真主使者身份行事的人被称为“瓦达”(*wadad*)或“舍赫”(sheikh)[①]，与其他大多数人区别开来。其他大多数世俗中的人，无论从事什么行当都属于战士

① 在阿拉伯国家里，舍赫指的是家族的男性长者，同时也是构成整个部落组织的较大社会单位的首领。舍赫由部落中的男性长者组成的非正式委员会协助。这个词还可作为尊敬的名称或头衔，或用以命名宗教权威。—— 译者注

(*waranleh*,意即持长矛的人)。尽管今天的职业多样,但这种总的划分依然有效。投身宗教的人或舍赫(用阿拉伯称号,通常指的是教士中较有学识的人)承当如下任务:教授年轻人《古兰经》与基本教义、主持婚礼、按照沙里亚法(Shariah)处理婚姻纠纷与继承问题、评估伤害赔偿以及总理其所在部落的宗教生活。他们的作用就是在民众间进行调解,在当地众多圣徒(索马里人在需要神灵的帮助与救济时就求助于他们)的支持下充当人与真主之间的纽带,即先知。宗教人士无论其血亲复仇及氏族义务是什么,都被人们视为理想的局外人,超脱出世俗的竞争与冲突。但是,在实际中,在索马里人的生活环境中,这种期望即使充分实现过,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重要的是,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相比照,索马里的舍赫通常并不是政治首领,只在特殊情况下才掌控政治权力。

虽然索马里南部从事耕作的人处于定居的环境中,处于更具有等级性的政治组织中,似乎更倾向于接受神权政治,但是,如果认为伊斯兰教对游牧民作用不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虽然南部农耕社会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地方的穆斯林神权政治更相符合,但是南北部同样遵守伊斯兰教的五项功课:信奉真主与先知、礼拜、斋戒、天课和朝拜圣地。另外,游牧民与耕作者一样虔诚。真实的情况是,双方因为传统社会组织的差异而在接受伊斯兰教的方式方面略有不同而已。[10]例如,在北部,很多家族的祖先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圣徒;而在南部,家族组织没有那么严密与重要,圣徒被视为纯粹的本土人物,并不神圣,只是家族的祖先而已。因此,尽管有着这种南北差异,但就索马里整个民族来说,如果说伊斯兰教已经在诸多方面成为影响索马里文化的主要因素的话,倒也并不是夸大其词。对游牧民与耕作者来说,表白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对融入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因而,索马里人很多显著的特点,尤其是其强烈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机警与投机主义以及强烈的传统自豪感与对其他民族的轻蔑,来自其传统文化。但是,索马里人所具有的很多特点也来自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是索马里文化的两个来源,这两种文化来源有着

典型的互相依赖关系，游牧生活塑造了高度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但是这种生活态度受到真主与先知力量的冲击，人们对真主及先知的信仰是牢固的，且肯定会带有宿命论的意识。尤其是，索马里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内容超越了其很多局部性的分歧，为索马里人的强烈民族意识奠定了基础。而伊斯兰教更是强化了这些共同因素，并把它们连贯了起来。虽然索马里人并没有组建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伊斯兰教强化了文化上的民族主义遗产，而正是这种遗产构成了今天索马里民族主义的基础。

这里所简要谈到的索马里文化与社会特征，对于理解后来章节中的内容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从这种极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来观察索马里的历史进程，那么我们就无法准确地理解或认识索马里人所居地域的(Somalia)*历史，所知的也就流于肤浅。只有联系到索马里人在一个严酷的环境下不断展开的生存斗争，我们才有可能阐释清楚索马里人过去与现在对当地及外部事件的反应。在索马里人所处在的环境中，他们似乎总在不断结成联盟或反联盟。近代的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索马里的城市化进程依然遥遥无期。只是在近一段历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所发生的激进或广泛的变革，才开始削弱索马里社会的传统结构。这些变革与传统力量之间的互相影响，我们将在最后的几章中加以讨论。

* 在本书中，除非有特别指出，否则“Somalia”和“Somaliland”两词是通用的，均指讲索马里语的人群居住的地区。

第二章 被瓜分前

直到19世纪末,"非洲之角"的历史主要是索马里人从北向南扩张、沿海穆斯林商业中心兴衰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这两方面都有其独立的历史进程,但是,多个世纪以来,这两者之间从来都没有完全隔绝开来。索马里人并不只是通过内陆迁移而扩大其领土,沿海事态对内陆也不是没有影响。我们的概述从10世纪开始。约在10世纪,事态发展的进程是从沿海延伸到内地。但是,到19世纪中期,内陆对沿海的影响与沿海向内陆的发展趋势趋向于均衡状态。如果再往细里说的话,那就是内陆略占优势,内陆已经开始对沿海的居民点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沿海历史文献来源多样,其中能获得的部分文献显示至少某些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内陆发生的事件就不得不更依赖于口头传说的验证。幸运的是,口头传说的记载总体上非常丰富,且基本情节都是一致的,因而可以对索马里人大概的扩张轮廓有个相当准确的描述。现在可用的证据可以肯定,最近10个世纪以来,含族语系的索马里人从亚丁湾沿岸向肯尼亚北部平原的逐渐扩张,是东北非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人口迁移之一。

这并不是向渺无人烟的地区进行的一次迁移。在这种迁移中,含族语系的索马里人赶走了相当多的其他居民。索马里人是靠不断的战争与流血才扩大了地盘。受这次迁移影响的人中,除了索马里人之外,

还有在人种上与索马里人有血缘关系的奥罗莫人，或是一部分奥罗莫人，以及混血黑人，即班图人。在含族盖拉人和索马里人入侵之前，这些班图人似乎已经占据了今天索马里共和国南部的部分地区。

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称这些班图人为僧祇人①，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两条大河之间的肥沃地区，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其中，占大多数的一部分人是居住在谢贝利河与朱巴河沿岸及两河之间的肥沃谷地上的班图族耕作者。他们在奥罗莫人与索马里人的口头传说，尤其是在迪吉尔与拉汉文部落的民间历史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迪吉尔与拉汉文两个部落是从北方进入到该地区的，定居在僧祇人中间并成为贵族阶层。他们的生活与社会组织情况，在后来的阿拉伯文集《僧祇人记》(*Book of the Zanj*)[1] 中也有记载。还有更为确凿的证据可以补充这些历史资料。残存的班图族耕作者部分是说斯瓦希里语的，后来又夹杂入了一些来自南部与桑给巴尔的前奴隶，他们今天依然在谢贝利河沿岸有五个、在朱巴河沿岸有两个不同的居住区。其余在两河间内陆靠拜多阿(Baidoa)的地方也有发现，还有的住在巴拉韦地区。今天在这个地区的古老首府，人们还在讲一种斯瓦希里语的方言，即秦巴拉兹语(Chimbalazi)。

这个在含族到来前生活在此地的人群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显然在人数上要比沿河的耕作者要少得多。他们从事打猎与渔业，过着游牧生活。如今，这些人的后裔深受含族的影响，居住在朱巴河沿岸地区与索马里共和国南部地区，并形成了少数几个分散的集团，通常被称为里比人(Ribi，或是瓦里比人，Wa-Ribi 与波尼人 Boni，或是瓦波尼人，Wa-Boni)。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体征特点使人会联想到非洲其他地区的布须曼人，但目前依然不清楚他们准确的种族起源。在政治、经济意义上说，他们似乎已经分散地依附于定居下来的班图族人，还有一些小的集

① Zanj，僧祇，是对 Zenj 的音译，它还有 Zanj、Zendj 等不同拼法。中国古籍将它译作“僧祇”。“僧祇”的原意是黑，即黑人。僧祇并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而是东非沿海地区居民的统称，甚至包括在东非沿海地区居住的亚洲移民。—— 译者注

团至今仍在南部从事狩猎，受到更为强大的班图部落的保护。

10世纪左右，这两部分人（不一定都是当地的土著人）似乎还没有扩张到谢贝利河以北地区，但与奥罗莫部落有着联系，而奥罗莫部落此时已经受到“非洲之角”东北端索马里人扩张的压力。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录证实了口头传说反映出的人口分布情况。这些早期的地理学家在提及北部、中部地区的含族人（盖拉人与索马里人）时，称之为“柏柏尔人”，并从体格特征与文化上将他们与南部的僧祇人区别开来。

沿海定居点

含族的大举南下迫使绝大多数僧祇人迁徙，最终形成今天“非洲之角”的民族分布，并间接地影响到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分布。在追溯这些历史前，我们必须首先讨论一下早期阿拉伯人在沿海定居的情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阿拉伯人的殖民带来了更多样化的技术，更中央集权化的政府制度。虽然这种政府制度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即使在游牧地区也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新来的移民带来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一种凝聚力量，在16世纪征服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时候，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至今还是索马里人与今天埃塞俄比亚很多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同时，这些阿拉伯定居者即使不是直接那也是间接地推动，或是促进了索马里人与奥罗莫人的扩张。

大体可以肯定，阿拉伯人很早就渗入到索马里北部与东部沿海地区。这可能发生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希吉拉纪元(hegira)之后不久，阿拉伯与波斯穆斯林就在索马里建立了一连串的沿海定居点。从这些定居点的现在状况、传说材料以及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很显然，定居下来的阿拉伯与波斯商人、传道者通常成为当地的贵族。他们在这里传播宗教、娶了当地的妇女并最后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混合型的索马里-阿拉伯文化与社会。这种新文化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两种文化混合与融合的不同程度，且在整个沿海地区也绝不是整齐划一的程度。这种新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地位，相当于其南部东非沿海范围更

广的斯瓦希里语社会对那里的影响。

阿拉伯势力在北索马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中心是泽拉(Zeila)与柏培拉这两个古老的港口。9世纪末,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比(Al-Yaqubi)首次提到泽拉,后来的作家对泽拉有更为详尽的描述。柏培拉本来是古代对北部沿海地区的总称,与泽拉一样古老,但它的历史就没有泽拉那样清楚。阿拉伯地理学家首次提到柏培拉是在13世纪。此后,除了这个城市在葡萄牙人统治红海时期的1518年被萨尔达尼亚(Saldanha)[1]洗劫之外,人们对它在18、19世纪之前的历史知之甚少。古老的迈特(Mait)港口位于埃里加博(Erigavo)的东海岸,是索马里人早期扩张的主要中心之一,人们对它的大部分历史同样也不清楚。

因此,目前人们对整个北部地区的所有港口,了解最多的就是泽拉。从政治上说,它是阿拉伯人在北索马里地区最为重要的定居点。其经济相当长时期的繁荣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泽拉是阿比西尼亚内陆与阿拉伯、东方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索马里的产品,主要包括皮革、贵重的树胶、酥油与鸵鸟毛,以及阿比西尼亚高原的奴隶与象牙,经过泽拉向外输出;布匹、椰枣、铁、武器与陶瓷器皿经泽拉输入进来。政治上,泽拉原本是穆斯林阿达尔(Adal)酋长国的中心,该酋长国是绍阿(Shoa)高原东部的伊法特国(Ifat)的一部分。自该港口进入伊斯兰历史开始,泽拉就明显地居住有阿拉伯人、索马里人、达纳基尔/阿法尔(Danakil/'Afar)人。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间),这三种不同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融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泽拉文化与泽拉方言,即阿拉伯语、索马里语与阿法尔语的混合物。毫无疑问,这里也居住有少量其他人种。波斯人与印度人在早期也曾经在这个港口定居过,但泽拉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阿拉伯人、索马里人与阿法尔人。

北部沿海中心正在发展的时候,阿拉伯定居者也在南部开发,或是

---

① 即16世纪初的葡萄牙航海家安东尼奥·德萨尔达尼亚(Antonio de Saldanha),南非西南海岸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萨尔达尼亚湾。——编者注

发展了类似的一系列港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摩加迪沙,即现在索马里共和国的首都,以及巴拉韦与马尔卡(Merca)。它们都是商业城镇,其繁荣主要依靠在阿比西尼亚、阿拉伯与东方各国市场之间的转口贸易。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当地的铭文以及文献揭示,在10世纪前半叶,相当多的阿拉伯与波斯殖民者曾在摩加迪沙定居下来,这发生在东非沿海基尔瓦(Kilwa)建立之前几年。这些材料还显示,马尔卡与巴拉韦也有着同样古老的历史。因此,到10世纪,南部、北部沿海地区都建立了一连串的商业中心,这主要是阿拉伯人拓展事业的结果。这些港口成为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贸易的据点,它们在其后多个世纪中得到巩固与加强,后来成为穆斯林在东北非进行扩张的基础。

索马里第一次扩张浪潮

约在10世纪,当索马里沿海地区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索马里南部部分地区依然被僧祇人占领着,而中部、北部的土地先后被不同的奥罗莫氏族与索马里人所占领。依照索马里口头传说与当地材料,盖拉人似乎在索马里人之前就占领了索马里北部的部分地区;约在10世纪,被普遍认为是索马里最古老的人群的索马里迪尔人就已经占领了北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并给他们南部的盖拉人施加了压力。

但是,根据传说材料,索马里人迁移的第一个重要动力是10或11世纪的时候,伊斯梅尔·贾巴尔提(Isma'il Jabarti)舍赫从阿拉伯来到了索马里。舍赫的后裔,即达鲁德部落从其早期占据的索马里东北端开始扩张。扩张的具体时期不能确定,但这里所提到的扩张时期及其后发生的事件在时间顺序上是吻合的。大约在两个世纪之后,伊萨克舍赫,即索马里伊萨克始祖从阿拉伯来到这里,定居在达鲁德西边的迈特。他的圆顶陵墓至今还矗立在那里。他与更早来到的达鲁德人一样,娶了当地的索马里迪尔女人。虽然现有的证据(确切地说是缺乏证据)显示,有关这两个族长的那些详细的传说大多都是传奇性的,但似乎可以认为这些材料反映了达鲁德与伊萨克部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扩大的情况。因为,虽然达鲁德与伊萨克的始祖本身或许只是传奇人

物，但是其后裔的迁移则是确凿无疑的。

按照这种解释，到 12 世纪，迪尔人与达鲁德人，后来还有伊萨克人，便开始向他们的近邻奥罗莫人进逼，也就是说，最终把奥罗莫人赶走的一系列大迁移已经开始了。今天的民间传说并没有提供关于这些迁移原因的解释。然而，以下的推测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即由于阿拉伯移民的持续迁移，或许还由于一系列严重旱灾加剧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促使索马里人大迁移以寻求新牧场。早期伊斯兰教的那种救世与战斗热情无疑也进一步地促进了这些迁移。

虽然引起索马里人这场大规模迁移的动机还只是一种臆测，但幸运的是，这次迁移的总方向还是很清楚的。有关迁移的传说揭示，这次迁移是渐进式的，也没有互相间配合，索马里人的迁移路线主要有两条：从北方沿着谢贝利河及其支流河谷南下；沿着印度洋沿海地区的水源前进。索马里人作为一个整体一批又一批地经过这些重要的水路向前移动。

随着达鲁德与伊萨克部落的人口增长与领地扩张，迪尔部落便退出了索马里的东北地区，向西部与南部进发。在西部，强大的伊塞('Ise)与盖达布尔西(Gadabursi)氏族把其先祖坟墓留在数百英里后的埃里加博，经过很多挫折后，推进到今天埃塞俄比亚哈勒尔州与吉布提共和国。预先说明一点，16、17 世纪时，达鲁德与伊萨克部落已经占领了索马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与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因此，大概到 17 世纪末，索马里北部各个部落的分布状况已经与现在差不多，虽然人口仍然不断地逐渐从北向南迁移。

在索马里人北方人口的迁移过程中，奥罗莫人逐渐向西、向南推进，最终进入埃塞俄比亚。然后，在 16 世纪以前，他们还没有向那里大举入侵。[2] 盖拉人在经过激烈抵抗后撤出，班图族的僧祇人也被赶到更远的南部。同时，索马里人维持着推进压力，在其扩张的早期阶段，有些部落联合了大量的盖拉人而得以成功地实现迁移。早在 13 世纪，哈维耶部落的某些支系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在阿拉伯人聚居的马尔卡附近定居了下来。地理学家伊本·萨义德(Ibn Sa'id)曾经提到过哈维耶当

时占领这个地区的情况，这是已知关于索马里部落的最早记载[3]。当地的传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情况，并揭示在这些哈维耶入侵者到来之前，其他索马里集团包括迪尔部落的几个支系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些早期的先驱者显然曾在谢贝利河住过一段时间，然后渡过河流移向沿海地区。因此，在 13 世纪，情况似乎是这样的：索马里哈维耶部落占领伊塔拉与马尔卡之间的沿海地区；迪尔部落占领往南靠近内地的地区；奥罗莫人依然主宰着西部地区。

在整个地区，当地传说提及最多的是阿朱兰人(Ajuran)，这个部落与达鲁德、伊萨克部落一样，其先祖是一个阿拉伯贵族元老，但该部落的母系与哈维耶人有着血统关联。阿朱兰人在世袭王朝的领导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肥沃的谢贝利河下游地区的主人，并与摩加迪沙港口建立了商业联系，甚至有些阿朱兰人还定居在那里。因此，阿朱兰苏丹国的命运似乎与摩加迪沙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阿朱兰人的权力达到顶峰，当时摩加迪沙是由穆扎法尔王朝[4] 统治的，这个王朝如果不是真正属于阿朱兰血统，也与阿朱兰人有着血统联系。后来，这两个中心大约在同时衰落。这一内容将在后面再叙述。

针对阿比西尼亚的圣战

在继续探讨这些索马里人的迁移之前，我们必须简短地提及一下发生在更深远一点的内地的长期斗争。这种斗争发生在阿比西尼亚王国与松散的伊斯兰教国家集团之间，后者包括位于信奉基督教的阿姆哈拉高原(Amhara Highlands)东南方的伊法特、达瓦洛(Dawaro)、巴勒(Bale)与哈迪亚(Hadiya)。这里，我们在口头传说基础上重构事件经过，并用基督教与穆斯林的文字资料加以补充。这些材料显示，到 13 世纪，伊斯兰国家伊法特(包括阿达尔与泽拉港)是由瓦拉什马王朝(Walashema')统治，该王朝宣称有阿拉伯血统。14 世纪早期，伊法特的苏丹哈克丁(Haq ad-Din)把其先辈的零散袭击发展为全面的侵略战争，且把战争说成是针对阿比尼西亚“异教徒”的宗教战争。这种说法

似乎是第一次提出的。最初,穆斯林取得了胜利。基督徒的领土被侵占、教堂被摧毁、基督徒在刀剑之下被迫背弃了自己的宗教。然后,在1415年,穆斯林被击溃了,伊法特的统治者萨德丁(Sa'd ad-Din)遭到追击,最终在泽拉沿海的一个岛上,也就是在其最后一个据点被杀死了。今天,这个岛还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从那时起,阿拉伯的编年史家便把阿达勒称为“萨德丁之国”。这次惨败与萨德丁殉道(他的死很快就被认为是殉道)发生于阿比西尼亚国王耶沙克统治时期(Yeshaq,1414—1429),在庆祝国王战胜穆斯林的赞歌中,首次出现了“索马里”这个名字。

阿比西尼亚人的胜利与对泽拉的暂时占领使得穆斯林事业遭到严重的打击。萨德丁的几个儿子逃到了阿拉伯,在也门国王那里避难。但过了几年后,他们又返回了索马里。此时的瓦拉什马王朝采用了阿达勒王国的称号,并把都城迁到了位于哈勒尔东部的达卡尔。这是一个远离阿比尼西亚攻击威胁的地方。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平静之后,阿达勒恢复了元气,足以发动一场对基督徒的战争,穆斯林最终发现艾哈迈德·易卜拉欣·加齐(Ahmad Ibrahim al-Ghazi,或称之为格兰,即Gran,1506—1543)伊玛目(Imam)①就是他们所要找的魅力型首领。穆斯林与基督徒都称艾哈迈德·格兰为“左撇子”,其出身有点说不清道不明。[5] 但在他的领导下,穆斯林取得了显赫的战果。他的军队装备有从泽拉港进口的大炮,在经过一系列的激战之后,其军队最终打进了阿比西尼亚的心脏地带。索马里人在今天依然对这一系列激战都能娓娓道来。

索马里军队在这位伊玛目的胜利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穆斯林编年史家希哈卜丁(Shihab ad-Din)在写1540至1560年这段历史的时候,经常提到他们。[6] 在索马里人的军队中,最为突出的是达鲁德部落的哈尔提(Harti)支系,他们当时占据着东部古老的迈特港,且正在从这个中心向西、向南扩张。伊玛目与一位达鲁德部落首领的联

① 伊玛目,伊斯兰教社会的领导者、领袖。—— 译者注

姻关系强化了达鲁德人对他的支持。虽然伊萨克部落没有被提到，但这个部落中的一个分支参加了格兰的战争；迪尔部落的一些集团也卷入进来。不过，格兰的索马里军队的主体是达鲁德人，达鲁德人的一位首领与伊玛目同名，因此达鲁德人常常把这位首领与伊玛目本人搞混淆。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米朱提因的达鲁德部落建立了一个苏丹国，它逐渐控制了索马里东北部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因此，其后来的历史总体上属于沿海地区的历史。

这些索马里游牧部落在战争中卓有成效的参与，表现出了伊玛目在宗教与世俗方面均有伟大的领导力。用穆斯林编年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些索马里人是有名的“剪径贼”(cutters of roads)。北部索马里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发达的等级制政府，因此也确实不适应在如此广泛的战线上为共同事业而团结作战。尽管索马里人的团结是短暂的，但是，如此多不同的、互相敌视的部落还是如此高效地联合起来了。

正如人们可以轻易预料到的那样，这种异常爆发的穆斯林雄心壮志并没有持续多久。作战双方都寻求外部援助；阿比西尼亚人寻求当时在红海权势较高的葡萄牙人，而穆斯林则向土耳其人求援。后来，伊玛目在取得几次胜利后不明智地解散了土耳其部队。1542 年，他在塔纳湖(Lake Tana)附近被当时的阿比西尼亚皇帝盖拉德乌斯(Galawdewos)打败。伊玛目被杀死了。盖拉德乌斯的胜利成为阿比西尼亚命运的转折点。虽然穆斯林以哈勒尔作为其新总部继续战斗，但他们并没有取得成功，再也没有取得伊玛目那样的辉煌胜利。此时，双方都不得不要应对一种新威胁，即奥罗莫人从西南部开始大规模入侵。在这种情况下，阿达勒王国很快就衰落了。1577 年，阿达勒的首都从哈勒尔迁移到酷热的达纳基尔(Danakil)沙漠中的奥萨(Aussa)绿洲，希望能避免再次受到阿比西尼亚的攻击。然而，在这里，它常常受到当时横扫阿比西尼亚的盖拉入侵者的骚扰，并被当地从事游牧的达纳基尔(阿法尔)人推翻，其古老的王朝在 17 世纪末最终灭亡。

阿达勒的疆界就这样经历了一段变动不居的历史。虽然在 16 世纪中索马里人在阿达勒征服阿比西尼亚时起到了那么显著的作用，但

是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在其他时期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这个伊斯兰国家的一部分。既然除了泽拉、柏培拉和迈特外,索马里内地在15、16世纪还至少出现过20个其他伊斯兰城镇,看来当时的伊斯兰国家对这些地区的索马里人无论如何是有过一些影响的。[7]

对阿比西尼亚进行圣战的后果

艾哈迈德·格兰领导的这次圣战至少对阿比西尼亚与东非之角的历史产生了两大影响:第一,艾哈迈德求援于土耳其人,导致土耳其人在1557年占领了马萨瓦(Massawa)与今天厄立特里亚境内的阿尔基基奥(Arkikio)。最初,土耳其人试图将其权威拓展到阿比西尼亚,但遭到失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土耳其人在1633年从马萨瓦撤军,只是安插了一位当地的贝贾族首领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代表。但是,土耳其人一直没放弃占领沿海地区的企图,尤其是在19世纪,这一要求又变得极为重要了起来。第二,更为直接的影响是,艾哈迈德的斗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为盖拉人在他死后从西南部发动大规模入侵奠定了基础。大批奥罗莫征服者一直推进到阿比西尼亚的北部,在那里,这些征服者成为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梦魇。这一新情况、阿比西尼亚后来的复兴以及阿达勒王国的衰落,事实上终结了索马里人在西部的进一步扩张。因此,索马里人被迫不断威逼其南部近邻,即盖拉人。这又促使盖拉人不断,甚至加强了他们对阿比西尼亚的大规模入侵。

这一时期,一些达鲁德与迪尔人集团似乎已经在哈勒尔-吉吉加(Harar-Jigjiga)地区安顿下来。而在南部,由于盖拉人撤出一条战线去进攻另一条战线,北部的索马里移民日益聚集了起来。新来的哈维耶移民打通了迈向谢贝利河的道路,开始挑战阿朱兰人的权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摩加迪沙城也遭到了围攻,古老的穆扎法尔王朝被推翻了。文献材料与口头传说都说这些事件发生在17世纪。[8] 阿朱兰人及其同盟者马丹勒人(Madanle,他们建造了很多有名的水井与石建工程)被击败后逃往南部,最终进入到今天肯尼亚的东北部地区。他们似乎是该地区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居民之一。博兰族(Boran)盖拉人与瓦

尔代族(Warday)盖拉人后来也来到了这里,这两部分的盖拉人建立了地方性统治,直到19世纪索马里大批移民涌入时,才最终被推翻。但这是后话了。

根据当地的传说,似乎就是在摩加迪沙穆扎法尔王朝被推翻的时候,谢贝利河与朱巴河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布尔哈卡巴(Bur Hacaba)在内,主要仍掌握在盖拉人之手。因此,那时的形势是,从摩加迪沙沿海地区向西直到内地这一地区,先后被哈维耶人、盖拉人所占据,最后又被拉汉文部落的索马里人所占领。[9]在更北部的米朱提尼亚(Majerteyania),牢牢控制加勒卡约(Galkayu)的盖拉人最终在19世纪中叶被赶走了。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拉汉文人继续施加压力。大约在17世纪末,他们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将残留下来的盖拉人从布尔哈卡巴据点赶了出去。这些盖拉人向西撤退,最终渡过了朱巴河,来到了朱巴河的右岸。这样一来,当然也就增加了僧祇人的压力。僧祇人的首府尚格瓦亚(Shungwaya)当时就是在朱巴地区。因此,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奥罗莫人由于有大批人口进入到了阿比西尼亚,实力必然大为削减,他们过去在索马里境内朱巴河以北的全部领地都落入到了索马里人的手里。然而,他们之前的存在还是留下了确凿的证据,即今天谢贝利与朱巴地区的拉汉文与迪吉尔索马里人部落中,还存在不同程度上被同化了的、具有奥罗莫人血统的小集团。

最后,从北索马里的东部、中部地区被赶走的迪尔部落,此时必定已经几乎全部到达了南部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比马尔族(Bimal)。比马尔族遭遇到了迪吉尔部落,经过战斗打败了迪吉尔人,最后在马尔卡附近也就是他们现如今居住的地方定居了下来。因此,到18世纪,南至朱巴河的南索马里就已经或多或少地呈现出现如今的种族混合形态了。

但是,索马里人的主要部分并没有长期滞留在朱巴地区。来自北部与欧加登的达鲁德人继续向南推进,但经常遭遇到原有居民的激烈抵抗[10]。最终,这些新来的北方入侵者到达了谢贝利河,在19世纪早

期开始向该地区的迪吉尔人大力进逼。但是,他们的进攻遭到了拉汉文人的抵制。从 1840 年开始,以谢贝利河为基地的格莱迪族(Geledi)一直是拉汉文部落的坚强领导。拉汉文部落的抵抗迫使新来的达鲁德移民向朱巴河地区转移,从而与朱巴河右岸的盖拉人发生接触。虽然盖拉人在索马里境内丢失了大部分领地,但是他们顽强地坚守剩下来的领地,并从他们的中心阿弗马杜(Afmadu)越过朱巴河不时袭击当时属于索马里人的地区。他们在该地区的势力还远没有被打垮,他们的袭击队一次又一次地威胁着索马里人 1820 年在朱巴河中游地区建立的宗教中心巴尔德拉(Bardera)。因此,新来的达鲁德入侵者遇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邻居。在那个时候,更为有利的权宜之计是让步而非挑衅。因此,在获得盖拉人的保护后,一批批的达鲁德人越过朱巴河成为他们收容的外来者与同盟者。朱巴河那一边的盖拉人似乎很欢迎这种新来的支持,他们在与西部强悍的阿卡姆巴人(Akamba)、马萨伊人(Masai)关系中也借助了这种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达鲁德人也在继续迁移,更多的达鲁德人进入到该地区,寻求与盖拉人结成同盟,并渡河过去与先来到此地的达鲁德人合并在一起。这样,在盖拉人的保护下,达鲁德移民逐渐增加了。达鲁德人与盖拉人之间的这种不稳定联盟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也就是 1847 年法国探险家夏尔·吉兰(Charles Guillain)访问索马里南部海岸时所描绘的局势。命运不佳的德国旅行家冯·德尔·德肯也记下了非常相似的情况,他于 1865 年第一次乘浅水蒸汽船“维尔夫号”沿着朱巴河向上游航行,但船在巴尔德拉上游的激流中沉没了[11]。似乎也就是在这一年,盖拉人群中爆发了很严重的天花传染,这给其邻居即达鲁德人提供了他们期盼已久的机会。达鲁德人立即向其盖拉主人发动了全面攻击,使得盖拉人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幸存的少数盖拉人逃往南方。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个地区的绝大多数南方盖拉人都被清除了出去,只在瓦吉尔(Wajir)与布纳(Buna)还保留有据点。这时还有一个新情况,即埃塞俄比亚人拼命袭击欧加登地区,并沿着朱巴河向下游地区进攻。这一新情况,加上更多索马里新移民的涌入(他们中有一些人

是乘独桅商船沿海岸南下),继续保持甚至增加了索马里人的压力。事实上,到 1909 年,一批批的达鲁德移民带着他们的家畜,估计有 5 万头之多,一直向南方迁移到达了塔纳河。

1912 年,英国人在东非保护领地北部这个动荡地区设立了行政点与军事据点,但是形势依然不稳。达鲁德人还在继续迁移,他们这时力图完全控制西从布纳、经瓦吉尔直到东南部塔纳河这一整块地区。有些非闪族的瓦博尼族(Waboni)猎人在迁移浪潮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其中很多都成为达鲁德人的奴隶,而留下来的瓦尔代族(Warday)盖拉人则不得不渡过塔纳河,以免被索马里人消灭。然而,也有很多人选择臣属于达鲁德人,愿做达鲁德人的保护民。因此,奥罗莫人早期在阿朱兰的主人地位就彻底颠倒了过来。在西部,一度强势的阿朱兰人于 17 世纪遭到失败后,灰溜溜地被赶到了南部。此时,他们就没有那么团结了,很快就被其他索马里人渗透了进来。南部的博兰族盖拉人这时正被达鲁德人持续不断的压力赶到了西北部。

到 1919 年,达鲁德人与渡过塔纳河的瓦尔代族盖拉人之间的互相憎恶,发展到了要英国当局再次进行干预的程度。结果是,他们双方签订了“索马里-奥尔马(盖拉)协定”,该协定要那些留在左岸的与达鲁德人居住在一起的盖拉人作出最后的选择:要么接受奴隶的地位,要么转移到河对岸与他们部落的自由民在一起。决定到塔纳河对岸去的盖拉人必须把他们在依附期间获得的牛群的一半留给其索马里主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瓦尔代族盖拉人迁移过去,也就不足为奇了。

约 12 年后,达鲁德人的盖拉属民又爆发了动乱。一则流言开始四处传播:索马里人打算破坏 1919 年的协定。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一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800 多名盖拉属民带着 8 000 多头牲畜,为争取自由不惜代价绝望地进行冒险。他们在最干旱的季节向塔纳河迁徙。后果是灾难性的:几乎死了一半人,少数幸存者沮丧地返回塔纳河左岸地区。1936 年,协议到期了。肯尼亚政府默认:除了塔纳河右岸的一部分人之外,长期与索马里人进行斗争的瓦尔代族盖拉人最终已经被同化了。曾一度占领该地区大片土地的奥罗莫人中,只剩下博兰族

与盖布纳族(Gabbra)了。

历时900年的一系列大迁徙就此结束。这些迁徙使索马里人从北部沙漠来到了较为肥沃的中部、南部地区,最后进入肯尼亚北部那些半沙漠的平原地带。这些迁徙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由于同奥罗莫人有了接触和同化了留下来的盖拉人,再加上早先班图社会的影响,于是便出现了各具特色的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这两个部落从班图人那里学会了耕种,并且暂时采用了盖拉人的年龄等级制度,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军事需求。后来渡过朱巴河的达鲁德人,也以几乎同样的方式采用了盖拉士兵年龄等级制度,但后来与拉汉文人一样也抛弃了这一制度。

在扩张的每个阶段,索马里人采用的策略是按照军事实力来评估政治权力这种传统观念来制定的。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为部落大规模迁徙当先锋兵的小家族与氏族,接受数量上多于他们的奥罗莫主人的保护。一旦他们足够强大,就会推翻自己的主人并使之变为自己的属民。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们在人数和武器上占优势,索马里人总是会取得胜利的。双方使用的武器似乎都一样,主要是长矛与皮革盾牌,有时或许还加上弓箭。索马里人可能还有少量的火绳枪,但是这未必就有很大的功用。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士兵有时是骑马的。奥罗莫人后来学会了骑马,这在他们大规模向阿比西尼亚迁移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索马里人之所以能夺取奥罗莫人这么大片的土地,最重要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与灵活机动的行动。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被索马里人打败与赶走的那些盖拉人主要是北方的阿基舒人(Akishu)、赖图人(Raitu)与阿鲁西人(Arussi)以及南方的瓦尔代人与博兰人。这些人并不是盖拉人[12]的主体,只是些外围部落,分散在远离传统故土的埃塞俄比亚东南部。最后,在考虑索马里人扩张的特点时,我们应记住,这不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一致行动,而是一系列彼此没有联系的部落或家族的迁移。许多迁移的集团是交叉前进的,各个集团为了寻找新牧场而互相争夺。索马里人与奥罗莫人的迁移也同样如此,只是这两个民族的最初起源

地都可以追溯到朱巴河上游支流的同一地方。

新来的欧洲人对沿海地区的兴趣

当发生这种大动荡的时候,除了北部的阿达勒王国以及南部阿朱兰人与格勒迪人(Geledi)国家曾一度有过中央集权政府外,只有沿海地区建立了并维持着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政府。尽管这种中央集权政府并不正规,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有必要回过头来探讨这个主题,并检视一下沿海各中心在索马里被瓜分前的最终命运。

阿达勒王国衰落后,泽拉仍旧维持着其商业地位,是内地的古老商路,尤其是它还是从阿比西尼亚高原经过哈勒尔一些商路的主要出口港。16 世纪,由于奥罗莫人的入侵,贸易曾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17 世纪,泽拉处于穆哈克(Mukha)的沙里夫的统治之下,柏培拉在某种程度上显然也是如此。因此,这两个港口在名义上并入了奥斯曼帝国。直到 1854 年,理查・伯顿爵士在他到哈勒尔进行那次著名的探险途中访问这一沿海地区的时候,情况仍然如此。哈勒尔与泽拉不同,当时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公国。

泽拉当时的总督是一个名叫哈吉・舍马克・阿里・萨利赫(Haji Shirmarke 'Ali Salih)的索马里人,来自哈巴尔・尤尼斯(Habar Yunis)氏族。他过去曾是一艘供训练用的独桅商船的船长,后来逐渐发迹。哈吉发财和成名之后,大约在 1840 年,从奥斯曼帝国在西阿拉伯帕夏的世袭代表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尔(Sayyid Muhammad al-Barr)那里得到了总督一职。1825 年,英国的双桅帆船"玛丽・安"号(Marry Ann)在柏培拉遭到了当地索马里人的袭击和抢劫,孟买的英国政府因为哈吉保护了船员的生命而向他表示谢意,这件事显然让他大获裨益。尽管哈吉・阿里进行了干预,但这个事件仍然导致英国对沿海一带实行了封锁,直到 1833 年从索马里人那里得到了 6 000 英镑的赔款才解除。同时,英国东非公司 1827 年与当地的哈巴尔・阿瓦尔(Habar Awal)氏族签订了一项商业条约。

1854 年,伯顿曾作了如下的记述:哈吉・舍马克,高个头,虽然六

十多岁，但身强体壮，没有丢掉年轻时的英勇，盘算着要征服柏培拉与哈勒尔。他生活简朴，住的是用泥土、柳条盖成的简陋茅屋，而不是城里那种石头砌成的两层楼房。他的“秘书”是一个斯瓦希里族奴隶。虽然他本人不识字，但其长子穆罕默德娶了个阿拉伯女人，并在穆克哈受过教育，颇有学者风范。伯顿发现，哈吉·阿里以灵活的手腕统治着那座城镇，且得益于一名强悍的哈德拉米(Hadrami)军人和四十名从哈德拉曼特(Hadramaut)、穆克哈和亚丁等地招募来的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都配有火绳枪和剑。掌管伊斯兰教律的穆斯林法官是一名来自哈维耶部落的索马里人。在他之前，也就是从1670年起，担任该职务的都是阿拉伯的赛义德人。

在伯顿看来，泽拉的面积与苏伊士相仿，容纳几千居民绰绰有余；有六座清真寺，十二座粉刷过的大石房，二百多座泥土、柳条结构的茅屋。用碎珊瑚和泥土筑成的古老城墙上已不再架有枪炮，而且很多地方已经倒塌了。饮用水必须从距城四英里的水井里提取。贸易很繁荣：在北部，商队与达纳基尔地区往来频繁；在西部，商队则越过伊塞和盖达布尔西两氏族的地区达到了哈勒尔，且越过哈勒尔到阿比西尼亚境内的古拉吉(Gurage)地区。主要的出口商品有：奴隶、象牙、兽皮、兽角、酥油和树胶。在沿海地区，阿拉伯潜水者忙着采集海绵，且沿海地区的粮食价格便宜。

伯顿很快发现，泽拉的这种秩序井然的城镇生活，出了城门不远就不存在了。伯顿及其同伴们再去哈勒尔的途中，穿过游牧部落的牧场。这些游牧部落并不承认其在政治上对泽拉的依赖。事实上，泽拉城墙边就常发生袭击和冲突事件。

1855年，虽然泽拉港的政治影响比起昔日已经是徒有其名，但是仍然处于索马里总督的统治之下，维持着沿海地区那种由固定的行政机构行使权力的传统。柏培拉的情况就非常不同了。伯顿发现，游牧部落对柏培拉的侵犯更加严重。实际上，这个城镇在政治上同内地的游牧区已经不再有什么区别了。1855年2月，伯顿顺利完成对哈勒尔的探险后来到了柏培拉。他发现哈巴尔·阿瓦尔氏族控制着柏培拉，

但是这个部落由于各支系争夺港口的控制权而出现分裂。同时,哈巴尔·尤尼斯氏族也在争着要夺取这个城镇的有利可图的贸易。

在这之前,即1839年英国人把亚丁变为殖民地前,哈巴尔·阿瓦尔氏族中的阿亚尔·尤尼斯(Ayyal Yunis)家族与阿亚尔·艾哈迈德(Ayyal Ahmed)家族曾掌管柏培拉,联合管理商业。他们以外来的阿拉伯与印度商人的“保护人”身份,在所有交易中抽取利润。在亚丁港发展的刺激下,柏培拉日益繁荣。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阿亚尔·尤尼斯家族驱走了与其竞争的亲族,并宣布为柏培拉商业的主人。两大家族结下了世仇,双方都寻求外援。失败的阿亚尔·艾哈迈德家族向哈吉·舍马克·阿里及其哈巴尔·尤尼斯氏族请求支持。在这种支持下,阿亚尔·艾哈迈德家族恢复了原来的地位,赶走了阿亚尔·尤尼斯家族。阿亚尔·尤尼斯家族便迁移到柏培拉以西几英里外的小港口布勒哈尔(Bulhar)。1846年,由于其他部落的威胁,阿亚尔氏族中这两个敌对家族之间的纠纷得到解决,哈吉·阿里也就被打发走了:他在1842年曾是柏培拉的“英国代理人”。

这场斗争及之前的动荡,在柏培拉留下了很多痕迹:城镇两边都有一英里左右的空地,空地上都是玻璃与陶器的碎片,这是过去许多代居民留下的遗迹;实际住人的地方,即“一堆脏乱的小土屋”仅占古城一小部分。东南方八英里外杜巴尔(Dubar)地方一些水井的古代输水管,早就不再向城里输送清水了。

伯顿及其同伴对柏培拉有着这种不好的印象,便离开索马里海岸前往亚丁,并在1855年2月9日到达那里。然而,1855年4月,伯顿作为一次新探险的领导人又回到柏培拉,目的是探索欧加登地区。在他离开的两个月内,柏培拉港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的柏培拉繁荣热闹,充满活力:“我到达这个东非商业中心时,这里呈现出一片混乱。就在前一天,哈勒尔大商队,三千多人加上三千多头牲畜开进城来,目的是为了补充八个月的各种必需品,就像往常一样。人们匆忙地进行收购、易货和交易,但有点不像是做买卖的样子。整个白天与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里,买主与卖主在镇上吆喝声不断,且不说其他贸易物

品，市场上的男女奴隶就有500人。驼货或不驼货的骆驼排成长队，在耀眼的黄色沙地上前行……一些旅客已经分批踏上归途。享有盛名的集市变成了一片污秽的席棚，其面积也在不断缩小。”[13]

伯顿及其同伴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观察这种景象。1855年4月19日凌晨，数百名索马里长矛兵向伯顿的营地发动了野蛮的攻击。在随后的混战中，斯特罗杨(Stroyan)中尉被杀死，斯皮克(Speke，他后来由于探险尼罗河的河源而获得声名)中尉受了重伤，伯顿本人则被长矛刺伤了嘴。尽管攻击者人数众多，伯顿及其同伴还是成功逃到了亚丁。这次探险活动被放弃了，伯顿后来再也没有返回索马里。然而，他至今依然被人们所记起，让人既感到有趣又充满敬佩：他在去哈勒尔途中采用的化名是“哈吉·阿卜达拉”('Haji 'Abdallah)，他经常在清真寺主持礼拜，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不亚于任何一位舍赫。

亚丁的英国当局立即以那个时代通常的方式对这次事件作出了反应。印度指挥部派出两艘军舰封锁了沿海一带，直到杀害斯特罗杨的凶手以及袭击斯皮克的人被交出法办为止。次年，哈巴尔·阿瓦尔氏族的长老们宣布，杀害斯特罗杨的凶手已经被他自己的同族处决了，并答应交付1.5万美元的赔偿金。11月，英国当局与哈巴尔·阿瓦尔氏族签署了一项有利于英国人在柏培拉通商的条约，规定以后要任命一个英国驻扎官。1825年，“玛丽·安”号双桅船在柏培拉遭到抢劫和舍马克·阿里进行干预后，曾发生过一系列类似事件。不过，这时亚丁与索马里北部沿海之间的联系已经得到了强化，为英国以后的活动打下了基础。帝国主义列强对于这个偏僻海岸的情况，不再是漠不关心了。

与此同时，索马里南部海岸也同样成为新来外国人关注的地区。该地区与泽拉不同，泽拉长期与阿比西尼亚、阿拉伯有着广泛的联系。该地区的港口的影响范围较为狭窄。阿比西尼亚基督教王国发生的事件对这些港口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影响它们命运的主要外部因素是印度洋与索马里内地的政治形势。

摩加迪沙在10世纪时，是一些阿拉伯家族与波斯家族结成的松散的联邦。到了12世纪，它成为由法克赫尔丁(Fakhr ad-Din)王朝统治

的苏丹国。三个世纪后,这些统治者为穆扎法尔王朝的苏丹所取代,这个城镇便同与之有血缘关系的阿朱兰苏丹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一时期,摩加迪沙曾遭到葡萄牙人的攻击但并没有被占领。这座古老城镇的真正征服者是新来的属于哈维耶部落的索马里移民,他们曾在17 世纪初打败了阿朱兰人,并推翻了穆扎法尔王朝。此时,摩加迪沙已经分为哈马尔文(Hamarweyn)和香加尼(Shangani)两个敌对的部分,新来的入侵者定居在香加尼。

当时,阿曼人(Omani)势力在印度洋崛起,给这里的形势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新变化。到 17 世纪末,摩加迪沙与其他东非港口都已经处于阿曼人的保护之下。1814 年,蒙巴萨总督宣布其城镇独立,并向孟买的英国人寻求支持。耽搁了 9 年后,欧文(Owen)舰长率领舰队来到了东非海岸。1824 年,欧文建立了著名的、短命的“保护国”。蒙巴萨的抵抗作为一种榜样,影响了摩加迪沙的民众。1825 年,欧文殷勤地访问了摩加迪沙,表示英国愿意保护它以抵抗阿曼人可能进行的报复。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不过,在摩加迪沙以南的巴拉韦港口,欧文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1826 年,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英国政府拒绝承认欧文建立的“保护国”,英国的干涉结束了。英国这次干涉的开始与结束都很突然且无法解释。那些抵抗的东非城镇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阿曼霸权。1828 年,摩加迪沙遭到炮击,被迫投降。但是,不久之后,马斯喀特国(Muscat)发生分裂,摩加迪沙以及索马里南部沿海,即“贝纳迪尔”(Benadir)[14]的姊妹港口转归桑给巴尔苏丹管辖。

同一时期,在贝纳迪尔海岸以北地区,米朱提因苏丹国显然对外界保持了独立。不过,这个国家的苏丹与英国在亚丁签署了一项协议,保证保护在这个国家沿海失事船只人员的生命与财产,英国每年给予360 美元津贴。[15]当时,这个苏丹国也与阿曼人有着接触,但似乎并不正式接受阿曼的统治。

1846 至 1848 年,“杜库迪克”(Ducouedic)号双桅船的船长、法国探险家夏尔 · 吉兰访问了这一带沿海地区的各个中心。他发现,贝纳

迪尔地区各港口总体说来是既承认桑给巴尔苏丹的权力，也承认索马里内地格勒迪氏族的权力。其中，格勒迪氏族是谢贝利地区的主人，此时正处于全盛时期。桑给巴尔苏丹无疑拥有更大的潜在实力，因为他比格勒迪苏丹拥有更好的武装，但是格勒迪苏丹更便于直接行使权力。因此，1870 年，桑给巴尔苏丹想为其在摩加迪沙的代表修建一座堡垒时，还要取得格勒迪苏丹的同意与帮助。这件事典型地说明这两个苏丹之间权力分配上的微妙关系。

在吉兰逗留期间，虽然古老的棉纺业依然有利可图，[16]但摩加迪沙的大部分已经成为废墟。不久前的瘟疫与饥荒使得摩加迪沙只剩下5 000人；该城哈马尔文与香加尼两个部分之间不和，各有自己的领袖。1842 年，格勒迪苏丹曾经被请来进行调和，两派勉强达成了休战。相形之下，桑给巴尔苏丹在摩加迪沙的权势是微不足道的，几乎是徒有虚名。1843 年，桑给巴尔苏丹曾任命一个索马里人作为摩加迪沙的总督，并派有两名士兵来征税，但不久之后，这个官员便放弃了职务。在吉兰访问摩加迪沙时，唯一的桑给巴尔代表是一个年老的阿拉伯人，他有一个印度助手帮助收税。

整个贝纳迪尔海岸地区的总督驻在巴拉韦。与摩加迪沙相比，巴拉韦的繁荣给吉兰留下了印象。这个城市拥有 5 000 人，虽然承认桑给巴尔的统治地位，但实际上由两个人领导，一个是索马里人，另一个是会说一点英语的阿拉伯人。巴拉韦与摩加迪沙之间的马尔卡完全由索马里人所侵占。该港口由当地比马尔(Bimal)氏族的一个成员管理。桑给巴尔在这里的唯一代表是一个年老的海关官员。不久前，在格勒迪氏族与比马尔氏族之间发生冲突的过程中，该城镇被格勒迪苏丹所摧毁，巴拉韦城民此时正准备反击。在此情势下，吉兰明智地决定缩短他对该港口的访问。

因此，总的说来，到 19 世纪中叶贝纳迪尔南部海岸承认桑给巴尔的宗主权。但是与在那里直接行使权力的且统治着内陆的格勒迪人相比，桑给巴尔苏丹的权力并不明确，也不稳定。总体上来讲，格勒迪苏丹并不对桑给巴尔苏丹的地位提出异议。两位苏丹是朋友而非敌人，

他们在控制贝纳迪尔上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再南边一点，桑给巴尔苏丹的命令就能直接发生作用了。例如，1868 年瓦尔代族盖拉人被击败后，达鲁德部落派来新增援部队，以便向南更进一步地推进；他们从北方经海路来到基斯马尤，并就此向桑给巴尔苏丹发出请求，还得到了认可。

贝纳迪尔海岸各港口北面的米朱提因苏丹国同阿曼有联系，但在政治上是保持独立的。泽拉在形式上仍然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柏培拉也是这样，只是不那么明显，但这两个港口当时都与亚丁的英国人有频繁的贸易往来，且柏培拉还通过一些商业条约与英国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 19 世纪中叶，索马里海岸已经不再与外界隔绝了。在这里，此时是内陆的游牧部落控制着各港口，而非各个港口控制着内陆的游牧部落。沿海的传统与内陆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混合起来；政治压力的中心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了内陆。但是沿海地区与外界的新联系，为 19 世纪后几十年的新的殖民冲击铺平了道路。这一冲击的压力又主要是从沿海推向内陆地区，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的。



第三章　帝国主义瓜分(1860—1897)

19 世纪中叶后的年代里,索马里很快成为英国、法国、意大利之间争夺殖民地的场所。在非洲大陆本身,埃及也被卷入了进来;接着是阿比西尼亚,它正是在这个时期扩大和巩固其版图的。到 1897 年,对索马里的瓜分实际上已经完成。虽然后来做了一些调整,但是索马里的新疆界已经确定,至少理论上是如此的。瓜分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空隙,后来在殖民巩固过程中进行了调整。剩下来的就是具体划界了,但是实际划界工作要比 1897 年所设想的要困难得多。

英国在占领亚丁后,对索马里地区产生了兴趣。1839 年,英国用武力获得了亚丁,把它作为通向印度捷径上的一个站点。由于亚丁缺乏资源,英国在亚丁的驻军几乎完全依赖北索马里供应肉类。亚丁也有不少索马里居民,其中很多人为那里的新统治者所雇用。索马里沿海地区的秩序,尤其是通往内陆的供养商路以及柏培拉与泽拉两个港口的畅通,是亚丁当局与孟买政府的直接关切点。尽管像伯顿这样的旅行家与亚丁当地官员都可能主张英国占领索马里海岸,但威斯敏斯特对他们的计划置若罔闻。英国政府只对索马里的肉类供应感兴趣,因为这是亚丁驻军的必需品。只有肉类供应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英国才认为有必要占领索马里海岸。尽管英国各届政府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对索马里海岸的这一态度直到 1887 年英国迫于形势建立"英属索

马里保护领地"之前,一直是白厅的指导方针。英国-索马里保护条约的性质也反映出这种看法。1897 年,英国与埃及签订条约的谈判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看法。后来这种看法发展成为一种吝啬、漠不关心的传统,且这种传统支配着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英国的行为。然而,尽管英国对其保护领地的关切是功利主义的,也是有限与次要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英国政府 1897 年在与埃塞俄比亚讨价还价时,利用其在索马里的占有地作为筹码而获得较大利益。

开始对红海海岸表现出兴趣的其他强国则有着更明确、更直接的帝国野心。在这个地区,英国最初的主要对手是法国。1859 年,法国驻亚丁的代理领事获得了达纳基尔的奥博克(Obock)港口的租借权。三年后,法国与达纳基尔签署了条约,直接从阿法尔人手里买下了该港口,在那里升起了法国国旗。但是,直到 1881 年,即苏伊士运河开放十一年后,法国才开始利用其在奥博克的孤立据点,在那里建立了法国-埃塞俄比亚贸易公司。在这期间,意大利继法国之后,对红海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英国自由党内阁却对提出帝国主义要求很不积极。意大利外交大臣授权前驻埃塞俄比亚的传教士朱塞佩·萨佩托(Giuseppe Sapeto),让他在红海海岸为意大利挑选一处殖民地。1869 年,萨佩托在厄立特里亚沿海的阿萨布(Assab)取得了租借权。第二年,一家意大利轮船公司直接从当地阿法尔人手里买下了阿萨布。该公司打算从事经苏伊士运河与红海到印度的航运业务。英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意大利来争夺这些权益。

与此同时,埃及无疑受到了这些外国势力的刺激,重新提出了土耳其以前对红海海岸的领土要求。土耳其在 1866 年将红海海岸的萨瓦金(Suakin)和马萨瓦(Massawa)港口交给了埃及总督赫迪夫·伊斯梅尔(Khedive Isma'il)的政府。伊斯梅尔政府宣称,新划归它的管辖区包括索马里海岸[1]。第二年,苏丹总督访问了红海诸港口,也访问了塔朱腊(Tajura)、泽拉与柏培拉,要求当地首领向苏丹效忠。1869 年,一艘埃及船只访问了柏培拉。第二年,穆罕默德·贾马尔·贝伊

(Muhammad Jamal Bey)被派到索马里沿海地区,在布勒哈尔和柏培拉升起了埃及的国旗。

埃及的占领立即引起了英国的抗议。虽然英国本身并不寻求占领索马里领土,只是担心亚丁驻军的肉类供应能否保障,但英国并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在亚丁湾对面安顿下来。为此,英国曾从亚丁派出密使,挑动索马里人反对埃及人。1869 年,英国代理人曾成功地阻止了索马里东部的一个部落给予法国停泊权。相应地,印度事务部要求采取措施以便让索马里对埃及保持独立。英国政府不同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是在 1870 至 1874 年期间,英国政府一直通过外交渠道来抵制埃及对泽拉东部海岸的领土要求。就在这一时期,埃及的实际管辖范围迅速扩大了。1873 年,埃及人占领了厄立特里亚的恩涅斯莱湾(Annesley Bay),1874 年占领了克伦(Keren),且赢得了这两个地方及索马里海岸地区民众的归顺。1874 至 1876 年期间,埃及继续执行这种进攻性政策;阿比西尼亚遭到了攻击,埃及派遣了远征队到瓜达富伊角(Cape Guardafui)以南的索马里海岸,但并没有在那里建立有效统治。尽管埃及在阿比西尼亚的冒险失败了,但是埃及成功地在泽拉内地进行了扩张,并在古老的商业城市哈勒尔驻防。

此时,英国面临着其他更难以对付的对手。英国开始将埃及的占领视为符合而不是违背英国的利益。因此,1877 年,英国与埃及总督签订了协议,英国承认埃及管辖范围南至哈丰角(Ras Hafun)。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对这一协议做了这样的描述:“这是我们阻止其他欧洲强国在亚丁对岸获得立足点的唯一保障。”该协议包括一项预防性条款,规定:“索马里海岸任何部分……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割让给外国。”这项规定后来写进了英国与索马里各部落签订的保护条约中。

看上去,埃及人在泽拉、布勒哈尔与柏培拉建立权威并不是那么困难,但他们对内陆游牧部落的影响比较有限。此时的索马里人还没有火器,不得不依赖传统的长矛与匕首来确保安全。此外,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但他们并没有组成单一的政治单位。外国的侵略所

遇到的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而是分散的、往往又是互相敌对的一些部落。这些部落经常由于宿怨而互相残杀。埃及在对沿海地区短暂的统治期内(1870—1884),虽然遇到个别部落与家族的强烈抵抗,但没有遇到团结一致的抵抗。

泽拉的统治者是一位当地的阿法尔人,即阿布·巴克尔(Abu Bakr)帕夏。他在埃及人到达前就取代了其前任索马里人哈吉·阿里·舍马克,成为土耳其驻泽拉的总督。阿布·巴克尔积极投入在当时依然还很普遍的奴隶贸易,在亚丁的英国人认为他支持与英国竞争的法国人的利益。柏培拉的总督是个埃及人,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贝伊('Abd ar-Rahman Bey)。按照对柏培拉保持戒备的亚丁当局的说法,他的统治是残暴且不公正的,当然也就引起了其索马里臣民的敌意。尽管埃及殖民者与其索马里臣民有着共同的宗教,但在泽拉与柏培拉,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内陆的游牧部族带来的棘手问题。新政府力图掌控索马里各部落苏丹的任命,同时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一些较小的部落支系,新政府指派头人(Akils,即"阿基勒")作为这些支系的代表。埃及人指定的候选人并不总是会被接受。1883 年,在承认盖达布尔西(Gadbursi)部落首领努尔"乌加斯"(Ugas)问题上,埃及人同这个部落出现了纠纷。努尔最终被派往埃及。如果传说是真的,埃及总督曾设宴招待过他,并送给他一些火器作为礼物。此外还发生过其他一些类似事件。

然而,无论在亚丁的英国人多么讨厌埃及人的统治,这种统治还是在索马里海岸留下了确凿的证据以示其权力的存在。尤其是在公共工程方面,很多公共工程是靠强迫劳役来完成的。泽拉与柏培拉的港口设备大有改进,建立了码头与灯塔;在柏培拉,古代向城里供应淡水的杜巴尔输水管得到了修复。埃及人自然也倡导伊斯兰教。他们在占领海岸期间新建了几座清真寺。然而,无论埃及统治的功过如何,这种统治由于苏丹的马赫迪起义而戛然而止了。这次暴动使得埃及必须集中力量,因而必须大量减少它在厄立特里亚、哈勒尔即索马里沿海等边远地区的职责,至少英国是这样认为的。后来,埃及于 1884 年撤出了哈

勒尔、泽拉和柏培拉。这立即又引发了如何治理该地区对英国有利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法国与意大利一直很是活跃。当时,法国新近在马达加斯加与中国获得了新权益,同时,英法对埃及的共管也已瓦解,这些都促使法国要在红海航线上建立一个基地。此时的红海航线是法国海外交通的一个重要连线。法国认为需要把日益衰落的奥博克港从垂死的贸易公司的控制下拯救出来,并把它建成一个有效的加煤站。这一时期,英法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英国亚丁当局这时不让法国运输船中途在亚丁加煤,因此,法国重建奥博克港口就显得更加必要了。1884 年 6 月,法国任命莱翁斯·拉加尔德(Leonce Lagarde)为奥博克的总督。他是法属索马里海岸(*Côte des Somalis*)[1]的奠基者。法国在埃塞俄比亚及东北非地区扩充势力过程中,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同一时期,意大利在阿萨布的影响得到了巩固与扩展。当时的阿萨布仍然属于拉法埃勒·鲁巴蒂诺(Raffaele Rubattino)轮船公司。最初,英国对意大利这些行动的反应是敌意的。但到了 1882 年,意大利在英国的压力下,承认了埃及对其南北殖民地的统治权。此时,意大利政府认为有充分的把握,可以公开对阿萨布提出领土要求,因此就从那家轮船公司买下了该港口。尽管有人对意大利的野心仍然感到不安,但英国政府已经开始认为意大利的卷入会有利于对付法国,法国人的扩张威胁在英国人看来要大得多。英国的自由党内阁此时还决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确保苏伊士运河的通航。1882 年 7 月,英国军队占领了苏伊士、伊斯梅利亚(Ismailia)和塞得港(Port Said)。然而,马赫迪派控制东苏丹与萨瓦金港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当时有传言说,在 1885 年埃及驻军撤出厄立特里亚的马萨瓦后,法国企图占有此港口。在这一传言下,英国就怂恿意大利卷进来,与土耳其人进行必要的法律上的安排。1885 年 2 月,意大利宣布从阿萨布到马萨瓦的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区为它的保护领地。

---

[1] 法国人对法属索马里的称呼。—— 译者注

意大利在索马里区域可延伸到的最北部以远的厄立特里亚建立殖民地，自然不会使意大利在索马里获得立足点。但是，意大利进一步地向内陆扩张，很快就侵入了阿比西尼亚境内，而且两国还在 1889 年签订了乌西亚利条约(Ucciali)。在意大利看来，此条约确立了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保护权。同年，意大利第一次在索马里直接获得权益，并且在阿比西尼亚东北、东南沿海地区建立了势力范围。此外，通过乌西亚利条约，意大利人还直接插手索马里的瓜分。

英属与法属保护领地的建立

在英国看来，如果说意大利可以取代埃及在厄立特里亚的地位的话，那么其范围并不适用于哈勒尔或亚丁对岸的索马里海岸。这些地区未来的地位问题较为复杂。对英国友好的国家和可以为英国完全接受的国家看来都不想取得这些地区。[2]埃及人不准备自动撤出在这些地方的驻军；土耳其无意重新控制塔朱腊与泽拉；索马里沿海的当地部落明显没有能力保持独立，也没有能力维持柏培拉长期的和平与秩序。当然，英国也没有同这些部落商量过。

如果埃及人主动撤出的话，有可能还会引起混乱。1881 年以来担任亚丁副驻扎官兼索马里海岸领事亨特(Hunter)少校报告称，如果埃及突然从哈勒尔撤出驻军的话，有可能会导致索马里人与奥罗莫人的斗争。他还说，埃及驻军在撤往泽拉的途中将几乎肯定会遭到伊塞与盖达布尔西氏族的袭击。哈勒尔本身也会易受攻击，将会成为野心勃勃的绍阿国王孟尼利克(Menelik)所垂涎的目标。在索马里海岸，来自苏丹的消息在柏培拉的索马里人中引起了不安。除了奥博克的法国人造成日益增长的威胁外，泽拉至少暂时还是比较平静。然而，埃及撤军总的说来会导致破坏与骚乱。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只好勉强做出决定，直接采取行动以确保商路的安全以及亚丁驻军的肉类供应。1884 年，英国派遣由休伊特(Hewitt)海军上将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前往阿比西尼亚，要求约翰国王(King John)在埃及从哈勒尔撤军一事上给予合作。此时，一艘意大利

装甲舰访问了柏培拉,并在泽拉引起了一件可疑事件。之后,英国政府授权亨特少校与当地的索马里部落谈判,为英国占领提供必要安排。由于索马里部落对埃及的统治比较厌倦,且可能已经意识到阿比西尼亚及其他外部势力即将对索马里采取更强烈得多的扩张主义行动,他们似乎很乐于接受英国人的保护。同年底,英国与伊塞、盖达布尔西、哈巴尔·加尔哈吉斯(Habar Garhajis)[3]、哈巴尔·阿瓦尔与哈巴尔·托尔·贾洛(Habar Tol Jalo)等氏族签订了正式条约,取代了早期的一些贸易协议。

这些英索新条约,在索马里的条约签订者看来是某种契约型的联盟,这种联盟也被广泛地应用在索马里氏族政治内部。当然,从表象上看,他们也没有让与英国什么东西。各个氏族条约的导言都说明,索马里方面的立场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独立,为了维持秩序与其他一些确实和充足的理由。"有些条约的导言还提到由于埃及的撤出而造成的新形势:"鉴于埃及总督殿下的驻军即将从柏培拉、布勒哈尔以及整个索马里海岸撤离,我们这些签字的……部落长老,为了维护我们的独立,为了保持秩序和其他一些确实和充足的理由,希望与英国政府缔结一项协定。"各相关氏族也没有向英国割让土地;他们仅仅保证:"除了英国政府外,决不把目前由他们居住或控制的领土割让、出卖、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让他人占领。"

然而,索马里氏族确实准予英国政府有权派遣官员常驻索马里海岸。1886 年,英国又与这五个氏族分别签订了补充条约,条约提到双方都希望"维持和加强彼此间的和平与友好关系",并且宣称英国政府保证使各有关氏族及其领土受到"女王陛下的恩泽与庇护"。还有一则条款规定,除非在英国知道与同意的条件下,各个部落不可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4]。

这些安排一旦完成,道路也就扫清了。亚丁的官员们热情很高。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准备占领索马里沿海地区,还特地训练了约有四十人的一队亚丁警察。但是,英国政府却发出指示,要求用尽可能文明的方式实行占领,而且不许把英国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内陆。到 1884 年

底，英国派遣了三个驻索马里海岸的“副领事”。一个副领事驻在柏培拉，且配有一个助手驻在布勒哈尔；另一个副领事驻在泽拉，当时的英国已经与土耳其达成一致共同管理泽拉。阿法尔官员阿布·巴克尔帕夏名义上仍然是泽拉的总督。这些副领事在英国驻亚丁的驻扎官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他们得到了明确的指示，即其职责相当于英国本土机构的官员职责，应当维持治安，而不得超过这个权限；不要考虑一些庞大计划；经费应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且应由当地港口部分收益来提供。所有这些规定完全符合英国把索马里海岸放在次要地位，且只是作为亚丁港食品供应源的这一观点。

普伦德加斯特·沃尔什(Prendergast Walsh)无疑是这一时期表现最突出的副领事之一，他将其在柏培拉的管理看作是“家长式的”。[5]在沃尔什的治理下，为了能得到城中缺乏的建筑材料，就通过给赶骆驼的人分发吊索，要他们只要从内陆来就要带两块大石头到柏培拉。他鼓励来自内陆的游牧民在进城前将其武器放置在警察局中，并想出一套阻止暴力行为的巧妙方法。如果抓到两个正在打架的人，就将他们分开并夺走其武器。然后，他们得挖个墓穴。警察对这个完工了的墓穴满意后，就将武器还给他们。他们要是继续争斗，需满足一个条件，即胜利者要将其对手埋葬掉。沃尔什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斗的武士也宁愿忘记他们之间的不和，至少暂时可以做到这点。然后，城市布告者(town crier)在城中宣告整个事件的经过。

由于有上述办法，再加上有一百名左右配有步枪的索马里海岸警察，柏培拉与布勒哈尔的秩序得到了有效的维持。非正式的武装护送队的护送，保障了商队与内陆之间的贸易安全。护送队由受到护送的商人提供报酬。柏培拉的阿亚尔·尤尼斯人、布勒哈尔的阿亚尔·艾哈玛德人(Ayyal Ahmad)作为所有外国商人的代理人，其地位仍然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他们垄断了组织商队到内陆贸易的权利。

在较远的内陆地区，秩序的维护有时需要在亚丁援军的协助下进行讨伐。在内陆地区，部落之间的、对商队的袭击与抢掠时有发生。由于内陆地区普遍同情苏丹的马赫迪教派，使得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

塞努西(Senusi)穆斯林教派在当地的代理人与马赫迪教派密使的活动,又助长了内陆地区部落对马赫迪教派的同情。对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这两者之间的不和减轻了他们本来可能会给英国人造成的直接影响。1885 年初,从埃及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泽拉警察发生叛变,但是驻在泽拉掩护埃及从哈勒尔撤军的印度步兵进行了干涉,从而避免了一起严重的事件。接着,柏培拉也发生了一场小骚乱。为了抵消宗教宣传的影响,英国当局用不引人反感的方式任命了一个亲英的舍赫为正式的穆斯林法官,代替了两个"自封"的法官。这两个"自封"的法官都是阿拉伯人,且都是极端反对英国的。

正当英国建立这种精简的却异常高效的行政机构的时候,埃及驻军在 1885 年撤出了哈勒尔,但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事件。哈勒尔人(Harari)阿布达拉赫·穆罕默德(Abdallah Muhammad)被留下来担任这座城市的总督,并配有一名英国顾问。与此同时,法国人在奥博克很活跃,与英国展开竞争。尤其是那个富有事业心的法国领事在达纳基尔总督的支持下,在泽拉从事阴谋活动,使得英法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由于英国政府不愿对泽拉的未来地位作出决定,让当地的英国官员有点不知所措。

埃及人撤出后,在拉加尔德(Lagarde)的大力推动下,法国的停泊站扩展到塔朱腊港的北岸地区。1885 年初,法国声称其统治区域已经越过塔朱腊而扩展到吉布提附近。英国对此作出了回应,并发布了一份公告,称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从柏培拉一直延伸到法国所要求的地区内的某个地点。对此,法国也作出了回应。法国与阿姆巴多(Ambado)和吉布提的伊塞人缔结了一项永久友好条约。这个条约明确地将全部土地割让给法国,因此法国也就对吉布提港提出了领土要求。

这场争吵没有顾及到当地居住者的利益,且看来似乎会导致公开的冲突。1885 年底,英国确实也预计法国将在泽拉港登陆,因此也做好了抵抗的准备。然而,双方此时同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而非诉诸武力。谈判的结果是 1888 年英法协定的签订,该协定将英法两个保护

领地的分界线划在泽拉与吉布提之间。四年之后，吉布提成为法属索马里的正式首府。这种新安排的后果，是将与法国、英国都签有“保护”条约的伊塞人分成两半。英国人签订的条约旨在保护伊塞人的独立，并没有赋予英国人公然要求伊塞人领土的权利。

意大利人的势力范围

意大利人曾被英国人趁机利用，作为英国的盟友以对抗法国人。但是，此时的意大利人立足于其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开始向内陆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这种要求所带来的后果，以及苏丹马赫迪教派日益严重的威胁，如同以前埃及人的入侵一样，更加促进了阿比西尼亚人的团结。意大利人为了对付阿比西尼亚人对意大利的扩张所进行的日益强烈的抵抗，曾企图挑起绍阿国王孟尼利克与拥有“众王之王”称号的提格雷国王约翰之间的斗争。意大利支持孟尼利克，提供武器并怂恿他夺取约翰的封号。但是，这两个首领却形成了王朝联盟，并就如何划分彼此打算征服的领土达成一致，约翰还同意在他死后由孟尼利克继承帝位。1887 年，哈勒尔的穆斯林统治者阿布达拉赫·穆罕默德，指使其士兵屠杀了一批意大利探险家后，孟尼利克夺取了这座城市，并任命其表弟马康南公爵(Ras Makonnen)为总督。孟尼利克在给亚丁的英国人的信中说，他认为阿布达拉赫·穆罕默德是 16 世纪穆斯林征服者艾哈迈德·格兰的继承人；阿布达拉赫的失败与格兰的失败一样，是基督徒拥有无上权力的证明。

在此期间，约翰国王忙于将马赫迪教派与意大利人挡在海湾附近。1888 年，意大利人取得了一场非决定性的胜利。第二年，约翰国王在梅特马(Metemma)与马赫迪教派的战斗中丧生。意大利人同当时继约翰称帝的孟尼利克签订了《乌西亚利条约》(the treaty of Ucciali)。意大利人将该条约的意大利文本解释为阿比西尼亚已经成为意大利的保护国。但是孟尼利克声称该条约的阿姆哈拉(Amharic)文本并没有规定他必须通过意大利来处理一切对外关系。然而，这个矛盾直到后来才暴露出来。当时意大利人对厄立特里亚的统治权已经正式得到承

认,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很有信心,不仅向孟尼利克提供大量武器弹药,还给予了贷款。1890年,意大利推荐阿比西尼亚参加"布鲁塞尔总法案"(Bussels General Act),这就使得阿比西尼亚得以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合法地进口军火。法国商人很早就与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者从事利润可观的军火生意,并不理睬禁止阿比西尼亚进口武器的1886年英法协议。法国的盟国俄国展开了与意大利之间的争夺,试图将阿比西尼亚作为俄国的保护国,也向阿比西尼亚输入了武器与军事顾问。按照意大利人对《乌西亚利条约》的解释,向阿比西尼亚输入战争物资是符合意大利利益的,但是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些物资却被用来巩固孟尼利克的统治,最后还使得这位皇帝能够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在此过程中,原来处于古阿比西尼亚霸权之外的一些索马里部落被并入了新的埃塞俄比亚帝国。

在签订词意含糊的《乌西亚利条约》的那一年,意大利对英国势力范围以东的索马里沿印度洋海岸地区提出了直接的领土要求。意大利驻桑给巴尔领事文森索·菲洛纳尔迪(Vincenzo Filonardi)与霍比亚(Obbia)的米朱提因苏丹优素福·阿里(Yusuf 'Ali)[6]签订了一项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优素福·阿里将其国家与领地交由意大利"保护与管理",以换取1 800塔勒(taller)的年金。两个月后,文森索·菲洛纳尔迪又与优素福·阿里的亲戚、阿卢拉(Alula)地区米朱提因部落的世袭苏丹伊斯曼('Isman)签订了一项类似的条约。1889年底,英国皇家东非公司将从桑给巴尔苏丹租来的贝纳迪尔南部沿海的港口转租给了意大利。直到1895年,朱巴河以南的索马里领土都属于这家英国公司。1895年,英国皇家东非公司镇压了因其职员无能而引起的叛乱之后,该公司交回了其特许证,英国政府宣布对这个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因此,这块被称为"朱巴兰"(Jubaland)的区域成为当时英国东非保护领地的一部分。

意大利对贝纳迪尔沿海地带的领土要求,本来就是一种要求而已,但到1892年,桑给巴尔苏丹把巴拉韦、马尔卡、摩加迪沙与瓦尔谢克(Warsheikh)等港口都直接租让给了意大利,为期二十五年,每年租金

为十六万卢比，这就强化了意大利对该地区的领土要求。意大利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这个沿海地区谋取利润和进行管理；但是，该地区的所有权仍属于桑给巴尔苏丹。在此期间，菲洛纳尔迪辞去了其领事职务，建立了商业性的菲洛纳尔迪公司。意大利政府委托该公司代管其在贝纳迪尔海岸的领地。1891 年，该公司在阿达来(Adale，意大利人称之为 Itala，即伊塔拉)建立了意大利的第一个据点，当地的索马里首领与菲洛纳尔迪签订了一项保护条约。沿海地区的新统治者，即意大利人的代表，是一个阿拉伯人，还有一小支由二十名土著士兵组成的军队。这就是意大利殖民地的简陋的开始。四十五年之后，意大利人就是利用这个殖民地作为征服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基地。

当菲洛纳尔迪公司在贝纳迪尔海岸开始运行的时候，意大利探险者也在积极活动。1891 年，罗贝基-布里凯蒂(Robecchi-Brichetti)从摩加迪沙长途跋涉到霍比亚，并从霍比亚穿过欧加登前往柏培拉。同年，巴乌迪·蒂·韦斯梅(Baudy di Vesme)与康代奥(Candeo)也穿过欧加登，欧加登部落的长老在他们经过时，向他们提出了要意大利保护的请求。1892 年底，鲁斯波利亲王(Prince Ruspoli)从柏培拉出发，从相反的方向穿越相同的大部分地区。1893 年 4 月，鲁斯波利亲王到达朱巴河畔的巴尔德拉时，与该地区的索马里人签订了一项保护条约。这些意大利开拓者并不是探险这些地区的第一批欧洲人。1883 年，就有一批英国人不顾亚丁当局的非难，从柏培拉来到了谢贝利河。1886 至 1892 年间，斯韦恩兄弟(Swayne brothers)曾对北部海岸与谢贝利河之间的大部分地区进行勘察。但是，这些英国探险家与意大利探险家不一样，他们没有与沿途遇到的各个氏族签订保护协议。

在菲洛纳尔迪公司开始扩大其管辖权后，该公司缔结了比较正规的协定。但是，沿海的索马里人并不总是欢迎这些新来的统治者。1893 年 10 月，菲洛纳尔迪及其同伴顺利地同马尔卡的首领签订了一项条约后，正要登上意大利军舰时，同伴中的一个人遭到袭击，受了重伤，命垂一线。意大利人进行了报复，囚禁了十二个索马里长老，并且猛烈地攻击这个城镇。其他地方也发生了炮轰事件，因为在厄立特里

亚、亚丁、桑给巴尔与贝纳迪尔沿海各港口游弋的意大利军舰发现这种做法颇有好处,可以帮助菲洛纳尔迪公司逐步扩展。但是,1896 年,该公司在成立仅仅三年后,就由于资金不足而不得不关门。到 1896 年底,意大利人除了在伊塔拉之外,还建立了六个据点。吉姆博(Giumbo)与瓦尔谢克这两个据点与伊塔拉一样,只是前哨地,并没有意大利官员;但是,巴拉韦、马尔卡、摩加迪沙与卢格(Lugh)已经有意大利官员常驻。

意大利人在著名的阿杜瓦(Adowa)战役中惨遭失败后,菲洛纳尔迪公司倒闭了。意大利原本曾含糊其辞地声称埃塞俄比亚是其保护国,阿杜瓦战役彻底颠覆了意大利的这种说法。但是,意大利设法保住了其在厄立特里亚的殖民地。尽管孟尼利克打了胜仗让意大利国内的民众愤怒不已,意大利仍是乐观地固守其在索马里新得到的领地。意大利人在驻红海、印度洋的小舰队帮助下准备防守贝纳迪尔以对付埃塞俄比亚可能发动的袭击。他们还企图向内地扩张势力。1896 年 11 月,意大利驻桑给巴尔领事切基(Cecchi),没有得到格勒迪苏丹的允许,就率领一支探险队去侦察谢贝利河左岸。这次远征的结局是灾难性的,探险队员在拉弗雷(Lafole)遭到了索马里部落的伏击,十七个意大利人只有三个得以逃生。

然而,这次挫败并没有让意大利政府灰心。它把当时的形势理解为要加强“靖乱”工作。因此,在没有找到一家新公司来担负管理贝纳迪尔沿海的任务之前,意大利政府任命“厄尔巴”(Elba)号巡洋舰舰长乔治·索伦蒂诺(Giorgio Sorrentino)为特派员,来恢复秩序,并急忙用船把更多的土著部队从马萨瓦运到索马里海岸。1897 年 11 月,索伦蒂诺对拉弗雷事件的报复性行动,使得格勒迪苏丹相信,接受新来的殖民者是明智之举。这个特派员的使命完成了。六个月后,虽然意大利国内对于进一步的殖民冒险事业一直缺乏热情,但贝纳迪尔公司(Benadir Company)已经做好了接替菲洛纳尔迪公司的准备。这个新公司像其前身一样,很快就发现既无资金又无资源,不能从这项事业中获利,终于在 1905 年垮台了。这时意大利政府才最终认识到,如果要

在贝纳迪尔有所作为，必须亲自上阵。

意大利虽然起初几乎无法施加自己的权威，但它获得了北索马里的两块保护领地，且租借到了贝纳迪尔南部的几个港口，这自然就引起了这些地区与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之间划定边界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所涉及的范围更广，并不仅仅只是关系到英、意两国的殖民地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按照意大利对《乌西亚利条约》的解释，意大利作为阿比西尼亚的保护者，究竟能得到多少领土。英国是承认《乌西亚利条约》的，法国对该条约则持有异议。各国关心的焦点是哈勒尔与泽拉。法国企图将赚钱的贸易从哈勒尔转移到其新殖民地的港口。英国仍然把索马里海岸放在次要位置，但也竭力想使贸易继续沿着古老的商路流入到英国保护领地内的泽拉港。意大利却把哈勒尔作为其阿比西尼亚保护领地的一部分，且企图占据哈勒尔贸易的天然出口港泽拉。

早在 1890 年，意大利就强调其对哈勒尔-泽拉地区的关注。当时，意大利政府就曾对哈勒尔可能因为英国保护领地讨伐伊塞部落而受到影响表达了关切。1890 年 9 月，孟尼利克致信于意大利国王，指出《乌西亚利条约》的阿姆哈拉文本允许他与外国交往时借助意大利政府，但是并没有规定他必须这么做。意大利政府的回答是派安托内利伯爵(Count Antonelli)去与那位皇帝交涉该问题。安托内利访问的另一个目的是劝孟尼利克给各国发出通告，阐明阿比西尼亚的古代边界。这份备受关注的文件是在 1891 年发出与收到的。这个文件涉及索马里的部分声称，阿比西尼亚拥有“欧加登州、哈巴尔・阿瓦尔、盖达布尔西与伊塞氏族”(后三个索马里氏族与英国签订有保护条约，伊塞氏族还与法国签订有保护条约)。这份文件还包含有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宣言，即“埃塞俄比亚四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异教徒包围中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孤岛。如果外面的列强要在彼此间分割非洲，我不会是一个无动于衷的观望者”。

然而，意大利还是作为阿比西尼亚的保护者与英国谈判边界问题。1891 年 3 月，双方签订了英意议定书，确定了英属东非与意属索马里之间的边界；意大利政府进而要求进一步划定意属索马里与英属索马

里之间的边界线。当时,英国不像意大利那样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它采取拖字诀。但是,1894 年 5 月,双方还是签订了一项议定书,确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至此,孟尼利克已经使得他 1891 年的通告中声称有权管辖某些索马里部落的说法显得像是有了某些根据。他继 1887 年征服哈勒尔后,又征服了当地强悍的奥罗莫人。这些成就使阿比西尼亚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其索马里邻居身上。马康南公爵的部队从哈勒尔出发,不仅在伊塞、盖达布尔西与哈巴尔·阿瓦尔等氏族中,而且还在东部、东南部的豪德地区与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人中征收粮草。这一举动,特别是 1891 年一支阿比西尼亚小部队在英国保护领地西部边界处于英属区域内的比约卡博巴(Biyo Kaboba)设立哨所,让英国保护领地当局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意大利坚持认为,与阿比西尼亚的所有谈判都应当通过意大利来进行。英国接受这一立场,但是当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时,它向意大利人提出的抗议却毫无效果。索马里相关氏族向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当局要求支持;本来,阿比西尼亚的压力只要用很少的武力就可以轻易地对付,但保护领地当局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有人曾提到过给索马里人提供自卫武器的可能性问题,但这种意见当然地被否定了。

虽然英国保护领地当局对英国政府不愿意充分履行英索保护条约的态度很是不满,但这却是英国官方对待索马里海岸的一贯立场。其结果是强化了阿比尼西亚的势力,强化了意大利作为阿比西尼亚保护者的地位。不过,这时的英国越来越怀疑意大利对孟尼利克究竟有多大的实际影响[7]。

在达成 1894 年英意协定的谈判中,曾讨论过这么一种可能性,即英国将伊塞、盖达布尔西部落以及泽拉港一起转让给意大利,以换取意大利让出北索马里的部分保护领地。然而,双方后来没有采取该办法。最后达成的决定是承认欧加登属于意大利的势力范围,豪德则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8]。三年后,英国又大大缩小了它根据上述协议在豪德取得的权利。

1897年与埃塞俄比亚签订的条约

1896年意大利人在阿杜瓦的失败彻底颠覆了阿比西尼亚是意大利保护国的言论。令人头疼的《乌西亚利条约》给孟尼利克帮了大忙。孟尼利克的天才对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教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欧洲帝国要顺利扩展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认真考虑其地位与愿望。法国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经取得了与埃塞俄比亚的和解。英国人仍然不相信这一点,直到意大利人在阿杜瓦失败后才彻底觉悟过来。后来,随着苏丹局势的发展与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侵犯日益加剧,英国政府才不得不直接与内陆的真正主人打交道。因此,1897年,英国驻开罗总领事馆一等秘书伦内尔·罗德(Rennell Rodd)奉命到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以便与埃塞俄比亚皇帝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更为广泛的问题。

如前所述,此时的伊塞与盖达布尔西氏族都已经被分割,分属于英、法与埃塞俄比亚三国。有些伊塞人在法国的"保护"下,有些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而更往内地的伊塞人事实上受哈勒尔的马康南公爵的影响。同样的,盖达布尔西人也被英国与埃塞俄比亚分割,这个氏族的努尔酋长每年向马康南公爵进贡一百头绵羊以换取其氏族不受侵扰。他同时也从埃塞俄比亚与英国那里接受馈赠与领取薪俸。在北索马里中部,伊萨克部落在豪德地区放牧时,同欧加登部落遭遇,不时受到埃塞俄比亚人的袭击。埃塞俄比亚人还对哈巴尔·阿瓦尔部落的某些支系发出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进贡,就会遭到袭击。甚至宗教中心哈尔格萨也经常受到威胁。

在南部,埃塞俄比亚的袭击队沿着朱巴河一直侵入到卢格村。在那里,当地的索马里部落的头人向桑给巴尔苏丹要求保护,他得到了十门前膛炮,因此得以在一段时期内守住其地位。然而,约在1893年,他的村子受到了埃塞俄比亚人的侵袭,于是他向沿海的意大利人寻求援助。1895年,意大利的先驱探险者博太果(Bottego)与乌果·费兰迪(Ugo Ferrandi)到达了卢格,他们击退了埃塞俄比亚人的一次进攻之

后占领了这个村庄。博太果继续前往卢多尔夫湖(Lake Rudolf)与绍阿，结果却在绍阿遭到杀害。费兰迪则留下来管理意大利公司在卢格的新据点，该地方后来被称为卢格费兰迪(Lugh Ferrandi)。1896年，埃塞俄比亚人的又一次进攻被成功地击退了。

由于俄国官员带着其军队到来[9]，埃塞俄比亚人继续向前推进，扩大其势力范围。索马里部落不仅在北方，而且在西部边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埃塞俄比亚的压力。这种压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经常地而是断断续续地在起作用，但其产生的影响却是相当大的。内陆埃塞俄比亚人的野心，沿海法国人、英国人与意大利人的野心，彼此冲突。索马里各氏族被裹挟在内，他们希望利用双方的互相争斗来坐收渔利。这种做法的结果只是削弱了索马里人整体的地位，并鼓励外国势力的入侵。

1894年，英、意两国划定了北部边界，却并没有通知孟尼利克。此次划界丝毫也没有改善英国保护领地当局与哈勒尔马康南公爵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由于埃塞俄比亚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情况更加恶化了，这种压力到1897年初发展到极致。当时，马康南公爵拒绝让英国保护领地当局为一次事件而对伊塞人采取行动。他声称这次事件是在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上发生的，为了强调其论点，他还扬言用武力来维护埃塞俄比亚的权力。英国在亚丁的驻扎官原本曾想与马康南解决这个争端，但这时却接到了英国政府的指示，不再与哈勒尔方面进行接触，因为有关英国保护领地边界的问题，将由英国派去会见孟尼利克的罗德使团加以解决。

英国下议院发表的声明说，前往埃塞俄比亚的罗德使团"要向孟尼利克国王确表我国的友好意愿，努力促进和睦的政治关系与商业关系，解决索马里海岸英国当局与阿比西尼亚哈勒尔总督之间存在的某些问题"。罗德使团更主要的目的是要向孟尼利克说明英国对英法争夺尼罗河流域的关切，并争取埃塞俄比亚在对苏丹哈里发的战争中至少保持中立，而解决英国保护领地的边界争端则被称为这次谈判的主要目的之一。只要罗德能够成功地与埃塞俄比亚建立友好关系，那么保护

领地边界实际如何划定与需要作出什么让步，都是比较次要的问题。如果需要大量经费，那么英国并不准备捍卫 1894 年划定的边界。当时确实已经出现完全放弃索马里保护领地的可能。然而，亚丁当局坚持说，决不能采取这种激烈变动的方针。因此，有待解决的问题是以这种方式保住这块保护领地：使它能充分满足亚丁进口肉类的需要，同时又把它限制在孟尼利克所能接受的边界内。

在英国使团之前，法国已经派了几个使团到亚的斯亚贝巴。孟尼利克殷勤地接待了罗德。罗德对这位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德带着某种优越感来描述这位皇帝。罗德最后说他"对这位埃塞俄比亚强人非常尊敬。这位皇帝认真努力地去了解当时的形势，克服了自己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疑惑"。[10]然而，与孟尼利克谈判的情况表明，他在外交上并不需要指导。虽然罗德成功地使孟尼利克保证不会让运给马赫迪教派的武器过境，而且孟尼利克曾宣布马赫迪教派是埃塞俄比亚的敌人，但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位皇帝还是与马赫迪教派进行了秘密谈判。

双方就埃塞俄比亚边界延伸到苏丹境内什么地方的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罗德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英国批准通过泽拉港为孟尼利克皇帝转运武器弹药，且对埃塞俄比亚国家使用的转口货物不征收关税。另一方面，哈勒尔与泽拉之间的那条古老商路，在当时已经因为法属索马里准备修建铁路而受到威胁，但还是对两国间的贸易开放。埃塞俄比亚则在通商贸易方面给予英国最为优惠的待遇。这些贸易安排在当时看来似乎很了不得，但实际作用并不大。法国商业在埃塞俄比亚已经根深蒂固。吉布提铁路很快就使得泽拉的贸易黯然失色。

关于英国保护领地边界的谈判是异常困难的。皇帝要求恢复埃塞俄比亚的"古边界"，且提到他在 1891 年发出的那份函件，而罗德说他并不知道这份函件。一开始，孟尼利克要求将英国保护领地纳入到他的帝国，最后皇帝作出了让步，同意罗德的建议，将保护领地边界的实际划定问题留待罗德与哈勒尔的马康南公爵去解决。条约的第二条规定，关于边界划分的决定应当作为这个条约的附件。先前在亚的斯亚

贝巴商定的一个附件预示了罗德将要在哈勒尔作出的那种让步。那个附件规定：由于调整边界而最终成为埃塞俄比亚臣民的索马里人应当受到良好的待遇和得到“妥善的治理”。

与哈勒尔的马康南公爵进行的边界谈判也久拖不决，困难重重。但最终还是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英国放弃了豪德境内约 6.7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英国保护领地保留了哈尔格萨与一部分内陆地区。英国对埃塞俄比亚的要求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因为埃塞俄比亚在 1897 年提出这项要求时并没有牢固地占有吉吉加以东的任何索马里土地[11]，但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能对它的要求提出异议；罗德完全明白，英国政府是不会支持使用武力的。

需要强调的是，协议条款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以便使埃塞俄比亚承认英国保护领地的新边界。从英国保护领地划出来的豪德地区的那部分土地，并没有割让给埃塞俄比亚；协议也没有规定英国必须承认埃塞俄比亚对于英国放弃的领土拥有主权。[12]孟尼利克在亚的斯亚贝巴接受的这个协议的附件，在措辞上暗示了这种单方面的承认。附件也保证了给予以后可能成为埃塞俄比亚臣民的索马里人以妥善治理与公平待遇。与此同时，罗德在措辞上与原来的一些英索保护条约条款保持了一贯的圆滑。我们还可以记得，这些条约实际上并没有把索马里领土割让给英国。而且，重要的是，这个条约丝毫不损害 1894 年英意两国所同意的意大利要求。

恰如罗德与英国政府清楚地预见到的那样，英国单方面地撤销或缩减保护范围最终必然使有关索马里人无法不受埃塞俄比亚的控制。埃塞俄比亚在断断续续的袭击之后，接着把对索马里的渗透变为明确的占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条约的第三个附件显然是为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作出规定。这个附件规定，英国保护领地新边界两侧的索马里氏族都可以使用英国保护领地境内外的放牧区与“附近的水井”；这些氏族在游牧时必须接受所在地方当局的管辖。然而，罗德与其他有关英国官员认为，埃塞俄比亚人可能不会很快就利用他们实际上已经得到的机会。他们认为，情况大概仍将与过去一样，豪德地区仍

将成为某种缓冲地带，英属索马里各氏族将只是季节性地使用那个地区作为牧场。当时没有预计到索马里西部各氏族逐渐改营农业的后果，因为那时这一过程几乎还没有开始。这个条约的一个更为严重的不利之处是当时本来可以预见到的，也就是许多世纪以来人口不断从水土严重流失的北方向中部与豪德地区迁移所造成的后果。人口的这种逐渐转移，把越来越多的受英国保护的索马里人带进了这时实际上已经属于埃塞俄比亚的地区。

然而，这些情况以及这个条约带来的其他更为直接的不利后果，都只是地方性的。虽然英国国内有人反对，索马里的英国行政机构中也有人感到担心，但是出于当时英国的帝国战略需要，这些人的反对与担心都不起什么作用。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说，既然英国又不肯在那里承担任何财政义务(因为这种财政义务超出了原来建立保护领地的目的)，罗德实际上就只是顺应大势而已。他至少作了出色的努力以取得埃塞俄比亚的善意，并且使埃塞俄比亚承认了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这个保护领地的边界也能继续适应亚丁贸易的需要。达到这个目标的代价是英国单方面废弃了与索马里各氏族签订的保护条约，这当然是不幸的。但是，当罗德拜见索尔兹伯里勋爵时，他发现外交大臣“并不关心阿比西尼亚对索马里的侵犯”，这就消除了罗德原来可能有的任何顾虑。[13]

然而，通过亚丁对治理索马里保护领地负直接责任的孟买政府并不完全满意。它预言日后会与索马里人发生纠纷。因为签订条约前并没有与索马里人商量过，索马里人对该条约一无所知。孟买政府要求，由该条约引起的任何额外开支不应由其金库负担。这一要求被接受了。对该条约负责的外交部就在第二年承担了对索马里保护领地的责任。两年后，索马里爆发了历时二十年的叛乱。英国外交部恰好赶上，把这次叛乱第一阶段所造成的重担给承担了下来。

因此，1897 年是确定英属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疆界的一年。但是，直到 1934 年英埃边界委员会试图划定疆界的时候，受英国保护的索马里人才明白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愤怒爆发为骚乱，边界委员

会的一名委员因而送了命。索马里人之所以这么久都不知情,绝非出于默认,而是由于埃塞俄比亚过了许多年才在豪德与欧加登地区建立稍微能起一点作用的行政管理。

62 然而,1897年仍然是“非洲之角”的帝国历史中的重要年份。当时签订的一些边界协定留下了一堆混乱未定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在毒害着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也不是当时唯一单方面取消对索马里人的某些保护义务的国家。在罗德使团之前,法国派到孟尼利克那里去的拉加尔德使团也讨论过边界问题,并且把法属索马里的范围缩小到使那位皇帝感到满意的程度。作为酬谢,法国得到在通商方面的某些保证,其中包括修建从法属索马里新首府吉布提到埃塞俄比亚内陆的铁路的协定。这条铁路事实上使得法属索马里成为埃塞俄比亚贸易的正式口岸。

在南方,意大利的地位虽然尚未巩固,但是它决心固守其在索马里的权益。在阿杜瓦战役失败之后,意大利被迫达成了一项可以为埃塞俄比亚接受的边界协议。这项解决办法是由内拉奇尼(Nerazzini)少校谈判的,他早前曾与孟尼利克谈判过意埃和平条约。[14]虽然孟尼利克在那个条约中自称为“埃塞俄比亚与盖拉族地区的皇帝”,而不提他在索马里的权力,但是意大利仍然被迫降低其对欧加登地区的领土要求,而这种权利却是英国在1894年的英意协议中曾经承认过的。事实上,意埃条约对意属索马里边界的规定很含糊,只说是从海岸到内地180英里与从英国保护领地边界到巴尔德拉以北朱巴河之间的地区。此时,意大利的地位很是虚弱,这种仓促划分利益范围的做法似乎对双方都有好处;其实在后来的年月里,这种做法造成了长期的不稳定与冲突,从而导致了瓦尔瓦尔事件(Walwal incident)与意埃战争,至今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然而,法、英、意三国至少已经暂时把各自在索马里的属地调整到可以为埃塞俄比亚所接受的范围,这就为该地区事态发展提供了场所。在此后的二十三年中,支配着当地局势的是舍赫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Muhammad Abdille Hassan)所领导的反对基督教“异教徒”

的宗教战争。绝大多数索马里人似乎在此之前已经接受了他们所知道的那些帝国的新发展，但是在这场宗教战争中，他们却顽强地为夺回失去的独立而奋斗。



第四章　德尔维希的自由之战 (1900—1920)

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

在讨论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为了争取从外国统治下解放祖国而进行卓越斗争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这场爱国运动兴起的社会与宗教背景。伊斯兰教在索马里由来已久，它一直与兄弟会或塔里卡(tariqas，字面意思是"道乘")联系在一起。塔里卡信仰"苏非"[①]，也就是伊斯兰教的一种神秘观念。这种观念颂扬圣徒的神圣权威，所以特别为索马里的氏族制度所接受。因为在这种氏族制度下，氏族祖先很容易就会被神化为穆斯林的圣徒。在19世纪，这些宗教组织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当时在索马里信仰伊斯兰教就等于成为苏非兄弟会的成员，当然更多的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归属。然而，当地的苏非派的神秘教义并没有发展成熟。但是，苏非派的每个兄弟会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特殊的礼拜仪式，其信徒就是按照这个仪式来礼拜真主。各个不同兄弟会的共同目的都是提高宗教的价值，而贬低世俗事物的

① "苏非"(Sufi)一词源于Suf(阿拉伯语，原意为"羊毛")，因信奉苏非主义的信徒身着粗羊毛衫以示简朴而得名。——译者注

价值，但这些兄弟会间往往又是互相对立的。它们间争执的中心问题是各个兄弟会的创始人在宗教上的功绩与其祈祷所具有的法力。一般说来，各个兄弟会都有松散的等级组织，有许多(虽然不是全部)索马里舍赫与神职人员在他们所信奉的兄弟会内部担任了拥有宗教权威的职位。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各个兄弟会之间彼此竞争、对立，但是其参加者与追随者却超越了氏族与部落的界限。这些兄弟会谋求用同派教徒的身份来代替同族同宗的身份，超越了氏族与部落的认同，以便属于不同氏族的人可以皈依同一兄弟会。这样，穆斯林兄弟会就有助于通过伊斯兰教来促进民族团结，克服那种在世俗活动中使得人们彼此敌视的宗族战争。然而，由于索马里的生活与社会环境缺乏大型的、集权的政治单位，人们唯有依靠小规模的亲族才能保证安全，因此对家族与氏族的效忠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各个兄弟会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宣扬的那种超自然属性的团结，虽然在索马里的文化民族主义中有所反映，但它也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且为日常生活中具有更多制约性的政治现实所压倒。事实上，这种号召也只是在少数宗教团体与传教中心才部分地得到实现。这些传教中心通常建立在教徒可以靠种植与养牛来维持生活的地区。在其他地方，兄弟会只是共同礼拜真主的聚合体而已，今天的大部分兄弟会也是这样。在所有大型居民点中，每个兄弟会通常都有自己的清真寺。

历史上第一个传入索马里的伊斯兰教派是卡迪里教派(Qadiriya)，该教派也是伊斯兰教最古老的教派，形成于巴格达(Baghdad)。公元1166年，卡迪里教派创始人赛义德·阿卜杜·卡迪里·吉拉尼(Sayyid Abd Al-Qadir Al-Jilanni)就是在那里去世的。究竟卡迪里教派何时传入索马里至今也没有明确答案。但是，到19世纪，该教派在索马里的根基就已经很牢固了，并分裂为两个相当有势力的地方支派：第一个支派以阿卜杜·拉赫曼·赛拉伊(Abd ar-Rahman Seyla'i)舍赫为首，他在1883年死于欧加登；第二个支派以乌韦斯·穆罕默德(Uways Muhammad)舍赫为首，他在1909年遭到暗杀。第一个支派在索马里

北部、英国保护领地与欧加登地区占支配地位,第二个支派则渗入到贝纳迪尔与索马里南部地区。在索马里,还有一个在当地有着重要影响的教派是艾哈迈德教派(Ahmadiya),它是由赛义德·艾哈迈德·伊本·法西(Sayyid Ahmad ibn Idris al-Fasi)在阿拉伯半岛上的麦加(Mecca)所创立的。这个相对近代些的改革运动及其支派,到19世纪末已经与早前就已经传入过来的卡迪里教派形成抗衡。[1]

到1900年,这两个教派在整个索马里有二十个永久性的聚居区,主要集中在朱巴河与谢贝利河之间的肥沃地带。此时,北部地区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是马达尔(Maddar,1825—1917)舍赫在哈尔格萨的哈巴尔·阿瓦尔氏族中建立的一个大型卡迪里教徒聚居区,伊萨克部落的大多数氏族都有人参加。该聚居区是骚乱地区的一个避风港。它恰好位于从海岸通向欧加登的几条商路的交叉点上。[2]卡迪里教徒的其他聚居区位于欧加登地区,也有一些在索马里更南部的地区。艾哈迈德教派的聚居区分布得也较为广泛。除了这些地方性聚居区外,几乎所有的索马里人在宗教归属上都分别皈依这两个教派。

19世纪末,这两个教派间的竞争大为加剧。当时,艾哈迈德教派的一个支派,即赛义德·穆罕默德·萨里赫(Sayyid Muhammad Salih,1853—1917)在麦加创立的具有军事性的萨里赫教派,传到了索马里。索马里舍赫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就是属于这个改革运动与清教徒运动的;正是在这一运动的旗帜下,哈桑展开了使其国家脱离"异教徒"统治的运动。

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的崛起

依据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的家谱记载[3],他于1864年4月7日出生于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东部杜尔巴汉特(Dulbahante)氏族居住区伍德伍德(Wudwud)与博霍特累(Bohotle)之间一个有水源的地方。他的祖父哈桑·努尔(Hassan Nur)舍赫属于欧加登部落,在1826年离开家乡来到了杜尔巴汉特人中间定居了下来,并在那里结了婚。早在7岁的时候,穆罕默德就开始跟当地的一个伊斯兰教师学习古兰

经。10岁的时候，他的祖父死了，此时他已经能够读古兰经，并成为其老师的助手。约五年后，哈桑决定终生献身于宗教，并成为教师。19岁的时候，凭借其学识与虔诚，哈桑获得了“舍赫”的称号。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穆罕默德舍赫离开故土，为寻求真理广泛游历。依照惯例，他访问了哈勒尔、摩加迪沙以及其他当地的伊斯兰教中心。据说，他经常在摩加迪沙的一棵树下做祷告，人们至今还念叨这棵树。他还远游到苏丹与内罗毕(Nairobi)。就这样，哈桑花了九年左右的时间，致力于求知与传道。约在1891年，他回到家乡，住到了其母亲所在的杜尔巴汉特氏族中间。在那里，他与自己所属的欧加登氏族中的一个女人结了婚。三年后，穆罕默德舍赫同其他十三个舍赫及朋友一道去麦加朝觐，并在阿拉伯半岛上待了近一年的时间。据说，他还访问了希贾兹①(Hejaz)与巴勒斯坦。在麦加，穆罕默德遇见了赛义德·穆罕默德·萨里赫，并为萨里赫的教义所吸引。随后，哈桑加入了萨里赫教派。回到索马里后，哈桑开始传布萨里赫教派的教义。他在柏培拉住过一段时间，并在这里娶了第二个妻子。哈桑怀着救世主的热忱，在柏培拉传经布道，反对吸烟，反对咀嚼带有刺激性的咔特叶(Kat)[4]，谴责一切骄奢淫逸的生活，劝告其同胞回到严格遵守穆斯林献身精神的道路。

穆罕默德舍赫的活动及其对新建立的萨里赫教派的热情，在柏培拉引起了较大的关注。这个港口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成立时间更早的卡迪里兄弟会的忠实拥护者。根据传说，约在1897年，举行过一次舍赫与宗教领袖的谈话会来讨论穆罕默德舍赫的神学主张并对其宗旨进行审查。此次谈话会在柏培拉一位贵族家里举行。参加者有穆罕默德舍赫以前的老师阿卜迪勒·阿鲁西('Abdille Arusi)舍赫以及哈尔格萨卡迪里教徒聚居区的首领马达尔舍赫。根据记载，谈话会开始的时候，马达尔舍赫问穆罕默德舍赫教派的名称。穆罕默德舍赫似乎是这

① 希贾兹(Hejaz)，又译为汉志，为沙特阿拉伯西部的一个州。地处北至约旦边境，南至亚西尔地区的沿海地带。——译者注

样回答的:伊斯兰教义说,真主为每一代人提供了一个超群的圣徒。在他这一代里,这个圣徒就是其老师赛义德·穆罕默德·萨里赫。哈桑传布的就是其老师的“道乘”。马达尔舍赫同意说,正统的教义认为每一代人都有其伟大的伊斯兰教圣徒。但是,他提醒穆罕默德舍赫说,不管穆罕默德追随谁,传的是什么道,真主都将会按照神法的严格条例来对他进行评判。当然,这是警告穆罕默德不得违反伊斯兰教教法(Salihiya),而且这个警告是出自一个以虔诚与严格献身精神著称的人之口。

接着,参加会议的其他人请求穆罕默德舍赫用一种迹象来证明其新教派的威力。据说,阿卜迪勒·阿鲁西舍赫当时说他很是惊讶于柏培拉的根基,这个城镇的根基是如此牢固以至于足以免于颠覆。这也就是在说,哈桑不能立即就能赢得追随者。穆罕默德舍赫回应道,这个城镇拥有强大的宗教根基,确实有福。然而,穆罕默德舍赫强调说他过去曾追随过阿卜迪勒·阿鲁西舍赫,但现在老师应该追随他,并分享新教派的恩典。

这是一次典型的索马里式谈话会,它让卡迪里教派首领们清楚地认识到穆罕默德·阿卜迪勒舍赫的教义所具有的那种革命性质。谈话会之后不久,穆罕默德舍赫就与1891年在英国保护领地北部地区设立一个传教点的法国天主教会进行接触。这个传教点原先是设立在柏培拉的,此时已经迁到了内陆通往谢赫(Sheikh)途中的德莫勒(Daimole)了。依据民间传说,穆罕默德舍赫在天主教的教会学校曾遇到过一个男孩,并问他叫什么名字。令他感到吃惊与愤怒的是,那个男孩回答说,他叫约翰·阿卜迪拉西(John ‘Abdillahi)。还有一个传说称,舍赫遇到了一群教会中的男孩,他问这些男孩属于哪个部落,这也是索马里人打听某人身份的常用询问方式。那群男孩回答说:“神父们的部落。”这显然是在否认其索马里人的身份(事实上,这群男孩中很多人是孤儿)。

无论这些传说在现在听起来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是在索马里人看来却是可靠无疑的,而且这些传说毫无疑问是符合索马里人与天主教

会打交道的经验的。这种经验使得穆罕默德舍赫坚信,基督教的殖民活动是要瓦解索马里人的穆斯林信仰。这种认识点燃了他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不遗余力地争取人们对萨里赫教派的支持。他在清真寺与街道上传道,说索马里正处在危急关头,呼吁爱国同胞赶走英国"异教徒"及其传教士。他还猛烈攻击外国人传来的饮酒习惯。一开始,他的号召受到了很大的抵制,尤其是卡迪里教徒,他们对穆罕默德舍赫要求承认萨里赫教派的救世主作用感到不满,也不满意他暗示说卡迪里教派(其创始人早已去世)不再具有精神生活与活力。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在英国新建的松散统治下,商业在蓬勃发展(每年向亚丁出口绵羊约7万头),柏培拉很多商人对这种繁荣很是满足,一心想进一步发展商业,压根就听不进穆罕默德舍赫毫不妥协的教义。

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阿卜迪勒舍赫返回到其母亲所属的杜尔巴汉特人中去了。杜尔巴汉特人与英国保护领地西部、中部的伊萨克部落、迪尔部落不同,他们并没有与英国签订条约。在那里,穆罕默德舍赫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并设立了一个宣讲萨里赫教义的中心。他还在牧民中间到处旅行,宣讲其教义,并告诫其同胞说,基督教传教士将要摧毁索马里人的宗教。与此同时,他作为氏族间冲突调解人而享有盛名,其非凡的诗才也开始为人们所承认,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望。他还开始收集武器(那个时候主要是长矛与弓箭),募集牲畜、资金等捐助来支持其运动。

1899 年,人们称之为"伊拉里"(源自索马里语 Illaali,即"监护"的意思)的殖民当局的一小队部落保安队访问了舍赫。保安队中的一个人交出了来复枪,据说换回了四头骆驼。保安队返回柏培拉后报告说(可能也就是谎报)穆罕默德舍赫偷了一支来复枪。于是,英国领事给舍赫发出了一封言语冒犯的信件,要求归还那支枪。穆罕默德舍赫同样不客气地回了封信,这封信几乎就是一个进行挑战的宣言。这件是非难辨的事件之后不久,穆罕默德舍赫在杜尔巴汉特人中召开了一次大会,号召氏族所有的人参加他讨伐异教徒的斗争。杜尔巴汉特人在柏培拉商业上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且与沿海地区的英国行政机构也没

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因此,他们不像沿海地区富裕的伊萨克商人那样顾虑重重,很多人都踊跃地参加了穆罕默德舍赫的队伍。这支队伍很快就具有了圣战军性质,参加者分到了一些穆斯林白头巾与一串穆斯林念珠。

当时,有传言说穆罕默德舍赫正在征集武器与人员,准备率领队伍远征埃塞俄比亚。十年前,穿越欧加登的英国探险家与旅行家已经注意到,来自哈勒尔的埃塞俄比亚武装队伍日益广泛的野蛮侵袭引起了强烈的愤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很多重要的索马里舍赫号召教徒对入侵的“异教徒”进行圣战[5]。因此,穆罕默德舍赫那时可能得益于这种爱国热忱,并为实现这种目标而提供了得力的领导。1899 年 4 月的官方报道说,穆罕默德舍赫指挥下的部队约有 3 000 人。8 月,有消息说他在请求伊萨克部落的哈巴尔·托尔·贾洛(Habar Tol Ja'lo)氏族与哈巴尔·尤尼斯氏族提供支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穆罕默德舍赫成功地为这两个氏族与其母亲所属的亲族杜尔巴汉特氏族实现了和解。实现和解后,他在布尔奥(Burao)召开了一次哈巴尔·尤尼斯氏族与哈巴尔·托尔·贾洛氏族的大会。此时,穆罕默德舍赫指挥的队伍估计有 5 000 人,他在大会上正式宣布进行一场反对基督教殖民者,尤其是反对英国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圣战。绝大多数参加布尔奥大会的人都响应了舍赫的号召,拿起了武器,但是哈巴尔·尤尼斯氏族的苏丹并不怎么热心。然而,穆罕默德舍赫的运动此时已经得到广泛的支持,他说服哈巴尔·尤尼斯氏族废黜了这位苏丹,指派了一名拥护这项事业的人取而代之。此时需要有某种行动以引起关注,他们便向对穆罕默德舍赫圣战缺乏热忱的艾哈迈德教派中的一个小支派的两个聚居区发动了袭击。此次袭击引起了某种震动,有报道说对柏培拉的进攻即将来临。

官方报道声称,穆罕默德舍赫此时已经采用了“马赫迪”的称号。索马里人知道此前在苏丹发生的事件,且同情苏丹的穆斯林,这当然也是穆罕默德舍赫的运动得以兴起的一个辅助性原因。但是,目前尚无证据证明穆罕默德舍赫确实采用了马赫迪的称号。事实上,从所有可

信的索马里材料以及穆罕默德舍赫的信件与诗文来看,他把自己称为"赛义德"或只是称为"伊纳·阿卜迪勒·哈桑"(Ina 'Abdille Hassan,这是索马里语,相当于阿拉伯语的伊本·阿卜迪勒)。他的追随者很快就在全国各地被简单地称为"德尔维希"(The Dervishes),"德尔维希"在索马里一般指的是萨里赫教派的教徒。

1899年9月1日,驻沿海地区的英国总领事收到赛义德的一封信,赛义德在信中谴责英国人对伊斯兰教的压迫,且指责那些顺从政府或与政府合作的人为骗子与诽谤者。信件还包含挑战的内容:"现在是你们选择的时候了。如果你们要打仗,我们奉陪;你们要和平,那就缴纳罚金。"[6] 英国总领事回复说穆罕默德·赛义德为叛乱者,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准备对"德尔维希"进行远征。这份官方谴责是一场旷日持久冲突的第一步。这个被官方宣布为"叛乱者"的赛义德属于欧加登氏族,埃塞俄比亚声称对这个氏族拥有主权,但并未行使主权;赛义德生活在其母系部落杜尔巴汉特人中间,而杜尔巴汉特并没有与英国签订过条约。因此,把赛义德归为英国臣民,实在是很值得怀疑的。

圣战:初期战役

德尔维希反对英国、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殖民者的二十年战争开始了。这些殖民者是不久前才在索马里领地上安顿下来。在总领事发表声明之后,赛义德及其追随者离开了布尔奥,从哈巴尔·尤尼斯氏族征集了更多的支持者。据英国人的报告,他们采用了威胁与暴力方式。1899年9月底,德尔维希回到博霍特雷的饮水地,在那里有些杜尔巴汉特人打了退堂鼓。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杜尔巴汉特氏族两个主要支系中的一个支系的世袭首领阿里·法拉赫酋长给柏培拉的总领事致信表示效忠,请求援助以抵抗德尔维希。阿里·法拉赫酋长也给本德尔卡西姆(Bender Qasim)强大的米朱提因部落强势的世袭首领伊斯曼酋长('Isman)发过类似的信件。杜尔巴汉特首领这一举动,可能是为了要维护其传统权威。无论什么原因,当这个消息泄露出来后,赛义德以其特有的敏锐作出了回应。他派出了一批德尔维希去暗杀阿里·法拉

赫。但是，这个行动失算了，因为此举让大批的杜尔巴汉特人不再支持他了。事实上，这个后果非常严重，赛义德谨慎地撤退到其父系亲族所在的欧加登。在那里，他娶了欧加登氏族最杰出的长老之一的女儿。在其运动过程中，赛义德常常使用这种通过婚姻来缔结政治联盟的方式。

虽然赛义德是欧加登人，但是其家族早前并不在欧加登人中间生活。因此，欧加登氏族中有些人并不愿意与赛义德有任何关系，并谋划要杀掉他。但是，正如后来多次要谋害他性命的图谋一样，消息泄露了，赛义德·穆罕默德与主谋者当面对质，成功地唤起民众对主谋者的义愤，从而使他能立即将主谋者处死。面对埃塞俄比亚当前的威胁，这种严厉的措施非但没有让他与欧加登人疏远起来，反而使他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此时，大量经由法属吉布提与米朱提因海岸各港口进口来的步枪与弹药运送到德尔维希的手中，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士气与声势。德尔维希凭借着这些装备，对经过欧加登的商队有组织地进行抢劫。埃塞俄比亚为了应付局势匆忙组织起一支讨伐军，但并没有发现德尔维希的去向，反而将精力耗费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抢劫骆驼及其他牲口上。这种行为当然只会进一步地让欧加登人对埃塞俄比亚人更为愤恨。赛义德·穆罕默德很容易地组织起来一支约 6 000 人的部队，并于 1900 年 3 月猛烈攻击在吉吉加的埃塞俄比亚哨所，夺回了被抢走的全部牲畜。埃塞俄比亚人声称在这次战役中获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虽然德尔维希遭到了很大的伤亡，并且撤退了，但是他们达到了目的，并使人们确信他们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与宗教人员在索马里内部事务中的传统地位不同，赛义德·穆罕默德此时已经成为一名政治领袖。在穆斯林索马里人与基督教殖民者之间更为广泛的冲突情况下，赛义德·穆罕默德既能实现其政治职能，又能继续保持其在宗教上的地位。他与他的追随者此时确实无可争辩地控制了欧加登地区。1900 年 6 月，为了彰显其实力，一支约 1 000 人的德尔维希骑兵队伍袭击了伊萨克部落的一个氏族，抢走了 2 000 头骆驼。这次冒险行动，利用了伊萨克部落与欧加登部落在放牧问题上

长期存在的冲突,在英国保护领地引起了较大的震撼。受到英国保护领地保护的部落也从欧加登地区以及附近的夏季牧区撤到北方的冬季牧区,使得这些地区很快就变得人满为患。英国保护领地当局认识到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相关的伊萨克部落就要被迫作出选择,要么与德尔维希妥协,要么他们的牲畜与他们自己就得挨饿。

在这种情况下,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孟尼利克建议采取联合行动。英国当局委派 E. J. E. 斯韦恩(E. J. E. Swayne)及其兄弟 H. G. C. 斯韦恩组织一支英国远征军,这两兄弟对英国保护领地的情况较为熟悉。雨季的到来拖延了组织准备。但是,1901 年 5 月 22 日,斯韦恩兄弟还是率领一支由 1 500 名索马里士兵与 21 名英国、印度军官组成的部队,从当时无人管辖的布尔奥出发,开始对赛义德·穆罕默德展开行动。他们很快就称赛义德·穆罕默德为"疯子毛拉"(The Mad Mullah)。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让英国随军记者忙碌不停,也为爱冒险的英国士兵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战场。许多著作都详尽地记载了这场战争[7],这里只须简要地叙述一下。在 1900 至 1904 年期间,英国经常会得到埃塞俄比的积极支持与意大利的积极合作,曾发动了四次较大的征伐。德尔维希采用大胆的游击战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且好几次取得了胜利,如 1903 年 4 月 17 日的贡布鲁山(Gumburu Hill)之战,有 9 名英国军官与 189 名士兵阵亡,但是到 1904 年底,这些征伐使得德尔维希的势力大为削弱,士气大减,以至于赛义德·穆罕默德本人虽逃脱了英军的多次抓捕,也只得同意讲和。

此时,赛义德·穆罕默德已经谨慎地撤到了意大利的米朱提因保护领地,那里并没有驻守的意大利行政官员,仍然受驻亚丁的意大利领事馆控制。赛义德提出了四个主要条件:

1. 他在意属领地上应有一个固定的驻地;
2. 他的追随者应由他管理;
3. 他应享有宗教自由;
4. 他应有贸易自由。

意大利接受了这些条件。1905 年 3 月 5 日,赛义德在伊利格(Illig)与意大利驻亚丁领事 G. 佩斯塔洛扎(G. Pestalozza)签订了条约。赛义德·穆罕默德同意同意大利、英国与埃塞俄比亚保持和平,并接受意大利的保护,虽然很难说这种保护有多大价值。他分到了北邻米朱提因苏丹国、南邻霍比亚苏丹国的一块楔形土地。虽然赛义德及其追随者就这样被赶出了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但根据英国政府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协议,他们还是享有在英国保护领地境内放牧的权利,以及给牲畜饮水的权利,可以用的水井一直到哈林(Halin)、胡丁(Hudin)、托加累(Togale)与达诺特(Danod,顺便说一下,达诺特位于英属领地外的欧加登地区)。

英国的第三次与第四次征伐共花费约 550 万英镑,但结果却有点草草了事。这一结果也说明英国承认德尔维希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但是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构成任何严重威胁,或许这样想可以聊以自慰。同时,赛义德·穆罕默德及其剩余信徒已经建立了某种神权小国,夹在三个地区之间。这三个地区分别是伊斯曼酋长统治下的北米朱提因,承认霍比亚苏丹优素福·阿里·克纳迪德(Yusuf Ali Kenadid)的南米朱提因与哈维耶。后两个地区都在意大利的保护之下,直接受亚丁的意大利领事掌控。但是,除了意大利炮舰定期访问沿海地区外,这两个地区很少受到直接的控制与干预。在西部,在赛义德及其追随者与实际受到柏培拉控制的英属各"友好"氏族之间,居住着杜尔巴汉特人与瓦尔桑格里人。他们起到了某种缓冲作用,虽然这种缓冲并不牢靠。英国人至少可以庆贺自己将这个暴躁的对手交给其盟友意大利来看管。1907 年 3 月 19 日,这两个国家还仓促地签订了英意补充协议,协议规定,赛义德对埃塞俄比亚如果要采取行动,英意不会承担任何责任。[8]

英国为什么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是不难理解的,无论这种满意有多少保留。意大利为什么愿意对赛义德承担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是很有限的),这一点是需要解释的。这可能是因为,早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就认为可以利用德尔维希以扩展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利益。但

是,更重要的可能是这样,即 1905 年 1 月,英国帮助意大利把桑给巴尔苏丹原来租给意大利的贝纳迪尔海岸完全买了下来,从而实现了完全占有。无论如何,意大利当时负责此事的大臣托马索·蒂托尼(Tommaso Tittoni)向意大利议会是这样解释的,伊利格协议使意大利与赛义德·穆罕默德实现了和平,这将会大大有利于意大利在贝纳迪尔海岸扩张势力。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表明,对形势的这种估计是多么的错误!

从伊利格到塔利布以及失败

和平一直维持到 1908 年。[9] 赛义德·穆罕默德表面上尊重伊利格协议中的条款,但同时也是利用这一时期休养生息以便恢复实力。一个广泛的间谍与代理机构网络在英国保护领地上展开活动,试图逐渐削弱各部落对英国的忠诚,并吸引各部落对德尔维希事业的支持。与此同时,赛义德·穆罕默德对霍比亚苏丹优素福·阿里发动了一场小型的、断断续续的战争。优素福·阿里虽然反复无常,其效忠对象并不明确,但在此期间,他总的说来对德尔维希持敌对态度。东海岸的英国保护领地上的瓦尔桑格里氏族却不是这样。他们在英勇的马哈茂德·阿里·希尔雷(Mahamud 'Ali Shirre)酋长(死于 1960 年)领导下,决定站在德尔维希这边。1908 年 1 月,他们向一艘正在靠岸的英国独桅船开火。他们与英国驻柏培拉的领事就此事交换了充满敌意的信件。有证据显示,德尔维希即将卷土重来。

在此期间,即在第二轮战斗打响前,英国当局得到一个便利的机会来反击赛义德发动的来势凶猛的反英宣传。当时赛义德写的措词尖锐的诗歌像野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一种可怕的武器。哈巴尔·托尔·贾洛氏族的哈吉·阿卜达拉·希赫里(Haji 'Abdallah Sheheri)以前曾一直充当赛义德在亚丁的代理人,在与意大利领事佩斯塔洛奇谈判伊利格协定的时候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此时他渐渐地对德尔维希事业丧失了信心。因而,意大利当局很容易就说服了他,让他参加了一个要前往谒见萨里赫教派创始人与首领赛义德·穆罕默德·萨里赫的使团。该使团从这位宗教领袖那里得到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穆罕

默德·阿卜迪勒·哈桑有违反伊斯兰教教律的行为,并威胁说如果哈桑不改过的话,就要与他断绝关系。英国人与意大利人对这封含有温和指责的信件大加宣传。1909 年 3 月,这个使团在赛义德的总部将这封信交给了赛义德本人。[10]

这个阴谋可能是英国与意大利当局联合策划的。还可以肯定,哈吉·阿卜达拉·希赫里与其他很多过去曾拥护德尔维希的人一样,此时认为德尔维希是一群既藐视伊斯兰教律又违反萨里赫教派规矩的狂热分子。这个策略无疑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赛义德·穆罕默德的个人魅力非常强大,在索马里人心目中是一个非凡人物且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因此,此举对他的地位的损害完全不足以严重削弱其运动。当时的形势需要的是直接的行动。

但是,英国政府已经付出了巨额款项,其数量之大与它在索马里海岸的有限利益是极不相称的。因此,英国政府决定,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重新估计整个形势。英国政府认为需要重新认识索马里,便指派苏丹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将军访问索马里,并对局势进行评估。如有可能,就直接与赛义德·穆罕默德打交道。就后一希望上,温盖特的使命完全落空了。英国政府在参考从未发表的使团报告之后,决定采取一种在海岸上集中的新政策。因此,1910 年,英国当局撤出内陆,退到了海岸地区。事实上,英国当局在内陆地区本来就没有稳定的民政事务管理。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武装被其称之为“友好部落”的伊萨克部落,让他们自卫以抵抗德尔维希。当局的顾虑由于一个想当然的假定而得到宽慰,即只要任由局势发展,就会产生一个能赢得人们支持的首领以对付德尔维希。英国政府认为有理由听任杜尔巴汉特人处于完全得不到保护的境地,因为他们与英国没有订立条约。然而,这个理由在过去并没有阻碍英国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将杜尔巴汉特看作是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的一部分。

这个认识是一种幻想,也是建立在对局势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即认为赛义德·穆罕默德尽管颇为杰出,但只是一般的部落首领而已,他

的政治作用只限于索马里内部的部落政治而已。事实恰恰相反，赛义德是一个拥有独特的地位、全国性的人物。他激发了作为穆斯林的索马里人的爱国热忱，无论他们各自氏族或亲族效忠对象有多么不同。部落内的对立确实会削弱德尔维希的运动，且互相对立的教派间的分歧也限制了运动的号召力。然而，即使是那些深受触犯的卡迪里教派的信徒们，也不可能大批起来反对赛义德。因为，这就要公然扮演基督教殖民者的角色，也就会大大损害他们自己的宗教地位。在英国的鼓动下，反对同一种宗教的人是一回事；但是，为了击溃德尔维希而联合起来则是另一回事。而且，之前在英国领导下反对赛义德及其追随者时所出现的团结，曾一度压抑住部落内部的嫉妒与对立。此时，英国人已经走了，这些部落又能自由地获得武器，因而迫切地想摆脱这种充满着紧张关系的和平状态。

结果，不但没有出现一个领袖来领导各友好氏族去反对德尔维希，各个氏族反而分别开始清算旧仇宿怨，内陆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形势很快就变得非常严重，大部分民众处于饥饿的边缘。由于缺乏食物，人们不得不吃老鼠以及其他肮脏的动物。

沿海地区的当局，没有可用的军事资源，且又大大丧失了威望，完全无法恢复秩序。德尔维希又活动起来。当时的环境对他们尤其有利，德尔维希接收了大量的新来的拥护者。英国当局的新政策显然彻底失败了。

到 1912 年底，据官方估计，英国保护领地可能有三分之一人口死于索马里有名的“饥荒时代”(Time of eating filth)。英国政策再一次做了调整，授权保护领地当局在当地募集一支骆驼保安部队。这支部队在邻近海岸地区的内陆地区维持治安，并由理查德·科菲尔德(Richard Corfield)指挥，很快就显示出其成功之处。它的机动性与策略很适合当地的需要与环境。此外，人们已经厌恶长期的无限制暴力，因而很希望重建秩序。因此，新骆驼保安队在很短时间内就让英国保护领地西部、中部地区恢复到正常状态，德尔维希此时则仍然留在东部地区。科菲尔德得到了谨慎详尽的指示，即他的职责是维护紧邻海岸

的内陆地区的治安，绝不要去攻击赛义德的部队。然而，就是维持治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德尔维希不时袭击受他保护的氏族。

在德尔维希一次猛烈袭击之后，科菲尔德及保安队有了追击他们的机会。这一局面的出现，本来就没有什么奇怪的。因此，1913 年 8 月，科菲尔德不顾得到的指示，虽是冲动却勇敢地从布尔奥出发追击一支庞大的德尔维希部队，并在英国保护领地东部的杜尔马多贝(Dulmadobe)与这支队伍交战。此次鲁莽的行动让科菲尔德丧了命，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伦敦的报纸以“我军在索马里的可怕灾难”为标题报道了此次战争的结果。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的非常精彩的诗篇《理查德·科菲尔德之死》使得这场战争留名后世[11]。然而，尽管骆驼保安队遭到此次挫折，但其队伍却在壮大，效率也在不断提高，有时还得到其他部队的军事支持，因此得以牵制德尔维希，直到德尔维希在 1920 年的最后失败。

在此期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新情况。1913 年 12 月，命运不佳的亲穆斯林的利杰·雅苏(Lij Yasu)亲王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他把朝廷从迪雷达瓦(Dire Dawa)迁到哈勒尔，与他同情的穆斯林臣民们在一起。在土耳其与德国驻埃塞俄比亚领事的有偿支持下，这位新皇帝想要在东北非建立一个庞大的穆斯林帝国。为此，他与赛义德·穆罕默德建立了联系，可能还给赛义德提供了财政援助与武器，并安排了一位德国机械师埃米尔·基尔施(Emil Kirsch)到德尔维希在塔勒赫(Taleh)新总部担任军械师。此时，也门的石工已经在塔勒赫周边修建了碉堡群。基尔施在德尔维希干得很不错，但后来他想摆脱其严酷的主人，却悲惨地失败了。德尔维希只在有限的时期内有过一个军械师，却能成功地长期抵抗英国一系列花费巨大的进攻，足以反映德尔维希战术上惊人的机智与效率。除了基尔施的效力外，土耳其与德国究竟支持了德尔维希多少，人们至今仍然不能完全知道，当然这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1917 年，意属索马里当局截获了一份土耳其政府发出的文件，该文件保证给予赛义德支持，并提名他为索马里民族的“埃米尔”。土耳其人这样做的意图是想恢复他们过

去在索马里海岸的权益,但形势已经不同以往。

然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赛义德本人当然乐于看到土耳其-德国人的成功,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一种看法,即认为土耳其-德国人的帮助对他的运动是不可或缺的。1917 年 3 月,英国驻柏培拉专员收到了赛义德的一封信,赛义德在信中以明确的口吻表达了其观点:

> 你们很清楚,我也很清楚,土耳其与德国人对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有人说我实力不够,不得不在外寻找盟友;如果这是真的,我不得不寻求帮助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英国,以及你给我造成的麻烦。恰恰是你们与世界上的各种人等勾结在一起,与妓女、流浪汉、奴隶们勾搭在一起,因为你们是如此的虚弱。如果你们足够强大的话,你们就会像我一样靠自己,独立而自由。因为你们是虚弱的,所以你们与索马里走狗、阿拉伯人、苏丹人、异教徒、叛教者、也门人、努比亚人、印度人、俾路支人(Baluchis)、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葡萄牙人、日本人、希腊人、食人生番、锡克教徒、班杨人、摩尔人、阿富汗人与埃及人勾搭。他们是强大的,而正因为你们是虚弱的,所以你们才像娼妓一样乞求别人[12]。

从 1914 到 1918 年的整个时期,英国人因为在其他地方有着军事行动,在索马里只能以有限的规模采取防御性行动。然而,在 1915 年 2 月,德尔维希的西姆柏柏里斯(Shimberberis)要塞被攻克,赛义德的进攻性哨所体系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英国还取得了其他一些小的胜利。与此同时,英国对海岸地区的封锁已经完全奏效,削减了德尔维希的武器弹药的供给。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保护领地当局断定再举行一次讨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伦敦最后同意了这一看法。1920 年初,英国发动了一次精心策划的陆海空联合攻势,最终击溃了德尔维希。牢固的塔勒赫据点遭到了轰炸,赛义德·穆罕默德被迫逃到了欧加登。在那里,他仍然不屈不挠,重新组织其被打散的追随

者并召集新兵。此时,柏培拉总督与之前的几次一样,写了封信给赛义德·穆罕默德,要他投降并答应给予特赦。赛义德在3月份给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回复,既不接受又没有拒绝英国提出的条件。

于是,英国决定派出一个议和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萨伊克族的主要长老和宗教要人组成,包括马达尔舍赫的儿子阿卜迪勒舍赫,他代表的是卡迪里教派。代表团中还有杜尔巴汉特氏族的伊斯梅尔·谢赫·伊萨克(Ismail Sheikh Isaq)舍赫和北索马里赛义德·穆罕默德·萨里赫的正式代表。伊萨克舍赫与其他人一样,显然在这一时期比较复杂的政治中起着某种微妙的作用。据说,他一方面暗中支持赛义德,但似乎也参与到了萨里赫从麦加发信指责德尔维希的活动。这个由这些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带着某种忐忑的心情去与赛义德交涉。他们被授权去说服赛义德·穆罕默德投降,并说赛义德可以在英国保护领地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宗教聚居区,可以在当局的监视下过着平静的生活。

代表团在谒见赛义德时,遭到了鄙视与污辱;在经历过多次令人吃惊的谒见之后,他们回来向保护领地当局报告说,赛义德·穆罕默德极其傲慢地拒绝了劝告。随即,一支德尔维希部队袭击了在埃塞俄比亚边界附近放牧的伊萨克人。尽管德尔维希遭到了严重挫败,但他们显然还没有被击败。这次袭击引起了伊萨克人的愤恨。被激怒的伊萨克氏族经过努力得到了英国保护领地当局的批准,对在欧加登的德尔维希新总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德尔维希遭到惨败。但是,正如之前多次发生的那样,赛义德本人及其一些伙伴并没有被抓获,并逃到了埃塞俄比亚境内谢贝利河上游的伊米(Imi)。赛义德及其追随者于1920年10月到达那里,并建立了13个新据点,但并没有得到埃塞俄比亚官方的保护。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行动,因为数星期后,赛义德·穆罕默德突然得了流行性感冒(或疟疾),于1920年12月21日去世,终年56岁。用一部关于赛义德·穆罕默德运动的索马里编年史的话来说,"一个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人结束了他的一生"。他曾结过多次婚,生有众多子女,但在他去世的时候,只剩下九男一女了。

赛义德·穆罕默德及其成就

无论赛义德·穆罕默德的诽谤者如何说,尽管他的统治归根到底无疑具有专制性质,但是,他火一般的激情无疑激励了其同胞献身于伊斯兰教,使得他们宗教的所有教规得到普遍和绝对的遵从。在赛义德·穆罕默德看来,萨里赫兄弟会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道"。他深深感到自己应完成对本国人民的使命,索马里人的古老的伊斯兰教信仰受到基督教殖民的威胁而处在危险之中。正是这种认识点燃了他的爱国热情,并使他确信,除非让他的人民得到自由,否则让他们献身于伊斯兰教的理想就绝对不会实现。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唤起民族运动,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过去,一般认为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仅仅是利用宗教外衣以抬高其个人地位,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主要目标,这一点在他写的很多宗教诗歌和未发表的神学著作中得以体现。但是,环境的压力迫使他越来越关注于德尔维希的组织工作和军事需要。他的神权政治建立在沙斐仪学派(Shafi'I school)对伊斯兰教规的刻板解释上。尽管他将很多民事和军事职责放手给一些最能干的追随者,但这种神权政治始终具有个人性质,并没有发展成严格的等级组织。他没有建立,似乎也没有打算要建立一个在他死后会延续下去的神权国家。他没有继承人,很多萨里赫教派的教徒并不支持他,而且他也没有声称是赛义德·穆罕默德·萨里赫在索马里的唯一代表。因此,虽然他的组织随着他的死亡而瓦解,但是,没有参加和参加过其运动的萨里赫兄弟会后来都延续了下来,并大大拓展了它们的活动范围。尽管他具有伟大的领导天赋,但他也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神权国家。要开创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组织松散的民族运动是非常困难的。值得注意的并不在于这场运动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而在于他竟然能成功地开创了这场运动。

尽管存在一些有利因素,如基督教传教活动引起的反感,如索马里人对国土被分割为几块殖民地产生了敌意和排外心理,但是索马里社

会结构固有的阻碍是巨大的,也是赛义德不得不要克服的。自从 16 世纪艾哈迈德·格兰展开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以来,索马里从未出现过像赛义德所提倡的那种接近于全民族政治团结的传统。由于存在争夺牧场与水源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各自为政的氏族间的竞争与猜忌根深蒂固,使得氏族间进行广泛的合作没有可能性。事实上,即使是信息灵通且很精明的斯韦恩也认为,在 19 世纪最后的十年内,互相间的矛盾是压倒性的,因此发动有组织的反英起义的可能性不太大[13]。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斯韦恩没有料到会出现像赛义德·穆罕默德这样一个独特的传奇人物。

毫无疑问,尽管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但如果没有像赛义德这样一个人物的领导,单单这些因素是不够的。赛义德的个性魅力、铁石心肠和对敌人的极端蔑视,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打动具有民主传统的索马里人的内心,索马里人最为钦佩的就是这种坚定的毅力和毫不动摇的决心。赛义德也许是专制的,但在很多索马里人(虽然不是所有的索马里人)看来,他的专断是为了实现一个崇高目的的。这位领袖具有非常多的品质,他用出色的语言和诗歌尖锐地抨击了敌人,并在其同胞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战斗与侵袭的激情和战利品的引诱,自然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认为赛义德的追随者仅仅只是为夺取战利品和牲畜,那就错误理解了索马里人的性格,也忽视了赛义德·穆罕默德个性魅力的真正性质。

虽然赛义德的任务是要开创一场超越氏族对立的民族运动,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得不使其策略适应索马里生活的现实。因此,他无比机智地运用了索马里政治中所有的传统权术。当情势有利的时候,赛义德就利用其父系部落的关系;其他情况下,赛义德就利用其母系部落的关系。赛义德也充分利用多次政治联姻所建立的直接关系。在他的追随者中,有来自北索马里所有氏族的代表,其主要助手也不是来自一个氏族。因此,毫不奇怪,其父系的达鲁德部落对他的支持是最为持久的。这点是有些偶然性的因素,即一般来说伊萨克人并不那么愿意追随赛义德,由于伊萨克人居住在英国有效控制范围内,受到英国

更大的控制。赛义德认为这是对其事业的背叛,并从不宽恕伊萨克人,经常在其充满论战的诗歌中责骂伊萨克人。他在一首有名的诗歌中说:“伊萨克人命中注定将永远愚蠢如驴。”

赛义德为了建立其队伍,不得不运用这些策略,但在德尔维希内部,他力图实行伊斯兰教律。他推行“报复法”,并不顾索马里根据氏族特定情境处理违法行为的传统做法。他努力使其追随者效忠于事业而非传统的对氏族的效忠。德尔维希的部队基本上不是按照氏族组成的。另一项引人注目的革新,是他不时训练妇女充当战士,有少数妇女甚至还会骑马。所有人要严格执行每天的礼拜和伊斯兰教节日的仪式,违反者要受到惩处,情节极端严重者处死或截肢。妇女也必须严格履行宗教义务,带着面纱。两性关系严格按照律法条文加以管理。

他在对待外国敌人以及拒绝直接支持他的本国同胞的时候,既强烈地谴责和谩骂,又使用和解的语言与鼓励。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常常使对方茫然不知所措。赛义德能进行很长时间且不间断的通信或交谈,还创作了无数论战诗歌。这些诗歌大大丰富了索马里诗歌遗产。他还善于领导德尔维希的政治和军事工作,这进一步证明赛义德确实精力充沛,机智灵活。他的信件以及现在已经搜集起来的一些诗歌,显示出他对殖民地局势有着精辟的评估。他很清楚意大利在对英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他在一首写给英国驻柏培拉专员的诗歌中谈到意大利人时候说:“意大利人是你们的追随者,是被你们赶走的弃儿……正是你们将软弱的异教徒引到这些牧地的。难道我分辨不出你们(指英国人)和你们的牛群吗?”

值得注意的还有,法国与德尔维希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在赛义德·穆罕默德的诗中显然很少被提及。法国在整个德尔维希运动时期中的态度颇为暧昧;看来法国人并没有积极地阻止经由法国控制的海岸线而输入到德尔维希手中的武器运输,他们可能关注的是这场永久损害英国利益的斗争的结果。

最后,在考察赛义德·穆罕默德圣战在意大利力图扩展并巩固其控制的索马里产生的影响之前,有一点还是值得强调的,即无论赛义

德·穆罕默德·萨里赫本人对其那位惹是生非的门徒有何看法,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仍然以其自己的方式忠于萨里赫教派。德尔维希在战斗中进攻的时候,嘴上念的就是一首颂扬萨里赫教派创始人的赞美歌。虽然现在还不清楚,以后可能也永远不会清楚,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和麦加的萨里赫教派总部到底是什么关系,赛义德·穆罕默德·萨里赫如果愿意做的话,他可以更加坚决地摒弃其在索马里的这个门徒。的确,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本人认为其使命就是让索马里人的穆斯林信仰恢复到虔诚的正道上。然而,现在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对于他的很多追随者来说,对于他的对手来说,甚至有时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个基本目标掩盖在他用民族团结对付"异教徒"对手的号召中。德尔维希进行过多次血战,而且常常对其他索马里穆斯林作战。索马里人更多的是认为他是民族英雄,是现代索马里民族主义先驱,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受到特大天恩的舍赫或圣徒来加以纪念。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是那些在德尔维希战争期间受害最大的人的后代,甚至是卡迪里教派的追随者也都颂扬赛义德的爱国功勋。在当时,卡迪里教派还是其较大劲敌之一,他们并非没有理由斥责德尔维希是异端,可以声称杀掉这样一个异端比杀掉一百个异教徒的功劳更大。这种对立态度自然削弱了赛义德·穆罕默德的战斗号召力,限制了这种号召力的影响。这种对立态度也没有局限于作为二十年战争的主要战场的索马里半岛北部地区,还波及索马里南部和贝纳迪尔海岸,尽管那里的很多部落和氏族指望赛义德·穆罕默德援助和支持他们反抗意大利的殖民。

意大利统治在南部的扩张

英国有点勉强地取代了埃及在北索马里的地位后,并没有想要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索马里内陆地区。英国利益严格地限制在不让敌对大国占据亚丁对面的海岸,同时保证亚丁驻军可以不受限制地从索马里海岸获得肉类供应。英国对德尔维希采取持久的、耗费大的、得不偿失的军事行动,并不是英国想把国旗插到内陆地区而产生的附带效应。

英国的军事行动让它背负了比先前预计更大的责任,这些责任和英国在该地区拥有的极其次要的利益完全不相称。

意大利在索马里的利益和意图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开始,意大利就极其关注索马里。意大利政府在1905年接管对贝纳迪尔海岸的直接责任时,就下定决心要把它发展为一个真正的殖民地,既成为宗主国的原料供应地,又成为安置意大利过剩人口的适合地区。因此,意大利政策从一开始就要尽可能地扩大其有效控制的领土。意大利的直接目标就是要加紧渗透并开发内陆地区。这一点和英属索马里不一样,英国人完全是因为镇压德尔维希起义才意外地摆平内陆地区事务的。然而,因为意大利早年在厄立特里亚的失利,其国内公众舆论强烈反对花费庞大的殖民冒险,意大利才相当谨慎地逐步占领索马里并扩大其统治。这种谨慎当然是按照意大利的衡量标准来说的。尽管如此,新殖民者的冲击仍然引起了很多索马里部落和氏族的猛烈反抗。在他们看来,赛义德·穆罕默德往往成为索马里反抗殖民统治的象征性人物。然而,贝纳迪尔的各个部落并不都有这种看法。南方的卡迪里教派和北方的一样,强烈反对赛义德·穆罕默德的运动。他们的领袖、巴拉韦的乌韦斯·穆罕默德舍赫,在其众多有名的宗教诗中强烈地谴责德尔维希,斥责他们为杀人成性的异教徒,注定要永远受到天谴。他对赛义德事业的挑战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09年,他在比奥莱(Bioley)附近被一小批德尔维希暗杀。在那里,其坟墓成为南索马里最重要的圣地之一。同样,现今也被尊崇为圣徒的艾哈迈德教派的阿里·梅耶·杜洛格巴('Ali Maye Durogba)舍赫(死于1917年),即使没有公开挑战德尔维希,肯定也没有为他们提供支持,因此意大利人对他颇有好感。

与北方一样,在贝纳迪尔海岸有些人多多少少已经安于新境遇,有些人则全力反抗殖民者,尤其是萨里赫教派的成员及其同情者,当然也有其他一些人。这些反抗殖民者的人中有些人甚至还从德尔维希那里得到了武器和其他援助。由于南方有些氏族反对废除奴隶制,因而加剧了对意大利殖民统治的反抗。除了有些奴隶在一些贝纳迪尔沿海港

口从事家务劳动外,那些轻视体力劳动的索马里贵族地主也需要很多奴隶或农奴为其耕种。此外,当时还有人往其他国家贩运奴隶。因此,很多享有这种特权的人都想维持这种情况,而意大利人却负有改变这种状况的义务。[14] 1904 年,好战的比马尔氏族部分出于这种抱怨,封锁了马尔卡的内陆,经过一系列的交战之后,到 1905 年才多少恢复了平静。这时新的殖民政府已经完全控制了贝纳迪尔沿海地区,并发布了第一个法令。此时,除了摩加迪沙外,两家公司还已在七个中心建立了行政管理。这七个中心位于沿海一带,最为重要的是位于朱巴河的巴尔德拉和卢格。

1907 年,意大利人和比马尔人又爆发了冲突,此时的比马尔人已经得到了德尔维希的一些支持。1908 年 2 月,一支配备有来复枪的德尔维希部队沿着谢贝利河往下冲击,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不过,他们被击败了,意大利人趁机占领了比马尔氏族的中心达纳内(Danane),最终收服了这个氏族。同年,意大利人还占领了以前是主要奴隶市场之一的阿弗戈伊(Afgoi),这次行动使得意大利人赢得了重要的格勒迪族苏丹的合作。意大利当局建立了一支名叫"格勒迪队"的部落警察来协助正规军(由意大利军官领导,主要由阿拉伯人和厄立特里亚人组成)[15],以巩固格勒迪苏丹的支持,毕竟这种支持具有重大意义。到 1909 年,处于朱巴河、谢贝利河和海洋之间的沿海地区已经平定,意大利的权威也更加受到尊重了。此时,奴隶制基本上已经被成功地控制住了。在此之前,1907 至 1910 年担任索马里总督的托马索·卡勒蒂(Tommaso Carletti)报告说,对新殖民者的敌视态度,使得欧洲人如果没有武装部队的刺刀保护,就不敢冒险走出任何沿海的城镇[16]。

1909 年,意大利在霍比亚保护领地的霍比亚城设立了第一个行政点。六年后,意大利又在米朱提因保护领地北部的阿卢拉设立了第一个驻扎官公署。另外,在 1908 年,一批德尔维希曾在谢贝利河上游的贝莱德文(Beletweyn)建立了一个堡垒。1916 年,他们就是从这里向布洛布尔提(Bulo Burti)发动进攻的。这些人直到 1920 年才被赶出了据点。因此,在整个意大利扩张时期,德尔维希的干扰是长期存在的威

胁,但又一直没有全面爆发。直到1920年德尔维希被最终击败,意大利的统治才完全建立起来,这种威胁才得以消除。

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

意大利人不只是受到德尔维希和贝纳迪尔部分居民的反对。1905年,一支埃塞俄比亚部队沿着谢贝利河谷南下进行袭击和抢劫,最南一直推进到靠近海岸的巴拉德(Balad)。此时,这段海岸还没有被意大利人占领。两年后,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的一支部队因受到德尔维希的压力而被迫撤退后,又派出了第二支更为强大的远征军。这支远征军没有能够找到善于躲避的敌人,转向南方袭击了卢格,抢劫了牲畜并将意大利驻军消灭殆尽。意大利政府对此大为震惊,提出赔偿要求。意大利政府在及时得到赔偿后,就趁机对埃塞俄比亚施加压力,要求划定边界。意大利人在阿杜瓦战役失败后,1897年的意埃和平谈判已经把意大利的属地,划定为从海岸到内地宽180英里和从朱巴河上的巴尔德拉往北直到英国保护领地边界的地区。这个协定把乌果·费兰迪(Ugo Ferrandi)[17]1895年在卢格建立的哨所划在了意大利范围外了。然而,孟尼利克还是同意意大利人在此地的贸易权。在此期间,意大利政府曾通过其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代表强烈要求将卢格纳入意大利的领土范围内。同时,1906年12月13日的英意法三国协定大大强化了意大利的地位。这个条约保证三国按照目前的状况以及至少九个协议、条约和公约,"进行合作,维持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现状和领土现状"。这些协议、条约和公约中有很多规定都是互相矛盾的,包括1891年和1894年英意议定书,这两个议定书曾承认欧加登地区属于意大利的势力范围。[18]

签订三国协定的目的是为这三国创造条件,以便在埃塞俄比亚一旦倒台的情况下,维护这三国各自的地位和野心。当时,孟尼利克生了病,埃塞俄比亚很有可能会倒台。按照意大利官方的解释,该协定自然会令埃塞俄比亚震惊,因为它把埃塞俄比亚南部划入到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内,且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和领土一旦发生变化,甚至影响到某个邻

国(如索马里或厄立特里亚)领土完整的情形下,授权意大利可以进行武装干涉。[19] 1907 年 12 月 6 日的英埃(埃塞俄比亚)协定更提高并巩固了意大利的地位。1907 年的协定确立了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东北部(当时还是英属东非保护地)之间的边界在朱巴河上、位于卢格费兰迪以北很远地方的多洛(Dolo)。

由于得到了这种巨大鼓舞并付给了孟尼利克 300 万里拉,意大利通过 1908 年 5 月签订的意埃条约,获得了一条从朱巴河上的多洛向北一直到谢贝利河的边界。这段边界线与原来已经达成协议的那段边界线在谢贝利河连接了起来。双方还草率地、多少是有名无实地作出安排,把边界上的各个部落分别划归埃塞俄比亚或意大利统治,而不考虑有关居民的放牧与用水需求,也压根没有和相关的民众进行商议。例如,拉汉文部落被划入意大利的范围,而迪戈迪亚(Digodia)、欧加登以及"边界线以北"的其他民族则属于埃塞俄比亚。由于新边界的划分非常含糊,因此,意埃边界联合委员会在 1910 年划定边界的时候,只能就朱巴河畔的多洛到北边 130 公里的耶特这一小段达成协议,这就不足为奇了。此后,谈判停止了,不过意大利测量队继续沿着谢贝利河北上进行勘察。

尽管这样,意大利还是把卢格和朱巴河与谢贝利河之间的一大片土地并入到了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并着手在该地区及沿着意大利对 1897 年和 1908 年协定的解释所规定的"边界"发展势力。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除了在索马里西部哈勒尔和吉吉加外,并没有力量可以在其要求的领土范围内建立行政点。因此,边界的不确定,让意大利获得了最大利益,这种情况有利于强化贝纳迪尔的传统作用,即充当埃塞俄比亚西部和欧加登南部大部分贸易天然出口的作用。意大利有意加强贝纳迪尔的这种作用,并采取经济渗透的政策,修建了从沿海到边界的公路,并对从埃塞俄比亚西部经过贝纳迪尔转运的货物免征关税。与此同时,意大利当局鼓励在边境地区属于意大利控制范围内的部落在需要放牧和饮水的时候,任意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地界,意大利殖民地边防部队对此提供武装保护。到 1921 年,这种系统的渗透政策已经达到

了相当的程度,意大利于是感到,1908 年条约对索马里部落和领土的划分已经不能满足意大利主权威信和尊严的需要。[20]但直到著名的 1935 年瓦尔瓦尔事件发生,问题才最终爆发出来。

1920 年的整体局势

到 1920 年,贝纳迪尔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已经处于意大利的控制范围之内,实现这种控制有的是通过条约,有的是通过赠送,有的是通过武力。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武力使用还是比较有节制的。在北部地区,意大利的两个保护领地都有地方管理机构,这两个机构不对亚丁负责,而是对摩加迪沙负责。意大利几年后放弃了旧有的间接统治政策,已经为把这两个保护领地最终并入到殖民地奠定了基础。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的战争,曾不时地延误和阻碍了意大利统治的逐步拓展,但并没有促使意大利改变其殖民规划,也没有使意大利放弃其目标,即建立一个经济上有利可图的领地,并从本国迎来移民来开发这个领地的农业潜力。经济考虑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此时意大利的声望已经处于动摇之中,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动力。德尔维希的运动也并没有阻止意大利重视对索马里人采取怀柔政策带来的好处,这种怀柔政策是一种手段,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其在索马里的地位,而且还为了向埃塞俄比亚境内扩张势力。

相形之下,正如前文所述,英国统治扩展到索马里保护领地内陆大片地区是德尔维希战争的结果,并不是战争的原因。赛义德的战争促成了英国-埃塞俄比亚联合反对索马里的传统,并使得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进一步地深入到欧加登地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埃塞俄比亚在其与索马里关系中的地位。无疑,这种情况最终也会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在此时产生,却是德尔维希争取自由斗争所造成的一个事与愿违的后果。因此,虽然赛义德·穆罕默德的形象在其去世时以及现在仍然是一个民族英雄和爱国者,尽管其支持者勇敢且不屈不挠,但是赛义德的圣战不仅没有实现把“异教徒”赶入大海的目标,在实际上还导致了外国统治的进一步扩大和巩固。

相形之下,在法属索马里,无论是这些次要影响还是德尔维希的直接行动,都没有产生明显的作用。在其他地方到处发生动乱的整个时期,法国人为了把埃塞俄比亚的转口贸易引导到法属索马里,集中精力来实现一个很有想法的计划,即建立从吉布提到埃塞俄比亚内陆地区的铁路。尽管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扰(法属索马里兵团在战中还因表现英勇而出名),法属殖民地-埃塞俄比亚的铁路还是在1917年修建到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整个地区唯一的铁路线,这一伟大的事业的最终成功,保证了法属索马里及其首府吉布提港的繁荣。同样,这条铁路的修建使得泽拉逐渐失去了内陆大部分对外贸易出口港的传统地位。因此,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一直与埃塞俄比亚保持良好关系的法国,虽然在索马里占据的领土是最小的,但是一直从这块殖民地获得了极大的好处。英国则恰恰相反,获利最小。从索马里人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的事态发展只是使得索马里被瓜分成为定局。尽管这样,赛义德·穆罕默德的无效斗争,仍然在索马里的民族意识中留下了爱国主义的理想,它永远不会消失,必将世世代代激励着索马里人。

第五章 索马里的统一：意属东非帝国

索马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英属索马里长期耗在反德尔维希的战争上，意大利又在逐步扩大其在索马里的统治，因此都没有多少时间和资源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然而，在意属索马里，从意大利开始实行直接统治的时期开始，就想要吸引意大利本国移民过来，在谢贝利河和朱巴河流域发展殖民种植园。卡勒蒂(1906—1910 年任总督)原先曾设想让一批批意大利农民定居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构造合作殖民区。为了实现该计划，卡勒蒂于 1908 年指示在准博(Giumbo)的驻扎官，在谢贝利河的戈沙(Gosha)地区预留一万公顷的可耕地。这块土地之前是图尼(Tuni)氏族使用奴隶和农奴来进行种植的。

政府在掌控这些资源之后，就采取措施吸引意大利移民来租用土地和建设农场。但是，那些满怀希望想到索马里奔灿烂前景的人很快就发现，由于在当地招募劳力比较困难，因此其努力遭遇到了很大的阻碍，这一点和人们的期望相反。这让戈沙区的意大利驻扎官开始强迫人——主要是过去的奴隶和农奴——到已经开办的种植园去工作。尽管工资并不低，但还是很少人愿意来。那些被劝诱来意大利农场工作

的人，还必须有警卫监视，否则就会怠工或逃跑。[1]虽然种植园工人的工作条件得到了逐步改善(如果说在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在意大利殖民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一直有这种大规模强制性招募劳工的传统，被强迫征来的劳工主要是居住在沿河地区的班图族部落。

第一批经营租让地的人不只遇到劳力短缺的问题。由于没有对当地情况的科学研究作为指导，第一批意大利农场主不得不在摸索中前进。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和装备，加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又没有政府的真正支持，因此，经营的状况大多数是很糟糕的。早在 1920 年，奥诺尔(Onor)博士就在谢贝利河岸靠近马尔卡的格纳勒(Genale)开办了一个农艺研究站，在那里试种各种热带作物，包括香蕉、水稻等，并对气候和土壤条件进行了系统的调研。但是，这项开创性工作的重要性被当时的意大利政府忽视了，因此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更为积极地进行殖民活动时，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改变。与此同时，早期种植园很多种植尝试都是失败的，当时大批从意大利移居索马里的农民的前景也是暗淡的。

然而在 1919 年，热带农业的先驱阿布鲁齐公爵(Duke of the Abruzzi)来到了意属索马里。接着，法西斯分子德韦基(De Vecchi)[2]担任意属索马里的总督。这两件事带来了新的发展，使得意属殖民地后来的经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充足的财政支持下进行了密集的技术研究后，阿布鲁齐公爵于 1920 年创立了“意索农业公司”(Societa Agricola Italo-Somala)。该公司总部位于谢贝利河畔以公爵名字命名的“阿布鲁齐公爵村”(Villagio Duca degli Abruzzi)。很快，该公司就发展成为一个效率很高的农业财团，生产棉花、糖、香蕉、油料和肥皂。[3]该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其创立人的组织才能，而是由于在每个工作阶段前都做了合理的科学准备，而且还得益于费尽周折地解决了过去存在的劳工招募困难。意索农业公司和早期意属索马里种植园的做法不同。早期移民是从殖民地当局获得土地的，而意索农业公司则是直接和公司所在地的部落——班图族希德勒(Shidle)部落

签订合同来获得土地和大部分劳力的。到 1920 年底,公司拥有 3 万公顷的肥沃土地,这些土地就是希德勒部落几个分支从其集体所有土地中直接拨出来的。这些部落分支保留了其已经耕种的农地,只是把其备耕地让给了公司。

公司用这种创新的方式从传统部落土地所有者手中取得了土地所有权,并和他们签订了合同,合同保证了灌溉和改良土壤所需的大部分劳力的供应。这些劳力以后还可以继续成为公司的雇员。每个家庭要为公司耕种一块不小于自家耕种的土地,产品按照每年共同协商的固定价格出售。1920 至 1922 年期间,降雨较少,很多人因为贫困和在家没活做被迫来到公司寻找工作。1923 年又发生了水灾,劳力又都四处分散开来。还有就是当地爆发了黑死病,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返乡了。在土壤改良的关键时期,劳力显著减少了,公司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公司在此情势下,又采取了强迫招募劳力的老办法。公司和意属殖民地当局作出安排,强迫阿弗戈伊(Afgoi)、奥德威格勒(Adwegle)和布罗-梅雷尔塔(Bulo Mererta)的希德勒部落和其他部落提供临时劳力。同时,公司还以稍微高一点的工资雇佣了自愿来的工人。

即使这样,公司仍然很难获得稳定的劳力。1924 年,公司在全体雇工中实行了"合作"劳动制度并获得了成功。这种制度让工人在公司划出的种植区定居下来,每个工人得到一公顷的土地,其中一半为自己耕种,另一半为公司耕种,地租依据收成而变化。在这一基础上,公司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劳工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公司将从不同部落和地区招募来的人,根据种族和部落划分成不同组居住在公司的各个种植村。公司提供基础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虽然这种服务是有限的、初步的,但还是超出了其他地方的一般标准。

意索农业公司计划最终所获得的成功,推动了德韦基政府在格纳勒建设大型灌溉工程的计划。格纳勒是一个长期受到忽视的地方,也是奥诺尔创办研究站的地方。殖民地当局在规定将土地租给意大利移民和公司的条件时,仿照阿布鲁齐公爵最初制定的条例,制定了一部劳工条例。制定这个条例的目的是为了从南部的农业部落(尤其是沿河

地区的班图部落)吸引全家和个人到劳工聚集的种植村，将他们束缚在公司的土地上。与阿布鲁齐公爵村一样，每个男女都分到供自己使用的土地，还可以饲养一些家禽和牲畜。雇主要提供给雇员使用的种子，在收获和种植的时候要付给额外的酬劳。孕期的妇女干轻一点的活，生产后有一个月的假期。在工人居住的村落里，雇主还提供一些保健卫生服务，因为给已经招募来的工人提供点福利，很显然符合雇主的利益。

雇主必须对雇员详尽地解释将双方联系在一起的合同，这合同上有双方的签字。[4] 在意大利移民和公司看来，这些条件似乎已经够优待的了，但很多从事耕种的部落人显然还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和故乡，放弃他们赖以生存的耕作来为外国主子干活。事实上，给外国主子干活和囚犯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在风调雨顺的时候，尤其是在家有很多活要做的时候，在格纳勒获得土地租让权的意大利人，仍然面临着劳工不愿意来干活和劳力普遍不够的问题。在当局的默许下，他们开始强迫招募劳工来解决这个问题。为此，他们派出队伍到贝杜亚(Baidoa)和布尔哈卡巴(Bur Hacaba)地区去抓壮丁。这一情景至今依然留在索马里人的痛苦记忆中。有点吊诡的是，游牧地区的部落一贯看不起耕种，过去和现在都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他们却最渴望找份带工资的工作。而南部从事耕作的人们则不同，因为他们在这个时期肯定可以依靠土地和牲畜产品满足大部分的最低生活需要，除非是在歉收或饥馑时期，否则压根就不必从事雇佣劳动[5]。

尽管有着这些困难，意索农业公司仍树立了榜样式的模式，先是谢贝利河的格纳勒和其他中心，后是朱巴河的中心地区相继效仿这种模式，从而使得索马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贸易形式。阿布鲁齐公爵最先试验生产的香蕉的出口，很快就成为格纳勒的主要的生产目标，并成为意属殖民地一种新的出口产品，其地位和传统的出口产品大桅牵条、兽皮和皮革差不多。这一时期创办的其他重要企业还有一家，即最北部米朱提因海岸哈丰角的制盐厂。这个企业是由伦巴第地区(Lombardy)的一群工业家出资，在1920年开始兴建的，不过在1925至1927年期间，由于米朱提尼亚(Majerteynia)地区的战争曾停办过。

到1933年,该厂已经年产26万吨精盐,成批地出口到东非、印度和远东地区。

其他领域,尤其是交通领域,也有相应的发展。意大利人非常尊崇罗马帝国的格言,即道路是战争胜利和扩张的基础,也是和平繁荣的基础。因此,在德韦基统治时期,公路增加到6 400公里,是原来的三倍。1928年,修建了一条柴油机车的小铁路,从阿弗戈伊和阿布鲁齐公爵村的种植园通往首都摩加迪沙及其港口。1929年,政府第一次开始地质勘查,为牧区经济所急需的凿井计划提供准备。而在过去,政府对牧区经济很少关注。1932至1933年间,共修建了150口井。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当局还考虑到一个被一直忽视的问题,即改进传统自给农业经济,并在谢贝利河沿岸的土著地区进行土壤改良和灌溉工程。

与此同时,社会服务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各地都设有一些诊疗所,一些主要城市建有医院。当局对当地居民的卫生保健福利也许比其他福利要更为关注些。1933年,当局还在索马里建立了一所培训护士的学校。

其他教育事业虽然得到了国家支持,但主要是由天主教会办的。在索马里南部,社会风气没有北部那么封闭,公众对天主教会的敌意也要比北部少些。意属索马里当局由于更全面地控制了当地的居民,它甚至可以在摩加迪沙建筑一座富丽堂皇的天主教堂而没有引起任何强烈的反对。在这种情势下,到1929年,天主教教会在马尔卡、巴拉韦、杰利布(Gelib)、阿弗戈伊、阿布鲁齐公爵村、贝杜亚、基斯马尤,甚至在哈丰角等地都开办了小学。1907年,当局还在摩加迪沙开办了一所教索马里人学习意大利文的学校;当时这里还有一所贸易学校。因为意大利当局认为索马里人接受教育,可以培养他们从事一些技术工作。这些技术工作派给索马里人比较方便,这也是意大利当局让索马里人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教会小学在一开始的时候,索马里和意大利孩子是在一个班里上课,但是在1929年,德韦基的继任者圭多·科尼(Guido Corni)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主人和“臣民”之间的等级关系,便

让这两个种族的孩子必须分开上课。

对索马里人开放的教育设施继续扩充，索马里小学生和阿拉伯小学生的人数从1930年的1 390人上升到1939年的1 776人。与当时英属索马里和法属索马里的情况相比，这个数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如果不是当时意属索马里的民众比英属索马里的一般民众更为接受西方教育的话，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关于这个问题，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意大利当局允许天主教传教士有相当大自由的同时，也公开支持伊斯兰教。当局经常拨划资金帮助修建清真寺和神殿。

当然，行政管理制度是效仿意大利法西斯制度的，是官僚主义的和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由驻摩加迪沙的总督及其直接下属和秘书们领导。各区和州设置驻扎官（相当于英国的地区专员），由从政府领取薪金的"酋长"和长老们加以协助。虽然这些本土权威（Capos）仅仅起到顾问的作用，更多的是传达命令和指示的工具，但意大利殖民地当局对那些忠诚和合作的酋长会颁发勋章和奖金。例如，比马尔氏族曾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而20世纪30年代的官方出版物则颂扬他们效忠于意大利，还称赞比马尔氏族著名首领阿卜德·拉赫曼·阿里·伊萨（'Abd ar-Rahman 'Ali 'Ise）苏丹为意大利利益的坚定支持者，并授予他共和国骑士勋章（Cavaliere Ufficiale）。[6] 同样，格勒迪苏丹艾哈迈德·阿布·巴克尔（Ahmad Abu Bakr），因为帮助格纳勒种植园招募劳工而得到了"殖民之星"勋章（Order of the Colonial Star）。他是迪吉尔部落名义上的首领，也是著名的占卜师，意大利曾在1940年请他算过东非战争的结果。

这些人以及意大利任命的其他酋长充当意大利驻扎官的代理人，并得到了一支名叫"果格赫"（Gogle）的农村武装保安队的支持。这支队伍最初是德马尔蒂诺（De Martino）担任总督期间于1914年招募起来的，到1930年已经发展到了约500人。它相当于北部英属索马里的伊拉洛部落保安队。行政当局还得到一支强大的警察部队支持，这支部队在当时拥有1 470名当地士兵，并由85名意大利军官领导。后来，

由于殖民地军队数量增加，警察部队就大为削减，并成为殖民地保安部队(Carabinieri)的正式组成部分。[7]

与这一时期扩张主义精神相吻合的是，意大利殖民地在 1925 年从英国那里得到了朱巴兰和基斯马尤港，领土大为扩大。从英国那里得到这两块地是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到的少量战利品的一部分。虽然朱巴兰过去曾动乱频仍，并曾遭受过英国多次残酷的讨伐，[8] 但是，这次领土转手和意属索马里与肯尼亚间划定新边界的工作并没有出现什么波折。英意当然并没有征求相关部落的意见，且很少甚至压根就没有考虑过部落分布的情况和放牧的情况。

如果说朱巴兰的转手进行得较为顺利的话，那么意大利在将其直接殖民统治拓展到北部的两个保护领地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德韦基从其接到任命的时候就主张将这些地方合并，但是直到 1925 年 7 月，即在 1924 年发生一起边界事件(英国保护领地的一队警察越过边界追击米朱提因苏丹国的袭击者)之后，罗马才授权他这么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采取军事行动。虽然意大利人将这些军事行动委婉地描述为“殖民地的警察行动”，但实际上费了大力气，出动了 1.2 万人的部队，其中包括来自厄立特里亚的 3 个营和海军陆战队的 1 个师，且这个师还得到了军舰和侦察机的支持。第一个目标是迫使霍比亚苏丹国屈服。由于霍比亚苏丹国的优素福·阿里·凯纳迪德(Yusuf 'Ali Kenadid)并不是一个世袭统治者，只是从米朱提因部落分离出去的后裔，因此这个目标很轻易就实现了。到 1925 年 10 月底，这个苏丹国被宣布为一个州，在加勒卡约(Galkayu)、埃勒布尔(El Bur)和伊利格设置了驻扎官公署。优素福·阿里本人被废黜，在摩加迪沙领着年金度余生。

在征服北方保护领地米朱提因苏丹国本土的过程中，拥有强大兵力的意大利人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伊斯曼酋长当时虽是一个老人，但受到普遍的尊重，其部队参加过德尔维希时期的战斗。和很多伊斯曼人一样，酋长在那一时期曾起到了某种微妙的作用。在意大利人要求他和他的人民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新地位后，酋长开始的时候设法拖

延，同时也在动员其追随者准备战斗。因此，尽管其对手在军事上占压倒性优势，酋长还是坚持抵抗了近两年。一直到 1927 年，意大利人击溃了所有的有效抵抗，酋长才不得不屈服，接受与霍比亚同胞同样的待遇。酋长的儿子逃到埃塞俄比亚，几年后回到了摩加迪沙，在那里死于天花。

同一时期，新近臣服的霍比亚苏丹国的埃尔布尔(El Bur)爆发了一场勇敢的起义，这次起义由奥马尔・萨马塔尔('Omar Samatar)领导。夺取警察军械和杀死意大利驻扎官后，主要的叛乱分子越过边界进入埃塞俄比亚。根据意大利的报道，这些叛乱分子在这里开始反对意大利在欧加登地区的渗透，并准备进攻意大利边界哨所。但是，除此之外，由于意大利当局发动了强大的报复行动，这次起义在殖民地本身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

朱巴兰和北部两个保护领地合并后，意属索马里当局在直接行政管理机构上也做了相应的扩大。意属索马里此时被划分为七个州或“大区”，下设三十三个由驻扎官管辖的区。此时所有的文职人员包括 350 名意大利移民和 1 700 名在当地招募来的索马里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人，这些人担任各种各样的次要职务，如医院的勤务工、技术助手、护林员等等。在索马里人看来，最重要的任命是翻译官，在任何直接统治体系中，如果外来官员不会说当地话，那么翻译总是一个关键的职位。在这个庞大的行政机构建立起来之后，领薪的酋长和乡绅有所裁减，仅留用了那些忠诚的、有能力的人。由于任命了正式的穆斯林地方法官(Kadis，即卡迪斯)，这些人的地位还有所受限。这些法官主管索马里习惯法和伊斯兰教律，他们比英国保护领地的地方法官拥有更大的司法权。

事实证明，巩固统治、建设经济开发的必要基础设施需要付出很大代价。1905 年的预算只有 90 万里拉，后来预算不断提高，1908 年达到了 250 万里拉，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每年的平均预算为 7 400 万里拉。当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进出口关税、消费税和执照税，直接税并不多。虽说这些税收也在不断增加，但远远赶不上支出。事实上，就在

同一时期，当地收入只有2 700万里拉，还达不到殖民地预算的一半。然而，在这一时期，出口贸易(主要是皮革、棉花和香蕉，1932年后棉花和香蕉的出口超过了皮革)开始有了一定的收益，贸易逆差从1927年将近1.31亿里拉的最高峰下降到1934年的2 900万里拉以下。尽管花费了很大的财力人力，意属殖民地经过30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仍然有很大的赤字，完全不像早期来到这里的意大利先驱所预测的那样，会成为意大利的财富之源。意大利原来还期望索马里为意大利大量过剩人口提供富裕的生活。可是，这种愿望此时已经显然不可能实现了，意大利也就悄然放弃了这个愿望。由于殖民地提升了意大利的国家威望，因此，意大利人也就开始不理会这种不令人满意的经济状况。不久，在1934年英国和埃塞俄比亚划定英国保护领地边界的过程中，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不愉快的瓦尔瓦尔事件。这一事件带来了深远的后果，使意属索马里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英国保护领地的进展

20年的德尔维希战争是一个停滞期，英国当局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战胜赛义德·穆罕默德的运动上，几乎没有时间或资金来从事任何建设性的事业。同时，这里的情况和苏丹的情况不同。英国在苏丹反对马赫迪信徒的战争中，修建了铁路、公路和电讯交通，从而间接地推动了苏丹的发展，英国也开始注意到要照顾苏丹的需要，因此取得了一些出色的成就，如开创了戈登学院(Gordon College)。而在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圣战的结果就完全不同。在这一时期的某段时间内担任首席秘书(Chief Secrectary)的道格拉斯·贾丁(Douglas Jardine)曾雄辩地指出，索马里的20年战争除了几辆歪歪倒倒的福特汽车外，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实在性的东西了，既没有像样的公路，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更为不幸的”是，“英国公众在索马里战争胜利结束前好多年就已经忘记了这场战争”。[9]英国政府在战争中耗资不少，这和它在索马里的利益完全不相称，因此，英国政府并不打算为发展事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更为可悲的是，反对德尔维希的战争远没有促使索马里人与当局

合作新时期的到来，反而留下了一种阴沉的不信任和潜在的敌意。

尽管英国保护领地的情形暗淡，但实际上还是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发展，这种发展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从保护领地当局那里获得什么援助。这种发展体现在保护领地西部地区——博拉马(Borama)和哈尔格萨(Hargeisa)逐渐开始种植高粱。这一地区远离德尔维希运动所在的中部和东部。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地势较高、水利条件较好的西部地区的盖达布尔希(Gadabursi)氏族和哈巴尔·阿瓦尔氏族的一些支系，尤其是吉卜里勒·阿博库尔(Jibril Abokor)家族，就已经开始以其在吉吉加的亲族为榜样，清除灌木丛地以种植高粱，用牛拉的木犁来翻地。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完全不同于南索马里使用锄头的耕作方法。这种先进的耕作方法最初似乎是由当地的一些教徒聚居区首先采用，然后很快就传播到周围的氏族。德尔维希战争完全没有阻碍这次经济革命，相反，战争还促进了这场经济革命，因为战争使得当地谷物有了利润可观的市场。那些转而从事耕作的牧民仍然对饲养牲畜有兴趣，并不完全依靠农作物生活。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生产经济作物，用这些经济作物与保护领地中部和东部的牧民进行交换。[10]

1924 年，英国保护领地当局认识到这种发展的重要性，设立了一个农业和兽医局，之后不久又建立了一个小的实验站。1928 年，蝗灾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几乎毁坏了所有的庄稼，导致大范围的饥荒。然而，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英国保护领地西部的广大地区，已经牢固地建立了和畜牧业相结合的稳定的农业，而且，英国保护领地当局已经完成哈尔格萨、博拉马(经过几次失败后，最终在 1921 年设立了这个区)农业区的划界测绘工作。而在其他地区，主要的还是游牧经济，提供绵羊、山羊和皮革的出口产品。

虽然索马里人在农业方面有所创新，但在教育上却乏善可陈。前文已经阐述了教会学校在柏培拉以及后来在德木勒(Daimole)的活动是激起德尔维希运动的因素之一。事实上，这种学校在 1910 年的时候就已经关闭了，当时传教会要别人改变宗教信仰的活动被禁止。此禁

令得到了严格执行，后来也从没有取消过。在此段时期的早期，保护领地政府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开始在教育领域里从事工作。到1905年，保护领地政府尽管遭遇到不断的抵制和反对，还是在柏培拉、布尔哈尔和泽拉三个地方建立了规模不大的小学。可惜的是，由于吉布提港的兴起，泽拉和布勒哈尔的人口有所减少，这两个地方的学校由于缺乏支持而关闭。

1920年德尔维希战争结束后，政府采取了更为系统的举措，准备建六所小学和一所中学。由于英国政府拒绝提供资金，有人建议对牲畜征收直接税以筹募必要的资金。此计划对当时的索马里人来说是最令人痛恨的，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并在布尔奥引起了一次骚乱，行政区专员也在此次骚乱中丧生。由于英国保护领地当局不断地得到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发生再一次的德尔维希战争，因此计划随即被临时搁置了下来。然而，从1919年开始，保护领地当局有资金供应少数得到家长同意的男孩到苏丹去上学。到1933年，戈登学院有了五个索马里男学生。在1929年，政府对私立伊斯兰教学校有选择地给予补助，这些学校是由索马里伊斯兰教舍赫开办的，而资助的条件是这些学校要用阿拉伯文教学生阅读、写字和算术。1935年，为了推行合适的教育制度，当局采纳了一些新的建议，并开始在柏培拉兴办一所新的官办学校。第二年，英国任命了英国保护领地的首任教育署长。但是，这个计划又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而遭到强烈的反对。在布尔奥爆发的一次骚乱中，三个索马里人被杀死，新任的教育署长被人民投之以乱石。此后，这些建议被搁置了下来，直到1941年意大利在东非被打败，英国重新占领了英属索马里后，情况才有转机。

其他领域虽然没有那么多乱象，但总体情况同样是暗淡的。1926年后，由于设立了新行政点，道路建设有所发展，医疗事业也有所扩大。除了兽医所的活动，唯一直接有利于游牧经济的措施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小规模挖井计划。与意属索马里相比，英国保护领地的发展实在是有限的，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也是因为英国保护领地自然资源少，体现不出来帝国荣耀，且没必要考虑欧洲移民的需要，因而所花

的经费也少。保护领地政府的预算少得可怜，直到1937年，预算还只有213 139英镑。由于推行直接税的计划失败了，英国保护领地的主要收入和意属索马里一样都是来自进出口关税和执照税。如果直接税的计划成功的话，它会对该地区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该地区的主要出口货物仍然是皮革和牲畜。20世纪30年代末，出口额为279 940英镑，进口额为535 210英镑。

有人曾妙言英属索马里为帝国的灰姑娘。尽管英属索马里面积相当大，达到6.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35万，但英国却能用很少的钱来管理这位“灰姑娘”。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政府机构少、公用事业和建设少，还因为索马里社会制度的特点。尽管这个地方只有少量的英国官员在印度裔、阿拉伯裔办事员的协助下进行工作，也没有有效的酋长制度可以作为建立传统意义上的间接统治的基础，但是索马里氏族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通过它可以确实无误地辨别出每个人的身份。由于存在这一制度，与意属索马里相比，英国保护领地的人口更为集中和同质，清楚地划分为迪尔、伊萨克和达鲁德三个部落，因此，英国保护领地当局得以实行较为温和的统治。

必须再次强调，英国保护领地当局的目标是极为有限的，事实上，只限于维持有效的法律和秩序。鉴于当地人倔强的性格，而且除了西部地区有几千人在从事农耕，从整体上讲，绝大多数人口过的是游牧生活，因此，如果要有效地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就需要建立更为强大的行政机构。英国保护领地的居民因为同属一个种族，但分为明显不同的部落，所以这种情况有利于用较少的精力来维持法律与秩序。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尽管伊萨克和达鲁德部落间有着传统的敌对关系，但比起种族混杂、分化严重的意属索马里居民，英国保护领地的居民还是能更有效地、更广泛地反对诸如实行西方教育这样的重大改革举措。

与此同时，英国保护领地并没有较为普遍的土著酋长制度，因此也就不具备真正的间接统治的基础。不过，很多名义上的部落首领和氏族长老得到了保护领地当局的正式承认，并领取薪水。与意属索马里一样，这些领导人通常有个阿拉伯语的称号“阿基勒”(Akil)，他们是区

专员和所辖区内民众间的联系人。由于索马里人爱打官司,部落、氏族间经常闹矛盾,法院的工作量很大,区专员认为处理这些工作有点得不偿失,因此便授给这些阿基勒或酋长有限的审判权,起着下级法院的作用。然而,他们的权限很小,涉及宗教和伊斯兰教律的个人地位问题,都由穆斯林法官来处理。

因此,尽管在表面上对间接统治的原则作了一些让步,但实际上,英国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一样实行直接统治,但是英国保护领地的管理手段要温和得多,管的事情也比较少。区专员掌握全部的实权,并兼任法官。整个英国保护领地由设在首府柏培拉的秘书处统治,下设六个独立的区。由于交通不便,且很多行政派出机构远离首府,区专员的权力自然也就不小,划归他们指挥的伊拉洛部落保安队则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他们的地位。警察部队直到 1926 年才得以创立。这支警察部队虽然有助于控制部落和氏族的争端,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区专员的权力。警察与行政官员、伊拉洛部落保安队与正规警察之间,实际上常常会出现一些摩擦。善于玩弄政治权术的部落也充分地利用这些摩擦。上述情况、部落内的政治斗争、挑拨一个行政官员去反对另一个行政官员(在这种事上,政府翻译官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就是地方部落生活中的主要兴奋剂。[11]

自德尔维希战争结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非战役后,英国保护领地的生活大体上就是如此的。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在当时已经初步建立了法律和秩序,但是西部地区,特别是在盖达布尔西和伊塞氏族中,在此期间还是发生了相当多的骚乱。这给行政管理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而瓜分殖民地时的专横措施,即把盖达布尔西氏族划分给英国和埃塞俄比亚,把伊塞氏族划分给英、埃、法三国,更是加重了这种困难。盖达布尔西氏族内部领导权的争夺者及其追随者,企图利用吉吉加的埃塞俄比亚当局和博拉马的英国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1930 年,这种危险的做法导致了一次不幸事件的发生,即盖达布尔西氏族内部一个亲埃塞俄比亚的想夺权的人,带领了一支埃塞俄比亚军队到英国保护领地境内抢夺牲口。博拉马当局迅速进行反击,双方互

相开火，有 4 个埃塞俄比亚人被打死。与意属索马里接壤的东部边境也出现了同样的麻烦，不过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在中部地区，由于埃塞俄比亚在豪德中部地区没有设置行政机构，所以没有发生这种纠纷，英国保护领地当局在必要时可以毫无障碍地派遣警察部队到该地区。

然而，英国保护领地当时显然有必要沿着多年前条约确定的边界线，实地标明这些边界。为了应对意大利的压力，英国保护领地首先关注的是与意属索马里的边界。斯塔福德(Stafford)上校和意大利学者、殖民政府文职官员恩里科·切鲁利(Enrico Cerulli)博士领导下的英意委员会进行了划界工作。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事件，并于 1930 年 9 月结束。1931 年 6 月在伦敦签订的英意协定批准了划界的结果。按照 1894 年原英意协定的精神，[12]这次批准似乎也承认了意属索马里边界沿英国保护领地东南部往西延伸，直到埃塞俄比亚境内欧加登地区的多莫特(东经 47°)。

成功划定了与意大利的边界后，英国便依据 1897 年协定中模糊不清的规定，进行英国保护领地与埃塞俄比亚的划界工作。这是英国首次清楚地表示要部分地取消英国对那些原来受它保护的索马里人的保护，并且放弃埃塞俄比亚当时迫切要求取得的那些索马里领土。因此，英埃联合划界委员会受到该地区部落的反对，且有一个委员在工作中丧了命，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比起 1934 年 11 月由克利福德(Clifford)上校和特塞玛·班特(Tessema Bante)侯爵领导的这个委员会在欧加登东部瓦尔瓦尔所遭遇的情况，这次事件只是件小事。

这里需要阐述一下英埃联合委员会在瓦尔瓦尔的情况。该委员会在完成了不得人心的划界工作后，越过边界进入欧加登地区，目的是要调查欧加登地区的水井和牧场的情况。得到英国保护的索马里人在那里享有使用权。11 月 23 日，委员们来到瓦尔瓦尔，令他们吃惊的是，走在前头的埃塞俄比亚卫兵遇到了一个武装良好的意大利哨所。[13]在阐述瓦尔瓦尔事件在当地的影响前，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在 1935 年以前的几年中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活动的经过。那次事件导致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和征服。

瓦尔瓦尔事件

需要提及的是，1908 年条约专横草率地把某些部落划给了意大利，把另外一些部落划给了埃塞俄比亚，这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之后，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一直采取经济和政治渗透政策。继可怕的德韦基(De Vecchi)之后，担任意属索马里总督是圭多·科尼，[14]他曾夸耀该政策在其任期内(1928—1931)是如何如何的成功。意大利人用重礼争取到了边界那一边的几个著名宗教领袖，还招募了非正规的索马里队伍，并向这些队伍供应武器，以便在欧加登地区制造事端。意大利可以轻易地把这些队伍说成是土匪来推卸自己的责任。[15]在木斯塔希尔(Mustahil)地区，意大利人向强有力的阿朱兰苏丹奥洛丁(Ololdin)提供了经费和武器，让他来袭击埃塞俄比亚的贡赋征集队。在当时，埃塞俄比亚行政机构的所有活动就只是贡赋征集队的专横征缴行为。

这些索马里队伍实际上就是意大利官方的边境巡逻队的先锋。自 1931 年开始，意大利的边境巡逻队统一由"雇佣军"司令部指挥。这个司令部由意大利军官指挥，拥有 1 000 名武装士兵，以盖尔多(Gardo)、戈德德累(Goddere)和加拉迪(Galadi)等地的哨所为据点进行活动，这些哨所都设在有争议的那段边界的欧加登一边。在 30 年代初期，意大利还深入到欧加登地区的瓦尔瓦尔等地(并未划归意大利)设置了一些小哨所。然而，直到 1934 年爆发悲惨的瓦尔瓦尔事件之前，意大利人在这些地方的出现却一直没有受到责难。

正如前面曾指出的那样，对比之下，埃塞俄比亚人在此时依然没有在意大利人放肆地伸手进去的欧加登东部设立任何行政点。[16]埃塞俄比亚的主要行政中心依然是远在西边的吉吉加。但是，就像埃塞俄比亚人过去在吉吉加和哈勒尔周围的索马里领土上所做的那样，埃塞俄比亚派出的全副武装的贡赋征集队也越来越向东推进，以便为最终建立埃塞俄比亚的统治铺平道路。与此同时，意大利利用索马里人对阿姆哈拉人原有的敌意，而埃塞俄比亚人也竭力将意大利人描绘为残酷

的外来掠夺者，并且利用索马里部落内部的互相猜忌为自己谋利。埃塞俄比亚人不但进行专横的军事袭击，而且还向那些敌视意大利的索马里集团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他们这么做是想达到两个目的：抵御意大利的侵略和取得索马里的领土。站在埃塞俄比亚一边的典型人物是奥马尔·萨马塔尔。1926 年，他大胆地袭击了意大利在布尔的哨所后，便越过边界进入到埃塞俄比亚境内。他此时的活动主要就是抵制意大利人在欧加登地区的渗透。

如此一来，欧加登的索马里部落就陷入了两个敌对阵营之间，这两个敌对阵营都在竞相争取索马里人的效忠。由于游牧生活的迫切需要和索马里部落制度的实际情况，索马里人之间不可能长期进行广泛的政治合作，因此在两大强国争夺他们的效忠和领土时，他们很容易就成了牺牲品。总的来说，意大利人更为成功些，因为意大利人可以在送礼和讨好上更加自如一些，也因为埃塞俄比亚人并不掩盖其反穆斯林情绪，从而使得意大利人容易表现为伊斯兰教的保卫者。

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人并不满足于局限在自己境内展开反击意大利入侵的行动。例如，1931 年 9 月，一支由几千人组成的埃塞俄比亚部队在逐出木斯塔希尔的意大利哨所后，沿着谢贝利河大举南下，威胁到了意大利在贝莱德文的总部，让意大利人服了一剂他们自己炮制的苦药。意人利匆忙集结援军，并在经过紧急的外交谈判后，一场公开冲突才得以避免，埃塞俄比亚人撤退了。双方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件，其中 1934 年的瓦尔瓦尔冲突达到了事件发展的顶点。此时，意大利已经着手进行了从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地区入侵埃塞俄比亚的诸多准备，对其在与埃塞俄比亚对抗中所处的有利地位越来越有自信，且这种信心并非没有根据。

我们当然会记得，许多年前，意大利在“非洲之角”的地位由于 1906 年三国条约得到了加强。[17] 1925 年的英意协定又进一步强化了上述条约的作用。根据英意协定，英国承认并答应支持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西部地区的经济利益。作为回报，意大利答应支持英国获得一块租借地以便在塔纳湖建立拦河坝。因此，英国事实上与以往的行为一

样，是在为埃塞俄比亚封建王朝一旦崩溃时维护其利益做各种可能的准备。三年后，英意两国又签订了一个永久和平与同盟条约，这加深了埃塞俄比亚的恐惧，同时又更加直接扩大了意大利的势力。新条约规定，两国间的分歧将通过调解和仲裁程序来解决。这确实是为了殖民战争而做出的不同寻常的准备。与此同时，意大利在欧洲各国议会中还进行了相当成功的游说，争取英法默许其即将而来的侵略。

我们在这里就不叙述所有的卑鄙细节了。意大利守卫部队与埃塞俄比亚护卫队在瓦尔瓦尔的遭遇导致了12月5日的战斗。在战斗中，意大利人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据优势，迫使埃塞俄比亚护卫队撤退。随后，双方经过国际联盟安排进行了多次无果的谈判，[18]英国过迟地决定不再支持意大利人的殖民冒险，其他强国，尤其是法国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国际联盟最终做出制裁的决定并没有能阻止意大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些情况已经有了很多作品加以描述和评判，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意大利军队沿着意属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帝国公路（修建这些公路最初是为了吸引贸易，后来则被用作扩张的基础），凭借其占压倒性优势的兵力、武器和空中支援，无情地向前推进。1936年5月7日，战争结束，埃塞俄比亚完全被征服了。意大利一直感到难以释怀的阿杜瓦战役的可耻失败终于得到洗刷，墨索里尼可以夸口说意大利最终赢得了帝国的胜利。

意属东非帝国统治下的索马里和欧加登

埃塞俄比亚被征服之后，意属索马里的领土扩大了，增加了欧加登以及谢贝利河和朱巴河上游的索马里人聚居区。意属索马里增设了三个新的行政州，过去被意属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边界”强行分割开来的索马里部落又合并了起来。战前准备和战争本身给这块殖民地带来了短期的空前繁荣。然而，因为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经济繁荣很快就转变为经济衰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属索马里政府没有进行任何新的重大建设。

当时的贸易和商业受到政府垄断公司和准国家组织的严格控制，

因此人们并没有多少进取心或事业心，而且法西斯法律还明确排斥索马里人或其他殖民地的“臣民”进入到有可能会与意大利人竞争的经济领域。至于殖民地政府本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西斯官僚机构臃肿，文武官员大量增加，极大地降低了行政工作的效率。法西斯社会生活中的整个基层组织，他们的支部和组织（每个意大利公民，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至少属于其中的某一个组织），都从意大利引入到了索马里。这些组织渗透入意大利居民生活的程度，尤其是在索马里的渗透情况，在今天看来都是极其荒唐的。

为了管理非意大利籍居民、维护殖民者的种族优越地位，当局还制定了一套复杂的歧视性法律体系。虽然不同种族间的男女私通很是普遍，但是官方对此并不赞同，并且完全禁止种族间的通婚。不过，幸运的是，意大利司法机关虽然可以专横地轻罪重罚，但它充其量也就是个臃肿不堪的机构，而且索马里人还发现许多意大利官员收受实物和金钱，这往往就会进一步降低司法机构的效率。有 4 万多名索马里人参加了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战役，[19]因此，全体索马里居民还得到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特权以作报酬：官方称他们为“索马里人”或“本地人”，而不再使用官方过去所使用的“臣民”和“土人”这种侮辱性的称呼。索马里的各派势力不得不满足于这个极其有限的待遇，因为意大利没有再做出任何重大的努力来扩大意埃战争之前已经实现的发展。

尽管存在严酷的法西斯法律，还有一大堆旨在促进和维护“雅利安”（Aryan）征服者的尊严和“主人地位”的规定和宣传，但是，如果认为全体索马里人在此时都积极反对他们的统治者的话，那就大错了。当时有很多意大利官员，他们一方面在口头上夸颂着法西斯，另一方面也在认真地履行其行政职责。不少索马里人与意大利人还保持着友谊，并且互相尊重，在友善程度上至少不低于其他索马里地区的索马里人和外国官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尽管学校很少，但还是有很多人学习了意大利语（当然所掌握的意大利语只是基础性的），且肯定比英属索马里会讲英语的人要多得多。一方面，相比较而言，英语难学点，而学会一般性的意大利语还算是容易些；另一方面，意属索马里认为索马里

语是一种蛮族语言,推行必须要将索马里语让位给文明的统治者语言的政策。这也是意大利人本身作为殖民者形象的一部分：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20]

索马里人除了在传统的部落制度内以及与行政管理官员打交道外,就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除了在最低等级上,并做低人一等的工作,索马里人也没直接参加到殖民地政府和管理机构。1907 年,被正式任命为殖民地首任常设总督的托马索·卡勒蒂(Tommaso Carletti)认为,索马里人的才智与自己的意大利同胞差不多,还明智地提出成立索马里市议会,并且最终建立选举制的政府。[21]这些开明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那一代人的认识,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意大利托管时期出现了新观念后,这些思想才为意大利人所接受。

要为意大利人说句公道话,无论意大利人的动机是什么,尽管存在法西斯的烙印,意属索马里对索马里人的好处肯定要多于英国保护领地和法属索马里,尤其要多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下的肯尼亚北方州。在公共建筑、道路、种植业方面,意属索马里已经建立了现代殖民地的基础,当时索马里人虽然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们后来却可以从这些发展中得到好处。同时,在这块并不难管的殖民地上,人们尊重法律和秩序,对中央集权制政府采取了较为现代的态度。这些在后来的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

现代索马里民族主义的初露锋芒

就在同一时期内,另一个重要现象在意属索马里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就是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在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结束后,大量索马里士兵被遣散,他们在贝纳迪尔州的一些城镇,尤其是在摩加迪沙安顿了下来,这使得城市的发展获得了新动力。摩加迪沙是一个古老的港口城市,具有向世界各国开放的悠久传统。在 1930 至 1940 年期间,摩加迪沙的人口翻了一倍,此时居民已经达到了 6 万多人。同样的,虽然不允许工会组织的活动,但意索农业公司和其他公司雇佣了相当多的工人,这有助于促进新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的形成。在西方教育的推动

下，这种新态度在意属索马里的城镇和主要中心开始较为明显。

在这些中心，西方的影响极其深刻，传统的集体复仇或索偿制度此时已经没有内陆的游牧地区那么重要。这些中心的商人对于过去的地方狭隘主义产生了新的不满。由于上述情况，传统的索马里民族意识在经历意大利爱国热情之后，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了出来。索马里人长期受到压制，对外来统治者不满。所有的这些成为新思想出现的土壤。因此，在这个短命的"意属东非帝国"最后几年里，意属索马里已经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形成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这主要表现为一些小规模的秘密集会，主要由新一代受过教育的、为意大利政府所雇佣的索马里人组织。不过，这些活动也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当局立即采取行动，对被认为给意大利统治造成潜在威胁的活动进行镇压。与此类活动相关的雇员则被隔离开来，当局将他们派往边远地区任职，以便让他们不足为害。[22]

与此同时，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英国保护领地也同样出现了。虽然该地区的城市化没有多大的发展，但是通过亚丁和世界各个主要港口的规模不大的索马里海员，该地区与外部世界有着很多的直接联系。赛义德·穆罕默德争取自由的斗争成为榜样，这场斗争所留下来的永恒记忆，则在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在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最初的发起者似乎是那些在亚丁或苏丹受过教育后回国，并在政府中担任低级公务员的索马里人。这些人数量并不多，其中，哈吉·法拉赫·奥马尔(Haji Farah 'Omar)是最先鼓吹新思想和谋求改进全国同胞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之一。他以前是个政府雇员，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展开积极活动，在与英国保护领地当局出现矛盾后被流放到亚丁。在亚丁日益壮大的索马里侨民社会中，他参加了索马里伊斯兰协会的组建工作。哈吉·法拉赫及其合作者通过在亚丁报纸上发表文章，以及写信和写申诉书给伦敦英国政府，试图引起英国人关心索马里人的利益。因此，也就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在英国保护领地本身，少数本地商人出于与意属索马里商人相同的意愿，在 1933 年前后，开始在柏培拉、布尔和哈尔格萨等主要中心，

组建政治协会和俱乐部。这种初步试探性活动开始后不久,就出现了索马里民族协会(Somaliland National Society)。它的主要宗旨是提倡现代教育和各方面的进步,设法克服分裂索马里社会传统的具有地方狭隘主义的部落矛盾。后来,这些总的目标又被规划为一个更为详细的纲领,其中包括统一索马里民族和领土这个目标。这些愿望,特别是拥护西方教育这一点,明显地与过去决裂。该协会也不是反宗教组织,事实上,它的许多宗旨是从伊斯兰教教义中得到启示或以此为根据的。1937年,英属索马里还出现了另一个政治性较弱,但依然相当重要的组织,这就是索马里公务员联盟(Somali Officials Union),其主要宗旨为增进索马里人在担任公职方面的权益。这个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因为英国保护领地当局雇用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当文书而不是培训本地索马里人来担任这些职务,索马里人对这一政策相当不满。新的思潮在英属索马里第一次以组织实体体现出来,而在东非战役和英国军队重新占领英属索马里后,它们立刻又找到了可以更加引起人们广泛兴趣和关切的问题[23]。

最后,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意属索马里另一项独立但又与上述现象相关的发展。这出现在文化而非政治领域,但它在后来激起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就是1920年前后伊斯曼·优素福·克纳迪德('Isman Yusuf Kenadid)为索马里语发明了精练而准确的字母和文字。虽然阿拉伯文字长期以来就在有限的地区被用来作为书写索马里语的工具,但这两种语言的区别,使得这种做法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尽管谢赫·乌韦斯(Sheikh Uways)及其他早期的索马里文字改革先锋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阿拉伯文在书写索马里语言上依然是有缺陷的。伊斯曼发明新文字后,立即就以发明者的名字将这种文字命名为奥斯曼尼亚文('Osmaniya)。这种新文字有一套全新的字母,完全不依靠阿拉伯语的字母,从而克服了原有的不足。为民族语言创造的这种真正的本地文字,自然会激发索马里人的民族意识,但那些偏爱阿拉伯文的保守宗教领袖从一开始就持反对立场。由于新文字的创造者出身于米朱提因部落贵族家庭,所以它很快就在这个部落的部分聚居区,

以及这个部落分散在其他地方的成员中通用，但使用范围有限。后来的事态发展造成了这样的局面：索马里现代民族主义的领袖们都赞同使用这种精确的文字，并认为它是索马里人成就的象征。在索马里民族的所有遗产中，索马里语或许是最为宝贵的一笔。[24]

第六章 殖民地边界的恢复 (1940—1950)

索马里的统一：1940—1950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一个意外影响就是激发了索马里新的民族主义观念。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观念培育了民族主义者的这样一个目标，即要将索马里的几块领地统一起来。与此同时，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观念还提供了能够基本实现该目标的条件。1940 年 8 月，意大利人在非洲的争夺斗争中，夺取了英属索马里，并将这块领地并入到意属东非帝国中的索马里部分。然而，这是一个短命的成就，因为七个月之后，在东非战役和埃塞俄比亚解放运动期间，盟军就收复了英属索马里，并占领了意属索马里和欧加登地区。[1] 1942 年，法属索马里宣布支持戴高乐。因此，除了法属索马里这块领地外，索马里的各个地区自此在 10 年内都一直处在英国人的统治下。

意大利战败后，英国曾临时成立了占领区行政机构，后由 1942 年 1 月的英埃协定与军事协议而废止。为了协助盟军行动和应对吉布提(此时依然处在维希政权的统治下)的威胁，英埃协定规定，继续保存设在欧加登和豪德的英国军管当局。此时英国的一系列"保留区"和驻军区包括有豪德，还包括从德雷达瓦(Dire Dawa)到法属索马里边界的那

条重要的法埃铁路沿线。豪德此时由驻在埃塞俄比亚行政中心吉吉加的一位英国高级民政官员统治,两个权力机构的并存,常常使双方都感到为难。欧加登仍然像在意大利统治时期那样,被视为原意属索马里的一部分,由设在摩加迪沙的总部管理。尽管英属索马里也受这个统一的行政当局管辖,但有其自身独立的军事长官。

1945 年签订的英埃协议,将法埃铁路和英国在埃塞俄比亚的驻军区恢复到其战前状态[2]。在不妨碍埃塞俄比亚对欧加登和豪德地区的最终主权的情况下,允许英国继续保留在这两个地区的军管当局。在这些安排达成之后,东非之角此时呈现出对索马里领土重新瓜分的局面;在这场利益冲突中,有关方面才首次对索马里人的意见以及他们对其前途的愿望给予考虑,只是这种考虑显得有些迟了些。

在原意属索马里与欧加登地区的英国军事管理

在索马里,意大利人的投降比预期的更容易、更快,他们放弃的领土范围比英国当局打算接手的要大得多。因而,只有很少的一批民政官员到达索马里,处理由于战争而遗留的混乱局面。他们拥有极少的资源和配备,而且许多人之前从未有过在殖民地任职的经验。

各种民政秩序一旦恢复,新当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随着意大利各种准国家垄断企业崩溃而来的严重经济形势。谢贝利河和朱巴河两岸的大农场一片凋敝,许多意大利农民逃到城里;索马里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劳动力,而抢劫更导致了广泛的破坏。在这些大公司中,受影响最小的是在阿布鲁齐公爵村的意索农业公司,它仍然在生产,而且还拥有一支相当不错的劳动力队伍,这是因为那里的待遇和劳资关系都普遍比较好。相比之下,在格纳勒(Genale)的 136 个农场中,英国当局发现,只有六个农场还在进行有效的生产,而且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也只有 500 人来工作,而所需要的劳动力却是 8 000 个。后来,由于将大量空地赠给了当地的比马尔氏族,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善。朱巴河沿岸的情况就更糟了。

然而,当局改善旧政权下工人劳动条件之后,劳动力就逐渐够用

了。当局还鼓励种植园集中力量生产糖和粮食,以满足本地区人的需求,对意籍农场主发放贷款和供应拖拉机燃料,对索马里本地的耕种者,也给予奖励。所以,到 1943 年,原意属索马里地区基本粮食已经能够自给,尽管有时还会发生更严重的粮食短缺。当局还鼓励索马里人和阿拉伯人比之前更活跃地参加贸易和商业活动,过去由于歧视性法律的存在,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然而,尽管有了这些经济上的成就,这个地区仍然需要相当大量的政府援助,特别是用于救助那里的意大利居民。1941 年,这个地区的意大利居民有 8 000 人,主要是平民和前政府雇员及其家属。由于妇女和儿童被遣送回意大利,这个问题才逐渐地缓和下来。到 1943 年,留守原意属索马里的,仅仅只有大约 4 500 个意大利人,这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人仍然在接受救助[3]。

同样紧迫的问题是维护治安,以及在整个地区牢固树立新当局的权威。这个问题有两个主要方面需要考虑:既要在全体居民中维持法律和秩序,又要能处理帝国意大利侨民这个特殊问题。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原因在于,人员非常匮乏,新当局不得不依靠许多意籍官员为其效力,特别是要依靠那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官员。结果,尽管许多低级技术官员继续在英国军管当局效力,但是只留用那些没有法西斯倾向的、其行为又表明其不致危及安全的人,继续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其他人则被关押在战俘营中。

与此同时,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和全面的改革。意大利警察机关因"纪律败坏和不可靠"[4] 而被解散,由一支在英国军官统领下的、匆忙招募的索马里保安队完全替代。到 1943 年,这支新部队已经扩充到 3 070名索马里与非洲士兵(其中一部分是从坦噶尼喀招募来的)和 120 名英国军官。依靠这些力量,普遍收缴民间武器的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有效制止了亲意大利的一些非正规游击队的活动。为了增加这支保安队的效能并为未来做些准备,英国当局开办了一所警察学校,学校运行得非常顺利,训练索马里警士和警官,1949 年,他们当中有少数人已经被提升为警长。同时,法西斯统治时期极其糟糕的监狱状况也彻底得到了改变。

尽管英国当局彻底改编了中央警察的队伍,但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地接收了名为“果格勒”的农村部落保安队。另一方面,在战争期间崩溃的意大利州级行政机关全部被替换,所有的州和区都由英国的民政官员来管理。当局还逐步采取其他改革措施。旧的部落酋长和首领同过去一样领取政府津贴,出现空缺时一般不予补充,而是鼓励让部落议会承担与政府进行联络的任务,促进地方自治,并为整个地区实现自治作准备;同时还选举了部落议会的领导人。1946 年,建立了区和州一级的咨询委员会。英国当局鼓励这些新成立的咨询委员会讨论供水、全面改进放牧条件、农业改革、失业和粮食匮乏等突出问题。

教育领域也略有发展。英国军管当局接管意属索马里的时候,那里有 13 所国家补助的意大利教会学校,为索马里人和意大利人提供初等教育。到 1947 年,那个地区已经有了 19 所公立小学,尽管当时很难招募到合格的教学人员。此外,还有三所私立学校和一个训练阿拉伯人和索马里人的师资培养中心,师资培养中心平均每期招收 50 名学生。这样,虽然教育的水平仍旧很低而且教育的范围仍旧很窄,入学儿童(仍然几乎全部是男孩)数量却已经是战前的两倍。

过去的意大利政府只关注帝国的野心及其移民的需要,很少顾及要增进索马里人的利益;新政府则把大部分精力和活动用来增进索马里人的利益。如果要了解当时意属索马里的气氛以及英国官员和索马里人关系的性质,那就必须清楚:新统治者将自己看成解放者,他们要将索马里人从法西斯压迫下拯救出来,而索马里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确实,英国官员一般都受到了友好的接待,这更加促使英国当局把索马里人看成是反对意大利的盟友。而许多英国官员也不掩饰他们对索马里人的钦佩和对战败的意大利人的蔑视。因此,从一开始,新统治者和索马里公众之间就存在相当的同情的关系。在当时开明的舆论潮流下,这种关系就表现为一种相当强烈和十分明显的亲索马里政策。尽管新政府的人员很少,然而它并不缺乏精力和进取心,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新政府的许多官员缺乏以前的经验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用新鲜的和不带偏见的头脑来处

理这里的问题,从而更突出地表明了他们同旧时代的决裂,使新政府更有新气象。

因此,对于新统治者的善意的、总的说来是开明的干涉政治,索马里人普遍反映良好。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即使英国官员在处理公私事务中有时比他们的前任意大利人更为严格,他们的意图无疑是进步的。此外,英国当局严格执行法律,使用"集体惩罚"的办法来控制氏族和部落之间的冲突。这种做法虽然常常不得人心,却是有效的,而且很快就赢得了索马里人的尊重。英国法律的公正后来甚至还成为值得珍视的传统。最重要的是,意属索马里人击败了一度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前主人,这不仅使新的英国当局在索马里人心目中享有很大的威信,而且也使索马里人更加擅长与别的国家打交道。

从具体效果来看,英国军管当局在索马里的开明措施,虽然没有像后来在厄立特里亚那样广泛地提拔本地的官员,但仍然使一些索马里低级官员骨干和少数较高级的警官得到了训练。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种做法提供了一个虽然不够扎实、但很健全的基础,使索马里的文官制度在独立前的托管时期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当局对于当地政治运动的态度。新当局一旦站稳脚跟,就取消了意大利统治时期对当地政治团体的限制。在意大利侨民中,各种社团立即大量涌现出来了。它们反映了大城市的从极"右"到极"左"的各派观点。在法西斯倒台以后,基督教民主党的支部在当地意大利侨民中间吸收的党员最多。所有这些意大利社团都很自然地关心意属索马里未来地位问题。意大利各个党派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几乎是一致的,爱国主义显然比党派的学说更有力量。

这个问题和意大利各个社团活动的高涨,引起了很多索马里人的兴趣。在这种情势下,早在法西斯统治临近结束时就已经开始寻求表现机会的索马里进步思潮,随着一批索马里社团的建立,而有了具体的形式。在这些组织当中,第一个正式成立的、也是最重要的组织,是1943年5月13日在摩加迪沙成立的索马里青年俱乐部。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前,曾经就章程问题同英国当局的地方政治长官进行过长达几

个星期的讨论。这个俱乐部有13个创始人,他们代表了索马里所有的主要部落。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摩加迪沙的杰出宗教领袖阿卜杜勒卡迪尔·塞克哈韦·丁(Abdulqadir Sekhawe Din)和原意属索马里北部米朱提因族人亚辛·哈吉·伊斯曼·舍马克(Yasin Haji 'Isman Shirmarke)。另一个著名宗教领袖哈吉·穆罕默德·侯赛因(Haji Muhammad Husseyn)也来自摩加迪沙,他在青年俱乐部的早期也起过重要作用。

因此,从成立之初,这个新组织就把国内原有的各个部落以及宗教和世俗人员的代表都网罗进来,他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消除过去那种无谓的部落之间的冲突,建立新的国家观念。这是索马里伊斯兰教一直想要实现的两个目标。40年前,在赛义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的时代,伊斯兰教是能够清楚表达这个民族爱国主义情绪的唯一渠道。然而,这时,伊斯兰教的这两个宗教目标已经同现代的民族意识相融合,并且通过索马里青年俱乐部这个新组织表现出来的普遍进步的愿望而得到了强化。

索马里青年俱乐部的现代化的、进步的愿望,深得英国军管当局的同情。它很快就集聚了一大批追随者。官方称这个组织成员的行动是"模范的"。起初,受过教育的比较年轻的官员最愿意支持这个组织,很快它又在保安队中得到了支持。索马里青年俱乐部在保安队中受到欢迎的原因,无疑部分地是由于当时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些索马里人在这支部队中服役这一事实。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这支部队本身的性质,它吸收了索马里各部落的成员,采取了甚至最小的单位也实行混合编制的、精心考虑的政策,而且还努力灌输一种超越部落、民族对立的忠诚原则。由于上述情况,也由于达鲁德部落成员在索马里青年俱乐部和保安队这两个组织中都逐渐地成为多数,因此,保安队在这个阶段的索马里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无疑被认为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英国行政当局偏向于不让其公职人员参与政治活动的政府原则,它却听任索马里青年俱乐部吸收许多保安队军官和其他官员,原因在于这个新的组织是进步的、同政府合作的,而且也是反意大利的。而在其他

的状况下，英国当局很可能会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事实上，我们从下文将看到，肯尼亚就是这样的情况。

到1946年，据英国军管当局的官方估计，索马里青年俱乐部的成员已经不少于2.5万人[5]；到1947年底，它改名为索马里青年联盟，成为一个组织有力的政治机器，其支部遍及原意属索马里全境，欧加登、豪德和原英国保护领地，甚至肯尼亚。而它在肯尼亚的活动，行政环境非常不同，那里的行政机构对它明显不赞成。索马里青年联盟当时颁布了以下四项纲领：

"团结全体索马里人，特别是青年人，消除所有有害的陈旧偏见(例如部落、氏族差异)；通过学校和文化宣传队对青年进行现代文化的教育；运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各种手段，关心并协助消除当前或未来任何可能有损于索马里人民利益的局势；最后，还要发展索马里语言，并协助在索马里人中推行奥斯曼尼亚的索马里文字。"

任何一个讲道理的和进步的当局，对于这些目标，都不可能持不同意见。这个纲领中特别有意义的一点是，它对现代教育的现实态度，完全不同于宗教界反对西方教育的传统态度。索马里青年联盟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也不仅只是口头上的宣传。索马里青年联盟在当局的赞同下，主动兴办了一批英语学校和学习班。索马里的精确的奥斯曼尼亚文字这时也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古董，而是具备了明确的民族主义意义。但是，全面采用这种文字却有困难，其中有的是实际问题，有的是因为同阿拉伯文竞争的结果。这些困难比索马里青年联盟建立初期的政策声明中提出的其他一些目标更难实现。

索马里青年联盟虽然是最大的和组织得最好的运动，但并不是这一初始时期出现的唯一组织。除了一些主要代表局部地方和特殊利益的、昙花一现的小团体外，青年联盟最主要的对手是在创立时名叫爱国福利联盟(Jumiya)的组织。它主要代表索马里南部的拉汉文和迪吉尔部落，以及一部分河谷地区的班图人和某些阿拉伯侨民。这个组织得到了意大利的财政援助。它赞同比较保守的政策，特别维护南方农业部落的利益，使其不受北方游牧部落的控制，而后者绝大多数支持索马

里青年联盟。福利联盟明显地不如它的对手那样反对意大利。1947年3月25日,这个组织发展成为索马里"希兹比亚・迪吉尔-米利弗尔党"(Hizbia Digil-Mirifle),主席是阿布达拉赫・谢赫・穆罕默德(Abdallah Sheikh Muhammad)舍赫。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索马里各部分未来地位的猜测越来越多,政治活动的速度和关心政治的程度高涨了。这个问题只有连同所有前意大利殖民地如何处置这个复杂的问题一起才能解决。埃塞俄比亚早已迫切要求归还欧加登和各个保留地。1942年和1944年的英埃协定就已经承认了埃塞俄比亚对这些地区的主权。埃塞俄比亚甚至还要求获得前意属索马里的所有权,而意大利这时当然也强烈声称对这块领土的所有权。1946年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曾向最初负责处置前意大利殖民地的四大国提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建议：如果继续保持索马里各地区已经实现的联合,那对索马里人民是最有利的。他建议实行托管,如由英国托管则更好,但是,他并不将这一点看做是必要条件。不过,这一解决方案不幸遭到埃塞俄比亚的强烈反对,这出乎了索马里人的期望,但也没什么令人奇怪的。英国曾经答应支持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的要求,还更直接提出过以泽拉港和英国保护领地西北部的一部分地方,来交换受英国保护的氏族常去放牧的豪德和欧加登的一些地区。但是英国的这些建议也未能动摇埃塞俄比亚收回欧加登的决心。

英国人试图调整局势,但为时已晚。这表明了它对索马里牧民的利益有所关心,以及它已经认识到将一个游牧民族分割开会带来一些现实问题。甚至在英国军管当局的统一管制下,这些情况也是极其麻烦的,而且一直是引起冲突的根源。然而,这个观点对埃塞俄比亚并没有影响力。对于负责处理意大利殖民地问题的另外三个大国也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它们一般都怀疑英国的意图,而且只要涉及索马里问题,它们的更广泛的利益总是同贝文的建议背道而驰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必须大力鼓吹才有可能实现英国关于统一索马里的计划。事态发展的结果很快就清楚地表明,反对这个计划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克服这种反对所需要的努力和政治上的牺牲，对于在这个地区只有极其有限的战略利益的英国来说是不值得的。到 1946 年底，四大国仍然未就处理意大利前殖民地的整个复杂问题达成协议，它们决定派遣调查团到各有关国家（前意属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利比亚和昔兰尼加）了解它们各自对于前途的愿望。

1948 年 1 月 6 日，调查团到达了摩加迪沙。这个时候，由于意大利人极力争取建立一个亲意大利的阵线，以及过早地宣布了贝文的建议，当地的政治形势已经复杂化了。索马里青年联盟还是毫不妥协地反对把前意属索马里归还意大利的任何计划，而且它的追随者仍然远远超过其他政党。但是，在青年联盟以前拥有强大势力的米朱提尼亚人地区，青年联盟的队伍发生了分裂。意大利势力的渗透，使得这里出现了一个敌对的分裂集团，名叫“米朱提因进步联盟”。希兹比亚·迪吉尔-米利弗尔党的内部分裂更加严重；其他的索马里社团则联合组成了一个天主教联盟，名字就叫“大会”。意大利人用金钱在这个联盟中培植亲意大利的情绪。然而，尽管有意大利干涉势力的存在，这个由各种利益集团建立起来的组织，在当时的索马里政治现实中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尽管有人企图分化在索马里青年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米朱提因人，青年联盟当时已经得到达鲁德部落的大力支持，而历来反对达鲁德部落的各种势力则经常怀疑和敌视青年联盟。许多（虽然不是全体）哈维耶部落的索马里人就是采取这种态度。这个部落中一个以摩加迪沙为中心的重要民族就把意大利人当作他们的潜在盟友，帮助他们反对达鲁德部落对他们事务的进一步干涉和施加压力。同样的，拉汉文和迪吉尔部落的许多人，也继续接受意大利的支持，来扩大和保卫自己的利益，反对那些以放牧为生的北方人。

意大利人除了试图分化他们最强大的反对者索马里青年联盟，支持和鼓励敌对组织的发展之外，还直接和公开地开展要求把原意属索马里归还意大利的宣传运动。将近 1947 年末的时候，这些活动的规模达到惊人的程度。在意大利本国广播电台和报刊的支持下，索马里境内意大利人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且傲慢。此外，英国军管当局很难

公平而又坚决地对付意大利民族自尊心的这种表现。索马里的前途仍然悬而未决，索马里人的希望又因为贝文计划的讨论而得到不应有的鼓励。当时的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局仍然正式提醒意大利侨民注意，如果他们的强大运动继续下去，就可能发生危险。然而意大利人显然确信英国当局将会维护意大利的利益，甚至会不惜为此而不公正地压制索马里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意大利人要求把原意属索马里归还意大利的宣传鼓动差不多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当四大国调查团到达时，事情终于达到了悲剧的高潮。

调查团在摩加迪沙聚会的时候，意大利人立即举着国旗、喊着口号来迎接。英国行政长官警告调查团的委员们，如果继续允许举行类似的示威，那就很可能对公共秩序，特别是对意大利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但是调查团的回答是，他们愿意观察这种公众表现支持的行动，并要求准许索马里青年联盟在 1 月 11 日召开一次群众大会。英国当局同意了这个要求。索马里青年联盟在指定的那一天在摩加迪沙集合了它的大批支持者。同一天的早晨，意大利侨民及其支持者和追随者(其中有许多人是特地雇来的)事先没有发出通知或取得批准，就分乘好几辆载重卡车涌进城里。意大利方面有许多人带着弓箭和其他武器，决心要用这些武器中断索马里青年联盟的示威。紧张局势迅速激化，不久，双方就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意大利人开枪射击索马里青年联盟的支持者，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

这次轻率行动使意大利侨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死亡 51 人，受伤人数与死亡人数相同。索马里人方面的损失没有这样严重。当时还有许多地方发生抢劫，直到索马里保安队在皇家非洲来复枪队支持下采取了行动，才阻止了进一步的暴乱[6]。这次不幸事件发生以后，意大利人对英国军管当局进行了各种歇斯底里的指控，谴责它同索马里人暗中串通，没有尽力保护意大利人的生命财产。

就在这种郁积着愤恨的气氛中，四大国调查团在当时情况下采取了令人惊奇的冷漠态度。它们着手调查各个政党和集团的主张。意大利人当时希望利用他们的损失引起同情，获得好处。索马里青年联盟

的主要发言人是阿卜迪拉希·伊萨(Abdillahi Ise,后来成为意属索马里自治政府首任总理)[7]。联盟的主席哈吉·穆罕默德·侯赛因也在调查团的意见听取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索马里青年联盟还由萨洛勒先生(Mr Salole,原籍亚丁的索马里律师,当时在英国当局的法律部门任职)和迈克尔·马利安诺(Michael Mariano,前英属索马里的政府雇员)[8] 担任顾问,起草了一份关于今后国家发展的详尽而给人印象深刻的纲领。青年联盟和过去一样,强调它的目的是使索马里各个地区联合起来,成立单独的政府和坚定地实现完全独立。它提议索马里由四大国托管 10 年。它坚决不同意重建意大利的统治。

其他多数索马里团体在意大利资助下组成了一个名叫"索马里亚大会"的团体,它提出的纲领不如青年联盟的纲领完整。它建议前意属索马里由意大利托管 30 年,但必须对国家进行根本改革并在各个领域中进行建设。独立立宪党(H. D. M. S)之前也同意这种观点,这时它已同"大会"决裂,它赞成前意属索马里由四大国托管 30 年。调查团谨慎地听取了当地所有的意大利团体和利益集团的意见,而且对这些意见给予了超过这些团体的人数所应得的尊重。这些团体的意见当然是一致赞成将前意属索马里交还给意大利。

在研究了居民中相当广泛的一些阶层的意见之后,四大国调查团[9]按照一定的程序将它关于原意属索马里的调查报告提交四国外长会议,它如实地叙述道(尽管在听取意见过程中经常嘲笑索马里青年联盟的代表),青年联盟的纲领受到当地公众的最大支持。尽管公众明显地反对把原意属索马里归还意大利统治,但是当时,英国同法国和美国一样,却毫不迟疑地转过来支持由意大利托管;俄国过去也主张由意大利托管,这时却主张由四大国管理。由于四大国对前意属索马里和前意属其他殖民地不能达成协议,便将整个复杂问题转交给联合国大会去解决。英国政府在放弃了它原来主张索马里统一的建议之后,又进而否认索马里青年联盟有权代表大多数索马里人发言,企图以此来为它的新立场辩护。英国政府在下议院发表的这种言论,受到阿卜杜勒-拉希德·阿里·舍马克[10]的尖锐回击。舍马克当时担任索马里青年联盟

的书记,后来在索马里独立后担任过政府首脑。阿卜迪拉希·伊萨被派去向联合国的各国代表进行游说。亲意大利的"索马里亚大会"这时已经得不到公众的多少支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意大利驻摩加迪沙联络处的控制,它也派人到联合国促成意大利主张的通过。

1949 年,联合国在成功湖(Lake Success)召开大会,讨论处理前意属殖民地问题的时候,摆在它面前的有贝文-斯弗尔扎(Bevin-Sforza)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建议前意属索马里不定期地交由意大利托管[11]。这时摩加迪沙和索马里境内其他地方的群众继续举行反对意大利的示威。前意属索马里的命运当时显然仍旧悬而未决。索马里人的期望,像过去经常遭遇的那样,看来将由于外部原因而遭到破灭。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当时反对意大利的情绪虽然很强烈,但是联合国大会在 1949 年 11 月 21 日作出的在联合国监护下把原意属索马里交给意大利托管 10 年的决议,却被平静地接受了,悄无声响。从下文叙述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决议如此出乎意料地被和平地接受下来,并不仅仅是因为索马里人向不可避免的命运屈服,还必须考虑到以下的情况,即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明确规定,意大利应当正确地履行它的新职责;更重要的是,托管期限被限定为 10 年。

无论如何,主要通过索马里青年联盟表达的索马里民族主义立即得到了新的支持者。这种民族主义当时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法西斯统治时期的停滞不前和压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豪德和欧加登的处理

当意属索马里的大多数居民为摆脱意大利的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的时候,欧加登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反对把这个地区让渡给埃塞俄比亚。由索马里青年联盟传播的新愿望,很快在这个孤立和落后的地区得到了支持。早在 1942 年,由于埃塞俄比亚试图强征直接税,哈勒尔-吉吉加地区曾经发生过动乱。两年以后,欧加登各民族首领曾经向英国军管当局提出申诉,强烈要求英国不要将他们的领土交给埃塞俄比亚统治。

埃塞俄比亚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赢得索马里人的好感，以对付上述这些维护索马里独立的努力。埃塞俄比亚驻吉吉加的总督为了争取索马里人的好感而给索马里氏族长老和首领高于英国当局付给的薪金，这使英国当局感到难堪。各方对这些措施的反应很不一样。分成很多派别的盖达布尔西部落的正式领导人同时从英、埃双方领取薪水。他逐渐被埃塞俄比亚争取过去，领着盖达布尔西部落的许多人退出了索马里青年联盟。但是其他大多数人却成群地参加了索马里青年联盟。联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埃塞俄比亚人曾经企图取缔它，却为英国当局所阻止。鉴于这种直接攻击遭到失败，埃塞俄比亚政府便资助一些人建立了一个名叫"索马里互济会"(Somali Mutual Relief Association)的敌对组织。然而这个组织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还充分利用1946年哈勒尔公爵结婚的机会，邀请了欧加登地区各氏族的主要领导人作为官方的客人参加他的婚礼。

这些讨好做法的价值值得怀疑。但是，由于贝文计划能否实现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因此，在将近1946年年底时，欧加登的一些领导人为了保险起见，同埃塞俄比亚的吉吉加总督进行接触。这种局面对于亲身经历过意-埃竞争的欧加登各氏族来说，确实是太熟悉了。这些氏族在自己的前途未卜的情况下，自然要为各种可能出现的局势作准备。但是可以肯定，他们总的倾向是反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的[12]。这一点在1947年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当时除伊塞氏族外，欧加登和"保留地区"的所有氏族向英国当局递交了一份申诉书，反对把他们的领土割让给埃塞俄比亚，并且要求把他们的抗议转达给联合国大会。

前面已经说过，英国早些时候曾试图保留欧加登，作为贝文的索马里统一计划的一部分。但在贝文计划已成泡影之后，英国政府就认为，这时可以把欧加登让给埃塞俄比亚，以履行1942年和1944年的英埃协定。人们都知道索马里人强烈反对这样做，当地的英国官员自然也不愿意参加许多人认为是出卖索马里人利益的活动，但是英国还是采取了这一行动。当这个决定在吉吉加宣布时，发生了一次暴乱，导致25个索马里人死亡。然而，除了这次反抗行动外，欧加登居民作为一

个整体,在不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低头了。1948 年 9 月 23 日,英国顺利地把欧加登移交给了埃塞俄比亚,没有再发生任何事件。即将离开的英国人向欧加登部落分发了大约 9.1 万英镑,用以清偿英国统治期间所有悬而未决的抚恤和赔偿要求,不论英国支付这笔款项时是否有意要取得这个效果,这件事肯定有助于使这次移交出乎意料地和平完成[13]。埃塞俄比亚终于得到了它垂涎已久的欧加登,而且这时,它的地位同 1935 年意埃纠纷时已经大不相同,它已经能够在这个辽阔地区的全境建立它的统治了。马康南公爵曾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从哈勒尔和吉吉加派出贡赋征集队,为埃塞俄比亚提出对欧加登的主权要求提供了依据,这些贡赋征集队终于取得了成果。

根据同埃塞俄比亚签订的协定,英国仍然在豪德和欧加登的部分地区保留临时的民政管理机构,受英国保护领地当局指挥。这就是 1935 年英埃边界委员会确定的、英国保护下的索马里部落经常放牧的那些地区。这个规定当然根本不否认埃塞俄比亚对这些"保留地区"的主权,埃塞俄比亚对这些地方的主权,尽管归根到底是取决于含混不清的 1897 年英埃条约,而这个条约(不管最近人们对它作了什么解释)的原文小心翼翼地避免承认埃塞俄比亚对这些争议地区的主权[14]。

这样,埃塞俄比亚事实上在这些交易中获得了很大的实惠。它从意大利对它的征服这件事上,取得了相当大的利益。它得到了欧加登,这是它从来没有充分治理过的地方,而且在国际上只有 1897 年和 1908 年的意埃协定承认了它对这个地区的权利。它还明确无误地得到了豪德地区,尽管它并没有立即对这个地区行使充分的行政权,而它原来对豪德的领土要求,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是脆弱无力和充满争议的。作为法西斯侵略的受害者,埃塞俄比亚当然有权利得到较多的考虑和宽大的待遇。不幸的是,在满足埃塞俄比亚对过去事件的赔偿要求的过程中,大声抗议的索马里人被当成了牺牲品,索马里要求实现民族自决的集体愿望几乎刚刚明确表现出来,就被抛在一边。

英国保护领地的恢复

在放弃了贝文的"大索马里"计划和把欧加登让给埃塞俄比亚之后,下一个步骤显然就是使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恢复战前的状况。1948 年 11 月,这一愿望实现了。当时,前肯尼亚北方州州督杰拉尔德·里斯(Gerald Reece,后来被封为爵士)被任命为英国保护领地的总督,同时兼任豪德和"保留地区"的军事管制长官。

自从 1941 年收复了英国保护领地以后,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过去的那种看守和维持的旧政策终于被坚决地放弃,而代之以比较进步的政策。这种方针的完全改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1943 至 1948 年担任军事长官的杰拉尔德·费希尔爵士的努力。虽然英国保护领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比意属索马里更难对付,这里没有意大利人在前意属索马里所建立的那种殖民基础,战争动乱对当地索马里居民并不是没有影响。这种情况有利于扩大在战前已经开始出现的现代化倾向。这时对于世俗的进步和对社会变革的敌意显然已经减少了。

1941 年 4 月,英国回到英国保护领地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重新建立正常的贸易和商业活动,恢复法律和秩序。同在意属索马里一样,为了恢复秩序,就必须收回在战争中遗弃的大量枪支弹药。由于柏培拉和其他一些基地在作战时已经受到严重损坏,因此英国当局决定在哈尔格萨兴建新的政府总部,这个地方是马达尔(Maddar)族长信徒的聚居区,位于英国保护领地中部的内地。这个决定完全符合将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扩展到整个保护领地的新的推进政策。以柏培拉为基地、只管理沿海地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居民们善意地接待了重返的英国人。"骆驼保安队"带着意大利武器装备主动来报到服役,他们立即被派去解除内地部落的武装。到这一年年底,贸易和商业都恢复正常了,在全体居民中收缴枪械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也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到第二年年底,警察队伍全部改编完毕,它拥有 8 名英籍警官和督察,以及大约 800 名其他职位的索马里人,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

到 1945 年,在新设立的"殖民地发展和福利"赠款计划的援助下,

当局开始执行一个协调一致的开发计划。在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兼行政官员亨特的指导下,从 1943 年开始对这个地区的各项资源和潜力进行普查,其中包括研究牧场和水源的需要。公共卫生事业扩展了,1945 年开办了一所训练索马里护士的学校。对于长时间不能解决的世俗教育问题,也着手加以解决。1942 年,在哈尔格萨、柏培拉和布尔奥开办了三所小学。两年后,广播和电影配合在一起,发动了一次争取人们支持进一步发展教育的运动。这次运动的反映良好。到 1945 年就有了七所小学,入学儿童超过 400 个男孩。另外,还对 19 所教授阿拉伯文和算术的私立可兰经学校给予补助。到 1950 年,已经有了两所中学,并制订了开展中等教育的计划。同一时期,明显扩展了农业服务范围,进行了新作物和肥料试验,实行了管理放牧的计划,并且建立了若干实验性的小型椰枣种植园。

也许有人认为,成功地采纳了这些新的措施,特别是世俗教育措施,就意味着所有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抗已经被克服了。但是,事情远远不是这样的。敌对的逆流仍然存在。1944 至 1945 年间发生的一次严重蝗灾,促使这股逆流迸发出来。为了消灭蝗虫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使用毒饵,这就引起了怀疑。某些人在居民中把这说成是政府蓄意杀害索马里的骆驼和牲口的阴谋。1945 年,这个问题在布尔奥引起了一次严重的暴乱,在埃里加博也发生了同样的麻烦。虽然当局没费多大力气就恢复了秩序,但是这种情况表明,当局有必要大大改善同公众的关系并加紧行政控制。当时,行政机构事实上是十分不够的。一共有六个区,但是只有五个区专员,而且其中只有一人会讲索马里语。英国保护领地的行政管理仍然很松弛,这一点非常清楚。

同过去一样,管理体系是通过区专员及领取政府津贴的“阿基勒”来运转的,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受权主持下级法院,但不得受理刑事案件。按照伊斯兰教律,受理私人案件的穆斯林地方法院继续进行工作,它们由主持哈尔格萨上诉法院的首席穆斯林法官领导。“阿基勒”法院从来没有做好工作,它们更适合于有等级制传统的社会,而不适合于索马里社会的特点。在 1945 年,这种法院逐渐地被放弃,新的附属法院

制度建立。这些附属法院由一个法官和若干陪审推事组成,他们不仅精通习惯法,而且还受过足够的教育,能够用英文或阿拉伯文把诉讼程序记录下来。这种更加灵活的安排,更符合索马里惯用的诉讼程序。在主要城镇中,建立了新的城镇参议会,逐渐实行地方分权,同时还建立了城镇规划委员会。

这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试验是建立了"保护领地咨询委员会",它在 1946 年 7 月举行了第一次有总督出席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来自各区各界,各种新旧组织都有代表。第一次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会议议程包括以下项目:农业发展问题,城镇贫困和少年犯罪问题(这在当时是很紧迫的),扩充附属法院的计划,开办更多的农村施药所,牧场管理,以及豪德和"保留地区"的放牧活动这个有较大争议的问题。最后一项议题关系到英国保护领地的伊萨克部落和杜尔巴汉特氏族同欧加登地区的氏族在放牧问题上的冲突。在欧加登和豪德割让给埃塞俄比亚管理之后,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解决了。

在采取这些进步措施的同时,人们对政治的兴趣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而对英国保护领地和整个索马里今后地位的日益增长的关心,又进一步提高了这种政治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爆发前不久出现的索马里民族协会,同另一个地方性协会联合组成了索马里民族联盟。虽然当时的官方档案说,这个组织比索马里青年联盟保守,但是这个团体在争取索马里统一、主张发展教育与消除部落狭隘性的问题上,同索马里青年联盟抱有共同的目标。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基础比较狭隘的伊萨克部落协会,它所关心的几乎完全是本部落的需要和利益。它特别积极地在肯尼亚促进本部落的利益。在英国保护领地的大多数伊萨克人或者通过这个协会,或者是独立于它,支持索马里民族联盟。

1947 年,索马里青年联盟进入英国保护领地,它的追随者逐渐发展,这给局势带来了一个决不受地方当局欢迎的新因素[15]。索马里青年联盟一般说来是代表索马里所有部落的,但是在英国保护领地占优势的伊萨克居民却认为它带有强烈的达鲁德色彩。因此青年联盟对于东部的杜尔巴汉特和瓦尔桑格里氏族,比对于中部的伊萨克部落,更有

直接的吸引力。不过,1947 年在哈尔格萨发生的严重动乱,虽则同索马里民族联盟和索马里青年联盟进行合并的建议有关系,却显然并不是由于伊萨克部落和达鲁德部落的传统敌对引起的。事实上,这些动乱之所以发生,看来是由于伊萨克部落内部的分裂造成:一派赞成这种新的合并,比较保守的另一派则支持伊萨克部落协会。在这两个派别当中,有一派主要是哈巴尔·尤尼斯氏族的成员,他们不久前刚刚丧失了其传统地位,不再是政府雇员的主要来源。这个氏族从英国一开始统治这个地区就取得了这种有利有势的垄断地位。由于新政府实行按照各个部落人数的比例雇用索马里人员的政策,这就使哈巴尔·尤尼斯氏族很快失去了这种垄断地位。这个政策得到其他氏族的拥护,却不能使哈巴尔·尤尼斯氏族高兴,而是使他们相当痛苦。

然而,混乱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在把欧加登割给埃塞俄比亚,宣布了意属索马里未来的地位,以及在英国保护领地恢复了民政机关之后,已经没有能引起公众关心的重要的和紧迫的问题了。对于新政治团体的兴趣暂时减弱下来。当时还存在的政治兴趣的主要内容,看来就是同政府当局合作,来逐步发展这个国家。到了 1950 年,公众和政府之间看来确实出现了新的合作精神,英国保护领地似乎可以顺利地走上逐渐演变和发展的道路。为了适应这种事态发展,政府采取了第一批决定性步骤,以最后实现民政机构的索马里化。几名警官升到了督察的官阶,一个索马里人被任命为督学,两个索马里官员领取殖民地奖学金前往伦敦留学。这虽是一个微小的开端,然而毕竟也是一个开端。

1949 年末的总形势

在索马里的各个地区中,只有法属索马里[16],以及那里互相敌对的索马里人和达纳基尔人,没有遭遇到更换政府的大变化;而且,总体上它一直置身于整个索马里地区十年来重大事件的浪潮之外。在某一点上说,这种孤立和隔离状态,是同这个地区的伊塞族索马里人的地方主义以及同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感情是相一致的,当时伊塞部落的多数人一定是怀有这种感情的。这种局面同法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是相

适应的。虽然吉布提港在 1926 至 1939 年之间有了很大的发展，1936 年，制盐工厂的生产达到最高峰，从而使法属索马里成为索马里各个地区中收益最大的地方，但是这里却很少有努力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1939 年设立的一个兽医站，确实使牧民得到一些好处，建立了最起码的卫生事业，1950 年，已经有 8 所学校，共 720 个学生。然而，除了已经迅速发展到拥有 2 万居民的吉布提港的城市化人口以外，内地的传统游牧生活实际上还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法属索马里的区长不是法国的军官，就是法国的文官，除此之外，那里的行政制度同英国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相似。法属索马里迄今继续由外国人独占文官职位，还未试图建立现代化的地方政府，也没有训练任何索马里人担任负责的文官。虽然吉布提工人已经有了工会，而且索马里青年联盟和索马里民族联盟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一些支持者，但是这个地区仍然没有在当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党。同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的情况相对照，这个地区甚至不鼓励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活动。

然而，1945 年，这里建立了一个拥有法定权力的地方性“代表参议会”。在这个机构中，当地法国居民的代表占一半，索马里人、达纳基尔人、阿拉伯人合在一起占一半。一部分议员由选举产生，一部分由法属索马里总督任命。这个参议会除了负责本地区外，还派一名代表参加法国的参议院，一名代表参加法国联邦议会。经由法属索马里土著居民和法籍居民的联合选举直接产生的一名议员，作为代表参加法国国民议会。

同在其他法属领地一样，法属索马里的政治活动也是面向整个法国的。这深刻影响了各个政党后来的发展，使法属索马里的政治运动同索马里其他部分的政治运动隔绝。这样，法国政策的大致结果使法属索马里脱离了索马里其他地区的前进道路。英法在“非洲之角”长期敌对的老传统仍然非常明显地继续存在，它表现在法国不信任英国原先提出的索马里统一计划。即使在贝文计划已经被正式放弃之后，法国对英国动机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也没有减少。另外，法国官方人士仍

然普遍认为,英国仍旧希望在其支持下建立一个对英国友好的、由索马里政府统治的"大索马里"[17],而使埃塞俄比亚受到损害。埃塞俄比亚方面也散布这种说法,因而使这个观点得以流行。后来的结果并没有完全证实这种关于英国在东北非的意图的解释。

因此,法国虽然已经在1950年承认法属索马里某种程度的代议制政府,而且这个政府比那时的英属索马里和前意属索马里所得到的还多一些,但是后两个地区所经历的政治觉醒,却比法属索马里更为深刻,其影响更为深远。此外,英属索马里,特别是原意属索马里,这时已经明确地开始走上通向独立发展和进步的道路。对于索马里民族愿望来说,不幸的是,一度曾经存在过的把原英属和意属索马里同豪德和欧加登两个地区合并起来,并在单一的统治体系下为建立自治的国家作准备这样一个唯一的机会已经不可挽回地丧失了。因此,到那时,索马里民族主义活动就被迫将大部分精力用在英属索马里和原意属索马里的地方性问题上;而在其他地方,索马里民族主义活动遭到了镇压,并且被迫处于秘密状态。

因此,从索马里人的观点看来,同已经激起的期望相比较,他们在英国的军事统治时期实际得到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由于对贝文提议的失败感到痛心,索马里人对于这段时期取得的进步也不那么感激了。这是英国政策多变的又一个例子,它使那些不清楚在处理前意大利殖民地谈判中所包括的全部问题的人,以及那些了解情况的人都感到非常不解。19世纪索马里被瓜分所造成的分裂,绝没有为准备自治提供合理的民族基础。而且,这种分裂状态现在比过去更加牢固地固定下来,被埃塞俄比亚分走的那一部分,情况尤其如此。这必然会给索马里民族主义者的努力增加障碍,反而会巩固殖民时期的分裂局面,这种分裂局面在今后还会带来挫折与摩擦。

尽管如此,历史悠久的索马里文化民族主义,最终还是在政治上找到了强有力的、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尽管索马里继续被分割开来,而且内部继续存在部落之间的敌对关系和派别活动,但是索马里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将使它日益进步的动力。这种新的政治发展,还

为索马里人施展传统的政治才能开辟了新的空间。而且可以肯定,没有几个新兴国家可以自夸拥有比民主的游牧社会制度更富有活力和更苛严的政治传统。在这种民主的游牧社会制度下,任何人要想在艰难且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和取得成功,他就必须是一个政治家,而且必须充分运用其所有政治才能。



第七章　从托管到独立(1950—1960)

索马里亚实行代议制政府

关于意大利在它的前殖民地中的新地位,委托意大利管理原意属索马里的联合国托管协定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个协定要求意大利托管当局“扶植自由政治制度的发展,促进这个地区的人民走向独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在托管当局的善意指导下,让索马里人更多地承担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的责任。1950 年 12 月 2 日,这个协定由联合国大会批准,它还有一个作为附件的组织原则宣言,用于保证索马里人的权利和保证托管当局完全履行托管义务。为了使索马里人更加放心,这个协定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驻在摩加迪沙,以便直接联络意大利当局及其被监护人。这个组织,由各联合国成员政府的代表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和人数不多的秘书处组成。这个委员会可以对索马里各个领域的发展进程提出建议和报告。它成为联合国对索马里承担责任、关心索马里的具体证明。联合国还定期派出访问团,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联合国的参与所带来的影响。这些访问团与咨询委员会一样,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报告[1]。

这些措施使得意大利没有空间玩弄权术或逃避责任,再加上托管时间限制为 10 年,这有助于减轻索马里人的恐惧。但是,新政权开始

的几年，双方仍然互相仇视和猜疑。因为对 1948 年的动乱记忆犹新，又意识到他们不会受到很热情的欢迎，重新回来的意大利当局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要确保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以便在索马里人的仇恨发展为暴力行动时能够保护自己。而对于索马里人来说，这次交接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军事占领的性质，因为大批军队被派来支持新政权的建立。意大利人为了重新确立自身的权威而经常(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借助高压手段，这让局势更加得不到缓和。一些在英国行政机构中担任过职位的索马里青年联盟的杰出成员被降级、解雇，还有几个甚至被监禁。同样的措施也用于索马里青年联盟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被认定为反意大利的危险人物。意大利还坚决贬低索马里青年联盟的力量和声望。诸如此类的专横行动，引起了索马里青年联盟的示威游行，有几次还发展成为暴动，遭到了当局的严厉镇压。

但是，这种不幸的民族之间的仇恨，并没有把索马里青年联盟的全部成员都卷进去，也没有妨碍某些成员不声不响地同意大利人合作来实现新的进步的发展计划。在托管的头两年中，索马里青年联盟和当局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一些旨在促进索马里发展的措施并没能产生什么直接效果。但是，在这段混乱时期中，还是建立了发展的牢固基础。这一点在教育领域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表现得都更加明显。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合作，1952 年出台的五年发展计划，落实了一个有雄心、有创造力的普及教育规划。提供免费教育的新的国立学校代替了意大利人过去依赖的教会学校。到 1957 年，约有 3.1 万名儿童和成年人上小学，246 人上初中，336 人上技术学校，还有几百个人上了高等院校。这比 1950 年的情况有了显著的进步。1950 年，受教育的学生人数不超过 2 000。这也证明了公众(老年人和青年都一样)，特别是城镇居民愿意接受西方教育的一种新的普遍情绪。

为了给边远地区的成年牧民提供基础教育，意大利当局也做了一些切实的努力，不过成效不大[2]。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优先受到考虑。意大利当局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主动性和勇气。1950 年，在摩加迪沙开办了一所政治和行政管理学校，作为培养索马里官员和政治领袖的培

训中心。意大利当局后来的一些立法，也同样把新兴国家最急需的这两种技能结合在一起。这些立法同英国的传统明显不同，它们鼓励公务员竞选议员，而且事先明确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竞选失败，还可以毫无障碍地恢复其原有的行政职位。到 1957 年，这所政治学校已经培养了一支由受过行政管理基本训练的官员组成的中坚力量。后来，重点又转向训练其他领域需要的合格技术人员。这所学校改为技术和商业学院。同时，在 1954 年，还创办了法律和经济高等学院(后来成为索马里大学的下属学院)，开设了两年罗马大学的学历课程。

意大利当局除了在当地采取了这些措施外，还慷慨地提供到海外留学的奖学金。留学生主要去意大利，埃及的援助计划也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奖学金名额[3]。这些发展大大消除了索马里人对意大利的意图存在的怀疑。意大利当局逐步让索马里人担任政府各部门的高级文官，对于消除这种怀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进展是很快的，到 1956 年，所有区和州都已经由索马里行政官员直接负责。如果希望这些新的索马里官员在全部行政管理工作中都像他们的前任那样胜任，那是不现实的，在诸如记录档案和文字工作方面，他们肯定是不足的。但是，他们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中，特别是在区一级的行政工作中，显示了很高的才能。

在教育方面，意大利托管当局基本上是在刚离开的英国前任所作的努力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而经济方面，其基础是直接从法西斯统治时期继承下来的。但不幸的是，就成就而言，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很难赶上其他领域。1950 至 1955 年间，意大利每年提供 300 多万英镑补助，托管当局的大部分钱款，都用于营建和修缮，以及用于改善道路、电讯以及其他同教育、政府与卫生有关的公共工程。1954 年，意大利托管当局开始执行全面开发索马里资源的七年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托管当局、美国国际合作署代表团和联合国机构的研究结果而制订的[4]。这个计划规定的全部开支约为 400 万英镑，一半以上用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在农业方面，这个计划强调扩展和加强谢贝利河中下游的水利灌溉系统，在朱巴河中游修建分洪区，以及在这两条河之间的旱

田区修建蓄水池。计划还要求开垦更多的土地,修建公用粮仓,开办实验农场,以及采用现代农具。一项更彻底的革新是开办了一家农业银行:索马里信贷银行,由它向农场主提供发展农业的贷款和信贷。对于牧民,这个计划提出要广泛地凿井和建设蓄水池。过去意大利当局的农业建设仅局限于意大利移民经营的种植园地区,这时农业银行全部重点却是如何发挥土著经济的潜力。同时,还拨出了相当多的贷款改善公路交通状况,为香蕉和水果的出口贸易提供便捷。

很明显,即使在托管时期结束后的许多年内,这些改进措施的全部效果都不会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初期,它们的成就仍然是令人鼓舞的。在谷物和棉花生产上尤其是这样。棉花的出口早在1952年就达到历史最高额度,尽管在以后的年代里变化不定;而谷物的增长率比较稳定,到1957年,粮食充足,并有盈余用于出口。在同一时期内,意大利的公司在种植园农业和工业上的投资几乎达到300万英镑。到1956年,主要的意大利公司——意索农业公司生产的蔗糖除足够供应原意属索马里本身的需要外,还能出口一部分。香蕉业仍然是出口物资的主要部门。香蕉业过去一直是意大利的国家垄断企业,而在英国军事统治时期已经衰落。在意大利重新托管之后,香蕉业得到恢复,而且仍然实行国家垄断,由“香蕉专卖处”(Asjenda Monopolio Banane)经营。到1955年,尽管香蕉出口有关税限制的障碍,以致一些经济学家[5]认为这种买卖不合算,但每年的香蕉出口量还是超过5万吨,差不多是1937年的五倍。这项垄断贸易当时占有决定性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出口香蕉可以直接获得收入,而且还因为它是意大利间接向原意属索马里提供赠款的一个主要来源。意大利对香蕉贸易的国家管制,不仅可以保证索马里生产的香蕉在意大利有稳定的和不受竞争影响的市场(从长远看来,却有可能妨碍它以后的发展),同时还能以不受竞争影响的高价出售给意大利批发商。意大利当局从这项贸易中取得的利润,是向原意属索马里提供赠款的一个来源。这样一种安排,虽然最终可能影响原意属索马里地区香蕉出口业的发展,但是它却能暂时满足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的需求。

依靠这些发展,原意属索马里大大扩展了国内和国外的市场。然而整体说来,这里仍然贫困不堪,在严重的赤字中艰难度日。一方面,本地当局收入从 1950 年的略多于 100 万英镑增加到 1956 年的 200 万英镑,但仍然像过去一样主要来自进出口税收,而很少来自直接税。另一方面,支出虽然从第一年的 700 万英镑减少到五年以后的 500 万英镑,但仍然大大超过收入。直到 1956 年,国际收支还是相当严重地、一贯地出现逆差。当时的整个经济情况使得在 1957 年访问这个地区的世界银行代表团得出结论说,索马里甚至在独立后 20 年内,还必须有额外的财政援助。尽管后来在财政方面有所改善,使这种评价显得可能过于悲观,但前景确实明显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到 1957 年,如果说要确定利用已有资源在经济上能取得什么成就还为时过早,那么,当时关于政治领域的未来结果如何,是没有什么悬疑了。前意属索马里不同于其他许多发展中的非洲地区。它的政治发展的进程,同索马里官员接替政府和警察机构中外国官员的步骤是一致的。于是,在行政管理和政治领域中,都以同样的步伐顺利地、有秩序地交接权力。新的教育措施虽说没有立即培养出大学毕业的干部,但它至少让普通教育得到了发展。这一成就极大地促进了行政管理和政治领域里的进步,进而为实现完全自治创造条件。在政治上,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在 1950 年成立了一个协商性的全地区"领地议会"(英国军管时期已为此打下了基础)。这不只是一个装饰门面的或徒有虚名的组织,而是一个活泼的论坛,托管当局把政府法律和条令草案都呈送给它审查和讨论。1950 至 1955 年间,将近有 100 件涉及许多方面问题的条例,曾经提交它审议。这个机构由传统的和现代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党)的大约 35 名代表组成。它的成分虽然同英国保护领地的咨询委员会相似,但是它比后者更加名副其实地是一个萌芽状态的立法机构。在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下,"领地议会"又进一步采取了一些措施,设立一些立法委员会和立法办公室,从而为进一步更全面地移交政治权力铺平道路。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职责通过两种形式的地方政府机构而逐步

移交，一种是农村地区的区议会，另一种是城镇和大都市的市议会。这些机构是直接以英国军管时期已经建立的机构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1955 年，经由选举产生区议会成员，但是区议会往往不如市议会那么有效，它们基本上仍然是协商性质的机构，是通过区级官员直接进行管理的制度的有益补充。市议会不像区议会那样受到游牧生活条件的直接影响。它们的发展很顺利，市议员们明显地表现出承担更多责任的欲望和才能。到 1956 年，已经建立了 48 个市议会，它们在财政上和政治上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托管当局派遣一些受过市政管理训练的人员担任市议会的秘书，这个政策有助于市议会的迅速发展。议员最初由当局提名。1954 年，举行了第一次市议会选举，提出候选人的政党多达 16 个。百分之七十五的男性选民参加了投票(当时只有男人有选举权)，由选举产生的 281 个席位，半数以上被索马里青年联盟取得。

1956 年，正当索马里人接替意大利人担任所有的高级行政管理职位时，"领地议会"又改成立法议会，使上述的各种发展达到一个顶峰。立法议会有 70 个席位，其中 10 个席位留给各个少数民族：意大利和阿拉伯侨民各分得 4 席，印度和巴基斯坦侨民各分得 1 席。新的立法议会在国内事务上拥有充分的法定权力，但是意大利托管当局的长官继续保有绝对的否决权。一开始，为选举后任命的索马里内阁部长都安排了意大利顾问，法律草案在送交议会之前，必须经意大利当局批准。候选人必须懂得阿拉伯文或意大利文，这个规定表明当时教育普及的程度。正如所预期的那样，新立法议会在组成上比旧的"领地议会"具有大得多的代表性，能够更加广泛地代表现代派的意见。

选举权仍限于男人，在城市选区和农村选区采用了不同的投票程序。在城市，选民必须在市政府的选民名单上登记，投票是不记名的。在内地，由于游牧的生活条件，这种选举程序很难实行，而且不可靠，投票是通过传统的部落和氏族大会进行的。在这些大会上实行集体投票，由记录员记下票数。这种投票方式留下了舞弊的空间。因此，有时记录下的总票数多于这一地区可能的居民人数，也并不稀奇。尽管居

民人数究竟是多少,也不是很清楚。

不论有什么样的缺点阻碍着农村地区的选举进程,全体居民仍然以非同寻常的充沛热情抓住了在政治上表达自己意志的第一个机会。在索马里人分配到的60个席位中,索马里青年联盟获得43席,独立立宪党获得13席,名叫"索马里民主党"[6]的一个小党获得3席,而名为"马里汉联盟"(Marehan Union)的一个地道的部落组织获得1席。在以前的市议会选举中,同索马里青年联盟竞选的政党有15个,这次减少到5个,这主要是因为人数最少和基础最薄弱的那些党实行了合并。索马里青年联盟的地位明显地得到了巩固,托管当局就要求它组织政府,由阿卜迪拉希·伊萨担任了第一任总理。截至那时,意大利当局和索马里青年联盟之间以前的对立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双方已经形成了友好合作的基础。1955年,受人尊敬的开明人士恩里科·昂齐洛蒂(Enrico Anzilotti)博士担任行政长官以后,这种合作又进一步加强了。从此以后,意大利当局就将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群局限于索马里青年联盟内部那些被它认为是最"温和"的、赞成继续同意大利保持联系的成员。

据估计,在1956年的选举中,索马里青年联盟在全国各部落都拥有成员。他们在各个主要部落的分布情况如下:达鲁德部落百分之五十,哈维耶部落百分之三十,迪吉尔-米利弗尔部落百分之十,其他部落百分之十。当英国退出原意属索马里的时候,索马里青年联盟领导集团中的主要裂痕(意大利人曾经企图加以利用)是支持它的达鲁德人内部的对立。虽然当时索马里青年联盟仍然没得到达鲁德部落的绝对支持,但是,它在这个主要部落中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然而,哈维耶(Hawiye)部落的成员在对待这个党的态度上存有分歧。由于青年联盟领导机构中的达鲁德人和哈维耶人之间存在着分歧,1956年选举前出现过一个起先定名为"哈维耶青年联盟"的组织,它希望取得哈维耶部落的支持。索马里青年联盟内部的这些分歧及时消除了,因而它在选举时的阵线是统一的(哈维耶青年联盟在选举中没有获得席位)。但从阿卜迪拉希·伊萨政府的组成,可以明显地看出,该党在修补这种分

裂时所遇到的困难。除了总理外,在剩下的五个部长职位中,两个分配给哈维耶部落的政客,两个给达鲁德部落,另外一个给迪尔部落。部长职位的这种分配办法似乎迎合了一时之需,但后来却产生了不利的效果,造成达鲁德部落分裂集团的出现。

可以肯定,没有别的政党能够夸耀它和索马里青年联盟一样在全国各地得到支持。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索马里青年联盟越是有效地扩大它的基础,它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功就越大,而它内部的分歧也越深。在索马里的政治现实中,任何在全国各地得到强大支持的政党,从实质上说只能是各种对立的部落势力的临时结合。索马里青年联盟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仍然是南部的迪吉尔部落和拉汉文部落。这些部落还是坚决地追随地方性政党——独立立宪党。这个党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竞选,然而在它自己的上朱巴州和下朱巴州选区中,它获得了13席,因而成为议会中的主要反对党。独立立宪党和索马里青年联盟所代表的这个民族的两部分之间的传统敌意,以及它们早先对待意大利的不同态度,仍然影响着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独立立宪党曾经指责索马里青年联盟政府歧视支持独立立宪党的文官。从1956年独立立宪党的著名议员乌斯塔德・伊斯曼・穆罕默德・侯赛因(Ustad Isman Muhammad Husseyn)不明真相地被暗杀的事件,可以对两党间仇恨之深有一些了解。后来,独立立宪党的议员争取到以他们的"烈士"的名字命名摩加迪沙靠近主要清真寺的一条街道。虽然独立立宪党在1956年还可以算得上是一支力量,但是它在全国范围内缺乏影响力,因此,在一个正在迅速走向独立的民族中,在那种充满民族主义热情的政治气氛中,它很难有获胜的前景[7]。

英国保护领地和豪德

在原意属索马里,由于托管期限规定为10年,那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在英属索马里,那里没有规定独立的日期,甚至几乎没有人提出独立的问题,因此发展的进程缓慢得多。这种情况,同英国社会上流行的一般看法是一致的。这种看法认为,如果用缓慢和稳健的步

伐行动,发展可能更有成效。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循序渐进的做法很适合于英国保护领地那种特别难于处理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然而,事态发展的结果却使英属索马里的殖民统治在极其仓促中结束,如果在早些时候加快步伐,也许可以部分地避免这种命运。此外;在这两个邻接地区独立和合并之前,英意当局之间没有多少官方的接触和合作,这确实是一件糟糕的事。而且应当补充说明,这不仅仅是事后诸葛;早在1956年和1957年,局势发展的大致趋势已经变得相当清楚,但是双方却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进行有益合作的机会。

1948年,英属索马里刚恢复民政管理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最显著的进步也许是在教育领域,虽则这里普及教育的面远远小于原意属索马里。保护领地当局把战争年代取得成功的试验作为基础,逐渐增加了教育设施。1952年,在哈尔格萨开办了一所贸易学校,在西部的种植业中心博拉马则开办了一所职业教育训练中心。一年以后,在布尔奥开办了第一所政府办的女子学校,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革新。尽管有人继续反对一般的世俗教育,特别是反对女子教育,这所女校还是受到普遍的欢迎。对这所女校的好感通过非常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许多人迫切地向女生的家长要求娶他们的女儿,并且答应出极高的聘礼。同一年,英国保护领地的第一所男子中学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使学生可以在国内参加毕业会考而不必到国外去。由于公众对这些新尝试日益关心和支持,1954年,成立了常设教育委员会,而且还在同年任命了保护领地的第一个索马里教育长官。这时,原意属索马里的副教育长官是意大利人训练的索马里人,他的资历和经验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英国保护领地的索马里教育长官。

在其他领域,值得报道的情况比较少。保护领地的皮革出口有所增加,但是没有发现可以发展经济的新产品。农业和兽医工作有所发展,在这方面最显著的成就也许就是在保护领地南部边境一带挖掘了一连串非常急需的蓄水池[8]。1953年,在布尔奥附近开始对有可能用于灌溉的季节性河流进行水文勘察。同时也加强了地质勘探,寻找可供开采的矿藏。

直到1955年,政治领域中的进步基本上限于地方政府层面。1950年制定的“地方当局法令”授权总督任命一些经过挑选的“阿基勒”(即领薪水的氏族头人,他们是区专员和各部落人民之间的联系人)担任地方官。这种任命给予这些氏族代表以某种有限的司法权,同时在理论上加强了他们的传统权威,使他们拥有的权力超过氏族长老通常享有的权力。因此,这个新计划在开始时受到广大公众的反对。到50年代中期,人们弄清楚了这一情况:可以接受这种职位而不使用法令授予这种职位的权力。于是,这种新的措施就被普遍地接受了。实际上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变化,只不过是改变了部落头人的头衔。然而,每月不超过十五英镑的微薄薪金和头衔,却吸引着许多争夺这种职位的人。“地方官”的地位很快地被认为是部落独立的同义语[9]。同一时期,建立了镇议会和区议会,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反对。到1954年,选举出来的代表已经在英国保护领地的柏培拉和哈尔格萨两个市议会任职,它们在财政上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全国性的表达公众舆论的唯一机构仍然是咨询委员会。它通常每年开会两次,讨论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包括取消或削减集体对血案赔偿的责任这个困难问题。这个问题的根子在于索马里的部落制度,它因为1951至1957年间杜尔巴汉特和哈巴尔·托尔·贾洛氏族之间的剧烈争斗而显得突出,并且成为所有具有民族意识的索马里人日益关心的问题。

在意大利人刚回到原意属索马里的那几年里,英国保护领地政党的活动暂时减少了。索马里民族联盟和索马里青年联盟在保护领地各地区的分支机构每周继续举行定期的集会,但是因为没有引人注意的紧迫问题,公众的兴趣减弱了。1954年底发生的一次事件改变了整个政治生活的进程,并且最终导致英国保护领地走向完全独立。这个事件就是英国最后撤销在豪德和“保留地区”的行政机构,并且把这些重要的放牧地全部交给埃塞俄比亚统治。自从英国保护领地恢复民政管理以来,英国对豪德的控制就在逐渐减弱,到1954年,只有两个英国民政官留在那里了。英国事先没有通知它的索马里臣民,也没有同他们商议,就在11月29日同埃塞俄比亚签订了英国行政机构全部撤出的

新协定,由一个驻在吉吉加的英国联络官代替留在那里的官员。这个英国联络官德赖斯代尔先生(J. G. S. Drysdale)及其助手的任务是,协助受英国保护的索马里人行使他们使用豪德的牧场和水源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在1897年的英埃条约中所规定的,并在新协定中加以重申了的。

过去英国当局的逐步撤出未曾引起多大的注意或批评。但是,当公众获悉新协定的条款及其含义的时候,立即发出了抗议的呼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遍及整个英国保护领地,表达索马里人的强烈愤怒情绪。仓促组成的抗议代表团被派到伦敦和纽约,他们在那里得到了足够的名声和同情,却没有取得使他们满意的结果。由于其他一些著名的民族领袖人物(主要有阿丹·艾哈迈德先生)的支持,在以前四大国调查团在原意属索马里举行的意见听取会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迈克尔·马利安诺(Michael Mariano)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名为“民族统一阵线”。这个团体得到了一切有组织的公众舆论(开始时,包括索马里青年联盟和索马里民族联盟)的支持,发动了一次强大的运动,目的有两个:收回豪德,实现英国保护领地在英联邦范围内的独立。

当地的英国行政官员很同情这些活动,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把豪德移交给埃塞俄比亚深感遗憾,并且很快就发觉新协定的条款是极难实施的。由于埃塞俄比亚当局称,在豪德行使放牧权的那些受英国保护的部落属于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范围之内,英国驻吉吉加的联络处的工作极其困难。埃塞俄比亚方面认为,英国人继续留在那里是不能容忍的。只是因为用了最大限度的机智和耐心才使局势没有恶化到剧烈的公开冲突。然而这个地区仍然经常出事。双方一再提出抗议,一连串的英埃联席会议都不能圆满地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加强了民族统一阵线争取豪德归还英国管理的运动。转让这块领土是根据当时英国对于恼人的1897年条约的解释,这个解释虽然不符合英国原先避免承认埃塞俄比亚对豪德的主权的愿望,却因为军事占领时期签订的1942年和1944年协定而得到肯定。1955年,英国政府殖民大臣在下议院的讲话中为英国政府的决定辩解(这个决定表明英国外交部继续支持埃

塞俄比亚),他说,他对原有的1897年条约感到遗憾,然而“不可能取消它”。由于同埃塞俄比亚当局的纠葛倍增,以及索马里人的强烈反对情绪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英国政府确实曾经试图调整这个局面。这次努力没有获得结果。1956年4月,英国政府派外交部议会事务副大臣到亚的斯亚贝巴,亲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商谈,提议买回这块有争议的领土,也一无所获。埃塞俄比亚政府同过去一样坚持自己的立场,谈判没有取得进展。民族统一阵线企图把问题提到联合国大会讨论并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但也同样失败了。这使英国极为难堪。

然而,民族主义者刚刚兴起的热情并没有熄灭。8月25日,埃塞俄比亚皇帝在欧加登的加布雷达雷(Qabradare)发表演说,这进一步刺激了这种热情。当时他断言,索马里人民是“埃塞俄比亚大家庭”的一部分,认为索马里人今后的发展必然要依靠埃塞俄比亚[10]。于是,英国保护领地的政治活动重新高涨,以前那种沉默地顺从英国当局的情绪,开始为日益增长的争取充分自治的迫切要求所代替。在这种压力下,英国政府于1956年宣布,将加速前进的步伐,逐步实行代议制政府。英国还表示,如果英国保护领地和原意属索马里愿意最后合并,英国将不反对。这时,事态发展变得就像滚雪球,开始是逐渐地发展,到原意属索马里快要独立的时候,就越来越快地发展了。新的学校开办了,索马里官员更快地被提升到警察和行政部门中的高级职位,而且和欧洲人同工同酬。1957年,英国保护领地建立了第一个立法议会,由总督从24名候选人(这个名单是在哈尔格萨召开了一系列激烈争论的政治集会后提出的)中指定了6名非官方议员。这些候选人不代表政党,而是代表这个地区的主要部落。人们可以预料到,当时部落关系仍然起着作用,而各政党又都不能代表大多数部落的利益[11]。与此同时,民族统一阵线由于达不成收复豪德的原来目的而逐渐失去了支持,索马里青年联盟和索马里民族联盟脱离了它。这个组织原来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会,这时很快也变成一个政党了。

尽管收复豪德的运动没有成功,英国保护领地最后还是采取了走向独立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各政党开始积极活动,考虑同原意属索

马里最后合并的可能性。当立法议会在1957年召开的时候,这些政党又更直接地要求让索马里人选出的代表参加议会。在当局任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五个委员中有两个是索马里人)[12]提出报告之后,立法机构便重新改组,以便准备在1959年初就实现这一要求。新的立法议会有12名由选举产生的议员、2名指定的非官方议员和15名官方议员,由总督西奥多·派克(Theodore Pike)爵士兼任主席。选举在1959年3月举行,在很少的几个城镇选区用秘密投票,在农村选区则用唱名选举。选举权限于成年男人。

索马里民族联盟当时代表英国保护领地最先进的民族主义立场。它要求立即建立由非官方议员占多数的立法议会。由于这个要求未被接受,它就正式宣布抵制这次选举,因而把阵地完全让给了索马里青年联盟和民族统一阵线。但是结果却没有一个索马里青年联盟的候选人当选;而在12名选举产生的立法议员中,7名支持民族统一阵线,4名是无党派人士,1名是索马里民族联盟的成员。所有的政党都主张独立以及同原意属索马里合并,它们的不同仅仅在于对实现这些目标的速度有不同的意见。民族统一阵线的主要领导和许多成员属于哈巴尔·托尔·贾洛氏族。除了这个氏族外,伊萨克部落的大多数氏族都支持索马里民族联盟,这时它是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东部的达鲁德部落和西部的迪尔部落(两者的人数合在一起还少于伊萨克部落),仍然不属于任何党派,虽然索马里青年联盟像过去一样,倾向于在这些部落中寻求最大的支持。由于索马里青年联盟的总部设在摩加迪沙,以及它自然而然地首先关心原意属索马里的事务,因此它在英国保护领地还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牢固的当地基础。英国保护领地的青年联盟支部在全党的地位仍然非常弱,不能产生任何广泛的影响。

鉴于索马里青年联盟①的抵制和日益高涨的公众要求更充分代表权的压力,1960年初,保护领地当局制定了一部满足上述要求和实行部长负责制的新宪法。1960年2月举行的新的立法议会选举中,索马

① 原文如此,根据上段,疑为索马里民族联盟。——编者注

里民族联盟在33个议席中获得20席，联合竞选的民族统一阵线和索马里青年联盟共得1席，新成立的索马里统一党（它与索马里民族联盟合作，主要代表达鲁德部落和迪尔部落）获得12席。这个选举结果标志着民族统一阵线的陷落，而在此以前当局总是把它看成是未来的执政党。虽然索马里民族联盟和索马里统一党这时共有32席，它们的对手民族统一阵线和索马里青年联盟合起来只有1席，但是前者所获得的票数只是后者的两倍多一点。那些支持民族统一阵线和索马里青年联盟的人，尽管可能有理由说，他们赢得的选票同席位的分配是不相称的，但是不管怎样，索马里民族联盟和索马里统一党合在一起无疑是代表了英国保护领地居民的大多数。于是，这两个党各有两名成员被任命为部长，索马里民族联盟的领袖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Muhammad Haji Ibrahim Igal)在立法机构中取得了“政府事务领袖”的头衔。

英国当局突然采用这个新宪法，紧接着还相应地加速了英属索马里全面前进的步伐。1958年8月，当局已经开始研究由索马里官员代替政府当中外国官员的所有问题[13]。当时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得到证实。在1959年，只有两个区专员以及若干区级官员和副警长是索马里人；到了1960年，所有六个区都由索马里官员直接负责，警察局副局长也是索马里人。这时已有100多个索马里学生在国外留学，其中有一些人在英国各类大学；英国保护领地的第二所中等学校也已经建立了。

尽管英属索马里在50年代初期的起步比较慢，这时已经朝着索马里人的民族主义目标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1957年，英国官方已经表示同意英属索马里和原意属索马里最后合并，1959年，又更加有力地重申了这一点。那时，这个领地看来已经在为今后几年内实现独立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了。当时很少观察家会料到，这个保护领地竟然没过几个月就赶在原意属索马里之前突然宣布独立。当时人们的看法是，英国保护领地的最后阶段将是安定的、逐步结束的，这种看法大大低估了因原意属索马也即将独立而激起的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在

1959年,英国保护领地各政党和政治团体的代表已经参加了在摩加迪沙的“泛索马里民族运动”。这个组织的章程提出了互相关联的两个目标:用和平的手段争取独立和实现索马里各个地区的统一;以及同其他亚非国家建立牢固的联系。在争取统一的政治活动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同整个索马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保护领地的独立问题,显然不能再长期拖延了。

索马里亚的最后阶段

阿卜迪拉希·伊萨1956年组成的索马里亚(即原意属索马里)政府,面临着一个迅速走向自治的国家的各种问题。他当然最关心那些对这个国家前途的稳定和繁荣有重大关系的国内问题。外交事务不属于他的政府的职权范围,因此这位总理对于实现泛索马里统一这个最重要的目标,只限于在他的施政纲领的第一条宣布,他将作出一切努力来解决同埃塞俄比亚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下面即将更多地谈到这个问题)。更加紧迫的事情是稳定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经济,吸引外国资本与援助,以及扩大征收赋税范围以增加国家收入。确定官方语言(索马里语基本上还是口语)这个多年未能解决的议论纷纭的问题也受到了关注;后文将说明,这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在社会事务方面,政府保证要研究使妇女得到选举权的途径,同时还要研究包括司法系统在内的政府各部门进一步索马里化的问题。在后一领域中基本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在其他方面也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措施。

部落酋长的法定权力(实际上,南方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酋长的权力大于北方的游牧部落)被削弱了。用集体惩罚来控制部落冲突的做法,逐渐改变为更多地由犯罪者个人负责。这个变动旨在削弱继续存在的氏族团结的力量。与此同时,为了把世俗权力同宗教权力分开,当局还削减了穆斯林地方法官在意大利制度下所掌握的相当大的刑事权力,以便更加明确地把他们的司法权限制为只受理有关个人地位的案件。就司法机构的索马里化来说,由于必要的索马里人员还没有训练出来,所以暂时授予索马里籍的区专员以审判权,他们在行使司法权时

必须受意大利法官主持的上级法院的管辖。

另一方面,由于舆论痛恨部落党派主义的破坏性影响,议会通过了法律,禁止用部落名称来命名政党。这一措施无疑部分地是针对反对党迪吉尔-米利弗尔(Digil-Mirifle)党的。这个党改名为"索马里独立立宪党",巧妙地利用了索马里语言的多元性保存原有党名的四个字的首字母。政府还制定了禁止对专门从事某些职业的"萨卜"群体使用传统的蔑称。这些以前处于奴隶地位的人很快就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解放。除了这一类问题外,政府还立即致力于准备为即将建立的独立国家制定宪法。为此,1957 年 9 月通过了法令,设立两个委员会来研究制宪问题:一个是政治性的,另一个是有意大利顾问参加的技术性委员会。这个法令的意图是要吸取其他已经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经验。[14]

鉴于流行的泛索马里主义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共同的目标,这部宪法必须考虑到原意属索马里同索马里其他地区最后实现合并的可能性。最后的草案中写有能够体现这个要求的条款。在这个问题上,索马里青年联盟政府和在野的独立立宪党持有迥然不同的观点。索马里青年联盟赞成而且坚持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国家,独立立宪党则从自身的狭隘利益出发,主张建立容许高度地方自治的联邦体制,并鼓吹在它自己的南部地区创建一个单独的迪吉尔-米利弗尔邦,而且对埃塞俄比亚皇帝在加布雷达雷演说中提出的一些倡议表示理解,而索马里青年联盟的政府则坚决反对这些倡议[15]。独立立宪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像它在其他问题(如,据说政府部门中歧视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的问题)上的立场一样,是直接从自身的狭隘利益和完全反对索马里青年联盟这一点出发的。但是,由于它在议会里只有 13 个议员,它的声音自然也是微弱的。

对索马里青年联盟领导的真正威胁,来自它自己队伍内部: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自行其是,另一方面,达鲁德部落和哈维耶部落的青年联盟党员之间的裂痕更大了。最能表现这些内部分歧的问题,是对阿卜迪拉希·伊萨政府温和政策的指责。批评政府的人谴责它过分地同意大利合作,没有充分地显示索马里人的独立性,更加重要的是没

有为推进泛索马里主义进行任何切实的工作。这种不满情绪在实质上同索马里青年联盟内部的对立是有联系的。1957年,任命哈吉·穆罕默德·侯赛因(他当时出国,在开罗)担任党的主席时,这种不满达到了顶点。哈吉·穆罕默德回到索马里亚之后,成为党内积极鼓吹泛索马里统一的那一派的领导。党内的这一派当时公开地攻击政府和议会议长阿丹·阿卜杜勒·伊斯曼(Adan Abdulle Isman),用亲西方的黎巴嫩领袖"夏蒙"(Shamun)的名字作为他的绰号。他们强烈要求采取更加公开的亲阿拉伯和亲埃及的立场。因为驻摩加迪沙的联合国咨询委员会的埃及委员不久前被杀害曾经激起公众的同情,这一立场一时间得到了较多的支持。在此前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有些索马里人曾经志愿到埃及参军;但此后,索马里人曾经抗议埃及对原意属索马里内政进行了所谓的干涉。而当时,公众舆论似乎又赞同采取更加明确地靠拢埃及的政策,而这正是哈吉·穆罕默德及其伙伴们所强烈主张的。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们还主张采用阿拉伯文字,认为它最适于书写索马里语言。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索马里青年联盟早先曾热心支持奥斯曼尼亚文,也由于有部分成员主张采用罗马拼音文字,因而,索马里青年联盟内部到这时还存在深刻的分歧。[16]

索马里青年联盟的新主席给政府及其支持者造成严重的麻烦,而且他的影响又使得党的公开分裂看来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这种分裂又侥幸避免了,因为1958年4月,支持政府总理和议会议长的那些人,在开了一连串吵得不可开交的会议以后,将难以对付的反对者开除出党。这个策略的成功(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索马里青年联盟内部达鲁德和哈维耶两翼的支持),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丹·阿卜杜勒,他后来成为索马里亚的第一任总统。哈吉·穆罕默德·侯赛因是享有盛名的演说家,并且在过去对发展索马里民族主义起过重要的作用。他在遭到这次失败之后,继续坚持斗争,组织了一个新的战斗性政党,名叫"大索马里联盟"。本地人把这个新组织简称为"伟大"。哈吉·穆罕默德在索马里青年联盟的各种持有不同意见的派系中寻求支持,并且企图利用在阿丹·阿卜杜勒调停之后仍然存在的达鲁德和哈

维耶部落间的裂痕。1958 年 10 月的市议会选举(妇女在这次选举中首次同男人一起平等参加)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衡量这个新组织的号召力。在 663 个席位中,索马里青年联盟赢得 416 席,独立立宪党 175 席,大索马里联盟虽然居于第三位,只赢得 36 席,但它还是超过了参加竞选的另一个全国性政党——自由党,后者只有 27 席。

大索马里联盟显然还不能对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大量支持者的索马里青年联盟构成严重威胁,由于考虑到大索马里联盟是刚成立的组织,特别是由于次年春季就要举行下一届国民议会的选举,因此决不能对它置之不理。于是索马里青年联盟加紧活动,特别是设法在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中间争取新的支持,这两个部落在市议会选举中曾经大力支持本部落的党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判断索马里青年联盟在这方面的前景,人们必须回顾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两个部落都具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但在种族成分上,他们是许多不同氏族的混合体,并且包括大量出身于达鲁德和哈维耶部落的人。不管 1959 年通过的立法的意图是什么,这个法律废除了在拉汉文和迪吉尔部落所收容的外族佃户的传统附属地位,这就使得上述情况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个立法所起的作用是鼓励后来搬到拉汉文部落中生活的外族人(主要出身于北方的达鲁德和哈维耶部落)取得独立地位,从而削弱整个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的团结。与此同时,许多想当高官的拉汉文部落政客,越来越认识到,他们获取名利的最好机会并不是参加独立立宪党,而是参加索马里青年联盟。最后,因为独立立宪党已经控制了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所在地区的大多数市议会,在国民议会中结成一条反对索马里青年联盟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也就显得不那么迫切了。有人认为保护拉汉文部落在当地的利益的最好办法,是参加到强大的索马里青年联盟里面去,这种看法肯定也是言之成理的。虽然不能确定上述这些不同因素中哪一个更重要,但是看来可以肯定,这些因素所产生的总体效果是方便了索马里青年联盟争取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选票的新运动。

另一方面,大索马里联盟因为纵容暴力行动而给了政府可乘之

机。它在部分地区被镇压,所以大大减少了它在竞选运动中的成功机会。大索马里联盟和独立立宪党都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举行选举活动,并且正式抵制这次选举[17]。出身达鲁德部落的内政部长的行动引起了更多的混乱。他自称是应埃及提出的要求撤销了关闭大索马里联盟总部的内阁命令。接着发生了内阁危机,这位部长提出辞呈。他的辞职被接受了,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总理接管了内政部。剩下的那个出身达鲁德部落的部长,为了表示部落团结也提出辞职,但是没有被批准。他仍留在政府里,这使得那些纯粹根据部落关系来解释索马里全国政治局势的人迷惑不解。这些事件是在选举刚刚结束之后发生的,它们表明阿卜迪拉希·伊萨政府自己断定它的地位极其牢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新近扩大的国民议会的 90 个议席中,只有 29 个席位有人竞选,而索马里青年联盟赢得了其中的 22 席。剩下的 7 个席位中,有 2 席落入自由党手中,另外 5 席为不顾党的正式抵制而参加竞选的独立立宪党分裂派所得,许多独立立宪党的前议员事实上已经转了党,作为索马里青年联盟的候选人而进入新的国民议会。

尽管已经取得了这种决定性的胜利,但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胜利,索马里青年联盟内部的裂痕更大了。在 5 月的党代表会议上,再次被推选担任总理的阿卜迪拉希·伊萨,在酬答那些对党的胜利作出过贡献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时碰到了一个大难题。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扩大了的新政府于 6 月组成,它包括 15 名正副部长,平均分配给达鲁德、哈维耶、迪吉尔和拉汉文等部落。在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中,有两个最著名的人物,即工业部长穆罕默德·阿卜迪·努尔和总务部长、独立立宪党前副主席阿卜迪·努尔·穆罕默德·侯赛因。如此慷慨地分配部长职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表明索马里青年联盟在迪吉尔和拉汉文部落当中所取得的成功。

从该地区当时存在的各种派系利益来看,很难指责新政府没有代表性。但是,正是由于政府如此公开地承认这些政治现实的力量,党内重要的米朱提因州达鲁德部落中主张革新的一翼,很快就对政府进行

抨击。一个主要的批评者是阿卜达尔-拉希德·阿里·舍马克('Abdar-Rashid Ali Shirmarke)博士。他刚得到罗马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49年,在索马里青年联盟创建时期,他曾经担任过联盟的书记。另一个主要批评者是阿卜德·拉扎克·哈吉·侯赛因,他在1956年担任过索马里青年联盟主席。这些人领导的评议团在短时间内曾经遇到大索马里联盟领导人哈吉·穆罕默德·侯赛因不久之前的命运。但是,他们集合起来的支持力量很强大,使他们很快就被允许重新入党。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在1960年初的内阁改组中得到部分的承认。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以后的事态发展有一部分是政策问题上的斗争,一部分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争,同时又是部落利益互相对立的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发展,一直等到原意属索马里独立并同英国保护领地合并之后的政府全面改组时,才表现出来。

独立和统一

1959年2月,当公布英国保护领地将在次年采用新宪法的时候,英国殖民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Alan Lennox-Boyd)曾经声明,在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都独立以后,英国政府准备为这两个地区实行合并的谈判提供便利。同年7月,阿卜迪拉希·伊萨在向索马里亚议会解释政府的施政纲领时,把索马里各地区的统一放在首位。他对议会说:"索马里人形成一个独立的种族,信奉同样的宗教,讲单一的语言。他们居住在广阔的领土上,这片领土构成了一个界限分明的地理单位。大家必须知道,索马里亚政府将竭尽全力,使用合法与和平手段(这种手段乃是这个政府的民主特性)来达到这个目的:索马里的统一,直到所有的索马里人组成一个单一的大索马里。"同一个月,在原意属索马里和英国保护领地政治领袖之间不时举行的非正式讨论,由于"泛索马里民族运动"组织在摩加迪沙成立而得到了指导和动力。索马里各个地区都派代表参加这个组织的成立大会,并且保证为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前意属索马里的托管应在1960年7月1日结束,比原定的时间提前了几个

月。这项公告立即在英属索马里产生了影响。

1959年2月,英国保护领地举行选举和建立了内阁制政府之后,要求独立和同意属索马里合并的压力就已经大大增加了。但是,在独立和合并时间问题上,索马里民族联盟和索马里统一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内部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议会的政府事务领袖和其他一些人的主张,他们认为合并不要过急过早,必须让英国保护领地有一段缩小同意属索马里在发展和进步方面差距的时间。这两个地区政府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差异,显然需要进行许多重新安排和调整才能够完全实现合并。另外一种是作为立法议会中唯一的反对派议员迈克尔·马利安诺提出来的反对意见;若干政府的成员,特别是索马里统一党的领袖们,也持有与他相同的观点。这种意见是,如果要进行合并的话,那么越早合并越好,两个地区行政传统的差别留待以后再解决。

尽管这两派意见都有道理,而且每一派显然都能阐述很多理由,但是当时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是如此高涨,因而后一种观点必然要占优势。因此,用某种联邦形式建立联系的旧想法被放弃了。1960年4月6日,立法议会全体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号召立即独立,并且同原意属索马里合并。这个决议案要求"采取果敢和决断的独立行动,同索马里亚合并的日期必须是1960年7月1日,即索马里亚将取得完全自由的日子"。五天以后,英国首相在下议院宣称,他的政府对索马里人的要求是同情的,殖民大臣(当时是伊恩·麦克劳德先生)将在5月初主持一次制宪会议以讨论独立问题。英国保护领地当局原来希望有时间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和做好准备工作,结果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在英国政府作出了上述决定后,保护领地当局只好匆匆忙忙地作出各项必要的安排。

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保护领地的代表4月中旬在摩加迪沙同索马里亚政府领导人商谈。这时为独立而准备的索马里亚宪法已经完成,英国保护领地的代表同意这部宪法的总则:即他们将要参加的这个共和国应该是一个单一的国家,由选举产生的总统担任国家元首,由对单

一的立法议会负责的总理和部长会议行使政权。简言之，就是这个国家只有一面国旗，一个总统，一个议会和一个政府，而在实现完全合并之前，两个地区以前的行政机构、法院和经济制度都将各自继续进行工作。

在上述事项决定以后，英国保护领地的领袖们于 5 月 2 日在伦敦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割断同他们的殖民国家的关系。英国和索马里的利益这次显然是一致的。由于英国保护领地从其面积和重要性来看无疑是英国最不划算的领地之一，因此英国政府这时急于摆脱对它所负的责任。英国所要达到的目的，除了保护英国人员的年金和赔偿权之外，就是继续为英国广播公司中东部租用柏培拉的中继站。这没有引起什么争端，会议在极其诚挚的气氛中进行。5 月 4 日，英国政府殖民大臣宣布，他的政府已决定安排英国保护领地在 1960 年 7 月 1 日独立。[18]他只附有一个不是实质性的、只是名义上的条件。这个条件是，虽然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有必要签订一个废除 1884 年和 1886 年英索条约的书面协定，但它却希望各部落头人和传统首领们公开表明他们接受给予独立的决议。英属索马里代表团欣然同意了，并且规定在 5 月 24 日召开一次"部落长老评议会"[19]。耐人寻味的是，英国政府过去曾经毫无顾虑地单方面采取违反上述条约的意图和内容的行动，这时却认为作出这样一个规定是适时的和必要的。

制宪会议结束后，英国保护领地为实现会议的决议而大忙特忙。1960 年 6 月 26 日，英属索马里实现了完全独立。五天以后，7 月 1 日，原意属索马里也宣布独立。这两个地区事先已分别同英国和意大利政府签订了协定[20]，因而独立后这两个地区就在它们的领袖已经同意的基础上实行合并。两个地区的立法机构在摩加迪沙举行联席会议，正式合并，组成共和国国民议会，选举阿丹·阿卜杜勒·伊斯曼(原索马里亚议会议长)为共和国临时总统。共和国的宪法将由一年之后举行的全国公民投票批准。前英属索马里改称北区，前意属索马里改称南区。六天后的 7 月 7 日，议会选举北区索马里民族联盟领导人贾马·

阿卜迪拉希·加里卜(Jama' 'Abdillahi Qalib)为新议长,接替阿丹·阿卜杜勒。

新政府的组成和领导这个更困难的问题还有待于解决。经过了持续两个星期之久的一系列微妙的活动之后,问题完满地解决了。7月22日,作为最够条件的领袖而出现的阿卜杜勒-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宣布了他的政府的成员。在14个部长级职位当中,有4个分配给北区的索马里民族联盟和索马里统一党。其中,索马里统一党的阿卜迪·哈桑·博尼担任重要的副总理职务;北区总理穆宁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担任国防部长,索马里统一党的阿里·格拉德·贾马(他曾经极力主张立即实现合并)担任教育部长。在南区的索马里青年联盟成员中,总理的亲密伙伴阿卜德·拉扎克·哈吉·侯赛因被任命为内政部长,把总理职位让给舍马克的阿卜迪拉希·伊萨负责外交部。就这样,原意属索马里宣布独立三个星期之后,新索马里共和国组成了一个政府,它比较合理地平衡了南区和北区的利益,同国民议会中北区(23席)和南区(90席)的议席比例也很接近。纪念独立和统一的热烈庆祝活动平静下来之后,在仍然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欢乐氛围中,新政府安定下来,着手处理这个新国家因为双重的殖民遗产而存在的许多问题以及迫切需要的财政援助问题。

尽管像以前经常所说的,联合国在原意属索马里的"试验"确实取得了成功,为这个新国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行政和政治体制,但是南区和北区在经济上还都不能养活自己。两个前殖民国家认识到这两个地区的明显的经济需要,都同意继续提供救援和补助。英国答应在独立后的第一年援助150万英镑,以后再逐年商定援助数额。除了这笔财政援助外,还有一个为期六个月的技术援助计划,即英国将在六个月中继续支付那些在独立后、应索马里政府要求留下来的前殖民官员的薪金。意大利允诺将给予更多的赠款,每年约为300万英镑,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在索马里政府工作的意大利"专家"的薪金。两国之间原有的商务联系(这种联系把南区带进了欧洲共同市场),将通过香蕉专卖和索马里南区对意大利进口的极端依赖而继续保持。由于有了上述支

持,由于从其他国家,特别是从美国、埃及和共产党集团国家取得的一系列越来越广泛的援助和借款,也由于联合国各机构的慷慨帮助,新建立的索马里共和国在展望前途的时候,它的经济前景比过去任何时候所能预见到的都要好。



第八章　独立带来的诸多问题

新国家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平衡

尽管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的合并,在当时看来似乎显得仓促和不完善,但是这一合并立即对索马里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时,所有的政治利益集团最后都将焦点放到了单一的国家立法机构上来。同时,由于两个地区的合并,国家内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政治地位发生了重大的、某些时候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要理解合并的直接后果的全部含义,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尽管人们欢呼共和国的成立,爱国热情高涨,但是个人对其亲族和氏族的效忠依然是最为广泛起作用的因素。当然,一个政党代表一个氏族的情况并不存在;这种趋势曾经一度存在,但早已经过去了。由于出现了诸如索马里青年联盟这样强大的全国性组织,建立在氏族基础上的政党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中获得任何有效地位。部落主义也绝对不是唯一重要的政治纽带。随着西式教育的不断普及、现代城镇的发展以及新的社会阶级的逐步形成(这种情况十分明显),部落忠诚已经只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政治联系组成的复合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然而,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在各种效忠关系中,以部落为基础的纽带依然最为普遍、最为强大,也最为潜在地起作用。而且此时这种纽带的存在比在索马里传统政治中扩展得更加

广泛。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关系和共同利益能将内陆的游牧民与他们在公职人员、国民议会乃至内阁中亲族，如此直接且无疑地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其他利益纽带在公共生活和私人领域中的各个方面能分布得如此广泛。[1]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者、政党政治家们以及传统宗教领导人都在抨击亲族关系的如下各个方面：它让毫无意义的派系对立长期存在；它削弱了必要的合作，甚至有时使得这种合作无法进行；它导致了用人和政策选择上不顾相关人员的品行能力和政策优劣。他们承认慷慨与互相帮助的意义，承认具有高度民主性质的传统政治程序且这种程序使得制定政策不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而成为每个成年人的天赋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严厉地谴责他们政治遗产中造成分裂的其他方面。"部落主义问题"早就是公众争辩的议题。在英国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独立和合并前，这两个地区的立法机构都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从当时的现实情势来看，他们都过于乐观地要找到一种办法来从根本上解决当时民族主义领导人认为是最有碍于实现民族统一的这个问题。[2]

在这个问题上，索马里民族主义与非洲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索马里的"部落主义"在一个已经实现了文化统一的民族内部存在的话，那么它所带来的分裂效应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大了。民族主义领导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部落间的分歧与猜忌在历史上曾成为外国势力分化索马里人的便利工具。现在，这种分歧与猜忌并没有减弱，不仅阻碍了泛索马里目标的彻底实现，而且还会危害到共和国本身的稳定。索马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担心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派系利益和各种分歧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因素在索马里有其特殊之处，即这些地方主义的分裂势力很强大，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深入人心以及他们的组织方式是按照同一原则实现的。尽管有些民族主义者竭力否认这些特点的存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特点在这个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将继续起重要作用。整个氏族关系问题所引起的情感本身就是氏族联系依然强势存在的体

现。所有的政治家和政党,无论他们怎么不情愿,都不得不利用亲族关系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在独立前就已经存在、现在更加广泛流行的一种巧妙说法,也许能最好地揭示出民族主义者这种矛盾的心态。在过去,要了解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的氏族关系,可以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就能明白:他属于什么氏族以及所属部落中的哪个氏族,进而追溯他的家族以及政治上的从属关系,直到询问者弄清楚所要知道的一切。现在,在农村地区,情况依然大体如此。然而,拒绝透露氏族身份且宣称效忠"索马里"而别无其他效忠,已经成为上层社会所接受的一种礼仪。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他们现在的氏族效忠关系说成好像只具有历史意义。不过,如果用"前氏族"这个词,就可以谈论一个人的氏族效忠关系了,甚至可以询问一个陌生人属于什么部落和氏族。事实上,索马里人使用"前"这个字,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为人们所接受的方法,以弄清一个人氏族关系的具体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伦敦人问的"住址"意思,但是比后者要更为重要。在以游牧为主的索马里社会制度中,没有什么方法而且看起来也不容易找到另一种方法可以这样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身份。

虽然人们不愿意承认,但索马里确实继续存在着由于氏族关系而造成分化的情况。这种局面也揭示出英国保护领地氏族与意属索马里氏族合并所具有的那种政治意涵。在此之前,北方地区的政治一直被伊萨克部落控制,他们支持索马里民族联盟,在人数上也占有优势。迪尔部落和达鲁德部落联合组成的索马里统一党是反对党。英国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的合并,不仅较大地削弱了伊萨克部落的政治地位,而且使得索马里统一党中的达鲁德人有可能通过参见非常强大的索马里青年联盟来获得新的影响力。对于索马里统一党中的迪尔人来说,传统的联系使他们可能在索马里青年联盟内外寻求与哈维耶人的合作,或者是与伊萨克人合作。

在政治上重新组合的有利形式决不限于这几种。如果以共同利益而不是氏族利益为基础,那么,只要索马里青年联盟在大索马里问题上

仍采取温和立场,那些主张更多地运用武力又有强烈亲阿拉伯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政党,诸如索马里民族联盟、索马里统一党和大索马里联盟,就很可能联合起来反对索马里青年联盟。也不能排除在南北方之间再次发生尖锐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因为,尽管作为一个整体,共和国在文化上具有统一性,氏族联合也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两种不同殖民传统的长期存在,对南北方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差异不是一目了然的。

英国的排外性和经验主义,在教育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质不重量,忠于英国的司法观念和行政管理的准则,以及政治和行政严格分离,这些情况在北方人看来,都与南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南方的政治和公众服务的道德标准显然不如北方严格,而且南方还有意大利人纷乱的官僚传统。不仅如此,南方过去还有相当多欧洲移民团体,以及相对发达的经济、教育事业和更完善的政治制度,再加上由于这两个地区之间传统文化差异,这些都使得两个地区在社会风气方面产生微妙但较为重要的区别。总体上说来,索马里游牧社会的传统观念在北方地区更加根深蒂固,相对而言,南方地区在许多方面观念更现代一些。这些差别给北方人提供了一套很适合表达他们传统的骄傲和超脱态度的标准。

这些可能的重组和分裂的基础,当然并不是互相排斥和毫无关联的,也不是截然裂分为两半的。更确切地说,它们表现为一连串互相重叠的亲族关系,各个政党的领导和成员都可以通过看起来最有利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运用。这就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施展策略的余地。新共和国的所有政党很快就领会了这一点。由于这类组合的方式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它们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比如前英国保护领地和原意属索马里两个地区的达鲁德部落之间的团结,由于这两个地区不同的殖民统治传统的差异,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伊萨克部落却加深了南北地区之间的裂痕,因为这个部落都住在英国保护领地,没有扩展到原意属索马里。

一体化的构成

从根本上讲，一体化就是指共和国的两个部分合并以后如何继续实现最终统一，使这种合并不仅仅局限于已经取得的政治上的结合。对新共和国的领导人因为索马里过去是两个国家的殖民地而面临的问题不能低估。在行政管理方面，英国和意大利训练的官员做着相似的工作（不论他们各自的水平有什么不同），但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条件都是不同的，工资差别也很大。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由前英属索马里巡防队和原意属索马里军队合并组成的国家警察部队和军队的所有官员，都有这样的区别。这两个地区不同的司法传统产生的问题，显然与人事无关，却也同样复杂。北方的司法体系主要依据英国的不成文法和成文法以及印度的刑法建立起来。南方则主要依据意大利的殖民地法[3]。另外，在合并之前，南方有自己的上诉系统；英国保护领地高等法院判决后的上诉案件则由东非上诉法院受理。因此，在成立统一的司法部门以前，共和国最高法院必须设立分院来处理两个地区的诉讼。在财政和会计程序方面的情况也同样复杂，因为英国在北部实行的制度，同意大利在南部建立的制度在程序上有很大的不同。最后，南北方在税率、关税和贸易的形式等方面也有相当大的不同。

由共和国两种殖民经历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差异，引起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复杂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新国家才能有效运作。语言方面的障碍更进一步地加剧了这些差异。这种语言方面的障碍，是由于南方地区学校一贯使用意大利语教学，而北方地区学校使用英语教学造成的。这种障碍影响到了公私各个方面的活动。由于对索马里的民族文字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4] 同时，只有很少一部分的人口精通阿拉伯语，因此，在办理各项事务时，仍旧同时使用两种前殖民国家的语言。许多南方地区政客和高级官员在英国军管期间就已经学会了一些英语，但是其中没有几个人能够熟练掌握英语，在日常公务中把英语当作正规的书面语言；而北方地区几乎没有一个人精通意大利语。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其他政治上的考虑，从长远来看，得到相对多认同

的是英语,不过这不能解决政治官员和行政官员直接的沟通交流问题。其中许多官员如果没有英-意文翻译的帮助,就无法直接互相通信。而优秀的笔译和口译人员都很难找到。同时,即使没有语言上的问题,共和国两个地区之间的实际交通条件也很不乐观。哈尔格萨和摩加迪沙之间没有直通的电话联系;尽管这两个中心之间有不定期的警察使用的飞机和每周两次的民航班机联系,而坐汽车通常需要三天时间。

最后,各种各样的意籍和英籍外国官员,作为技术专家,在索马里独立之后仍然留在这个国家,他们自然很迷恋各自原来的行政管理制度,因此,往往阻止,而不是要促成合并。这种保守势力的影响,在侨民比较多的南方表现得最明显。这些意大利官员害怕和讨厌事态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这些发展不仅威胁他们祖国语言所占的首要地位,而且还威胁着宗主国同索马里的全部联系,其中包括重要的商业和文化联系。

由于继承了这样杂乱的遗产,以及南北方部落之间存在的巨大隔阂,共和国两个部分之间产生一些争论就不足为奇了。在独立和统一时期的爱国热情消退下来后不久,北方地区就明显回归到某种冷静的状态。北方地区之所以首先怀疑合并的价值,这是不言自明的。北方地区的牺牲要多于南方地区。由于首都和国民议会都设在摩加迪沙,南方地区仍然是国家事务的中枢。但哈尔格萨原来是一个小国家的首都,这时却衰落为远离国家事务中心的地方首府。尽管有很多北方官员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北方人的骄傲使他们很难忍受这种名望的降低。独立之后,随着外国官员及其家属的撤离,失业人数显著增加了,这也直接激起了他们的不满。

1961 年 6 月 20 日,在举行全国公民投票通过临时宪法的时候,这种日益增加的不满和愤恨情绪,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而一年以前,两个地区就是根据这部临时宪法合并的。所以,这次公民投票实际上成为人们是否信任政府的一个测试。尽管北方地区的索马里民族联盟的有些成员参加了摩加迪沙政府,但是他们仍旧决定拒绝参加这次投票。结果,北方地区参加投票的人数只略多于 10 万,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反

对这部宪法。[5] 相比之下，在南方地区，有超过 150 万的人投票赞成这部宪法，只有 10 万多人反对，反对派主要是大索马里联盟和独立立宪党。

摩加迪沙政府没有充分估计这种明显的危险信号的含义。这个政府按照意大利传统，慷慨发放赠款，但它在议会的日子并不好过，而阻碍并不仅仅来自北部地区的议员。7 月 6 日，议会选举共和国总统时，索马里青年联盟内部的分歧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进行了三次投票之后，临时总统阿丹·阿卜杜勒·伊斯曼才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他的对手阿里·朱马勒赫(Ali Jumaleh)舍赫。三个星期以后，再度被邀组阁的阿卜达尔-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宣布，他的扩大的新政府由从索马里青年联盟和索马里民族联盟-索马里统一党(1960 年 9 月，民族联盟和索马里统一党正式合并为一个政党)选出的 16 名部长组成。然而，国民会议认为这个政府过于庞大，8 月 14 日，在讨论新政府的政策声明之前，它以非常独立自主的精神，通过了一个议案，限制内阁人员为 12 人。舍马克博士辞职了。然而，他仍然是大家特别喜爱的领导人。经过劝说后，他在 8 月 19 日重返了议会，并将内阁人数减少到 12 人。议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他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对内政策是建设和统一，对外政策是不结盟；这个纲领还得到了(主要来自埃及、联邦德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2 500 万英镑的贷款，以及(来自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直接援助[6]。

由于政府取得了上述成就，而且正在着手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典，并采取了其他一些旨在更进一步合并这两个地区的措施，因而它显然认为不必着急立即考虑北方地区局势。那年秋天，人们的注意力迅速地转移到了那场席卷共和国南部地区的水灾。紧跟着两年严重干旱之后的那场洪水，使很大一块地区都面临饥荒和疾病的威胁。[7] 国民议会的成员选择这一时刻通过了给他们薪水加倍的立法，每月 100 英镑，大大超过了南方地区各州专员和其他高级官员的收入。这当然不会增加北方地区人们对南方这次不幸的水灾的同情心。尽管北方人选出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立法行动，但是北方人仍然认为这个决议只不过是遥远

的摩加迪沙政府的一长串不负责任的行动之一。

1961年12月,由于一场短命的、流产的军事政变,问题变得极为严重。北方地区发生的这次反抗行动的全部情况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次叛乱是英国桑德赫斯特(Sandhurst)军校训练的一批尉官领导的,这些尉官在索马里独立以后,在意大利训练的、被派往北方地区的高级军官手下服役。这些英国训练的下级军官看起来是受到了个人野心和北方地区的爱国主义这两种情绪的直接鼓舞。他们悄悄地逮捕了来自南方地区的上司,他们认为把这些人提升为他们的上司是不公平的。他们当时公开宣称,在摩加迪沙及其他地方反政府的骚乱普遍发生以后,国家军队的司令达乌德(Da'ud)将军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看起来,人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并不太糟。但是,第二天,由于高级军官显然没有参加这次政变,人们开始怀疑这个消息,而且很快就有人透露,索马里民族联盟内部的一些人即使不是直接帮助和煽动这次政变,他们对此至少也是深表同情的。政变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脱离南部地区,摧毁共和国。这对很多人来说太过分了。因此,在一些士兵和士官的带领下,这些发动叛乱的尉官全部被逮捕了。等到强大的政府援军和警察从摩加迪沙赶到时,整个事件已经结束。

在这次事件中,某些高级军官和政府成员有共谋的嫌疑;而且,这个事件还表明需要改善哈尔格萨和摩加迪沙之间的交通。这次事件终于促使政府采取了行动。政变集团的首领们都被逮捕了(他们在一年后受审)[8]。许多军官被开除或者降级,那些保持忠诚的军官则受到了奖励。此外,为了更进一步地统一这两个地区,政府还作出了新的努力。政府所有部门的南北方地区的工作人员,包括军队和警察,与过去相比,被更大规模地调往全国各地。进一步的措施还需要更多时间。到1962年3月才获得批准的新"公务员法",把共和国范围内的薪金和工作条件都统一起来。从北方地区公务员的观点来看,虽然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但它的结果却是有人得益,有人受损:因为低级雇员的待遇提高了,高级官员的最高薪金却降低到大约南北区最高薪金的平均数[9](在此之前,北方地区区专员按照老的英国标准领取的薪金,远远超

过了南方地区的州专员的收入,大概是南方地区区专员收入的两倍)。后来在1962年,全共和国采取了效仿北方地区(英国)的新财政和会计制度。同时,还引进了以前英国通过投标委员会购买政府装备的做法,这种革新使得南方地区的意大利公司非常烦恼,但也增加了索马里企业的竞争力。

对北方地区更直接有利的是,政府努力推动这个地区在建设项目和新工业中获得更大的份额。雄心勃勃的“图克·瓦贾勒(Tug Wajale)”计划,在1960年9月就已经在执行,它采用机械化种植小麦和高粱,非常成功。这时,政府又进一步努力扩大生产,并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利用英国援助将哈尔格萨的飞机场改造成现代化飞机场;苏联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答应为新建的地方工业提供资金。为了同美国援助250万英镑发展南方地区基斯马尤港口的计划相抗衡,苏联工程师还准备调查改进柏培拉港口设施的可能性。一些新的医院也在兴建中。

然而,这些措施还不足以平息北方地区持续存在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根源也许植根于北方人的骄傲和政治上的孤立这两者的结合,而初步的困难是占这个地区绝大多数的伊萨克部落不再支持他们所选出的政府官员。另外,虽然有过国民议会要定期在哈尔格萨召开的传言,但并没有实行,同以前一样,那种认为北方是一块边远偏僻的地方的观点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大索马里联盟要在北方寻求同盟者。结果,1962年夏天,出现了由哈吉·穆罕默德·侯赛因领导的一个新党派——索马里民主联盟,它试图将大索马里联盟和索马里民族联盟以及索马里统一党的部分成员同南方地区的独立立宪党合并起来,然而,索马里民族联盟,或者至少是这个组织在议会中那时已经变得徒有虚名的一些领袖,却因为他们同联合政府的合作关系而受挫。参加了政府的索马里民族联盟的成员,之前一直持有一种危险的暧昧立场,这时也不得不迅速作出抉择:是继续拥有选民对他们的支持,还是继续保留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索马里民族联盟和索马里统一党的分裂看来也即将来临了。

这些事情后来都在夏天发生了。北方地区的不满非常厉害，行政工作的正常开展难以维持，以致政府被迫派出由三名北方地区部长（索马里民族联盟两人，索马里统一党一人）组成的特别小组去调查局势。总统本人也被卷进了这次挽救危局的行动，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和备受瞩目的旅行。这次旅行总的来说是成功的，这部分地应当归功于总统个人的崇高声誉。部长们的调查小组却不那么走运了。解释小组职权范围的问题引起了争吵，农业部长（索马里统一党）和他的同事们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对付时局，存在不同意见（当时意见之一是，将北方地区的一批行政官员停职[10]）。最后，在这一年的夏末，调查小组的两个索马里民族联盟的成员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其中一个是教育部长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Muhammad Haji Ibrahim Igal）。这个行动恢复了这两位索马里民族联盟著名人物过去在北方的声望，也鼓舞了议会中的索马里民族联盟其他成员一致、公开反对政府。那时，就出现了一个更加有组织、更加强大的议会反对派。政治领袖们开始讨论组织一个新政党，这个党包括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领导下的索马里民族联盟的剩余人员，以及那些支持被打败的总统候选人阿里·朱马勒赫舍赫的青年联盟的成员（主要属于哈维耶部落）。人们还希望把其他的少数党派也囊括在这个新党派之内。这些活动最终的后果是，1963 年 5 月，索马里国民大会党成立，这个党由来自南北方的大约 20 个议员领导。

从政府的角度看来，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是，这个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范围采取了单一的税率和关税制度。尽管其目的在于降低北方地区的运输费用，但效果却适得其反。[11]北方地区的食品价格突飞猛涨，引起了公众普遍的愤慨，这种愤慨又导致 5 月 1 日的哈尔格萨骚乱的发生，以及新政党在北方地区得到多数公众的支持。南方地区的局势很不明朗，究竟是索马里国民大会党还是索马里民主联盟将成为最强大的反对党，或者这两个政党是否会联合起来反对索马里青年联盟，究竟这两个政党或者其中之一是否将与独立立宪党和其他小党合并，这些是有待解答的问题。1963 年末，在非常动荡的政治形势

中，这些问题只有依靠时间和将要来临的市议会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才能解决。如果所有的反对党都联合起来，索马里青年联盟必定处于艰难的境地。但是不可能判断出青年联盟是否会像过去那样恢复元气并击败它的对手。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仅取决于青年联盟内部各个部落利益的平衡，还取决于它的领导层可能发生的变化。

索马里青年联盟当时已经成为名义上的联合政府的支柱。为了应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反对势力，它积极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并在管理国家事务中更有战斗性、更警觉。1963 年 7 月，在青年联盟的年会上，新的年轻总书记接替了他的前任、年长的传统宗教领袖。[12]他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讲话，要求这个政党作为政府部门，必须更有效地开展工作。这个说法是索马里青年联盟在政治上的一个代表性的新趋向，其中包含着一党制的国家论[13]，并且这个主张是在索马里青年联盟觉察到它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时提出的。另一个能说明这种趋向的例子是(至少在反对派看来是这样的)，7 月，在激烈争吵之后，议会通过了有争议的“公共秩序法”[14]。如果说对这种趋向作任何有把握的评价还为时过早的话，那么索马里的政局却存在这样的一个特点：一旦共和国比过去拥有更多的反对派，这个国家就会发展。在这种不确定的局势下，所有政党仍然可以依赖的一个不变的因素是：在职的议员都竭尽全力保持他们的高薪职位。至于选民们如何反应，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这样，到 1963 年末，北方地区的地方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在索马里国民大会党内寻找出路。这种地方主义的目标不是分裂共和国，而是推翻索马里青年联盟政府。正是这种更加有限的、也完全符合宪法的目标，说明了 1961 年政变失败的原因，以及北方地区的新政治组织迅速寻求同南方地区反对索马里青年联盟的政治组织结盟的原因。截至那时，共和国的统一所受到的威胁，远远不如外国观察家经常设想的那么严重。而且到这一年的年底，两个地区的一体化又有了进一步发展。5 月，议会以 52 票对 42 票通过立法，将现行的南方地区的普选权原则扩大到过去仅仅男子享有选举权的北方地区。[15]6 月，修改了宪

法的第 29 条，除穆斯林以外，禁止一切传教活动，这就使得前英国保护领地的做法普及到了共和国全境。8 月，议会通过立法，统一了管理市议会和农村区议会的条例。到这一年的年底，费时而艰巨的统一法典的制定工作差不多完成了。

就这样，到 1963 年末，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以来的三年半时间里，一体化的工作已经大体完成。这个国家中的各种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也都在努力寻找更加满意的合并形式。在 1964 年春天即将举行的下届议会选举中，这些政治力量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直接表现出来，还有待观察。但是，如果目前的这种发展形势继续保持下去，特别是如果伊萨克部落能够同南方地区的部落结成稳定的联盟，那么南北区之间的分歧，可能将大大减少。

泛索马里问题

共和国成立之后，那些居住在法属索马里、相邻的埃塞俄比亚东部地区以及肯尼亚北部边区的索马里人，仍然处在共和国之外。关于新建立的共和国在 1960 年面临的状况，内阁总理的话作了最好的描绘。阿卜达尔-拉希德博士写道："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致力于促进同邻国以及非洲其他国家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我们的邻居并不是我们的邻国，我们的邻居是我们的索马里同胞。不分青红皂白的边界'约定'篡改了索马里人的国籍，他们必须跨过人为的边界才能进入自己的牧场。他们同我们一样，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从事同样的游牧经济。我们讲同样的语言。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文化和同样的传统。我们怎么能把我们的兄弟看作是外国人呢？当然，我们都有着强烈的、非常自然的统一要求。1960 年，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的合并是第一步。这个行动不是'殖民主义'的行动，也不是'扩张主义'或'侵吞'的行动。它是对非洲和平与统一的一个积极贡献。"[16]

然而，英国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合并是一回事，进一步扩大索马里的统一，将法属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豪德和欧加登，以及肯尼亚的北部边区囊括进来，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尽管共和国的宪法显著地将

这个目标置于崇高的位置[17]。肯尼亚的北方边区，以及埃塞俄比亚的豪德和欧加登都是邻国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对索马里的事业并不热心，很难指望它们会欣然同意这种减少它们领土面积和降低它们声望的变化。法属索马里的情况可能比较有希望，因为，如果那个地区不同族群的大多数居民有联合的愿望，那么，至少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障碍阻止一块原法国领地像英属索马里加入意属索马里那样，在独立以后参加索马里共和国。但是，1960 年，法属索马里还远远没有独立。1958 年，戴高乐政府举行公民投票时，这个地区的居民曾投票反对完全独立，而选择继续做法国的海外殖民地。

这需要作一些解释。1945 年，法属索马里成立领地委员会之后，1957 年，按照根本法选举了负责当地事务的领地议会，这个地区的政治生活，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这在宪法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当时，法属索马里在其他领域的发展还赶不上意属索马里或英属索马里的进展。共和国联盟在新议会的第一次选举中获胜，它是一个选举联盟，代表着部分索马里和阿法尔族(Afar)居民，还有阿拉伯居民的利益，由马哈茂德·哈比(Mahamud Harbi)领导。主要的对立组织也包括不同种族的成员，由哈桑·古勒德(Hassan Guled)领导。这个人和马哈茂德·哈比一样，属于索马里的伊塞部落。选举以后，成立了以殖民地总督为主席的政府委员会。除了副主席马哈茂德·哈比以外，这个机构还包括三个索马里人、两个阿法尔人，一个阿拉伯人和一个欧洲人。这个构成即使不完全符合索马里族和阿法尔族居民的力量对比，但它反映了索马里人已经较多参与政治了，也表明了法属索马里的两个主要种族虽然有传统的对立，但在处理当地事务方面，却有着充分的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

但是，当索马里民族主义情绪在英国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高涨时，局势开始发生变化。1958 年的公民投票实际上被理解成了一个抉择：或者争取独立并和意属索马里合并，或者仍旧属于法国。在进行这次公民投票时，马哈茂德·哈比提出了索马里民族主义的纲领，而哈桑·古勒德在法国选民的有力支持下，主张保持和法国的联系。马哈

茂德·哈比虽还在掌权,但后一种意见却占据了上风,局势因而变得非常混乱。在法国当局的干涉下,混乱才得以控制。法国当局解散了议会,并安排在1958年11月23日进行新的选举。[18]在混乱当中,马哈茂德·哈比的党大部分瓦解,而哈桑·古勒德的那一派则改变了组织成分。最后,出现了五个选举组织,其中有两个完全是阿法尔人的组织,另外两个是索马里人和阿法尔人的混合组织,分别由哈桑·古勒德和马哈茂德·哈比这两个主要的对手领导。根据按选票比例分配席位的新制度[19],赢得大多数阿法尔人支持的哈桑·古勒德击败了马哈茂德·哈比的索马里民主联盟。随后,马哈茂德·哈比逃往开罗,不久又去了摩加迪沙。1959年,他在那里参加组织全国泛索马里运动。他短暂的、变化无常的政治生涯在第二年的10月结束了。当时,他在访问中国和东欧后返回摩加迪沙,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在法属索马里境内,哈桑·古勒德继马哈茂德·哈比成为政府委员会的副主席。1959年4月,他被选进法国国民议会之后,将这个职位让给了阿法尔族议员艾哈迈德·迪伊尼(Ahmad Diini),1960年6月,艾哈迈德·迪伊尼又被另一个阿法尔人阿里·阿里夫·布尔汉(Ali Ariif Burhan)代替。这样,虽然索马里人在领地议会中(32个席位占了14个席位,阿法尔人占13个席位)和政府委员会中都是最大的集团,但是,领导权却落到了阿法尔人手里。最强有力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或是居于反对派位置,或是流亡在外。与此同时,1959年7月,戴高乐将军对法属索马里进行短暂访问时,曾经用他那出色的、非同寻常的口才明确地宣告:法国极为重视吉布提(它那时在同英国的亚丁港竞争),无意放弃对那里的控制。[20]

因此,1960年,当索马里政府开始考察泛索马里的前景时,法属索马里的情况远远不够乐观。尽管索马里人和阿法尔人在最终同索马里共和国合并的问题上还没有绝对的分歧意见,但要判断索马里民族主义势力的大小是困难的,而要估计这种势力对阿法尔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就更加困难了。而且,法国的政策至少在当时是已经明确地决定不会再在主权问题上让步,还明确暗示法国政府认为泛索马里运动是一

种威胁,要尽可能地坚决抵制。另外,法国在法属索马里为提高过去被忽视的阿法尔人的地位而采取的新措施,已经加深了阿法尔人和索马里人之间的裂痕,而在索马里人看来,这也正是法国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敌视泛索马里主义这一点上,法国和埃塞俄比亚的政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策是由两个共同利益(繁荣的吉布提港以及连接这个港口和埃塞俄比亚内地的铁路线)所支持的。

在埃塞俄比亚的豪德和欧加登,索马里任何进一步扩大统一范围的前景甚至更加遥不可及。1956 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在加布雷达雷发表了关于索马里事务的讲话以后,这两个地区的教育和医药事业有所发展,但是远不及讲演所许下的诺言。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府坚持所有想要升学的索马里人都必须接受阿姆哈拉文(Amharic)教育,就大大减少了上述改革发展的吸引力。这里不容许任何政党进行政治活动,索马里民族主义情绪的任何公开流露都会被坚决制止。因此,尽管在1960 年,有六个索马里代表和一个索马里参议员参加了埃塞俄比亚议会,在欧加登地方还录用了一些当地人担任行政官员和警察官员,但是,没有为索马里人开辟表达民族主义愿望的通道。因此,只能从日益增加的叛乱事件,从政治流亡者和秘密代表团带到摩加迪沙的消息,来估计民族主义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这种不安定的局面,还由于两个国家没有达成边界协议而恶化了。实际上两国的边界仍然是 1950 年英国人在意属索马里留下的临时行政管辖线。

在意大利托管期间,由于联合国的敦促,双方曾经为划定彼此都能接受的边界而进行过多次谈判。意大利声称边界应在临时分界线以西;而埃塞俄比亚人则坚持边界应当在临时边界线以东,即更靠近海岸的地区。在意大利政府拒绝接受埃塞俄比亚关于临时边界的妥协方案以后,于 1958 年成立了由三名法官组成的仲裁法庭。然而,法庭的权限又引起了争论。联合国大会曾请求挪威国王推荐几位国际知名人士担任法庭的顾问,试图用这个办法平息争论。这个微妙的任务被分派给了联合国前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e)先生,要求他提出

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条件。1959 年，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接受了作为讨论基础的妥协草案。但是，随后双方提出的修正案又都不能为对方所接受，因此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主要的争执点在于，埃塞俄比亚坚持边界必须根据对 1908 年意埃协定的严格的合乎法律的解释来决定，意大利则主张还应考虑其他的国际协议和争议地区的种族因素，即不同索马里部落的分布情况。因此，意大利的立场是赞成一个朝着索马里民族愿望实现方面的、较为开明的解释。在索马里独立以后，边界问题仍没有取得进展。1959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和意属索马里都同意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英国划定的临时边界应继续有效。[21]

独立以后，意属索马里和英国保护领地的合并增加了一个新的复杂因素。英国保护领地的领袖们在同英国政府的谈判中，正式拒绝认可 1897 年英埃条约的规定，不认为他们应该接替英国承担这个条约的义务。无论这些领袖们的态度在国际法上多么成问题，他们的态度是他们对它不能再承担责任，因为这个条约既没有征得索马里人的同意，又违背了之前的英索协议，最后还让埃塞俄比亚获得豪德[22]。由于存在这样两个突出的边界争议，而这两个争议又都直接关系到范围更广的泛索马里问题。因此，索马里共和国争取索马里统一的运动显然不可能得到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很明显，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也会极其难以处理。

同肯尼亚的争执

这样，就剩下肯尼亚北部边区的形势有待讨论了。这个在种族和行政管理上都很特殊的肯尼亚地区，有将近 40 万人口(根据 1962 年的普查)，其中一半以上是索马里人。这个“边区”事实上由六个行政区组成，其总部分别设在曼德拉(Mandera)、瓦季尔(Wajir)、加里萨(Garissa)、伊西奥洛(Isiolo)、马萨比特(Marsabit)和莫亚累(Moyale)。这个地区的索马里牧民分布得很广而且稀疏，他们几乎占了这个地区的整个东部(加里萨、瓦季尔和曼德拉等区)。从莫亚累的东面向南到

塔纳河的"索马里线",将他们同他们的邻居及同族的奥尔马人(Orma)、博兰族盖拉人分割开来。这个边区的另一个种族是从事农耕的波科莫人(Pokomo),大概有 6 500 人,散布在塔纳河两岸。由于许多奥罗莫人信奉伊斯兰教并处于被索马里人同化的过程中,从而使情况复杂起来,但是盖拉人和索马里人之间的区别还是相当清楚的,最西部的马萨比特区还有半索马里化的伦迪勒族人(Rendille)(约一万人),他们形成一个明显的楔子,处在盖拉族的异教徒和盖拉族的穆斯林之间,这又使得盖拉人和索马里人之间的界限不那么清楚了。因此,这个地区的东部明显属于索马里人,而西部的划分却不是很清楚。

总的来说,在 1960 年,肯尼亚北部边区仍然是它最偏僻和最落后的部分,而且除欧加登外,那里还是索马里人所有领地中最落后的部分。自从 1948 年,索马里青年联盟在肯尼亚法律规定的这个"禁区"被禁止以来[23],民族主义者的活动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一直到 1960 年,这个地区纳税人的政治权利才过迟地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承认。在此决定前不多久的时间里,虽然这个地区的人民没有直接参加 1957 年的肯尼亚选举,但是在 1959 年,任命了一个由索马里人提名的议员,以"寻求"他们在立法议会的利益。1960 年,解除了对政治团体的禁令(虽然同时没有放松对这个地区的其他特殊限制),索马里民族主义者又很快动员起来支持北方州人民党,这就预示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至少在当时看来是这样。这个地区的索马里部落早已宣布,他们的目的是要脱离肯尼亚其他地区,实现民族自决,以便能够同索马里共和国的同胞联合起来。由于长期以来,英国对待这个地区及其人民的行政管理不同于殖民地的其他地区,也由于英国人支持意属索马里和英属索马里合并,因此,索马里民族主义者觉得,他们的愿望很有可能实现。因为,既然英国能响应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人民的愿望,准备帮助他们同意属索马里合并,那么,它怎么会拒绝为它在肯尼亚的索马里臣民做同样的事情呢?

这似乎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简单的看法。但是,在有关部落的人看来,英国既然已经对一条行动路线承担了义务,所以它在遇到相似情

况时，理所当然地也将坚持这么做。然而，英国政府的立场却很不明朗。由于埃塞俄比亚对贝文先生促进英国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统一的尝试(尽管没有成功)记忆犹新，所以它对于英国愿意帮助英国保护领地同意属索马里合并一定感到严重不安。自从英国在1956年首次谨慎地表示它关于英属索马里同意属索马里合并的意图以来，埃塞俄比亚政府就开始了一场积极反对泛索马里主义的运动。它采取的策略是指责英国政府企图建立一个亲英的大索马里，并且强逼英国澄清它的政策。1959年，埃塞俄比亚皇帝访问莫斯科，并接受了苏联一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都说明，如果漠视埃塞俄比亚的利益，就可能带来什么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英国保护领地要求在1960年7月1日独立并同意属索马里合并，麦克米伦(Macmillan)先生认为有必要给予一些说明。于是，1960年4月，在答应了英国保护领地要求独立的请求以后，首相在下议院发布了以下声明。他说："英国政府没有也将不会鼓励或支持任何影响法属索马里、肯尼亚或者埃塞俄比亚领土完整的要求。只有在各个有关政府和民族都愿意的情况下，这一要求才能给予考虑。"很明显，这个声明主要是为了减轻埃塞俄比亚和法国的恐惧，并让肯尼亚的非洲领导人放心。然而，与此同时，当肯尼亚总督在两个月后向北部边区的酋长和长老传达这个声明的时候，它似乎是打开了实现索马里愿望的大门。因为这个声明表示，会考虑他们的愿望，同时他们还认为，除了索马里政府外，唯一"有关"的政府就是英国政府。这也是新成立的索马里共和国的官方看法。

由于肯尼亚的政治形势迅速发展，所以，肯尼亚北部边区的这一部分索马里民族，看来最有可能早日被索马里共和国合并进来。于是，在独立以后的两年当中，共和国政府注视着法属索马里和欧加登的形势，努力宣传那里的索马里人为争取独立而做出的努力；而它主要关心的还是肯尼亚的北部边区问题。这里确实有很多事情需要索马里民族主义者来处理。因为局势发展得非常迅速。在1961年的肯尼亚选举中，索马里族占主导地位的加里萨、瓦季尔、曼德拉和莫亚累等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选区(北方州东区)。但登记的选民只有1 622个。索马里人

普遍的都决定抵制选举,理由是,一旦参加选举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肯尼亚的国籍。唯一的候选人阿里·阿丹·洛德先生(他后来死于汽车事故,哈里夫先生代替了他)全票当选。

1961年选举之后,政治活动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索马里人要求脱离肯尼亚实行自决的运动势头变得迅猛了。为了寻求支持,索马里族政党的领导人和部落酋长的代表团多次访问摩加迪沙。11月,索马里国民议会对这些希望得到支持的请求作出了回应,通过一项决议,欢迎肯尼亚北部边区同索马里共和国合并,并且极力主张政府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争取实现合并。这推动着摩加迪沙政府发起了一个支持它在肯尼亚同族的宣传运动。虽然索马里政府不能参加1962年2月在兰开斯特大厦(Lancaster House)召开的肯尼亚立宪会议,但它在道义上给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北部边区代表团以强有力的支持。到那时候,除了一些反对索马里的组织之外,这个地区有三个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党。这些政党虽然是以部落系统为基础被分割了,但它们都为了争取脱离肯尼亚而独立并加入索马里共和国而联合起来。北部边区代表团由哈里夫统领,他要求:"在作出影响肯尼亚的任何宪法上的变更之前,应当准许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地区实现同肯尼亚的完全分离的地方自治,以便这个地区能够在肯尼亚完全独立以后,通过一项合并法案与索马里共和国合并。"[24]

这个要求,很自然地受到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和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代表团的坚决反对。这两个党尽管在其他问题上缺乏一致性,但是都坚决不同意给予北部边区的索马里人以及其他民族任何单独的自决权利。他们认为,这种让步会危害肯尼亚的领土完整,而且会助长全国范围内的部落分离主义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领导人知道埃塞俄比亚是支持其立场的,并且其他地区的非洲国家政府并不怎么支持索马里人的做法,所以他们的态度就更加坚决了。另一方面,北部边区的代表团提出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得到和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的同胞一样的权利,那些同胞的独立及其同索马里的合并,都是在英国的援助下进行的。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宣称如果民族

自决原则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决不意味着要强烈地阻碍其民族的合法统一。[25]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在作答时质问道，为什么北部边区的那些可能不愿意脱离肯尼亚的非索马里人的部落，就应该为索马里人要求分裂作出牺牲呢。他们声称，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让那些想脱离的索马里人离开肯尼亚，加入索马里共和国，没有人会阻挡他们。他们认为，索马里人要在这个地区谋生这个事实并不重要，因为这里的索马里人都是游牧部落。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还认为，说索马里人拥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充足的理由。

面对着这个涉及对于国家和国籍的不同概念的斗争，英国殖民大臣莫德林(R. Maudling)先生通知立宪会议说，他已经决定委派一个"具有适当职权的"独立委员会来"调查有关这个地区前途的公众舆论"。他还说，可能需要在北部边区的部分地区就这个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以征求意见，甚至由公投来决定。北部边区代表同意了这个决议，条件是肯尼亚自治之前实行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论，代表团带着这个看来是个重大成就的决议回到了肯尼亚，为委员会调查公众舆论作准备。他们受到了别人的引导，相信这种调查将决定他们的未来的地位。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北部边区的索马里人在这个问题上，愿望是多么的强烈，因此他们对调查结果深信不疑。

与此同时，摩加迪沙的索马里政府在对这一消息表示谨慎的欢迎之后，特别任命了一个部长级委员会，焦急地注视着事态的进展。因为索马里北部地区在合并以前的处境同肯尼亚北部边区相同，两者同英国的关系也相似。公众舆论，特别是共和国北部地区的公众舆论对这件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要求政府大力推动此事。当北部边区代表团在肯尼亚立宪会议上提出索马里问题时，索马里共和国各地举行了广泛的群众示威游行，来表达道义上的支援。索马里政府的总理与这种情绪相呼应，于 3 月发表了一篇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讲演，攻击埃塞俄比亚和法国，并且警告英国说，如果"过去的错误"再次出现，肯尼亚北部边区的人民得不到"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那么英国应该对

此负责。[26]然而，仅仅说这些话还不够。公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很高，而且持续不断。议会的 31 名议员(包括南北方地区的议员)在 3 月末的时候提出对政府不信任案，就反映了这种普遍情绪。他们主要批评的是政府“缺乏”推行泛索马里主义的“勇气”。

但是，舍马克博士的内阁不顾这些劝告，仍然决定遵循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原则，至少在目前只是局限于采取和平的外交行动。临近年底时，英国政府才任命北部边区调查委员会。在这段旷日持久的时间里，摩加迪沙当局仍坚持对英国外交部施加它所能施加的压力。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打算遵守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或其对这个争议地区的公众舆论的其他任何公正的调查。然而一旦确定了这个调查结果，就应该由英国采取必要的行动，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英国和索马里人民之间的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同英国打交道绝不是容易的。这是因为，摩加迪沙直接与英国进行交涉，使得英国极为难堪；因此英国政府除了通知索马里共和国说必须等待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以外，尽可能地避免作出任何直接的答复。

这种回避的做法掩盖了英国政策重点的一个最重要变化。殖民大臣在兰开斯特大厦立宪会议上曾表示，他对于这个争执是没有成见的，并且准备根据北部边区调查委员会所收集到的证据，用分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时，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作出的声明也暗示，尽管他们有些勉强，但不是不可能同意这种解决办法的。在那次会议后，英国政府显然又另有想法了，这部分是源于外交部的推动(外交部一直要照顾英埃关系)，还有部分是对来自乌干达政府、坦噶尼喀(Tanganyika)政府以及肯尼亚本身压力的回应。除去英国在其他地区的事务外，英国在肯尼亚还面临着许多其他紧迫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英国就拖延了任命北部边区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在此期间，肯尼亚的非洲领导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就开始对索马里籍分离主义者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态度。

这些情况和其他一些情况，共同使得英国越来越想抛弃殖民大臣的诺言，而倾向于肯尼亚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因此，英国现在的方针是

强调它关于索马里统一问题已经发表过的政策中的一个部分,即没有肯尼亚政府的同意就不能对当前的争端作出任何决定。英国驻摩加迪沙大使馆的人员一方面在正式场合采取拒绝就这个问题同索马里共和国直接交涉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又非正式地提出了可以避免麻烦的(即使是有些不诚恳的)观点,即索马里政府最终必须自己同肯尼亚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还强调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索马里政府怀疑这种做法,但愿意看看这种方法能够导致什么结果。它利用 1962 年 7 月的独立日庆祝会,邀请肯尼亚的两个非洲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到摩加迪沙进行非正式的会谈。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一行人首先到达,在他们之后不久,罗纳德·恩加拉和其他的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领导人也应邀前来访问。从社交方面看,访问是很成功,这些贵宾受到宴请,气氛非常真挚。在这种情况下,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肯雅塔和恩加拉都获得了"索马里团结之星"勋章。

乔莫·肯雅塔在几次会谈和公开讲话中都强调指出,他认为北部地区是肯尼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整个争论是肯尼亚的内政问题。恩加拉的立场相同,虽然他用词不那么斩钉截铁。索马里方面的发言人对于争议地区是"肯尼亚的组成部分"的观点进行反驳,着重说明在肯尼亚的整个行政管理的历史上,这个地区一直被当做一个单独的实体。他们重申索马里愿意尊重北部边区各个部落的愿望,双方意见不一,而又争相表示对计划中的东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共和国最后都将被包括进去)的热情,因此索马里总统认为必须讲一些要求大家谨慎行事的话。他在一次关于评价泛非洲主义的辛辣而雄辩的发言中,忧伤地总结说,影响非洲的有效统一的最根本的障碍,是"非洲各国的统治者不愿意约束他们的权力和取消他们的人为的殖民地边界"[27]。

这些直接会谈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关于共和国参加东非联邦的初步讨论也遇到障碍。当时,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关于建立联邦的时间顺序问题。毫无疑问,联邦问题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因为即使只是为东非联邦建立一个核心,也要克服许多其他的障碍。问题

在于时序。双方都同意,如果索马里共和国参加计划中的联邦,那么所有的索马里领土将在其中组成一个单一的领土单位。肯尼亚领导人认为这个局部的索马里统一问题应当在共和国加入联邦之后实行,索马里领导人则认为因为它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不好,坚持应该颠倒顺序。这看来只是一个细微的争论,但由于东非联邦还是一个没有实现的目标,当时双方的态度都很强硬,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摩加迪沙政府相信它在北部边区的同族会选择独立,并且与共和国合并,因此继续促使英国加速任命调查委员会和实现预期这个委员会将要作出的结论。在此期间,索马里共和国希望不让肯尼亚北部边区发生任何可能使人对这个争执产生偏见的变化,因而认为有必要多次提醒英国政府记住它在兰开斯特大厦会议上所作的保证,即在此期间,“关于北部边区的地位,或者它的行政安排,不应当有变动”。

这个期待已久的调查委员会由一个尼日利亚法官和一个加拿大将军组成,在10月份终于抵达肯尼亚。它以值得称赞的敏捷完成了听取证词的工作;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大约六个星期后,很顺利地出版了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们发现[28],北部边区的索马里人(据委员会估计,占62%)“几乎一致”赞成脱离肯尼亚,“最终”目的是加入索马里共和国。这也是这个地区的其他较小的穆斯林居民中大部分人共同的愿望(主要是盖拉族穆斯林)。对马萨比特区的一些奥罗莫族、莫亚累区的非穆斯林的博兰族,以及加里萨区塔纳河沿岸的从事农耕的波科莫族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果却相反,这群人愿意继续留在肯尼亚,参加这个国家的立宪进程。还有几个较小的地区同时存在两种意见。然而,总的来说,穆斯林(索马里和相关民族)赞成脱离,而非穆斯林(主是盖拉族)赞成留在肯尼亚。有一个重要事例能够说明索马里人要求同共和国合并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虽然盖拉族的主体在埃塞俄比亚,但是证词记录中“没有迹象”表明埃塞俄比亚对这个地区的未来地位有“任何关心”。

这个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大部分是已经预料到的,但是,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句话使索马里民族主义者特别焦虑。这句话是,已经收集这

些证据的"前提是,在肯尼亚获得独立以前根本不讨论分离问题"。这个说法显然来自委员们得到的秘密指示。之前,殖民大臣在肯尼亚立宪会议上宣布决定成立委员会时,是没有这句话的,而且看起来,这个说法违背了当时英国表示要在肯尼亚独立之前做出决定的诺言。不管怎样看待英国政府在整个问题上的做法,它给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指示看来肯定是对索马里的分离要求采取强硬态度。英国外交部通过驻摩加迪沙大使馆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也表现出了这一特点。同时,尽管索马里的主张得到了一些英国报纸的支持,但是这种主张对于肯尼亚甚至是已知的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领袖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吸引力。总的气氛是没有什么希望。

尽管如此,索马里政府仍然希望英国政府会尊重它在肯尼亚立宪会议上许下的诺言,同时,它又受到北部边区委员会调查结论的鼓舞。于是它加紧努力,敦促英国执行它已经同意的决定。为了这个目的,尽管英国有点勉强,索马里总理还是在这一年的年末访问了伦敦,同麦克米伦先生和外交大臣进行了简短的会谈。这些活动对于澄清局势没有什么帮助。

最后,1963 年 3 月,英国新任的殖民大臣邓肯·桑迪兹(Duncan Sandys)先生宣布了英国政府的决定。这个决定使内罗毕(Nairobi)和亚的斯亚贝巴政府很满意,而使索马里政府感到失望。这个决定把北部边区纳入了肯尼亚的地区建制,即建立一个新的以索马里人为主体的东北地区,这个地区的索马里人享有同肯尼亚其他六个地区已经得到的同样程度的地方自治。这个决定与其说是在实行北部边区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不如说是在实行肯尼亚地方边界委员会[29]的建议,它不仅没有考虑索马里分离主义者的要求,而且还把与索马里人有着同样目标的几个穆斯林部落从这个新区里分割出去。英国还想玩弄手段,所以没有明确表示这究竟是不是英国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但是,很难弄懂英国以后怎么能够既同意索马里人同肯尼亚分离,而又不严重危害它同肯尼亚及埃塞俄比亚的关系。

无论英国政府当时是否认为这件事已经最终结束,刚刚筹划的这

种安排只能进一步引起索马里舆论的反对，并且使所有领取英国薪金的酋长和地方官员都提出辞职。肯尼亚境内的索马里部落也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地区议会的选举。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前几个月已经非常紧张的索马里共和国与英国的关系，这时迅速恶化了。索马里共和国舆论强烈要求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在日益强烈的反对下，舍马克博士的政府若要继续执政的话，除此以外几乎无路可走。在通过外交手段进行了异常频繁的交涉之后，英国大使在最后关头告诉索马里总理说，他已经得到通知，英国即将提出新建议。英国政府显然已经决定改变它的立场。然而新建议的内容却成了只有学术界才会感兴趣的问题，因为英国大使交给索马里总理的这个给人带来希望的口信，不久就被大使本人的声明所否定了。大使的声明说，英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舍马克博士表现了惊人的克制和对于英国外交史的可以原谅的无知，他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怀疑是否有任何其他的英国大使曾经受到这样的对待。[30] 1963 年 3 月 12 日，索马里共和国同英国正式断绝关系。

这次断交使这两个国家都损失了一些特权。索马里共和国放弃了每年从英国得到的数目虽小却很有用的 150 万英镑援助。英国则丧失了飞越索马里领空的权利，并被迫关闭英国广播公司在柏培拉的强大的中东地区转播站。英国显然已决定，不管它从保持与索马里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中能得到什么利益，也不管人们认为它对肯尼亚的索马里人，或者对前英属索马里的人民应该负什么责任，英国反正不能因此而损坏它同埃塞俄比亚的长期协定，也不能割让大英联邦的新领地肯尼亚的领土。这个决定无疑是根据下述假设作出的，即有争议的肯尼亚北部边区可能不会发生暴乱，万一发生的话，暴乱造成的局势也是能够加以控制的，而不至于危害英国的利益。从长期来看，这些假设的准确性怎么样，仍无法作出肯定的预言。

然而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英国同索马里共和国的断交是可以避免的。这当然不是轻率地、不加分析地断定索马里共和国的行动太草率，而是要指出英国政府的行动太不果断了、太迟缓了。在 1962 年肯

尼亚立宪会议之前的好几年,北部边区政府曾连续报告索马里人情绪的动向和强度。如果认真注意这些报告的话,那么英国政府显然有可能为北部边区最终脱离肯尼亚创造条件。在那个阶段,这样做还不会遭到肯尼亚的非洲人舆论的强烈反对。但是,英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所以问题就遗留下来了,一直发展到除非疏远这一方或者另一方、否则就不能解决的地步。

在事态发展到相当晚的阶段时,肯尼亚北部边区的索马里人在摩加迪沙配合下所采取的实际上是消极抵制的中间道路。这也不见得是当时形势下的最好的策略。当然,做事后诸葛是很容易的。对北部边区的索马里人来说,更有利的做法可能是采取更加激烈的、更加不妥协的策略;或者采取另一个办法,即全力参加新的立宪安排,以便利用新的地区议会作讲台并采取英国政府可能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提出分裂的要求。如果要使后一种做法能被索马里所接受,那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和了解,但英国政府在这个争端中的做法却使这种相互信任和了解成为不可能。

最后,对以下的情况进行猜测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索马里共和国在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同英国已有长期联系的基础上加入大英联邦,那么这个争端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这种情况无疑会使英国政府的处境甚至更加困难,但它可能提供一种环境,使英国能更公平地听取肯尼亚索马里人的愿望。

泛非洲主义及一些更广泛的问题

索马里共和国在独立之后的三年中,把注意力集中于肯尼亚北部边区问题,结果却一无所获。它不仅没能实现同肯尼亚境内的同胞联合的具体目标,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在泛非世界中陷于一种不值得羡慕的孤立地位。

这个发展是不无讽刺意味的。过去,在他们的那种民族主义运动的特殊环境中,索马里人对其他地区的非洲民族主义一般是不怎么关心的。自从第一个索马里政府在 1956 年建立,特别是 1960 年共和国

成立以来,情况都发生了变化。这些事态的发展大大扩大了索马里人的兴趣和经验,而且迫使索马里民族主义者设法适应这种席卷非洲大陆的、日益高涨的泛非主义浪潮,并在其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共和国的宪法已经预告了这个新的趋向。这部宪法提出了促进全非统一和泛索马里统一双重目标,以及同伊斯兰教世界保持友好关系的义务。泛非主义和泛索马里主义二者之间看来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因为索马里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两个目标是互为补充的,并且也认为索马里的统一就是正当地在一个地区运用全非统一这个总的、更加广泛的原则。前英国保护领地和意属索马里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受到了索马里人的欢迎,他们把这次合并当做既是泛索马里的一个成就,也是泛非主义的一个成就。尽管还存在着完整性的问题,他们仍然欢欣鼓舞地称这次合并为非洲统一的少数几个成功的事例之一。最初,这种看法在共和国之外得到某些好意的注视,但是没有引起它认为应该得到的那么多的注意或兴趣。

索马里人对于有效地实现非洲统一的先决条件所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特有的文化遗产。反映他们基本思想的一个假设是:有生命力的政治联合需要共同的文化特征作为基础。1962 年 7 月,乔莫·肯雅塔访问摩加迪沙时,索马里总统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学会了判断两个独立国家之间政治联合是否有效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普通人都必须能够在经济、种族以及文化方面看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同新秩序的一致性。”

而且,在索马里看来,文化上的一致和民主似乎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在同一个讲话中,阿丹总统接着又说:

“这也许是最难学的一课,但是,如果我们非洲人想要自豪地在国际事务中占有我们的地位,我们就必须做更多的事,而不是只在口头上尊重我们社会中的普通男人和女人的感情。”[31]

关于非洲统一的这种观点,反映了索马里文化统一的悠久传统,也反映了从民族发展成为国家的愿望(而建立国家是泛索马里目标的一个难题)。但是这种观点同非洲其他国家的民族统一的进程却是背道

而驰的。因为非洲其他地区的普遍性问题是,他们是把存在多种语言和多种部落,而且领土边界已经在殖民主义时期被随意确定的国家,建设成为民族国家。索马里民族主义和非洲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区别,虽则是有意思的学术问题,但是这种区别本身并没有重要到足以使索马里人在全非洲舆论中陷入孤立境地。真正的困难在于索马里人想要与他们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同胞联合起来,而非洲的新领导人却强烈地要维护殖民国家划定的边界,因而,这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对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来说,泛索马里运动威胁到了非洲国家的领土主权。不能奢望肯尼亚领导人愿意放弃已经取得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作为民族主义者通过斗争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手里赢得的。埃塞俄比亚的立场相当不同,但是,索马里的目标也会使埃塞俄比亚曾经为之同意大利进行过长期斗争的边界再次成为问题。其他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往往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而无视埃塞俄比亚过去在索马里被瓜分时所扮演的角色。此外,为索马里陈述理由的这些人在全非洲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并没有起过什么突出的作用,而他们的对手——乔莫·肯雅塔、汤姆·姆博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皇帝却都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非常显著地起过这种作用。另一个不利于索马里人的重要因素是,他们传统的种族优越感所引起的反感。

这些就是在泛非范围内对索马里争端进行评价所涉及的更广泛的问题的一些思考,也是索马里代表在非洲国家在其后相继举行的会议争取支持时必须对付的问题。从索马里独立到它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时期中,它所取得成果很不能鼓舞人心。在索马里独立之前,1960年1月,在突尼斯召开的全非洲人民大会曾经通过了一个支持泛索马里主义的决定。但也就在第二年的3月,在开罗召开的全非洲人民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上,索马里代表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这次会议为其他的全非洲性活动定下了调子。因此,在两个月后的蒙罗维亚会议上,索马里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就是推动通过了一项动议,敦促索马里共和国同埃塞俄比亚解决边界争端;在9月召开的贝尔格莱德会议上,索马里的主张也没有得到明确的支持;同年10月,阿丹·阿卜杜勒总统对加

纳进行国事访问时,从这个有影响的地方传来了一线希望。两位总统发布的联合公报主张建立非洲联邦作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同时也强调"非常有必要恢复被殖民主义任意破坏的种族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联系"。在这一点上,恩克鲁玛博士显然因为他自己在加纳-多哥边界的埃维问题上的利益而受到影响。[32] 然而,从这个声明中可能得到的安慰很快消失了,因为很快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没有一个非洲国家会认为埃塞俄比亚在对索马里的瓜分中扮演了殖民主义者的角色,甚至更为明显的是,没有人打算将肯尼亚非洲民族主义者对肯尼亚北部边区的要求看做是具有任何殖民主义性质的。

随后召开的一些非洲会议同样令人失望,尽管不久就出现了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比较现实的建议。1962 年 1 月,拉各斯(Lagos)会议极力主张索马里边界争端应交给将要建立的、解决非洲国家之间纠纷的仲裁机构。东非和中非泛非运动的 2 月会议在赞成恩克鲁玛的联邦主义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然而是空想的决议,即扩展设想中的东非联邦把索马里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也包括进去,从而在这个框架内实现索马里各个地区的统一。这个建议后来引起了操作上的困难,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关于索马里究竟应该在共和国加入联邦之前恢复统一,还是在加入联邦以后恢复统一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的谈判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 1963 年 2 月在坦噶尼喀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非常大会,尽管由于提出索马里问题而产生了令人不快的争论,却出乎意料地通过了一个支持肯尼亚北部边区的分离运动的动议。这次会议拒绝同意索马里把埃塞俄比亚称为帝国主义,这比较符合其他非洲会议的总体趋势。

这个含糊的结果似乎给了索马里小小的安慰。不过,5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那次重要高峰会议,最终完全毁掉了这种安慰。由于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共和国之间长期存在边界问题和互相指责,而且双方关系持续紧张,索马里一开始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后来妥协了。在会议上,索马里人由于对手的策划而陷入了孤立境地,同时索马里总统的致辞有勇无谋地谈到埃塞俄比亚在瓜分索马里中所起到的作用时受

到了冷遇,这些都是无法掩盖的。[33]埃塞俄比亚在策略上赢得了出色的胜利。索马里共和国由于刚刚在北部边区问题上遭到挫折,它的泛索马里理想又遭到一致的反对,因此它不顾欧加登地区对埃塞俄比亚统治的反对日益增长,而开始谋求同它的强大的邻国和解。很难预料这样一种趋向能够维持多久。

在结束关于索马里共和国在非洲舆论界怎样日益孤立的介绍之前,必须简单提一下埃及的作用。埃及作为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和参与索马里事务最多的非洲国家,它的处境显然是艰难的。开罗广播电台对索马里和肯尼亚双方领导人都表示支持,这种笨拙的做法就明显地表现了埃及的困境。它一方面通过阿拉伯语和索马里语广播表示支持索马里领导人,另一方面通过斯瓦希里语广播表示支持肯尼亚领导人。但不久,索马里和肯尼亚双方都知道了埃及对另一方讲了什么话,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埃及只好放弃了这个策略。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埃及的立场是一种尴尬的中立。没有一个渴望在泛非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的国家能够承诺站在索马里一边。

孤立

支持索马里观点的那些声明的价值是成问题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索马里独立以来的三年中,它的对手们协调一致的反对造成的损害是沉重的。由于对非洲舆论作出了正确的估计,英国的地位得到了加强。1963 年 8 月,肯尼亚和索马里代表在由英国的倡导而在罗马举行的一次徒劳无益的会议上,进一步表现了非洲舆论的间接影响。英国是由于它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在国内受到了一些批评而召集这次会议的。它显然希望缓和北部边区内部以及肯尼亚和索马里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英国代表团团长在会上说明,英国政府认为,英国不同意北部边区分离是符合亚的斯亚贝巴会议表现出来的非洲的共同意见的。索马里政府建议,在作出最后决定以前,有争议地区应该由索马里和肯尼亚共管或者委托联合国管理,这项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会谈随之破裂。

到 1963 年末，索马里共和国在非洲事务中成为不合群的角色。肯尼亚独立了。从索马里的观点来看，北部边区问题没有解决，而某些英国官员似乎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一方弃权的情况下解决了。然而，尽管如此，索马里在联合国中，在同世界上两大阵营的来往中，一直遵循着亚非模式的不结盟政策。而且，在泛非主义阵营内部，它一般都会站在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那些非洲国家一边，尽管这两个邻国之间存在严重的局部性的争议。泛索马里问题对索马里的民族情绪来说，显然是个重大问题。但是它不能因为这个问题而不顾共和国的其他利益。自从独立以来，它从东西方都取得了慷慨的馈赠和贷款。确实，到了 1963 年的年中，外国援助已经使它有可能开始一个很有雄心的五年发展计划(1963—1967)，这项计划的总开支达 7 000 万英镑，其中约半数已经有了资金。

由于能够吸引如此大量的援助，也许可以证明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个政策就是，不让泛索马里主义引起的争执影响索马里共和国的总的立场，即索马里是亚非阵营中自主同埃塞俄比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国家。然而，索马里青年联盟政府的反对派并不这样看问题；至少有一部分人准备牺牲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利益而在北部边区问题上采取更坚定的行动。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是以最文明的方式进行的)绝没有减轻英国的行动对索马里自尊心所造成的严重伤害。盘算一下英国过去处理索马里事务的长期历史，索马里公众对英国及其西方盟国感到非常愤怒。由于人们指责青年联盟政府在北部边区问题上领导不力，以及它在处理国内问题上日益不得人心，政府急于设法采取某种引人注目的行动，以便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之前恢复声望和加强地位。

在这种充满愤怒和失望的情况下，索马里人一开始就认为，中国会提供支援，因为中国对索马里事务已经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而且没有对埃塞俄比亚承担与索马里不相容的义务。毫无疑问，索马里总理在 1963 年年中访问中国和印度的时候，心里一定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他已经同这两个国家都签订了贸易和援助协定。因此，在达成这些协

议之后，中国似乎很可能紧接着就会提供某些引人注目的新援助。从东西方关系来看，这种援助可能恢复摩加迪沙政府下降的威信。然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舍马克博士不是从中国而是从苏联找到了他希望用来重新获得人民支持的金钱。1963 年 11 月，共和国正式宣布，它已经拒绝西方提供的大约 650 万英镑的军事援助，而同意接受总额将近 1 100 万英镑的苏联军事援助。

这个行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苏联已经明确改变了它对索马里争端的政策，还有待观察。然而人们很快就觉察到了它在当地的影响。11 月，在市议会选举中，执政党在竞选的 904 个席位中赢得了 665 个席位(占 74%)，而它的主要对手索马里国民大会党获得了 105 个席位。当时同埃塞俄比亚的一系列边境事件已经爆发为公开的战争，欧加登州重新陷入骚乱。接下来，在 1964 年 3 月 30 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索马里青年联盟所得到的票数略有减少，但是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地位(索马里青年联盟 69 个席位，独立立宪党 9 个席位，其他党派 8 个席位)。这个选举结果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并且表明索马里青年联盟如何在一定有利于政府的形势下有效地恢复了大部分民众对它的支持。同时，进行选举的方式以及反对党派参加选举的广泛程度，再一次肯定了索马里共和国继续奉行议会民主的原则。这样，索马里共和国在处理国内政治生活的做法上，同它在处理对外的民族主义利益一样，也使它在多数邻国中陷入孤立。

文官政府的最后阶段

选举后组建的新政府中的成员分布引起了索马里青年联盟中达鲁德人内部长期的也更为激烈的冲突。这必然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很是具有领袖气质和胆略的政治家阿卜杜勒-拉扎克·侯赛因('Abd ar-Razaq Husseyn)取代了阿卜杜勒-拉希德成为总理，并极力推行一系列的行政改革。然而，只要有机会，退职了的总理及其派系就会在国民议会中给政府制造严重的障碍。由于国民议会投票都是无记名的，这就为暗中使坏提供了条件，因此阿卜杜勒-拉扎克要控制其所在的、纪律

涣散的执政党是极其困难的(何况该党中有些人是脱离其他党派而过来的)。该党在国民议会中占有 105 个席位。

经历好几次内阁重组后,阿卜杜勒-拉扎克及其支持者直到 1967 年 6 月总统大选的时候还能掌控着权力。阿丹·阿卜杜勒·伊斯曼总统很有机会再次当选。他的家庭与总理家有姻亲关系,他于是得到了阿卜杜勒-拉扎克的支持。主要的竞争候选人就是前总理阿卜杜勒-拉希德,他当时已经和伊萨克政治家、索马里民族联盟前领导人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此时已经正式成为索马里青年联盟成员)结成联盟关系。最终,阿卜杜勒-拉希德获得总统职位,并在 7 月召集其同盟者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组建政府。因此,英国人培训起来的北方人开始操控政府了,且在部长分配上选择代表主要的游牧世系集团的人。

索马里青年联盟内达鲁德领导人之间长期存在分化,迪尔、伊萨克和哈维耶人的脆弱联盟也失去了基础,索马里民族联盟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反对达鲁德人的政党,也成为索马里青年联盟的累赘。在南方总统和北方总理联合统治下,沿着南北分界线的分化也难以为继了。因此,索马里出现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倾向,即回到地方世系竞争中去了。在当时,扩大了的主要世系集团已经消解为一种更大集团的构成部分了。这种小团体派系主义的重现之时,恰好也是很多城市精英因为泛索马里斗争没有成效而日益感到理想破灭、挫折之际。

在对泛索马里问题的整个局势做出评估后,新总理感到不安。在肯尼亚北部,索马里人的游击行动(索马里人称之为 *shifta*,也就是土匪战争的意思)得到相关氏族的支持。在英国没能贯彻 1962 年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后,索马里人的游击行动就已出现,但是,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且给当地索马里老百姓带来了严重的损失[34]。吉布提的情况则更为严重。在摩加迪沙的总统选举前两个月,吉布提进行了公投,这也是法国当局安排的。公投的结果是索马里居民(至少是那里被允许投票的人)又一次同意法国统治的继续存在,反对完全独立。阿法尔人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控制索马里人长期享有的那种政治主动性,并在伤口

上撒盐，将法属索马里海岸改名为“阿法尔人和伊赛人的法国领地”[35]。没有任何一件事能比这更能直接反映出吉布提在政治上出现的新的复杂形势。

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的前任曾支持大胆推进泛索马里事业，但埃加勒却很少这样做，他想通过更为温和的外交行动来实现部分目标。在9月金沙萨(Kinshasa)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会议上与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有过鼓舞人心的互动之后，埃加勒总理于10月在坦桑尼亚阿茹沙(Arusha)会见了肯雅塔总统，双方同意立即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在肯尼亚北方边区实现和平，并同意经过卡翁达(Kaunda)总统的协调展开进一步的谈判以便寻求问题的彻底解决。与这些发展相一致，索马里与英国(在“土匪战争”中给肯尼亚人提供军事支持)的外交关系也得到了恢复。由于索马里共和国在军事上越来越依赖于苏联，不可避免地就会给人造成了一种反西方的印象，为此，索马里也采取了措施削弱这种反西方形象。

虽然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宣称其新外交政策并没有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做出让步，事实上代表了对索马里立场的一种新的理解，但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索马里的这种新外交则被视为一种降服。这种观点自然引起了索马里总理在摩加迪沙的反对派的兴趣，有些人指责总理是个“卖国贼”。然而，由于政府控制着财政资源，因此还是在这种批评声中存活了下来，并小心地寻求一种平衡以获得充分的支持，投入到为1969年3月举行大选而作的准备工作中。

为压制建立在一个世系基础上的政党、鼓励全国性的政党，索马里采取了新的选举规则。每个选区都定下一个“选举商数”，其数值是由投票总数除以席位数来决定的。政党只有获得超过该“选举商数”的票数才能获得席位。即将到来的竞争和政治活动引起了索马里民族的极大关注，这次政治活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很多杰出的文职公务人员辞去职位而成为候选人。选举活动也耗资甚巨，很多活动动辄都花费1.5万英镑(当时的国家预算是1 500万英镑)。政府调动了所有资源投入此次活动。备受尊重的警察局局长穆罕默德·阿卜希尔(Muhammad

Abshir)将军辞去了职务,因为拒绝动用警察交通工具运送索马里青年联盟投票人到各个投票站去。期间,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混乱和骚乱,据报道约有 50 人丧生。尽管采用了新的选举规则,但还是有 1 002 个候选人,代表 62 个政党来竞争 123 个席位。索马里青年联盟获得 73 席,失势的索马里民族联盟获得 11 席,独立立宪党仅获 3 席。索马里民族联盟和独立立宪党的结果清楚地显示出,迪吉尔和拉汉文人通过全国性政党而非他们本身的地方政党更能实现其利益。与往常一样,国民议会一开,就有大量的党员脱离党籍加入到政府中来,希望能分享职位。副手们的临阵倒戈让阿卜杜勒-拉扎克·哈吉·侯赛因成为国民议会中唯一的反对派成员!同绝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索马里共和国最终成为一个一党制国家。

第九章　索马里革命(1969—1976)

军事政变

1969 年的选举以压倒性的优势将权力交付给索马里青年联盟，但也引起了诸多不满。就选民来说，虽然互相竞争的世系派别支持在不同政党旗帜下的候选人，保护各自的赌注，但很多候选人没能成功地返回摩加迪沙继续担任委托代表。在这些没能获得选举成功的候选人中，有很多人都在选举中花了大力气，也都是强势的、雄心勃勃的人物。选举的过程激发了这些人向法院提交大量关于选举的投诉，抱怨不迭。最高法院给出了政府的答复，即与先前的决定不同，此时的最高法院无权裁决此类问题。这自然增加了一些没能在议会中获得席位者的挫折感。与此同时，虽然索马里青年联盟主导着议会，但他们的绝对人数使政党纪律问题更加严重。这也使得埃加勒比起前任来说更加依赖于政府可控制的资金数额。[1] 因此，议会外的反对者和批评者更是激烈地抨击腐败和裙带关系。在他们看来，腐败和裙带关系现在蔓延到各个层级的政府。

这种不满和挫折感绝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西化了的精英们。议会民主进程本来很好地和传统索马里政治机构结合起来，开始的时候也是生气勃勃充满希望，但现在已经明显变味了。对所有公民来说，国民议

会不再是自由言论和公平竞争的象征,它此时被广泛地嘲笑为污秽的集市,议员们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选票交易,不关心那些曾投票给他们的选民的利益。议员们出入有高级轿车接送,携带着似乎有魔力的国民议会登记许可证(Assemblea Nazionale,简称 A. N.),首都中充满怨恨的穷人们编了个冷幽默,把 A. N. 变为了“anna nolabay”,意为“我好就行,不管他人”。而一个在摩加迪沙颇为流行的故事,反映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并做出驾驶车辆的动作,政府总部入口处的警卫一脸困惑地拦住了他:“你对你现在做的事是怎么想的?”警卫挑衅地问道。骑在人身上的那个人回答道:“哦,我注意到,要是能进这里的话,你就得带个司机。”在那些不再抱有幻想的批评者看来,民主已经陷入商业化的无政府状态中了。要想把国家从贫穷、不安全和无效率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就急需要有新型的强势统治。[2] 埃加勒总理和阿卜杜勒-拉希德总统对这些充满危险的信号极其担心。在广失人心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承认需要采取一种危险的、高压的极权统治。军事干预的谣言也广为流传。尤其是在那些被疏远的青年精英中间,他们已经多次讨论能将国家从目前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政府领导人的可能人选。其中一个人选就是前警察局局长,穆罕默德·阿卜希尔将军,尽管人们都知道他不愿意违宪。

结果,极其突然发生的政变完全出乎人的意料。1969 年 10 月 15 日,埃加勒总理到海外访问,而阿卜杜勒-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在视察索马里北部拉斯阿诺德(Las Anod)受旱地区时,被自己的一名警卫枪杀身亡。一得知这个消息,总理就匆忙返回摩加迪沙,为了寻求支持,他召集了所有能够依靠的人并组织新总统的选举。总理提出的候选人是一名竞选老手,也是他的亲密伙伴——哈吉·穆塞·博克(Haji Muse Boqor)。在 10 月 20 日深夜会议中,政党的核心成员达成一致,推选博克为他们的正式候选人,事实上也就保证了哈吉·穆塞·博克成为总统,以及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Muhammad Haji Ibrahim Igal)再次被任命为总理。那些一直紧密关注局势发展的

军官们决定开始行动。

10 月 21 日凌晨,军队占领了整个首都的主要场所,政府成员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家及个人遭到扣押(或者与穆罕默德·阿卜希尔将军一样,处于软禁中)。宪法遭到搁置,最高法院被取缔,国民议会也被关闭,所有的政党被宣布为非法,军人们成立了最高革命委员会(Supreme Revolutionary Council)来进行统治。新政权的目标是要消除腐败和部落裙带关系,重建一个公正的、令人尊敬的社会,真正关注所有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对外事务上,新政权尊重现存的条约,继续坚持为索马里统一而斗争,并对反殖民主义,给予解放运动进一步的支持。正是出于这样的期冀,国家重新命名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 11 月 1 日正式宣布。正如早前预期的那样,委员会的主席为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uhammad Siyad Barre,他于 1965 年继达乌德将军后担任军队司令),并有 24 位其他军官辅助,这些军官的军衔从少将到上尉不等,其中还有两位原本就担任副主席的军官,一位就是贾马·阿里·科尔谢尔(Jama 'Ali Korshell)将军。贾马·阿里·科尔谢尔继穆罕默德·阿卜希尔担任警察局局长,他的职位体现的是一种顺从,而不是说警察部队在既成事实的政变中进行了积极地参与(1970 年 4 月,科尔谢尔不被信任并被捕。)

最高革命委员会中有大量并没有多大才能的上校,而几个曾在早期鼓动军事政变的年轻上校则不在最高革命委员会之列。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被广泛地解读为西亚德将军决心牢牢地控制新政府。我们将会看到,后来的发展充分地验证了这一观点。最高革命委员会掌控权力两周后宣布成立 14 人组成的"秘书"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具有决策而非辅助权力,并将对日常行政负责。除了副主席贾马·阿里·科尔谢尔将军对内政部负责外,秘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是年轻的文职公务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成员的选择主要是看能力而非着眼于对国家传统分化的部落和氏族进行平衡。最高革命委员会立即就开始强有力地恢复了政府、经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最高革命委员会的目标就

是要清除污秽腐败之所，要采取务实的态度携手解决人民的真正敌人：贫穷、疾病和无知，恢复索马里人的美德。

为了实现此目标，文职的区、州领导人都被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军官和警官所取代；机警的军事人员被派到各部对账目和当前的业务进行详细的督察；驻外使馆人员被要求继续留任。有违法乱纪嫌疑的政治家和官员则遭到了逮捕和调查，并要进行司法审判。地区的新领导人被任命为地方革命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地方革命委员会要督促生产活动。这种普遍侧重于将公共资源导向索马里所急需的真正发展上的趋向，反映在了情报部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中(此时的情报部也负责“公共导向”)。政府也立即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其中包括调动一些失业的、贫穷的、生活在城市里的处于“边缘”的部落民众的积极性，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服装，并让他们在农场里工作，或从事修路和其他一些公共项目。政府也邀请一些民众代表，让他们批评国家在过去的错误管理，也让他们就未来改进提出建议。与此同时，部族世系间的宿仇在过去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团结，为了阻止世系间没完没了的宿仇，国家还引进了死刑以取代集团间传统的血偿制度。

索马里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军事政变一周年(1970 年 10 月)的时候，新政府大力拨乱反正，为国家的未来坚实基础的努力有了更为具体的意识形态倾向，西亚德将军在此时宣布，索马里今后将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立场的选择在此前政变转变为革命的进程中就已初露端倪，也反映出索马里军队越来越依赖于苏联装备和顾问，而警察部队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系只起辅助作用。加入新政权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转向苏联集团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先前的文职政府总体上倾向于西方(尽管，或者可能也就是因为 1963 年苏联的军事援助协议)。科学社会主义(索马里语写古文 banti-wadaagga ‘ilmi ku dhisan，字面意思是“基于智慧上的共同富裕”)[3] 此时成为行政政策的基石，紧密地与团结、“统一”、“依靠自己”、“自力更生”等观念联系起来[4]。科学社会主义的

提出，也伴随着对部落主义的强烈谴责，就像官方口号简洁表明的那样："社会主义将统一分化力量"。从前文职政府领取津贴的地方部族首领被获得"追求和平者"(*nabad-doon*)这一打动人心的封号的长老所取代。无论是什么级别，这种新任命都是由官方决定的。政府也同样坚定地废除血偿制度。那些倾向于从事与传统世系和氏族组织相联系的这种或那种部落主义行动的人都会受到警告，他们要交付巨额罚金或要到监狱服刑。为了抑制城市的部落主义，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承诺将给那些在城市里去世的且没有亲戚可以帮助安葬的人提供安葬费。

1970 年末 1971 年初，索马里共和国的主要中心地区举行了一些游行活动，代表着"部落主义、腐败、裙带关系和暴政"的假人被象征性焚烧或埋葬掉。这种反对部落主义的全国性运动(*plol*)或"应急计划"(*parnaamaaj*)在此期间达到高潮。先前文职政府给予容忍的委婉用词"ex"(如 ex-clan，参见第 168 页[①]的内容)被宣布为非法，同志(*Jalle*，意即朋友)一词成为流行用语，官方号召用同志来取代传统的礼貌用语"兄弟"(*itta'adeer*)。"兄弟"一词因为带有部落主义、血缘关系的意涵而不再被提倡。无论是宗教上还是世俗上的，早前的索马里民族主义者曾呼吁建立具有超越部落界限的索马里人的兄弟情谊，以将不同氏族和世系的人们团结起来。现在所强调的朋友关系是在无差别的索马里民族认同基础上建立合作和团结，让索马里彻底不再有传统上的分化。

对西亚德将军来说，随着民众最初对政变的支持热情逐渐消退，官方这种意识形态的和其他一些抑制分化措施的出现变得日益重要。由于受到中国、朝鲜、纳赛尔主义者以及苏联的影响，举国上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针对国家元首的个人崇拜。索马里官方出版的西亚德传记将西亚德推向了神坛，称西亚德为"战无不胜的领导人"(*Guulwaadde*)，勇敢地领导了索马里反对敌人的不屈斗争。宣传海报、诗歌、颂歌和赞词

---

① 正文中所提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编者注

迅速地在全国铺展开来,只是单调地宣扬这位索马里英雄般的"父亲",而索马里之母就是革命。由于有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激励,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团结被称为国家在不断奋斗前进中获得繁荣和成功的源泉。更为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的花朵"(即官方指定的贫困儿童,常常还是孤儿。他们从摩加迪沙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被召集到革命青年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得到食物、衣服、教育和培训,以承担建设国家的任务)。这些人成为理想的新公民,他们是纯洁地为国家奉献的人。这些人让世代相传的亲族效忠黯然失色。

摘自西亚德众多公开演说词中的简短教诲,诸如"少说多做"(*haddalyar iyo hawlweyri*)等醒目地出现在国家日报《十月之星》(*October Star*)上。这些语录还被汇总成为一本蓝白相间的小手册,狂热的官员将这本手册广为发送并自豪地加以展示。索马里广播在日常节目中也突出地广播国家元首的语录。同样,将军的公开出现总是呈现出精心安排的喜悦场景,为他献身的臣民们向元首欢呼、奉承、庆祝和鞠躬致敬。这些群众在元首面前常常跳着朝鲜舞。这种狂热的偶像崇拜与索马里传统游牧文化中的平等主义格格不入,也与元首在面对面接待同志和外国来访者所精心展现出来的谦和直率形成鲜明的对比。

元首在公开场合出现时的盛况和典礼也反衬出元首自己简朴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广为人知的对穷人和下层群众的关心及教诲。因此,尽管元首得意于他是一个"仁善的领导人"(*buono condottorre*,一幅宣传画上的用词),西亚德将军还是成功地维持了他的公众形象,即他是一个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人。

国家控制

这种个人崇拜旨在集聚人民群众的巨大能量,起辅助作用的是其他思想控制机构的大量出现。主席的政治处扩张为一个带有全国性的意识形态组织,并在全国设立了永久性的"指导中心"(*hamuunin*)。政府也希望民众在公共假日到这些中心来学习革命宗旨和方式。这些中

心的墙壁上挂有三幅画像：马克思、列宁和西亚德。为了能在地方灌输和维持这种革命热情，主席办公室的官员还得到了治安人员或"胜利先锋队"的协助。"胜利先锋队"是1972年夏成立的一个组织，该组织成员主要由失业人员组成。这些平民卫兵穿着亮绿色制服，眼神冷峻警惕。在组织地方力量支持（意识上或资金上）发展和"应急计划"方面，他们被寄予厚望。妇女分支主要从事社区和家庭福利工作。

在首都摩加迪沙，一所过去的军校成为培养高级公职骨干的国家最高指导中心。这所前军校被改名为"哈兰"（Halane），主要是为纪念一位索马里年轻中尉。这名中尉在1964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爆发短期冲突时为救国旗而牺牲。对在职人员的密集培训课程是与索马里发展规划学院的员工合作完成的。这些机构在培养和维持爱国热情上也得到了其他纠察是否违背官方政策的机构的支持和强化。在这些检查机构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和国家安全法庭（National Security Courts），这两个机构联合处理各种政治犯，包括裙带关系和部落主义问题（这点我们已经阐释过了），也包括处理诸如"缺乏革命热情"之类的指控和叛国罪行。国家安全局在一名接受过桑德赫斯特[①]（Sandhurst）和克格勃（K. G. B.）训练的指挥官领导下，享有随意逮捕的权力，有时也会因为私人恩怨而将某人斥为嫌疑犯。国家安全局还对公职人员进行监视，它所撰的报告对公职人员职位的升降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能监管并控制公共舆论，宣传机构也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国家禁止集会，个人想要去拜访外国人的家庭或想要参加外国使馆宴会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除了那些在这些琐碎控制中享有豁免权的人之外，那些与外国人有着友好往来的人常常会受到国家安全局的质询。由于国家在不受约束的文职政府时期处于流言阴谋漫天散布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为了进一步地监视对索马里持有敌意的外国政府，这些控制被加以合法化。反政府势力可能最经常被谴责为谣言制造者（*Afminshar*），

① 一所英国军校，位于英格兰南部小镇桑德赫斯特。——译者注

散布反对政权的恶毒流言的人会面临指控且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虽然很少有政治犯在监禁中遭到残酷虐待或死亡，但对那些西方化了的精英们和在前文职政府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来说，这种压抑的氛围尤其令人厌恶。在那些直言不讳者中，有很多只要能离开的都离开了索马里，到海外谋职，尤其是在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和肯尼亚。因此，这是一种"智力输出"，实际上耗尽了索马里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在那些急需要专业人才的领域。虽然那些继续忠心耿耿地在政府职能部门或从事商业的人也在追求自己人生的成功，但其他人则常常遭受牢狱之苦，并常常被安全部门搞得烦不胜烦。

国家安全局已成为向国家安全法院提供待审犯人的主要机构，而主管国家安全法院的是军官，这些军官很少或没有经过法律培训。这些法庭维护着粗鄙的正义，被告通常在法庭中几乎不享有什么权利。判决往往都是严苛的，而向元首请求开恩的结果常常都是被置之不理。

虽然日常犯有谋杀罪的罪犯通常是由射击小组来执行处决的，但也有好几次对犯有叛国罪的犯人进行公开处决。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是1972年7月，当时有两个将军(其中一个为副主席)因为受到企图推翻西亚德将军政权的指控而被枪决。这种对最高革命委员会内部争议问题的处理清楚地表明，西亚德将军的话就是法律，他不会容忍别人对他的违抗和不同意见。如果说这次强硬的判决搅动了国民心境的话，那么1975年1月公开对10名地方宗教舍赫的处决则产生了更大、更严重的后果，触及到了社会神经的更深处。这10名被处决的宗教人物因在清真寺传道反对开明的新法而遭到指控。这部新法与伊斯兰教传统相反，它让妇女和男人一样具有继承权。另外，受到指控的还有其他23名被判多年有期徒刑的人。发生此事之年正好是国际妇女年，索马里政府也借以表明其世俗的、改革的立场，但是代价则是索马里人的伊斯兰教认同问题以一种尖锐的形式凸显出来。这是一个关于伊斯兰教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兼容性的问题，我们稍后将给予更多的讨论。

虽然西亚德主席常常劝诫地方官员要做沟通的桥梁，要诚恳地将民众的思想和意愿转达给他，但无处不在的国家控制机构几乎阻绝了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有效对话。因此，这种互动不可避免地成为单方面的。政策确实经常有着变化(事实上，1977 年政策上有着巨大的调整)，部分也是出于对公众舆论的回应，但这种变革也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很难搞清楚公众在特定时期可接受的确切界限。缄默显然是最安全的策略，人们自然会告诉当局，当局所想就是他们所想听到的。

这些情况的出现要归因于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导的政府所具有的专制属性。尽管当局采取了繁复的高压手段，然而，政府本质上的这种独断专行模式仍然并没怎么触及占人口大多数的游牧民。尽管政府制定有力措施将游牧民族更安全地聚集在一起，但事实上他们依然难以驾驭。1974 年，先前国家划分出来的 8 个州被重新划分成 15 个州，下设 78 个区。有些区需要重新命名，但名字不能是部落(或氏族)的名字。政府的侧重点是安置地(*digmd*)，让安置地成为人们联系和身份确认的基本单位，以便进一步消除残留不去的亲族效忠。甚至对仍游牧的人群也采取了措施，鼓励他们将设在人们经常出入的取水点附近的指导中心看作是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心。婚配传统上会涉及互相竞争(常常暗地里充满着敌意)的世系，现在则由地方指导中心来管理，居民社区代替了新郎新娘的亲属。期望这些措施在游牧民中立即产生多大影响可能有点不切实际。因此，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游牧民的政治生活中，理论与实际之间还是有着相当大的鸿沟。

经济管理

采用同样强制的方式来应用科学社会主义管理国家经济，其情形也是一样的。游牧民各自都有个人所属的骆驼、牛羊群，他们是私营活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将剩余牲畜卖给索马里和阿拉伯人开办的面向阿拉伯和波斯湾国家市场的出口公司。但并不是所有的畜牧经济的交易都经由私营企业。基斯马尤(这是美国人建造的港口)就有苏联人建成的国有肉类罐头厂。政府机构控制着全国的皮革出口与贸易。出口货物中另一个支柱产品是香蕉作物，这些产品大部分是南索马里沿河地区的私营种植园生产的，有些种植园是阿拉伯和意大利人开办的，但

是出口被国家市场机构所垄断,由该机构给生产者分配出口配额。在水源较好的南索马里,私有的但通常也是小农庄所生产的所有谷物,同样是由农业发展公司(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收购,然后通过零售商以控制价出售,或者通过指导中心进行分配。每户农民都允许留下一定谷物以供家用。政府设有地方粮仓,通过这种国家控制市场的体制,禁止了追求私利的中间商。部分地,也是出于吸收政府财政,一些农业公司自己组建了农业合作社或团体,其中最为成功的是位于索马里共和国西北地区的埃尔-伯德勒(El Birdale)公社[5],它也是一个传统宗教中心。就像现实所表明的那样,这里当然也有国有农场,有些农场还使用犯人劳动。谢贝利河畔上的乔哈尔(Jowhar)还有国有糖料生产加工厂。在1975年大旱造成对资源产生无法预期的需求前,1974至1978年的五年发展计划决定在总预算中拨出30%(2亿英镑)来促进农业发展。政府对如下两个方面给予特别关注:救活处在垂死边缘的国有农场;建立合作社和应急计划的农业安置点,以吸收城镇失业人员和游牧经济中剩余人口(1975年旱灾后情势变得极为紧迫)。

城镇中有很多小型的私营公司,其中有一些公司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出现的,而国有大型工业公司(通常是外援建立的,如中国人建造的火柴厂)较少。1975年10月,绝大部分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和分配都国有化了,因此造成了间歇性的物资短缺。然而,还是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它们经营规模较大,也有较大盈利。总体来看,由于引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部分肯定会有不少增长,但经济在实际运行中依然还是处于混合形态。

社会主义与发展

然而,最高革命委员会正是依靠延长了的国家"应急计划"最直接地去落实其革命目标。在所有这些目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最有抱负的是1973年在城市和1975年在农村发动的大规模扫盲运动。1972年,西亚德政府做出了一个大胆且敏感的决定,即采用罗马字母来作为民族语言索马里语的官方书写形式。这个问题由于太过于微妙以至于

前政府无法有效解决，因为这里涉及这样的考虑：采用罗马字母的书写形式是否会带有世俗倾向的含义，很多亲阿拉伯的索马里人支持采用阿拉伯字母，但这对索马里来说又有点不合适。一旦下了决定，这个决定还是受到广泛欢迎的。没有人怀疑1973年的城市扫盲运动是非常成功的。[6] 官员们被送到速成班去学习，如果通不过文化考试，就会丢掉工作。成人扫盲班则没有这样的约束，但是绝大多数没有受到教育的城市居民参加了这样的班，人数众多，热情很高。

这场“文化革命”被新闻与国家宣传部长伊斯梅尔·阿里·阿博科尔(Ismail 'Ali Abokor)将军吹嘘到极点。这场“文化革命”之后，1974年的目标就是将“扫盲”延伸到游牧民中去。1974年7月，估计耗费1 000万英镑，约3万名中学生和教师搭载着货车被派遣到内陆地区。8人一组，组长为老师，还配有兽医和医生。这些索马里青年先锋队开始教游牧民书写自己的语言、卫生保健知识、现代畜牧方法、公民基本常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队员随身带有毛毯、一个折叠黑板和水壶，每天领取2个索马里先令(在英国约相当于15个新便士)。这些有些特权的城市学生要和被受到忽视的游牧同志们分享革命成果，客居在游牧民的大家庭里，教授主人读写。西亚德主席发出了号召，“会学才会教”，此号召也和早前城市大规模扫盲运动的号召一样。正如西亚德将军在197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演讲中解释的那样：“关键的……是要给每个人会读会写的机会……我们必须要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现代革命教育……以重塑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消除社会巴尔干化和碎片化为部落和支系的武器。它将带来绝对的统一，让任何负面的外国文化影响没有落脚之地。”在这里，现代化、民族主义和独立等目标紧密地联系起来，结合在一起。一个现代的、统一的民族，其民众不但说的是“同一种语言”[7]，而且会读会写这种语言。

无论计划得多么仔细，这种抱负极大的项目注定会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游牧民不确定的迁徙、严酷的游牧生活都让扫盲队没那么容易找到和接近他们的学生，甚至有段时期为了牧民前来学习，政府的水井都免除了水费。另一方面，一些年轻的教师本来是在城市

里长大,没有过游牧生活的经历。他们发现游牧生活很艰辛,更谈不上有吸引力。因此,在这个"离乡锻炼"(outward-bound)运动中,如果说参加学习的游牧民表现出很快就能掌握新的文字体系,学到了东西,那些教师们学到的东西和他们教给牧民的一样多。该运动如何按计划圆满结束依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后来,由于"农村繁荣运动"(Rural Prosperity Campaign)期间发生了索马里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旱灾,政府匆忙地将这一运动改名为"农村发展运动"(Rural Prosperity Campaign)[8]。与亚的斯亚贝巴政府在早些时候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中的表现不同,索马里政府并没有试图掩饰灾难的严重程度,它动员了所有资源,尽可能多地挽救受到旱灾的游牧民的生命。索马里政府也因此备受赞许。索马里政府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号召发动征服饥荒的"圣战",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寻求减灾救援物资供应和医疗援助。在受灾最为严重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政府迅速地调动学生来搭建救灾帐篷。在干旱的高峰时期,这些帐篷容纳贫困游牧民有 20 万人之多。

如果说这场旱灾将农村发展运动变成了大规模的救灾行动,那么,将为救灾设置的帐篷改造为指导中心,则又使农村发展运动的初衷得到了恢复。当然,这必然只是权宜之计。住在帐篷里的很多游牧民失去了大部分甚至所有的牲畜,他们未来的生计成为一个极有挑战性的问题。然而,政府又一次地借机推行两个长期政策:让游牧民定居;让部落组织解体。在开始重建规划的时候,政府将住在帐篷里的绝大部分游牧民重新安置在南部谢贝利河与朱巴河一带的新扩建的集体和国有农场里,或者将他们安置在沿海的渔村以服务于苏联人援建的鱼罐头工业。虽然索马里政府希望能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这一大规模安置工作所需资金,但结果是苏联人组织起安置工作,担负了大量的空运和陆地运输。索马里人这一次突然性的地区迁移,让很多人从传统牧区迁离出来并被安置到与他们并无关系的部落和世系中。在那里,这些人从游牧民变成了定居的农民或渔民(这两个职业过去一直为游牧民所鄙视)。这种人口迁移的确是一项大胆且冒险的决定。

谢贝利与朱巴河流域之间从事混合农耕的居民中间，容纳了许多北方游牧民[9]。正如西亚德将军在此期间的讲话中承认的那样，这场大规模、快速的变迁有种让传统氏族和部落竞争重燃的风险。即使没有重大事件的发生，一旦过去的牧区雨量充沛，游牧民们能得以重新从事畜牧活动的话，人们也很难预测到这些重新安置下来的游牧民中有多少人会愿意留在这些新安置地区。

这场全国性灾难得到了相当有效的控制，甚至也被充分地加以利用，也推动了 1974 年 12 月政府的重大重组。这反过来也为广受欢迎的索马里社会主义革命党(Somali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于 1976 年最终出现做出了铺垫，同时，文职政府正式取代了军人政权，这一转变也是苏联长期所要求的结果。

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部落主义的传统制约

我们现在要对科学社会主义对传统力量(伊斯兰教与氏族或世系制度)改造的确切程度做出更深层次的评估。虽然有人说索马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精英中有一些人是无神论者，但西亚德反复坚称其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伊斯兰教是相融合的，事实上，客观上也正如西亚德所指出的那样，也体现了伊斯兰教具有的集体主义的基本精神。西亚德在夺取政权几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伊斯兰信仰教导我们，它的内在精神是永存的，随着人民的进步而继续不断发展。我们宗教的基本教义不能以一种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它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来源……为了帮助我们的同胞和同志，我们必须要超越单纯的仁慈之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更高层次的、更无私的合作观念。我们必须满怀热情、满怀爱国主义，努力为所有人实现最大可能的福祉。"而 1972 年西亚德在一次讲话(对象显然是针对年轻的、世俗的激进分子)中又阐述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尤其不反对宗教，但他们揭露并驳斥了宗教中的反动因素，这些反动因素支配着人类所具有的健康的理性思维，因此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因此，毫无疑问，无论索马里国内外保守的伊斯兰教批评者如何辩

解,真主在这里并没有死去。正如西亚德主席在 1972 年另一次讲话中宣布的那样:“就社会主义来说,它并不是像伊斯兰教一样是来自天国的讯息,而仅仅是一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采用的生产方式的制度。如果说我们决定要管理国家财富的话,并不是说要反对伊斯兰的精神。真主创造了人,也赋予了人思维能力,让他们在好坏、善恶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选择了社会正义以取代人对人的剥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实践上帮助每个穆斯林并引导他过上正直的生活的原因。然而,反动派想要在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间制造裂痕,因为社会主义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西亚德政权以这种折中的方式坚定地为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融合辩护,反对保守派对改革措施(如在继承权上推行性别平等)的批评。事实上,在悠久的、神圣的伊斯兰教传统上,国家元首声称他比批评者能更好地理解先知的教诲。国家媒体,尤其是广播,将伊斯兰教和索马里社会主义精妙地糅合在一起,将《古兰经》及其评注作品中的内容自然地导向社会主义理想,并用多次引用的国家元首的语录加以简洁地表达。如果说深层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的话,如果说国内外就西亚德解释的伊斯兰教的正统性还存在各种保留意见的话,那么与卡扎菲上校对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的那种有名的利比亚式糅合比起来,至少可以说它的解释要更可信些。考虑到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以及苏联与伊斯兰世界面对面的商谈所带来的活动能力,索马里 1974 年正式加入了阿盟就并不令人惊讶或出乎预料了。然而,这确实让索马里的内外政策更直接地受制于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的强有力监视。

那么,社会主义与传统部落效忠间的紧张关系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之前曾论述过,部落效忠在政变后立即被禁止,被正式取缔了(可能是被苏联研究者设计出来的诸多典礼吞噬掉的),这种取缔又在主席多次公开警告中一再重申。但索马里部落主义普遍地暗暗在起作用。虽然没人敢冒风险公开这么说,但在大多数索马里人看来,最高革命委员会在 1975 年被正式解散前,还是按氏族代表性原则组织的。下表显示,最高革命委员会与先前的文职内阁一样,按传统比例混合着多个部落成分。

索马里各届政府[*]中主要部落集团分布：1960至1975年

	1960年[a]	1966年[b]	1967年[c]	1969年[d]	1975年[e]
达鲁德	6	6	6	6	10
哈维耶	4	3	4	5	4
迪吉尔与拉汉文	2	3	3	2	0
迪尔	0	1	1	0	2
伊萨克	2	3	4	5	4
总计	14	16	18	18	20

* 这里只统计政府内阁部长以及1969年后最高革命委员会委员。整个索马里民族主要包括5个大的部落集团(我在以前的作品中曾称它们为"氏族系"：参见刘易斯，1961)，各部落在各届索马里政府中的代表在上表中都有显示。

a. 1960年独立后成立的第一届索马里政府，由阿卜杜勒-拉希德·阿里·舍马克(达鲁德族)总理领导。总统兼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为阿丹·阿卜杜勒·伊斯曼(哈维耶族)。

b. 1966年的政府由阿卜杜勒-拉扎克·哈吉·侯赛因(达鲁德族)领导，阿丹·阿卜杜勒·伊斯曼留任共和国总统。

c. 1967年的政府由来自索马里共和国北部地区(前英属索马里)的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伊萨克族)组建。阿卜杜勒-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达鲁德族)此时担任总统。

d. 1969年3月选举后，第二届政府由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组建，阿卜杜勒-拉希德·阿里·舍马克博士继续担任总统。

e. 1969年10月军事政变后成立的最高革命委员会在成员构成上出现过多次变化，此处是1975年最高革命委员会的情况。1976年7月，随着索马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成立，最高革命委员会正式解散。① 该党设有一个由73名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一个由5人组成的政治局(包括3名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安全局局长)。上述的两个机构由国家元首兼党的总书记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将军领导。

在这种典型的传统世系代表比例中，有三个集团被广泛地认为具有突出的主导地位。这也在反映西亚德政权特点的"M. O. D"秘密代码中有所反映。M代表主席的父系家族，O代表主席的母系家族，D则代表主席最为重要的女婿，即国家安全局长的家族。主席自己所属的家族居住在朱巴河上游一带，靠近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边界。其母系氏族，即欧加登人，占领着相邻的、极度敏感的、位于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欧加登地区。主席女婿的氏族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通常在前英属索马里与前意属索马里分界线两边地区从事畜牧业，因

① 本次解散并不彻底，因此于1982年再次解散。——译者注

此,他们也是索马里国家中这两块地区的联系人。就像主席试图通过其母系氏族在那里的重要联系以寻求调节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进而控制其与埃塞俄比亚间的外部关系一样,主席通过其女婿氏族寻求抑制索马里南北两方及其各自所代表的英语区与意大利语区殖民地传统间的矛盾。M. O. D. 是一个统治索马里的大体公式,为主席提供权力基础并带来国内外的安全。我们也会看到,它的局限性是这些关系所具有的内在的互惠性。如果说这些关系让主席获得了忠诚与支持的话,那么这些关系也确实让主席付出了代价,即主席在有关的党派利益上变得极为敏感和麻烦。这也在主席反复刻薄地攻击"部落主义"上直接增加了个人色彩,"部落主义"是难以容忍的厌恶之物。正如主席在一次对地方法官发表的具有威胁性的演讲中宣布的那样:"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无法相结合;我们民族有着太多的氏族分化,这是我们的不幸;如果所有的索马里人要下地狱,那么部落主义将是他们到达那里的交通工具。"他的一些听众一定会小声地嘟哝道:"是道出你的切身体会吧。"

虽然没有一个人会公开说出西亚德政权的这个秘密的象征性代码,但他的统治基础即 M. O. D. 是公开的秘密,人们只是在私底下谈论和批评。机灵的索马里诡辩家用他们那如簧之舌,编了个遁词,用日期(自光荣革命开始)来代表主要控权集团。在遁词中,10 月 21 日指的是 M,10 月 22 日指的是 O,10 月 23 日指的是 D。这个新隐喻还有额外的优点,即足够灵活地涵盖更多的集团,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可以显示出这些集团相对权力和等级上的变化。1976 年 6 月,索马里社会主义革命党成立了,它设有一个人数较多的最高委员会,包括 73 名委员,为 M. O. D 的权力单元设定了大量的代表位置。

西亚德主席是党的总书记,也是部长议会的主席,[①]他领导的中央

① 随着索马里的政治发展和变化,西亚德的职务也有变化:1969 年 10 月在推翻埃加勒政府后,任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1976 年,委员会撤销,成立索马里社会主义革命党,任党总书记、总统和部长议会主席。译稿尊重原文对其职务的用词,在不同地方分别称其为将军、主席或总统等。——译者注

委员会包括前最高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另外还加上 19 人——虽不全部是,但主要都是军队出身的。每个新委员负责政府的某个特定领域。同时,各个被任命的部长要与政治局保持一致。至关重要的政治局不出人们预料地包括有:主席(不再被称为"将军")、3 位副主席、侯赛因·库尼耶(Husseyn Kuhniye)将军、穆罕默德·阿里·萨玛塔尔(Muhammd 'Ali Samatar,军队司令)将军、伊斯梅尔·阿里·阿博科尔(党的副总书记)和国家安全局长艾哈迈德·苏莱曼·阿卜杜勒(Ahmad Sulayman 'Abdulle)。这个极其复杂的组织要远远比任何一个前届文职政府复杂。政治局内有些委员可以偶尔严重地挑战主席的权威,但一般都会被告知要低调点。虽然在正式的政策决策上,人数和利益集团被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但很显然主席要是有意的话,依然可以像以前一样实现完全控制。

他也可以放弃或认真地调整自己的仁慈的或专横的家长式作风。这个新结构所要寻求的就是赋予总统更大的合法性。政治局成立两年后,执政党拥有不到 2 万名党员,这个数字显示出该党在整个索马里并没有广受爱戴。

社会主义与西亚德主义

如果说西亚德在这一时期的统治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掩饰了建立在持续的氏族与世系效忠基础上的基本结构的话,那么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为争夺影响力的派系并不仅仅建立在血缘纽带上。教条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差异、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教以及意大利殖民地传统与英国殖民地传统间的竞争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国家元首对在这些问题上的批评和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批评同等关注,并坚定地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普世性的制度,可以实际应用在所有的环境下——伊斯兰教的和非伊斯兰教的。正如 1972 年他在哈兰国家指导中心的一次讲话中轻蔑地评论道,心胸狭隘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说"列宁同志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后没收了某某财产,或者是 20 世纪 40 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国家里针对反动势力所做的某某事"的时候,他们

并没有抓住重点。“这些人完全忽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教导的历史背景。他们是出于自己的考虑来从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那里断章取义。”在另一个不同的场合中,一位年轻的索马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结束与一位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的热烈讨论的时候,他以同样的语气说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轻蔑地宣称道:“我不需要马克思;马克思需要我!”

不过,如果说阶级斗争思想不适合当地环境的话,那么“部落”和混合着军事沙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可以取代“阶级”。西亚德对其国家的敌人——贫穷、疾病和愚昧——不停地发动战争。他被刻画为引领迈向进步和胜利的不屈斗争的全能的领导人。这是一种狂飙突进式的、西亚德式的领导,在过去也是有先例的。然而,在过去,个人权威要到这种程度,通常也只有对异教徒发动圣战的民族宗教英雄才能成功地获得。在索马里的民族意识中,这种骄傲的传统有两个杰出的榜样,即伊斯兰教捍卫者艾哈迈德·格兰(Ahmad Gran,1506—1543)和萨伊德·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1864—1920)[10]。前者曾在16世纪征服并短暂统治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心脏地带;后者则是20世纪急躁的德尔维希运动英雄。哈桑与西亚德在母系上有着姻亲,格兰则在一些索马里人看来是元首的父系先祖。

西亚德主席试图利用这些令人敬畏的历史人物形象,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永远的十字军战士,投身于反对国家敌人的不停的战斗中。因此,世俗的身份与宗教交织在一起。西亚德主席自己宣称是人民的救星,像神一样地指引着人民前进。难怪一些索马里人低声嘟哝着说索马里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宗教。

这个时期的索马里人生活事实上就是一场战斗,每一次胜利都被高呼为伟大领袖的成就。像1975年饥荒这样的天灾、政府不断发现内部“叛徒”以及革命的小高潮都验证了这种永远处在斗争中的状态。正如总统在讲话中不断警告的那样,也正如肆意逮捕和无法预测的政治犯平反所验证的那样,国家一直面临着国内外想要颠覆科学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的威胁。总统在对全体人民的一次长篇讲话中宣称,[11]没

有反对派,社会主义就不会存在。反对派一定要被永不停止的通向胜利的斗争所打到。在这场互相间的斗争中,西亚德划定谁是敌人并掌控着斗争的结果。虽然列宁、毛泽东和金日成对西亚德政权所创设的本土发展与权力哲学有着一定的影响[12],但索马里的政治现实表明“科学西亚德主义”或许是这一时期索马里所发生的一切的更恰当的表达。可以肯定,在索马里,社会主义是一种手段而非目标。



第十章　非洲之角的民族主义、族群与革命

索马里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凸显

西亚德将军军事统治的第一阶段(约到 1974 年为止)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也就是说,关注地方发展和政权权威的巩固。索马里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也激励了西亚德政府在第二阶段采取了外向型政策,更大程度地卷入到外部(地区性和国际性)事务中去。在这一趋势下,索马里在很多场合都迈出了试探性的步伐,如在 1972 年,索马里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间的对抗中成功地进行了调停。但是在 1974 年,这一外向型政策有着更大的表现。此时的索马里已经加入了阿盟,成为阿盟唯一的一个非阿拉伯语成员国,索马里也曾担任非洲统一组织会议的东道国。在提供必要设施(包括安全)上,索马里为官方代表团、大量外宾以及新闻记者做了精心安排,虽然这种安排给摩加迪沙的当地资源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但是索马里还是克服了困难,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索马里没花多少钱就利用这次机会提升了索马里在非洲、阿拉伯和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在非洲、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看来,索马里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成就也引人注目。1974 年 6 月,非洲统一组织会议在摩加迪沙新近落成的、耗资巨

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召开。索马里组建了一个梅塞德斯-奔驰车队，以供来访的国家元首使用。虽然肯定有人会批评说这种过分的接待是对资源的浪费，也很荒谬，但很多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为国家能有这样的地位而感到自豪。正如一名年轻的官员所指出的那样，国民的民族自豪感有时比国民生产总值更为重要！

为了能在非洲事务中获得更加突出和有利的地位，西亚德政权强调索马里在地理位置上恰好成为伊斯兰世界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桥梁。索马里与苏丹的关系一直到此时大体上还算亲密，但由于苏丹早前就已经提出了它是这样的桥梁，索马里也寻求这一相同的地位势必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竞争。索马里与古巴在为非洲解放运动训练游击队方面有着合作，同时，作为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西亚德，他所处的位置尤其适合参与到葡萄牙政府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解放组织之间棘手的独立谈判中去。这也和索马里政府的总体立场相一致，索马里积极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独立运动。先前的索马里文职政府很少关注，甚至不屑于关注这些问题，但此时的索马里广播、政府媒体、设计粗糙的宣传画和标语充斥着反帝、反殖民言辞，这种言辞在整个非洲都蔓延开来，并成为索马里地区的主流趋势。这种态势还体现在民间戏剧作品中，反帝斗争如果说不是精心策划的，那么也是官方支持的主旋律。所有的这些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出，索马里日益卷入并致力于非洲问题。西亚德政权认为，群众最终会认识到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邪恶势力的重要意义*。

正是在这种更为广泛的非洲环境下，西亚德政权此时又开始考虑泛索马里民族主义问题。军队自 1969 年掌控权力以来，经常宣告说将长期致力于在外国统治下受苦的其他索马里同胞的解放事业，这些同胞主要生活在阿法尔人和伊萨人所在的法属领地(吉布提)、欧加登地区(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东北部地区。不过，索马里一直到此刻在这方面还是保持了克制，只不过军政府在实现这一目标上表现得更积极些而已。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国身份所提供的机会以及这一身份所带来的限制表明，如果这一民族主义议题此时强劲复苏的话，法国在吉布提

的继续统治、这一不合时宜的做法将成为首要反对目标。1974 年，由于垂老的皇帝日益丧失控制力，并于 9 月 12 日被武装部队最终推翻，混乱席卷了整个埃塞俄比亚，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这无疑极大地激起了索马里人的希望，即要实现欧加登地区的自治。虽然欧加登的前景是令人激动的，但是索马里此时还是采取了谨慎的观望政策，坐等埃塞俄比亚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索马里主要关注的还是吉布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一政策虽然主要是防范性的，但并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以对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大量难民，包括欧加登的索马里人做出回应，他们是埃塞俄比亚的持不同政见者。

法国在吉布提统治的结束

在吉布提，1974 年 11 月的选举显示出阿法尔人在下议院中主导地位的加强。在"全法团结和进步"的口号下，阿里・阿里夫(Ali Ariif)的阿法尔人政党赢得了全部席位。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联盟(*Ligue populaire Africaine pour I'Independence*)是在野党，代表着索马里人的利益，而总部设在摩加迪沙的、更具有军事色彩的、处于非法地位的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Front de Liberation de la Cote des Somalis*)依然从事地下活动。1975 年 5 月，由于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绑架了法国驻索马里大使，人们才感受到该组织的存在。在摩加迪沙政府的帮助下，这名大使被安全释放，法国与索马里的关系在短期内也得到一定的改善。当然，吉布提也日益得到关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12 月，在阿里・阿里夫与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总统的一次会晤后，吉布提宣布将被获准独立，不过法国将继续在当地保留一个军事基地。这一安排不出预料地遭到了赞成独立的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联盟的反对，也没能令追求独立的人(此时不只是索马里人)满意。

吉布提的政治形势迅速变得扑朔迷离。虽然阿法尔和伊塞部落在 1975 年的早些时候也发生了大量的暴力冲突，但是，阿法尔人(基本上是一些集团的聚集体)本身此时已经由于存在几个强有力的派别而分裂开来。阿里・阿里夫在其所属的地区也失去了支持。由于埃塞俄比

亚阿塞塔(Asaita)的阿法尔领导人阿里·米雷赫('Ali Mirreh)苏丹与亚的斯亚贝巴的新军人政权新近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让整个阿法尔人陷入动荡中。要理解这一新情况的重要性,我们就要理解如下情况,即多年来,阿法尔人事实上有两个领导:吉布提的现代政党首领们和阿里·米雷赫苏丹。阿里·米雷赫是阿法尔人更为传统的代言人,他在海尔·塞拉西(Haile Sellasie)的间接统治体系中,控制了具有重要战略和经济地位的阿瓦什流域。阿里·米雷赫与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流血冲突席卷了阿塞塔地区,并造成了平民的大量伤亡。之后,阿里·米雷赫逃到了吉布提,这激起了阿法尔人新一轮强力反埃塞俄比亚的运动,这场运动可能也得到了索马里相机行事的支持。这一反埃塞俄比亚的集团曾考虑过自治的阿法尔国家的可能性,并很快就成立了阿法尔解放阵线('Afar Liberation Front)。阿法尔解放阵线展开游击运动,这种游击运动给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之间重要的铁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造成了威胁。

与此同时,在吉布提境内,1976 年 2 月,几名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劫持了一辆搭载法国军人子女的学校巴士,并将巴士开到了索马里边境。要求无条件独立的劫持者被法国军队制服,但法国军队在攻击巴士的时候也有几名军人丧生。索马里部队显然也越过了边界并开火,双方都很恼火并进行了指控和谴责,这也导致索马里和法国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在吉布提后来的政治剧变中,被禁的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联盟很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不仅仅只是马里人的支持)。阿里·阿里夫在议会中遭到绝大多数同僚的抛弃。面对局势又一次有利于索马里人所带来的压力,阿里·阿里夫没有选择,只得辞职。取代他的是其所属政党的前任总书记阿布达拉赫·穆罕默德·卡米尔('Abdallah Muhammad Kamil)。阿布达拉赫·穆罕默德·卡米尔是阿法尔人,娶了索马里人为妻。法国当局选择了这名能干的年轻的管理者,认为他是领导过渡联合政府的理想人选,包括所有主要政党的代表都认为他可以引导吉布提走向独立。吉布提 1976 年 11 月宣布独立,1977 年夏实现了独立。

1977 年 3 月,准备独立的谈判在巴黎举行。所有阿法尔人和索马里人政党的领导人都收到了邀请,但只有那些支持联合政府的领导人做出了回应。他们赞成在 5 月份就独立问题进行重新公决,并就扩大了的下议院进行选举。索马里人主导的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联盟和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以及阿里·阿里夫的一些前支持者同意组建争取独立人民联盟(*Rassemblement populaire pour I'Independence*),并提交了一份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 33 名伊塞人、30 名阿法尔人和 2 名阿拉伯人。虽然阿法尔人的政党联合抵制选举和公投,但占总投票人 99%的阿法尔人中有 77%的投票人赞成独立和官方候选人的名单,只有 10%的投票人响应了阿法尔人政党的号召进行了抗议,投了空白票。5 月 16 日,非洲人民争取独立联盟主席,前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哈桑·古莱德(Hassan Guled)当选为议会主席,领导一个有 10 名部长的政府,其中 6 人来自古莱德所属的政党,没有一人是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的。新任部长中有一半是阿法尔人。最终,6 月 27 日午夜,吉布提正式独立,采取了一个中立的国名"吉布提共和国",老资历的索马里裔的哈桑·古莱德任第一任总统,阿布达拉赫·穆罕默德·卡米尔担任总理。这个新生的国家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的第 49 个成员国,也是阿盟的第 22 个成员国。在法国人的援助、防卫保证和阿拉伯人的支持承诺下,哈桑·古莱德在未来可能与索马里(可能在思想上与埃塞俄比亚)联合问题上没有给出任何一种方式的承诺。这意味着吉布提不会成为任何一个东非国家的"代理人",对外部侵略会同样给予回击。然而,这份对吉布提强邻(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勇敢的独立宣言并不能掩饰这一点,即这个小国、这块处于危险境地中的领地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依然依赖于它和这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就在吉布提独立的前几周,索马里人(可能也有阿法尔人)的游击队还炸毁了吉布提市到亚的斯亚贝巴间的铁路段,这也深刻地体现出吉布提的对外依赖性。铁路的炸毁让交通和贸易瘫痪了,而这对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来说是同等重要的。由于业已存在的高失业率,虽然吉布提取得了正式的政治主权,但它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所有的迹象表明,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紧张

关系有所加剧，这将进一步地威胁到吉布提本已脆弱的国家认同，并威胁到吉布提未来安全所依靠的微妙的阿法尔-索马里人同盟。未来发展的主要希望将依靠：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有着不同的野心且互不相容、法国与阿拉伯人的外部支持、当地人口中部落分化与派系的复杂化。

欧加登战争(1977—1978)：西索马里还是东埃塞俄比亚？

如果说1977年突然爆发的欧加登战争是埃塞俄比亚革命带来的在地区竞争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释放、是对门格斯图政权的残酷压制的一种宣泄的话，那么可以说，欧加登战争最早可以将我们带回到埃塞俄比亚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开始时期——1886年孟尼利克对哈勒尔人的征服以及随后对周围索马里、阿法尔和奥罗莫部落的军事远征(武器装备主要是由法国、意大利和沙皇俄国提供的)。埃塞俄比亚的这次霸权扩张，以及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对索马里沿海地区的分割，激发了猛烈的、由欧加登舍赫穆罕默德·阿卜迪勒·哈桑领导的德尔维希斗争。哈桑在1900至1920年间想让索马里从外国统治下获得独立。1900年3月，德尔维希的第一次主要袭击就意味深长地指向埃塞俄比亚驻在吉吉加的军事哨所。埃塞俄比亚对这个边缘地区的管辖到1947至1954年英国人撤走(参见第七章)之后才开始被感觉到，这也激发了欧加登民族主义的复活。我们已经论述过，埃塞俄比亚与新成立的索马里共和国之间的矛盾，由于埃塞俄比亚的地方当局与欧加登部落发生武装冲突而加剧，并在1964年爆发了一次短暂的战争。恢复和平后，欧加登暴动者势头大减转入地下，泛索马里主义的斗争焦点转到了肯尼亚北部地区的索马里人。

与此同时，在紧邻埃塞俄比亚的巴里州(Bale)，同样也是在反阿姆哈拉人统治的激励下，在与索马里人有着紧密联系的说库希特语的阿鲁西(Arussi)和奥罗莫人中，同时出现了抵抗运动。领导者为当地的一个奥罗莫军阀瓦克·古托(Wako Guto)。战斗在1963年开始，零零散散地一直延续到1970年。1970年，埃塞俄比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

动成功地重建了阿姆哈拉人的统治。被击败的瓦克·古托与海尔·塞拉西签署了和平协议，并得到一个封号(Dajazmach)[1]。在这漫长的斗争中，很多难民(很多但不都是阿鲁西的穆斯林)从埃塞俄比亚统治下逃了出来，越过边界，进入索马里寻求避难。尤其是在索马里埃加勒总理以及后来的西亚德主席努力维持与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良好关系时期，这些难民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事实上，一些较激进的奥罗莫领导人遭到了索马里当局的关押。索马里政府和军队中的一些激进的高级官员(欧加登索马里人)也不时遭到同样的制裁，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给西亚德施压，要他对欧加登地区进行武装干涉。到 1975 年，随着混乱蔓延到整个埃塞俄比亚，新军事统治者越来越难以控制整个国家，索马里当权者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对欧加登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回应。瓦克·古托在摩加迪沙寻求支持。如果要避免国内剧变，西亚德主席不能再冷落西索马里解放阵线(Western Somali Liberation Front，包括有奥罗莫穆斯林、阿鲁西和欧加登领导人)了。1976 年，瓦克·古托回到了巴里，领导了新一轮的反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运动，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此次运动就是打着西索马里解放阵线旗号发动的[2]。约在同一时间，西亚德将军向亚的斯亚贝巴派了密使，试图与新军事领导人就欧加登自治问题进行谈判。尽管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政权都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但自治问题的提议以及后来即 1977 年 3 月的尝试都失败了。1977 年 3 月，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曾推动西亚德将军与门格斯图上校加入一个由苏联赞助的松散的社会主义联盟，这个联盟将会允许欧加登索马里人在当地以一种未确定的方式实现自治。苏联人安抚当地民族主义的方案远没有满足索马里人的期望，却大大地超越了门格斯图可以接受的埃塞俄比亚放权的尺度。

到 1977 年春，奥罗莫游击队已经重新控制了巴里的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在北方，厄立特里亚的战争发展到了关键性阶段，当地的民族主义力量几乎控制了整个地区，给遭到围攻且意志消沉的埃塞俄比亚驻阿斯马拉(Asmara)和马萨瓦的卫戍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此时，埃

塞俄比亚新统治者与华盛顿卡特(Carter)总统的新政府间的关系严重恶化。埃塞俄比亚传统保护大国不再给予军事支持,并敦促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谈判解决问题。4 月,美国关闭了一些站点(包括设在阿斯马拉的卡格纽[Kagnew]通信站——由于美国获得了迪戈加西亚[Diego Garcia],阿斯马拉对美国战略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门格斯图政权立即展开回击,驱逐美国人,极其恼火地谴责美国人权批评的伪善。据说,美国的人权批评从没有针对过皇帝。这一行动表明非洲之角上的超级大国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大转变,且有很多种结果,但由此带来的后果很难预料,更不用说衡量了。

直接的结果是 5 月门格斯图访问莫斯科,发表了一份关于互相合作的“庄重宣言”,并谴责“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造成了东北非局势的恶化。这显然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言辞,因为在 6 月 26 日,在吉布提独立前夕,由古巴训练、苏联提供装备的农民军在亚的斯亚贝巴接受检阅,人数至少有 7 万。如果说欧加登索马里人要恢复独立的话,显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破坏了吉吉加与哈勒尔以及哈勒尔与迪雷达瓦间的通讯后,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开始召集部队共同攻击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的卫戍部队。到 7 月底,当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宣称已经解放了戈德(Gode)这一战略中心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正指责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要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并向外部发出援助请求。8 月初,由于埃塞俄比亚拒绝就索马里人自决权进行讨论,拒绝见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的调解方案宣告失败。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以及对欧加登人的要求缺乏同情,这让西亚德将军在 8 月底跑到了莫斯科,但结果令人失望。这是一次毫无结果的访问,勃列日涅夫(Breznev)没接见索马里主席。西亚德做出决定,9 月开始展开对阿拉伯国家的一系列访问。据后来的报道说,沙特阿拉伯考虑到索马里与苏联关系破裂,答应提供 2.3 亿英镑用来购买军备。9 月 7 日,随着欧加登的战斗日益激烈,埃塞俄比亚断绝了与索马里的外交关系。8 日,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索马里“无耻且露骨的侵略”。虽然一份旨在遏制索马里民族统一主义的防卫协定将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捆

绑在一起，但肯尼亚在后来的冲突中的援助仅限于对索马里的“侵略”进行官方谴责、允许埃塞俄比亚经蒙巴萨(Mombasa)进口武器，以及禁止索马里使用肯尼亚的领空运送武器。

9 月下旬，当大批的苏联米格战机、坦克及重武器运到了亚的斯亚贝巴蓄势待发的时候，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取得了最大的一次胜利：解放了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地区的重要军事总部吉吉加。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对手由于血腥的军内清洗而斗志消沉，几乎没有什么反抗。由于出现叛变，埃塞俄比亚第三师从至关重要的防守位置撤退下来。该防守点位于马尔达通道(Marda Pass)，此通道控制着通往哈勒尔的公路。他们在撤退的时候，将大量主要是美国的装备留给了兴高采烈的索马里人。此时，索马里人对国家恢复了军事管制。

西索马里解放阵线控制了吉吉加后，继续向哈勒尔迈进以实现其最终目标，即一直解放到埃塞俄比亚统治下的阿瓦什流域的整片索马里人的区域。这将需要把埃塞俄比亚人从哈勒尔附近杂居着索马里人、奥罗莫人(盖拉人)和阿法尔人的地区内驱除出去。这也需要击败在哈勒尔和德雷达瓦重新组织起来的埃塞俄比亚部队。随着战场越来越大，也由于涉及多个族裔集团，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以及摩加迪沙政府的官方声明都强调巴里和哈勒尔地区内索马里人、阿鲁西人以及奥罗莫人间的紧密关系。“阿博-索马里人”和“瓦里亚-索马里人”(*abo* 来自奥罗莫语，*wariya* 来自索马里语，主要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这两个生造出来的术语用来强调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索马里人与他们的奥罗莫人盟友间的亲密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索马里阿博解放阵线(Somali Abo Liberation Front，S. A. L. F.)就是作为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分支而组建起来的。

与苏联关系的破裂

与此同时，索马里共和国的注意力有了很大的分散。10 月 18 日，在索马里的全力配合下，一支联邦德国反恐纵队在摩加迪沙机场成功地解救了一架被劫的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的飞机。这自然极大

地鼓励了索马里寻求西方的同情以及西方对其在欧加登地区的斗争的支持。索马里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到了决裂的边缘。正式破裂的唯一重要阻碍就是西亚德的顾虑。西亚德担心,突然断绝关系可能会造成其政权的不稳定,在没有寻找到另一个可靠盟友前自然也不愿意断绝了其武器供应的主要来源。索马里可能也存在这样的想法,即苏联可能会在适当的压力或甘言劝诱下,要求门格斯图对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人的民族主义做出必要的让步。然而,这一期望并没有实现。11 月 13 日,摩加迪沙宣布与苏联决裂。所有的海陆空军事设备(包括设在柏培拉的重要通讯站和反潜导弹控制站)被撤离,索苏友好条约(苏联提供武器给埃塞俄比亚已经违反了该条约上的条款)宣布作废。索马里政府要求 6 000 名苏联军事、文职人员在一周内离开索马里。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依然保留,与古巴则完全断绝关系。与苏联及其卫星国断绝关系,虽然是很久前就有的想法,但依然棘手。断绝关系也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与中国人所受的待遇不同,苏联人在索马里从不受待见。索马里民众长期受到压制,对索马里早前的官方"朋友"(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与西亚德政权在诸多领域里的压制政策有关)的愤恨在欧加登战争的氛围下达到了憎恨的地步,现在最终得到释放。摩加迪沙政府也获得了更多民众的支持。

由于受到索马里人读写能力发展所带来的推动,索马里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达到了顶峰。很多索马里人都直接卷入(而其他索马里人也都间接卷入)到了欧加登的战斗中,欧加登的战斗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关注。所有人的兴趣点都在战争的进展上,对战争的非官方支援毫无疑问优先于所有的其他活动。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在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有"离岗"的人,武装部队中那些来自欧加登地区的人同样加入到了其兄弟和部落反对埃塞俄比亚篡夺者的战斗中去。妇幼保健中心很快成为制作制服的小工厂。整个索马里都在专注于收听关于战争进展的广播报道。对欧加登的关注让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关心对光荣领袖的个人崇拜,西亚德主席被安静地抛到一旁——至少被暂时抛到一旁。

埃塞俄比亚的重新征服

现在,我们必须要回到这场战争的进程上来。到 10 月底,哈勒尔附近的战斗尤其激烈,古巴人员已经撤离出去的报道让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声明更为可信。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声明说他们已经为夺取这座古老的穆斯林城市——或经过多次猛烈的攻击后的城市废墟做好了准备。当有消息说阿法尔解放阵线('Afar Liberation Front)已经切断了从阿萨布港(Assab)到哈勒尔那条主要公路之后,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突进哈勒尔显得马上就快实现了。阿法尔解放阵线与奥罗莫解放阵线(Oromo Liberation Front)此时也发动反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游击战。另外,由于马萨瓦和吉布提港无法运转,阿萨布港口是苏联供应得以进来的唯一港口。然而,尽管有着这些令人鼓舞的进展,苏联和古巴装备与顾问的大量输入明显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西索马里解放阵线无法夺取哈勒尔,虽然他们不止一次地宣称已经进入到了这座城市。可预见的胜利变成了僵局,有报道称两方部队用远程火炮进行着互攻。12 月下旬,西亚德将军在伊朗寻求支持的时候,埃塞俄比亚战机对北索马里目标展开一系列有限的空中打击。索马里人此时绝望地寻求一个可以像苏联一样提供军事支持的替代国,并设法让美国和西方政府相信,施加压力阻止苏联和古巴人在埃塞俄比亚的出现是符合它们利益的。虽然早在索马里与苏联关系破裂前,美国政府就已经暗示它准备给索马里供应武器,但现在除非索马里准备停止支持欧加登民族主义者并放弃其泛索马里主义,否则西方不会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索马里寻求支持激起了肯尼亚愤怒的反应,随后又遭到北约国家政府的严重警告。影响对索马里请求给予这样谨慎和不热情回应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英美就罗德西亚问题上很是微妙的谈判。英国和美国政府尤其担心采取疏离非统组织的任何行动,因此它们强调在非洲范围内找到埃索争端解决之道的重要性。由于古巴很有可能干涉罗德西亚,它们开始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谴责苏联和古巴在非洲问题上的干涉。与此同时,它们也坚定地宣布它们坚持非统组织的现存边界——英国外交大

臣称之为“非洲地图”——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埃塞俄比亚在官方声明中将西方的政策解读为对索马里的支持，这对索马里人来说，简直是辛辣的讽刺！事实上，西方政府能给予的最大支持就是提出极为明智的建议，即在索马里还具有强势地位的时候进行谈判。这符合索马里的利益，同时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依然控制着欧加登。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可能不了解的是西亚德政府与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中各个氏族力量间的微妙关系。将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简单地认为是摩加迪沙的“前线”，这是一种虽有道理但却错误的看法。真实的情况是，欧加登人同样在试图取代摩加迪沙的西亚德政府。

因此，各方都认为索马里是侵略者，而很少甚至不关注欧加登索马里人的自决权。索马里共和国军队秘密而非公开的参与更是证实了这一观点，即索马里人是侵略者，正在“侵犯埃塞俄比亚的领土”。甚至为了索马里的利益而准备与肯尼亚断绝外交关系的伊朗，也直截了当地声明说它的支持是为了维护索马里的边界而非重新改变非洲的疆域划分。索马里此时只得到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有限支持，没有久经沙场的外国援军来对付也门人和古巴人，且苏联人曾给它的装备比苏联现在给埃塞俄比亚的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在性能上要差得多，因此，索马里的处境越来越危险。1978 年 2 月，在忧惧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索马里正式参战并进行总动员。期待已久的苏联与古巴人此时也正式展开反攻，且已经取得一些胜利。3 月，在吉吉加与哈勒尔之间，8 000 人的索马里主力部队遭到沉重的空中打击。埃塞俄比亚第十师在六七十辆坦克组成的古巴整编装甲旅的支持下，出人预料地从北方通过了马尔卡通道并开始攻击吉吉加。索马里主力部队发生了军事叛变。古巴人的坦克空投到索马里战线的后方，古巴人驾驶的米格战机也配合埃塞俄比亚军队对吉吉加的攻击，且在攻击的过程中还调动了大量苏联人的高端新式武器。索马里军队在将当地平民撤到索马里之后，放弃了吉吉加。索马里增加了一个旅加入战斗，但由于遭到米格战机的扫射，也不能阻挡埃塞俄比亚人的前进。

3 月 9 日，西亚德主席在一系列旋风般的出访后宣布索马里接受

美国人的要求,正在从欧加登撤退,苏联和古巴军队也应该撤军。实际上,这也就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胜利。事实上,索马里相当担心埃塞俄比亚人的推进不会在边界上停止,会继续推进到索马里共和国境内。因此,索马里政府反应过度地在北部地区向平民发放了大量的武器。结果,就像苏联人曾承诺的那样,埃塞俄比亚军队在边界线停止了推进,仅限于逐步重新确立在欧加登地区的统治。苏联驻索马里军事代表团前领导人格里戈里·巴利斯洛夫(Grigory Barislov)将军领导了这次击败索马里军队的行动,让索马里人很不是滋味,但苏联人在对待俘虏上所表现的善意让逃散的索马里残兵游勇多少觉得好过些。然而,苏联和古巴人并没有立即撤离出欧加登的迹象,更不要说从埃塞俄比亚撤军了。门格斯图政府也愤怒地拒绝了索马里的要求。情况很快明朗,即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将会继续在欧加登从事游击活动。事实上,索马里正式宣布撤军几周后,以及西亚德主席访问中国后,摩加迪沙政府就宣布它不会停止支持欧加登人的解放运动。这必然刺激到了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声言如果它的边界不被尊重的话,索马里的边界就没有理由要去尊重。时间将会告诉人们,索马里的这一挑衅性政策是为了在可怕的欧加登惨败后挽回颜面,还是为了最终寻求到阿拉伯人(如伊朗和沙特)在埃塞俄比亚一旦发动攻击时,对索马里防卫给予支持的一种反应。

欧加登冲突的更深层背景

正如我们曾论述的那样,欧加登冲突反映了超级大国在非洲之角的结盟关系的重组。苏联人本来是因为欧加登来到索马里(参见上文),但也是因为欧加登而与索马里闹翻。苏联人的这一大转变验证了其对该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容忍度。这一点我们将回过头来简短地做些阐释。美国人不再支持门格斯图政权后,投机主义的苏联人乘机插入到埃塞俄比亚因此出现的权力真空地带。苏联的这一行动或许最初对西方国家来说也是有利的。美国不再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而这个自封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显然要用最残酷的手段清洗反对派以

维持统治。苏联承担的是一项危险的、最后可能不讨好的任务，因为埃塞俄比亚除非有在人力、武器上的投入和苏联可能也难以接受的卷入程度，否则很难还会维持国家团结。可能没有预见到的是苏联人及其古巴盟国实际上准备为支持门格斯图不稳定政权付出的代价有多大。1978 年夏，在重新征服欧加登之后，苏联-古巴人控制下的战争机器如人们所预料到的那样转向了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自由战士先前曾在从前意属厄立特里亚殖民地(1952 年通过联邦的形式并入到埃塞俄比亚)恢复独立的斗争中得到了古巴人的直接支持。而且，厄立特里亚自由战士有更长期的反抗埃塞俄比亚的传统，并成功地收复了除阿斯马拉和马萨瓦港口外的整个地区，而埃塞俄比亚在这两个地方的卫戍部队则被团团围困。厄立特里亚的多山地形也与欧加登地区不同，更适合于游击战争。这一点在先前的战争中也有所体现。埃厄战争是一场长期的，也注定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双方都有大量的伤亡。这也让古巴在非洲的形象不佳，可能也会不利于苏联人在非洲的利益。它也肯定会让这两个国家与厄立特里亚所依靠的阿拉伯国家内的左翼、右翼政党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任何一种延长反对厄立特里亚、排除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厄立特里亚人的自治要求可能性的军事行动，也将会强化那种在欧加登战争中支持埃塞俄比亚而出现的奇怪的联姻关系(或者如索马里人谴责的那样是“邪恶同盟”)。用“联姻”一词来指苏联(其他东欧国家)、古巴、南也门、以色列和利比亚间的奇怪组织似乎有点过了，不过，正是这些国家的支持让门格斯图得以在欧加登地区恢复埃塞俄比亚人的统治。以色列愿意供应凝固汽油和军事技师，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在红海地区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国家的存在可以平衡阿拉伯国家的影响，这样做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而利比亚参与打击厄立特里亚的独立派，尤其是在一些中东国家看来，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左翼穆斯林，动机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当然，取得各种各样的外部支持有利于埃塞俄比亚政权，也符合埃塞俄比亚外交政策的传统。然而，这些外部联合显然是由苏联人掌控的。无论什么也掩盖不了这一点，即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苏联的代理

国。在历史上,沙皇长期渴望将埃塞俄比亚变为俄国人的保护地,此时最终修成了正果[3]。俄国人的这一想法在 19 世纪末尤其突出,当时俄国提供武器、派出顾问来支持孟尼利克的征服,还将埃塞俄比亚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起源说归因于俄国的民族诗人普希金。这种结果在 19 世纪是通过基督教教会取得的,现在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者手中实现的。这也让人很容易就想到了苏联自己的革命经历。对古巴人来说也是如此,埃塞俄比亚的动乱和流血具有一场真正的“正在发生的”革命的所有特征,强人门格斯图作为国家元首,与带有慈父作风的索马里领导人西亚德·巴雷相比较,显然也更能吸引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关注。西亚德太容易使人想起拉丁美洲老派的那种仁慈的独裁者不那么具有革命性,而无论索马里革命取得了何种成就,它相对平静的发展态势在动乱、死亡和恐怖程度上肯定无法与埃塞俄比亚相比。

但是,如果门格斯图最终在这种由苏联人控制的帮助下,成功地制服了厄立特里亚人,在其他具有分裂倾向的州份以及埃塞俄比亚中心城市中恢复并巩固了权威,那么,门格斯图会在外部力量帮他实现目标后设法将它们赶出去,这也是埃塞俄比亚人的传统做法。这种情况是否或何时出现还是个未知数,也只有时间才能解决。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目的达成,埃塞俄比亚就会立即驱除外部干涉。该地区一贯有此传统。

1978 年夏,局势出现失衡和转变。埃塞俄比亚离开美国倒向了苏联阵营。在越南战争后,索马里失去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却没有获得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阿拉伯人支持的力度与作用依然难以确定。共产主义中国长期以来既支持索马里又支持埃塞俄比亚,并在继续强力谴责苏联的帝国主义。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去支持其在索马里的平民援助项目,但在索马里所需要的军事支持上依然有待观察。在索马里与苏联决裂期间,欧共体国家主要将精力用在提供紧急援助项目上,以便继续支持那些苏联放弃的项目。中国无疑也会提供其独特的支持(不排除给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游击队提供武器)。由于西亚德主席在外交关系处理上有着难以理解的举动,所以索马里与苏联出现

某种新的和解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地方性问题

欧加登战争的蒙羞所带来的地方压力与对外关系上的大量不确定性在索马里同时并存。人们自然会尖锐地指责军事行动的指挥策略(最终也是主席本人主导的)和索马里对外政策。多个由西亚德及其代理人所组成的对外使团并没有从一些重要国家得到对新阶段的泛索马里斗争无条件的公开支持。泛索马里斗争在开始的时候,生机勃勃,前途光明,可最后却以灾难性的结果告终。

这给人们在事后令人沮丧的反思留下了批评的依据。如果政府将军事预算中的一小部分经费专门用于外交公关活动,它就会更容易地使外部世界相信索马里人所追求的欧加登自治是正义事业。若多年来不断宣传,本可以使得人们对这一问题始终保持关注,也可使外国政府(诸如英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更难以忘记它们在索埃争端的起因上难辞其咎。那样的话,人们就会更多地注意到这一事实,即索马里虽然独立了,但是却还继承了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争议,而之前的意大利和联合国的努力都没能解决问题。因此,这一地区的"非洲版图"在索马里独立的时候远没有定型。

而且,如果政府在索苏关系最好的时期里能保持谨慎,在西方阵营中培育一些盟国,索马里在关键时期也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如果能尽可能地采取措施减轻肯尼亚人正常的(也是合理的)疑虑,这对索马里来说也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假装不支持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策略,也有问题。因为,这样做使得埃塞俄比亚确信索马里就是一个侵略者。在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在欧加登发动攻击期间或之前,索马里没有尽可能地就欧加登问题采取主动的外交攻势,这肯定是一个根本性错误。索马里甚至也没有澄清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作战的目标和限度。

在索马里人取得初期胜利的时候,西方媒体的报道以及广播评论员的评论都极其明确地反映了索马里人有着上述的所有不足。报道和评论在谈论西索马里解放阵线部队的时候,说它"夺取"、"占领"和"占

据"欧加登地区的各个"埃塞俄比亚"中心。这些微妙、漫不经心且带有政治意涵的词汇强化了这样一个印象，即索马里人是厚颜无耻地侵略埃塞俄比亚领土的入侵者。而事实是，索马里人定居点想要恢复独立，只不过得到索马里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支持而已。当西索马里解放阵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时候，这些报道和评论完全用同样的词汇来报道这支队伍的胜利，而不是更为谨慎地说这支队伍是在收复索马里人的主权。新闻与国家宣传部本应做出更为有效的宣传，但与索马里其他很多部门一样，其工作在冲突期间经历着严重的考验，部门的负责人不是根据其技能而是根据其对国家元首的效忠来决定的。索马里人事业的发展也遭到其他未曾预料到的问题的阻碍。例如，政府致力于消除部落主义以及政府与西索马里解放阵线部队中各种氏族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因素让索马里政府不可能出版一些文件，以便展示在19 世纪孟尼利克侵犯时期索马里部落在欧加登地区的分布。

真正的事实在这里实际上遭到了忽视。德雷达瓦和欧加登地区附近的索马里伊塞氏族间的关系并不稳定，欧加登氏族与其北部的伊萨克氏族间争夺牧场的斗争有着漫长的历史。甚至，欧加登氏族联盟内部本身也有分化，至少在欧加登游击队的领导人与在索马里占据高位的欧加登氏族人员之间是这样的。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中的穆斯林奥罗莫支持者与其他同样反对门格斯图政权的奥罗莫人(有一些是穆斯林，其中有些人支持奥罗莫解放阵线)之间，也存在着不信任和敌意。而且，其他奥罗莫人(可能在这个大族中占到绝大部分)还没有和任何一个这样的组织直接结盟。正如我们曾论述的那样，阿法尔人同样也分为亲埃塞俄比亚和反埃塞俄比亚两个不同派系。这么多的分化极大地削弱了西索马里人的有效斗争，也使得他们与索马里共和国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与此同时，在索马里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有些个人和集团发现索马里人的民族主义可以很方便地越过国际边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无需非要和摩加迪沙的索马里政府保持一致。这种在认同和公民身份上的机会主义的长期传统加剧了氏族内部的分裂，必然让西索马里解放阵线运动内的制约性因素更多。

反过来，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如果当初考虑到自身的强势地位，采取谈判——如让埃塞俄比亚可以安全地出入吉布提港——以换取欧加登地区的独立，这该有多明智！索马里政府此后如果想到这种可能，应该十分懊恼。最后，军事行动本身也有大量引来批评与指责之处。事后看来，索马里政府在很多方面都犯有严重的战术上的错误。过分自信且缺乏经验的索马里指挥官严重低估了苏联-古巴所支持的敌人在战术上的老练。显然，正是这些因素造成索马里正规部队后备军的悲剧，缺乏空中掩护的部队损失惨重。

那些从吉吉加闪电战中逃脱出来的人来到索马里共和国北方边境的时候，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困惑。那里据说有很多即刻性的军事处决发生。根据某些记叙，那些被枪决的人是军官，他们在吉吉加附近的最后战斗中拒绝服从命令。其他报道显示，那些被处决的人中有一些是士兵，这些士兵威胁要发动叛变，因为他们被要求脱掉制服，立即返回欧加登地区去当西索马里解放阵线游击队员。

索马里政权显然也较为谨慎地命令从欧加登地区撤退回来的大多数人沿着北方边境驻守，以便让他们防止埃塞俄比亚可能的进犯，也想让南部地区不会出现什么不满情绪。这些防备很正确，因为 4 月 9 日南部地区的卫戍部队就曾试图发动政变。据说，在后来与忠诚于西亚德主席的部队的战斗中死了 500 名反叛的士兵。西亚德本人毫发未损。好几个反叛的领导人，主要是米朱提因氏族的上校，逃到肯尼亚去了。在北方平民中，曾经发放的枪支究竟成功地收缴上来多少？至今依然不清楚。当然，拿着枪的不满者确实是一种真正的潜在威胁。

1978 年 8 月，涉嫌卷入 4 月那次流产政变的平民与士兵在摩加迪沙遭到审判。当时，有很多消息称米朱提因氏族也抓了西亚德所属的马雷汉氏族的一些人当作人质。国家元首最近在官员的任命和提拔上都显示出他对自己氏族日益依赖，据说西亚德也与米朱提因氏族领导人进行了秘密谈判，以扭转当时的局面。一些当地索马里评论员称这种局面可能会导致全面的部落战争。这种看法可能夸张了点。可以肯定的是，比起前四年，比起 1975 年旱灾和 1977 年欧加登战争前，1978

年夏，摩加迪沙有更多公开批评西亚德政府的声音。这表明与其说是先前的安全举措有所松动（虽然也有这方面的迹象），不如说是中央本来牢固的控制力日益减弱。对于政府变革的要求，在米朱提因那次不成功的推翻政权企图后，反而有增无减。有些群体认为，这次未遂政变组织得实在太糟糕，无法达成政府变革的目的。虽然众多米朱提因氏族（它们在议会统治时期有着很大的权力）的急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们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倾向也让其他集团的成员避而远之，不过其他集团的成员与这些米朱提因氏族有着同样的不满。

从这些趋势来看，西亚德让各部和政府机构中的领导人到摩加迪沙国家指导中心进行五个月的学习，这一奇怪的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一些人看来，这一决定是对四月暴动浪潮的一种防御性反应。这一举动让全国的最高层文职官员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官员的提拔与降级也被承诺以"客观"的方式来操作，但它也加重了本来就很严重的困难，即这些官员本来在吸收大量外援上（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国家）很有经验，欧加登战争后不再是军事支持而是这些外援正在大量地涌入索马里，可是却苦于缺乏人手。在欧加登战争的失败激发了军队的分化，也在索马里国内造成了普遍的消极影响，这些对西亚德权力的持续性造成了损害。由于有如此多的国内问题，且在对外关系上还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的因素，西亚德主席的困境实在是不妙。

难民入侵

埃塞俄比亚重新占领欧加登地区的过程中，成千上万的索马里人和与索马里人有关联的部落都涌到了索马里共和国寻求避难。索马里政府对这种人道灾难立即展开回应，成立了国家难民委员会（National Refugee Commission, NRC），并在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匆忙地修建了一系列的难民营。索马里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的援助呼吁。在持有同情态度的志愿组织和其他在欧洲和美洲有着广泛支持的压力集团的帮助下，索马里的呼吁得到令人满意的回应，即国际社会将提供短期的紧急救援。国家难民委员会和内政部联合组织管理这些难民营

(有些难民营容纳的难民达到4万多人)。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难民营还形成了其内部的组织机构,由难民指挥官来领导,这些难民指挥官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官员来担任。难民营在当地的居住地通常是以欧加登地区的地名来命名的,因此与难民的来源地保持了某种联系。难民营里还建立了一个难民卫生所,补充和扩展外国短期医疗援助队的工作。难民营基于发放给每个家庭的比例卡来分配粮食。

尽管索马里政府得到了志愿组织的帮助,但还是不得不担负难民救助计划初期花费中的大部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及其资助国(主要是西方国家)承担更长远的财政花费。能获得这种支持(每年的花费超过1亿美元)的实际难民数很快就成为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1981年11月,索马里国家难民委员会和主要资助国代表就难民营中的难民人数问题产生分歧进行协调,双方遂决定在难民营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但是关于普查过程计数不准的报道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分歧,最后双方都有些不情愿地达成一个折中的"规划人数"70万人。索马里当局此后极力反对对难民营的难民人数和人口特征再做调查,只坚持认为实际难民数比规划人数要多得多,更别说那些住在亲戚家因而融入索马里总人口中的那些未登记的"看不到的难民"了。这就造成了一种荒唐的局面,一方面,1981年那种带有随意性的规划人数始终不变,另一方面,难民营中存在新出生的和死去的难民,也有新来的和离开的难民,总人数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特别委员(他本人就是一个欧加登人)领导下,国家难民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王国,它严重质疑相关的人口统计调查。

因此,这一庞大的难民人口(占到索马里全国人口的20%)最初对索马里共和国经济造成的困难,到后来则由于救济(至少是因为一部分的难民救济金)而得到了减轻。没有一个难民营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它们大都缺乏让自给自足成为可能的水源和可耕地,而且营中的难民起初都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4]。然后,营中仅存的少数成年男性则往往在后来被吸纳到索马里经济生活中去了,一些人就在当地工作,其他人则加入到移民潮中去海湾国家以便找工作,或者返回到埃塞俄比

亚放牧牲畜,在埃塞俄比亚,他们也可能会加入到游击队伍中去。随着时间的发展,难民营中新一代的年轻男性成为索马里武装部队可强征入伍的便利人群,这也让招募新军的官员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官员间常常发生矛盾。

正如可能会预料到的那样,如此大规模的难民移民区的存在,虽然最初得到热情的接待,但肯定会对当地政治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长期与这些难民关系并不友好的索马里本地群体所在的地区。北部的难民人口中虽然有相当多的非索马里人的奥罗莫人(他们是一个与索马里人有联系的说库希特语的民族),但是那些属于索马里欧加登氏族的难民的存在造成了当地传统上互相竞争的伊萨克氏族间的严重冲突。这似乎也加强了北部地区在索马里的分裂意识,这种意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很是明显。我们将会回过头来简短地探讨这个问题。

从一党制国家到一言堂式的国家

欧加登战争后的难民危机让索马里得以接受西方政府慷慨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些西方政府已经取代了西亚德之前的伙伴——超级大国苏联。这些西方政府的优先考虑和利益,尤其是它们在让索马里放弃“民族统一主义”和推进索马里与肯尼亚的关系上的关切,反映在它们所提供的援助是民用而非军事援助上。因此,美国在索马里虽然获得一些军事设施使用权,但是美国人在 1987 年只是勉强给索马里提供了价值 870 万美元(而非索马里人所要求的 4 700 万美元)的基础防御装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证据显示西方对索马里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政权的权力基础和民意由于 1979 年 12 月选举产生的“人民”议会而得到扩大,而人民议会中 171 个席位都被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所占有。选举后,西亚德重组了内阁并撤销了三个副主席的职位,如果说并不是撤销他们的实际权力的话。然而,1980 年 10 月,正值难民危机高峰时期,此时的难民危机由于固有的管理缺陷而有所加剧,国家元首宣布索马里进入紧急状态,并恢复了最高革命委员会。最高革命委员会与政治局和党中央有着重叠,且是一个平行(如果这是一个准确表达的话)

的设置,而政治局和党中央反过来又与部长议会相重叠。相比较于索马里部落,很多人怀疑政府是否需要有这么多过剩的、浮夸的机构设置。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迷宫般的机构设置会造成被统治者和总统小圈子外的决策的混乱。

1982 年 3 月,最高革命委员会再次解散。就在同一年,西亚德总统首次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为了这次访问,在美国的压力下,索马里总统释放了两名良心犯,即前总理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和备受尊敬的前警察局局长穆罕默德·阿卜希尔,这两个人事实上自 1969 年 10 月以来没有受到指控也没有经过审判一直被关押着。然而,在这些重要人物被释放之后,1982 年 6 月又有现政权的七位领导人因涉嫌卷入一次恶毒的反政府阴谋而遭到逮捕。这个新政治犯集团包括副总统伊斯梅尔·阿里·阿博科尔和前外交部长奥马尔·阿尔特('Omar Arte),这两人均是著名的北方人士,也是国家元首个人崇拜的设计者。该集团还包括两名总统所属氏族的重要人物,因此总统就可以在这次事件中逃脱带有部落偏见或搞小集团的指责。其中的一位是前教育部长穆罕默德·阿丹·谢赫(Muhammad Adan Sheikh)博士,他也是马雷汉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并已经从高级部长职位降格为索马里科学与文化院的领导人。

到此时,索马里主要政治人物当然也都顺应了这种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升降模式;精英群体始终在变动,个人的政治生涯轨迹可能从囚犯到大使再到内阁部长。但进监狱和当部长这两个极点其实差别也不太大,因为一些部长是不允许出国的(哪怕是为了治病),他们实际上是其所属部落或氏族支系的人质。西亚德总统有着马基雅维利式的实践手腕,又有着一个电脑般的政治头脑,他尤其擅长从大的部落集团内部中那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的支系挑选一些象征性的人物,这些人均乐于为西亚德服务,并将自己看作是部落的代表。国家元首如此熟练地操控着这种亲族关系网络,不过这种网络确实是极其复杂的[5],而且这种网络以其独有的方式构成了全国部落的宏观架构,在这种架构中存在很多分化,西亚德总统可以对此非常精明地加以利用[6]。如果说早

些年前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为了"夺取权力的工具"的话,那么此时西亚德正在解决"传统"政治体系中的困境以确保其权力的维持,并没有借助于"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用来证明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但给早前在总统身边所业已存在的 MOD 部落联合带来了新的限制性因素。无疑,西亚德在政治生存权术上超过之前所有的文职领导人。当然,他也比前人拥有更多的优势:军权、盘根错节的安全机构(包括军队系统和非军队系统),真正的民主机构机制的缺位,以及充足的物质资源来赢取一些屈服于他的支持者。

这些手段有利于总统个人的权力维持,但肯定不意味着会带来有效的政府和发展:文职公务人员的工资长期不能足额发放,因而这些人的工作热情日益消极。官员们战战兢兢地为了保住性命,希望能避开政治上的灾祸以维持职位,也想避开那些可能会带来负面形象的职位。这种政治上的不安氛围也超出了索马里国内蔓延到索马里共和国在海外的使馆,而且使馆的主要任务成为监视索马里海外公民的活动,甚至对这些海外公民在涉及索马里利益的行动进行报告。国家元首对媒体和其他出版物中涉及他本人的任何评论是否能立即得到报告极其关切。

由于索马里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并没有真正的独立媒体,且国家审查制度一直在执行,因此口头新闻来源就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也因为如此,外国广播电台的驻外机构的广播在索马里被广泛地收听,尤其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索马里广播站。西亚德政权常常向英国政府抗议英国广播公司带有偏见的报道,这也可以看出英国广播公司作为索马里国内外新闻来源的重要性。同样地,当英国政府为节约成本而考虑关闭这个广播站时,一个由索马里各方领袖组成的代表团直接找到英国驻摩加迪沙的大使。他们说,他们很理解英国由于经济困境而需要减少花费的这一做法。虽然他们都很敬重大使本人,但在这件事上,他们实际上认为宁可关闭英国大使馆,也不能中断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针对西亚德政权钳制公众辩论和批评的做法,还有另一种反应形式,即大量抗议诗歌的出现,这些诗歌取材于索马里丰富的传统口

头文化。西亚德政权的反对者,包括索马里国内的和国外的,还常常创作很多隐晦难懂的情歌来挖苦西亚德政权的领导人。总统的御用诗人则大量创作作品加以回击,从而索马里还出现了较长时间的诗歌交锋。这些诗歌"镣铐"(索马里人的叫法)被灌入磁带,在整个索马里和散居在海外的索马里人中间广为传播。晶体管革命给极为丰富的索马里传统口头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7]。在索马里,如果出入境带有这样的煽动性材料被海关官员抓到的话,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有组织的反抗

对政权的不满力量本来较为分散,但经过两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后更具有组织性了。这两次政治运动主要是在索马里共和国中部和北部地区(前英属殖民地)的部落间发起的。以穆杜格为大本营的米朱提因氏族中,那些与 1978 年未成功的政变有关联的人到 1981 年末组建了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Somali Salvation Democratic Front,SSDF)。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是一个游击组织,它在 1982 年将指挥总部迁到埃塞俄比亚,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无线电广播发射站("库尔米斯广播"[Radio Kulmis],后来叫"哈尔干广播"[Radio Halgan])。1982 年 6 月,由于得到军事支持,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部队越过埃塞俄比亚边界线并控制了索马里境内的一小块地区,他们在广播中宣称正在发动反对西亚德政权的全国起义。虽然入侵者只是继续控制着已经占领的边境地区,但是索马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要重新控制穆杜格及其临近地区。

此时,另一个主要反对集团索马里民族运动(Somali National Movement,SNM)宣布它将与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联合行动。索马里民族运动成立于伦敦,后设在埃塞俄比亚,该组织主要得到了托格代尔(Togdher)地区的伊萨克氏族的支持。米朱提因氏族的政治优势由于西亚德所属的马雷汉人权力而遭到了压制,如果说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米朱提因氏族受打击的傲气的话,那么索马里民族运动则反映了伊萨克人的抱怨。这些抱怨包括:没有适当的政治

代表权、发展上的被忽视以及当地商人和出口商由于经济上的控制而产生的挫折感。这种经济上的控制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市场，这个市场由于牲畜出口和劳动力输出到海湾国家而带来的硬通货得以繁荣起来，在北方地区是极为兴旺的。伊萨克商人在牲畜贸易中居主导地位。1983 年，由于沙特政府因为牛瘟而禁止从索马里进口家畜，这些伊萨克商人遭到更大的严重冲击。就在同一年，索马里政府禁止具有兴奋麻醉作用的植物咔特(*qat*)的种植和买卖，而在西北部地区，这种植物已经是广为种植的经济作物[8]。尽管这一举措是渐进式展开，也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是在北部地区却被解读为进一步打击伊萨克人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由于北方有着大量难民，且摩加迪沙越来越倾向于对该地区采取直接的军事统治，这些因素更是全方位地加重了一些人的挫折感。1981 年底，当地有 40 多名杰出人士(包括有公职人员、医生、教师和商人)参加了部队，他们参加部队不是为了推翻政权而只是为了改善当地公共服务的质量。但是，当局以涉嫌颠覆政权的罪名逮捕了这些人，从而更加剧了互相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局势下，索马里民族运动得到了相当大的民众支持，并发动了多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1983 年 1 月令人惊叹地从曼德拉监狱(Mandera Prison)解救出多名政治犯，1986 年 12 月暗杀了北方地区的国家安全局局长。1987 年 1 月，北方地区的督军(Military Governor)计划发起既有严厉的军事措施又有严厉的经济措施的运动，这些措施与早前在穆杜格针对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同情者的措施类似。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这份“绝密”计划在向国家元首汇报后就被泄露给了索马里外的公众。这可能是为了挑起支持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的米朱提因氏族与支持索马里民族运动的伊萨克部落之间的摩擦而有意外泄出去的，伊萨克部落是计划中的军事报复行动的目标。这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西亚德也越来越依赖于这一策略**。

正如预料的那样，西亚德政权对这两个敌对运动展开攻击，称这两个运动组织是以氏族为基础的“部落主义”组织，它们与埃塞俄比亚人有勾结，是叛国分子。西亚德政权认为这样肯定会消解这两个组织在

全民族中的支持，并会使它们无法联合成一个值得信赖的民族阵线。在埃塞俄比亚人看来，这两个反政府运动组织是一种便利的工具，可以消解在欧加登地区得到摩加迪沙支持的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影响，尽管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在此期间的活动并不活跃。在西方一致的压力和劝诱(经济援助)下，索马里政权不但寻求修补其与肯尼亚之间的关系(符合西方利益)，而且还开始倾向于与埃塞俄比亚就欧加登问题展开谈判。鉴于上述情况，索马里政权采取这一姿态就不足为奇了。1986年1月，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国家元首在较为便利的中立国吉布提开始会晤谈判，这次具有积极意义的会谈之后带来了某种脆弱的和平。然而，这种脆弱的和平很快就由于1987年初新的边界冲突而遭到威胁。不过，在一些索马里人团体看来，索马里政治带有较深犬儒主义倾向，因此这些事件只是西亚德政权玩的把戏，西亚德是想从西方获得进一步的军事支持。

无论这些脆弱的和平倡议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晰了，即只要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和索马里民族运动以埃塞俄比亚为基地，埃塞俄比亚人就握有一个强大武器，以此可以抵消摩加迪沙设法通过欧加登地区的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给埃塞俄比亚施加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欧加登氏族日益发现他们已经成为西亚德总统的傀儡组织。

家族王朝还是氏族王朝?

与此同时，索马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86年5月，西亚德总统在一次几乎致命的交通事故中受伤。不过，他能存活下来倒并不是其保镖的功劳。这些保镖用枪劫持了一位索马里医院医生，并将这位医生押到事故现场却没有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也没允许他携带合适的医疗设备。最后，副总统萨马塔尔(Samatar)和其他对索友好的政府采取果断行动，将西亚德总统用一架医院飞机运送到沙特阿拉伯。西亚德虽然没有痊愈，但倒也恢复得不错。6月，西亚德返回索马里继续履行总统职责，当然，他也没有之前的那种精力了。

在西亚德治疗期间，公众依然错愕于对这次事故的新闻报道之时，按照宪法，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阿里·萨马塔尔将军接任成为国家元首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似乎阻止了西亚德家族和西亚德所属氏族中的成员可能匆忙发动军事行动。这些人显然极为关切“老头子”不在位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他们在西亚德在沙特阿拉伯医院治疗期间与西亚德本人还有着紧密的联系。萨马塔尔将军及时干预采取稳定局面的行动似乎得到了军方的普遍支持，也得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支持：即三位副总统侯赛因·库尔米耶(Hussein Kulmiye，规划部长)、艾哈迈德·苏莱曼(Ahmad Suleyman，内政部长，也是前国家安全局长)和艾哈迈德·马哈茂德·法拉赫(Ahmad Mahmud Farrah)同志。这个集团中的主要领导人来自各个氏族，因此被称为“宪政”派系(索马里语是 *Dastouri*)，而西亚德家族的派系被称为“五人帮”：很有权势的总统长妻、长妻生的长子马斯拉赫(Maslah)将军、西亚德的堂兄兼表兄阿卜迪拉赫曼·贾马·巴雷(‘Abdarahman Jama Barre，外交部长)、阿卜迪拉希·瓦尔萨姆·因德勒赫(‘Abdillahi Warsamme Indolleh，合作部长)和阿卜杜勒-卡迪尔·哈吉·穆罕默德(‘Abd al-Qadir Haji Muhammad，党副总书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马雷汉亲族组成的家族派系(也被称为氏族派系，索马里语为 *qabiili*)并没有得到整个马雷汉氏族的广泛支持，且由于级别接近，派系内部也存在竞争，如在马斯拉赫将军和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赫曼·贾马之间。

1986 年 6 月，西亚德总统在氏族矛盾的压力下迅速返回索马里后，萨马塔尔将军立即放弃了临时总统的职位，西亚德对其忠诚也没有表示一些感激之情。西亚德显然对“宪政”派系也没有什么好感。在其家族内部，不同妻子所生的孩子间互相争夺，其他主要亲族也在争权夺利。虽然萨马塔尔将军没有利用总统不在的时候削弱总统的地位，期间也没有政变迹象，但西亚德的权威还是受到了严重影响。自从西亚德在索马里掌权以来，索马里民众第一次开始公开讨论谁将接替他的位子，西亚德所属的马雷汉氏族(他们将是最大的输家)也在为一旦西亚德不在了，如何保护自身而紧张地展开活动。尽管西亚德上了年纪，

且车祸也造成了影响,但他还是设法重新掌控权力,竭尽所能地塑造形象,即他传奇般的旺盛精力依然没有消减。因此,1986 年 9 月,党中央正式提议让“老头子”担任下一个七年任期的总统,正如所料,这一提议在 11 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全票通过。紧接着在 12 月 23 日的全国选举中,西亚德正式再次当选为总统,在全体选民中获得了 99.9%的支持率。外交部长和其他马雷汉候选人要求进入西亚德主持的政治局,但遭到“宪政”派的反对,此事也就被临时搁置下来了。西亚德为了安抚马雷汉人,就强化了马雷汉人在武装部队中的地位,越级提拔了一些人,授予他们将军和其他一些高级军衔。与此同时,西亚德还重组了内阁,强化了马雷汉人对国防部的控制。1987 年 2 月初,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萨马塔尔将军被任命为新政府的“第一部长”,这就免除了萨马塔尔的职责而巩固了马雷汉人在国防部的权力。事实上,萨马塔尔将军的办公室和官邸被新近提拔的国防部长非常无礼地霸占了。

由于像国防部和外交部这样重要部门的部长直接向国家元首而非向“第一部长”汇报,因此索马里事实上出现了两个政府:第一个是以萨马塔尔将军为中心的官方机构,第二个是以最高权威西亚德总统为中心的其他机构。萨马塔尔将军在西亚德不能出席部长议会会议的时候并不愿意坐在西亚德的座位上,这也反映出这两个有着重叠的政治集团的相对权力。西亚德的精力有所衰减,这也意味着本来西亚德亲自处理的很多问题此时都转到诸如国防部副部长——令人生畏的加尼(Gani)将军和新任党副总书记阿卜杜勒-卡迪尔·哈吉·马萨勒赫('Abd al-Qadir Haji Masaleh)等人的手中,他们都来自西亚德所属的氏族,因而也让事情更加复杂了。在难对付的总统长妻及其儿子马斯拉赫将军周围也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圈子,他们也在很多问题上做出决策。马雷汉人的权力在军队中的渗透和扩展尤其明显。据估计,到 1987 年中,高级军官队伍中有一半人都属于总统所属的氏族或与总统有亲族关系的氏族。在西亚德儿子马斯拉赫将军领导的新设立的南部指挥中心,炮兵与坦克旅中的这种比例甚至更高。在绝大部分部长

和政府部门中，马雷汉官员还组成非正式的监督机构，如果说不是决定，那么也可以说影响着行政决策。

对其他氏族成员来说，这些情况看起来意味着马雷汉人正在建立防卫性的氏族安排，这种安排远不是早前的 MOD 三方联盟，即马雷汉、欧加登和杜尔巴汉特。在最为重要的杜尔巴汉特人物中，有一位是在"宪政"派系，欧加登人则分化成两个派系，这也显然与两个欧加登运动组织有关：西亚德控制的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另一个是反对西亚德的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Ogade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马雷汉人权力的扩大加剧了其内部的分化，也会加剧总统家族及其亲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在出车祸前，西亚德总统似乎曾赞同让外交部长接任他，但在车祸后，接任者又变成了他的儿子马斯拉赫将军。这些要建立家族王朝的努力促使马斯拉赫的马雷汉竞争者在自己氏族外，甚至是在第一部长萨马塔尔领导的"宪政"派中寻求支持。萨马塔尔本人对这些王朝构想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仍然还有待观察。一些当地的观察者认为，萨马塔尔在西亚德发生车祸后住院治疗期间担任代理总统的时候已经错过夺取权力的机会了。萨马塔尔在那个关键时期的忠诚行为，也证明了西亚德当初的决策很明智，即从传统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族裔中选择一个人长期担任国防部长和第一副总统(萨马塔尔那时正担任此职)。这个少数族裔仅仅与索马里一个主要氏族(米朱提因人)保持有直接的联系。

不值称道的遗产

在我们结束讨论这种不确定的政治前景前，我们必须要简短地论述一下西亚德总统长期执政结束前的整个经济形势。在欧加登战争期间，索马里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军事援助。战后，虽然苏联人撤退了，美国和欧共体国家来了，但是欧佩克国家依然是石油和民用援助的重要来源。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也令索马里有所担心，因为美国政府并没有提供索马里所要求的那么多军事援助，而且，美国粮食援助计划(该计划允许索马里政府卖掉这些谷物以便为发展项目筹措资

金,但索马里两个派系都想争夺控制权)还让问题复杂化了。然而欧加登战争后,索马里经济状况很糟糕,难民危机还带来了财政负担,这种情况让索马里政府很难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自由化"的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让索马里货币贬值;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设法扩大出口;以前,香蕉是索马里的一种主要的出口产品,但在科学社会主义时代索马里的香蕉业已经极其凋敝,国有糖料产业同样也有所衰退,甚至都不能满足本地市场。同样地,农民的谷物生产,尤其在可耕作的南方地区的谷物生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为农民难以接受政府控制的低价,纷纷转向种植西瓜。西瓜是一种高利润的经济作物,且政府没有加以限制。

另一方面,没有被国有化和不受限制的牲畜出口业由于国际价格的上涨和持续的需求而较为发达。牲畜贸易在 1982 年发展到了顶峰,总额达到 1.32 亿美元,占索马里对外创汇总额的 80%。在指定处货款交换(*franco valuta*)制度下,政府给出口产品定了最低价,这些出口产品需要每个得到许可的出口商通过国家银行系统以官方汇率来支付。然而,这种由索马里出口商和沙特或其他硬通货进口商上报给银行的定价,往往要比实际支付的价格要低得多。索马里出口商获得的这种硬通货利润,或被用来进口稀缺的消费品在索马里出售,或被以平行市场汇率卖给索马里进口商,而平行市场汇率是官方汇率的 20 多倍。这些出口商因常常躲避关税而让实际收益增加了很多。1982 年,据估计,索马里出口商达到 400 人左右[9]。一年后,索马里的主要进口国沙特阿拉伯因牛瘟宣布对索马里牲畜实行禁令后,这种重要的贸易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一料想不及的问题反映出索马里在贸易和援助上对沙特阿拉伯的依赖程度。沙特阿拉伯在文化上对索马里的影响也较为明显,这也反映在索马里政府在成年人和儿童中发动阿拉伯语教学运动上。另一个私人外汇的主要来源是在海湾国家的索马里移民劳工的汇款。这些移民劳工是在索马里"劳工输出"中出去的,也反映出索马里越来越依赖于阿盟,而索马里本身也在 1974 年机缘巧合地加入了进去。现在,没有了国家干预,当地商人通过给移民家庭提供货物或等

值索马里货币,以平行市场汇率来换取硬通货。显然,海湾国家经济的衰退将会给这种硬通货来源造成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到索马里经济的各个方面。

为了应对飙升的通货膨胀(1984 年达到 90%)和为国家银行系统带来更多硬通货,政府设法鼓励商人开设当地外汇账户。1984 年,指定处货款交换的出口制度被取消了,接着又引入了一种修正了的制度。1986 年 9 月设立了世界银行美元拍卖,目的是为了缩减非正式货币市场并减小官方和非官方汇率的差额。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取得多大成效,政府设法通过更有效的征税方式来增加税收,并开始削减行政机构的经费。由于每个高中和大学毕业生以前都由国家在行政机构中实行分配,索马里的行政机构正在日益变得臃肿。涨工资的同时也伴随着裁员,农业用地也被划拨给提前退休的文职公务员。然而,没有迹象显示国家想要引进激进的薪酬和绩效改革,以便让政府机关雇员能够不要从各个灰色收入来源获得好处。要知道,一个月的工资还付不起一周的房租。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索马里虽然勉强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和欧共体在国际收支平衡上的支持[10],且还有阿拉伯和西方的发展援助,其经济勉强得以有限的发展,但是索马里的整体经济前景似乎和政治前景一样暗淡。因此,索马里对投资巨大的巴尔德拉水电站项目抱有如此大的期待,也就不足为奇。这个项目在 1987 年还有很好的财政支持,然而依然需要美国和其他西方资助国的援助。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香蕉业有了一些积极的发展,牲畜出口也得到了恢复。然而,经济或许不能说无可救药,但肯定是一团糟。经济政策摇摆不定,只能说过一天算一天。政治舞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正如我们已经论述的,欧加登战争后,索马里从对苏联的军事依赖转到了对美国、欧共体和欧佩克国家更为广泛的援助依赖。这种新的依赖涵盖了对基本粮食提供的需求,且这种依赖由于持续不断的、巴勒斯坦式的难民存在而不断加深。与此同时,难民问题还没有找到永久解决的办法,如果要解决的话,就需要大量的难民返回到埃塞俄比亚。可是,难民问题一旦得到解决,索马里在吸纳外援上就少了一个主要理由。

这也会带来诸多后续效应,且这些效应肯定会远远超出难民营(到1987年有40多个难民营)给索马里各个领域造成的影响。由于游牧民和农民容易遭到旱灾影响,因此外国援助机构通常认为他们是索马里最为贫穷的人群。最近的研究显示,尽管城镇中虽然出现了一批大小企业家,但是随着城镇人口的迅速膨胀,这里可能会出现更为严峻的贫困现象[11]。一旦阿拉伯国家经济出现衰退,这些国家将会让大量的索马里移民返回索马里,因此肯定会让城镇贫困现象更为严重。由于粮食和燃料价格攀升和短缺,1987年8月中旬摩加迪沙还出现了自发性的骚乱。这些骚乱揭示出城镇中这种贫困现象所带来的不祥预示。政府对此做出了一些妥协,但也逮捕了大量所谓的"煽动者"。埃塞俄比亚革命前的局势与此时索马里局势很是相像,也出现了同样的骚乱,且在1974年终结了海尔·塞拉西的长期统治。

我们这里论述的这段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与十年前欧加登战争时期的局势相比,索马里的政治局势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在那时,索马里民族主义高涨,充满自信,西亚德将军利用民族团结意识而获得全国主要氏族的支持(除了一个主要在吉布提的西北部氏族)。在这种环境下,西亚德的MOD权力基础就意味着一个安全网络。现在,即十年后,民族团结瓦解,氏族间的冲突空前增加。由于西亚德将军出于防御性考虑退而寻求其所属的马雷汉氏族(也是对西亚德最为忠诚的人)的支持,MOD框架已经被抛弃。与此同时,西亚德当然也能采取各种手段继续利用其他氏族联系和矛盾。因此,他通过划拨经费和武器来笼络那些"友善"集团。但是,由于氏族间的联盟格局不断变化,这种危险的政策会导致小武器的扩散,这些小武器很容易就会流入到西亚德反对者的手中。

然而,有些奇怪的是,潜在的内战阴云也有利于西亚德这个历经风雨的老将,因为他可以借此消灭一些死敌。同时,西亚德总统车祸后没有立即出现政变,这也显示出索马里政治的冷漠和麻痹以及氏族间的猜忌。西亚德死里逃生也加深了氏族间的这种猜忌。因此,尽管西亚德早期统治时期的成绩有些言过其实,但西亚德之后的政治领导人从

他那里可以继承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遗产可能是氏族力量瘫痪的局面,这种局面有可能会防止内战的发生。西亚德去世后,这种局面有可能会提高西亚德家族和氏族的主导地位。在西亚德之后,氏族内的权力争夺会像预料的那样日趋激烈,而马雷汉领导人将肯定会寻求更大的联盟关系,不过这种联盟关系可能会让索马里政局陷入僵局,也有可能会让"宪政"派在民族和解的氛围中掌控权力。任何一个后继政权要想在全民族范围内实现稳定,就当然会涉及这一问题,即要对那些支持索马里民族运动和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的氏族进行令他们较为满意的安排。因此,埃塞俄比亚也就有机会对未来的索马里政府构成和未来的两国关系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欧加登战争后的十年内,西亚德的生存战略也强化了索马里政治体系中内在的分化特征,削弱了民族团结(常常是瞬息万变和临时性的现象)的基础,而这种情况却有利于埃塞俄比亚。

第十一章　混乱、国际干预与北部地区的发展

走向混乱

回过头来看，1988 年 4 月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两国领导人签订的和平协议规定，彼此都不要再支持在对方国家内的索马里反对派。这一协议是惨烈内战过程中所仓促达成的结果，而内战导致了政府机构和经济的整体崩溃(国家生存多年来依赖于外部援助)[1]。在 1991 年 1 月西亚德被事实上推翻之前，内战彻底毁灭了索马里。人权活动家们对西方政府的压力、在索马里兰和米朱提因令人震惊的对平民反抗的残酷镇压，导致了外部援助在 1990 年前就已经枯竭了。当时，西亚德的控制范围超不出摩加迪沙城，其反对者嘲笑西亚德并称之为“摩加迪沙市长”。摩加迪沙内的压力集团陷入绝望的深渊，在索马里外部朋友(尤其是意大利)的支持下，寻求与西亚德达成协议，让他将权力移交给平民政府。然而，西亚德固执己见，拒不准备做出任何让步。事态的后续发展则让这样的和平解决方案成为奢求。

1991 年 1 月，达鲁德独裁者及其保卫人员被索马里联合国会(简称为 U. S. C，1989 年成立于罗马)的部队赶出了业已被激战破坏的城市，狼狈而逃。这支部队是由哈维耶部落构成的，并由勇敢的来自哈巴

尔·迪吉尔氏族的将军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uhammad Farah Aideed,艾迪德是其绰号,意思是“不甘受到侮辱的人”。这个绰号也由于其残暴的个性而得到充分印证:惹他不高兴的人会有被其保卫人员就地正法的危险)所领导。艾迪德是国家军队的一名职业军官,西亚德曾将其拘押数年。在西亚德看来,艾迪德是一个威胁。后来,艾迪德在被派出为驻印度大使前却成为这位领导人的副手。到西亚德逃跑前,索马里已经分崩离析了,恢复了传统的氏族与家族分化界限。由于缺乏其他形式的法律与秩序,这种氏族与家族界限就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安全。

此时的整体状况容易让人们想起伯顿及其他19世纪欧洲探险家们的生动描述:这是一片由诸多氏族(氏族支系)小国构成的土地,旅行者要想穿越某块领地就需要获得这块领地上的氏族集团的保护。氏族集团对旅行者的保护是通过传统的“代理人”制度来实现的,只要价钱谈妥,接受保护的旅行者就可以暂时免于代理人亲族的袭击。与此时唯一的根本区别在于整个索马里境内的这些氏族集团间的关系起伏不定。达鲁德人(尤其是马雷汉人)的霸权与压制行为以及动用现代武器、死亡数量与破坏规模前所未有,让氏族集团间的关系更为动荡。接踵而来的摩加迪沙以及南部其他地区残酷的“氏族清洗”(索马里人的用词)也是前所未见。尤其是自欧加登战争以来,西亚德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将武器分发给其适时的盟友以反对其适时的敌人。这就让现代武器得以在整个索马里境内扩散。西亚德被推翻后,其巨大的军火库(军火堆放杂乱,主要来自俄罗斯、西方国家与阿拉伯国家)落入推翻他的民兵组织手中。后来,埃塞俄比亚独裁者门格斯图被推翻后,缺乏关注的埃塞俄比亚遣散军的武器装备又进一步地补充了原来的军火资源。当时,二手坦克购买价格便宜得像买小汽车一样,武器穿越肯尼亚边界、沿着海岸源源不断地输入索马里境内。

将西亚德的残兵败将赶出了摩加迪沙后,索马里联合国会的哈维耶领导(即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将军,他与北方地区的伊萨克氏族的索马里民族联盟有着联系)与阿里·马赫迪(Ali Mahdi,著名的摩

加迪沙商人,曾出巨资资助索马里联合国会)之间就如何分享权力没有达成一致。阿里·马赫迪得到了阿布加尔(Abgal)氏族的支持,采取主动建立了"政府"。阿布加尔氏族代表的是摩加迪沙更早期的哈维耶公民,而艾迪德所代表的是更近期的哈巴尔·吉迪尔(Habar Gidir)入侵者。艾迪德当时仍然忙于将西亚德赶出摩加迪沙,阿里·马赫迪的这一挑衅性行动将摩加迪沙分裂为两个武装阵营(北方和南方),也让氏族间的矛盾激化(阿布加尔和哈巴尔·吉迪尔),并很快就让首都处于长期的屠杀状态中,约有1.4万人遭到杀害,受伤者更是遇难者的3倍[2]。哈维耶部落的分裂有着深远的政治后果,在后来的十年内毫无缓和的迹象。

残酷的战斗越出了摩加迪沙蔓延开来,在南索马里大部分地区造成了破坏和饥荒。在这场战斗中,受苦最深的是那些更为温和的当地的迪吉尔部落米利弗雷(Mrifleh,即拉汉文人)氏族的种植者,他们人数不多,也没有武器弹药,被迫背井离乡以躲避民兵来回的猛烈攻击[3]。

摩加迪沙是毁灭与恐惧的中心,人们未能预料到这种毁灭和恐惧会辐射到摩加迪沙之外。与西亚德曾竭尽全力地呼吁所有的达鲁德人团结在他的旗帜下一样,现在哈维耶的联合国会袭击任何一个他们能辨识的仍然留在摩加迪沙的达鲁德部落中的氏族,杀死男人强奸妇女。任何一个迷途中的人都要报出其姓名和家系,且命悬于此。被击败的达鲁德人,尤其是西亚德所属的马雷汉氏族,在西亚德的一个继子,即由于在索马里残酷镇压伊萨克人并为伊萨克人控告为战争贩子而臭名昭著的摩根(Morgan)将军的领导下,沿着朱巴河一带重新组织起来。由于这两支部队都穿过朱巴河,双方将两河间的农业地区,也即索马里谷物主产地变成一片废墟,手无寸铁的种植者遭到杀害和恐吓。由于农业、畜牧业的破坏,饥荒开始蔓延,尤其是在可耕的河岸地区。联合国会认为30万人死于饥荒,约100万人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也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和北美地区寻求避难。

随着冲突扩大,艾迪德和奥马尔·杰斯(Omar Jess)上校的民兵(欧登加)联合起来反对摩根(米朱提因),而摩根则与西亚德的另一个

前将军,即阿丹·加比奥(Adan Gabio)及其民兵(南欧加登)形成松散的同盟。达鲁德的分裂集团以及在摩加迪沙的两派势力都在最大程度上武装了起来,并为了控制南索马里其他地区而展开激战。这些力量主要以传统部落或这些部落的分支为基础,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动员起来,且在经济来源上依靠战利品来维持发展。过去被称为战争领导人,现在的替代词即外国记者称之为"军阀"(强盗头子,或黑手党头目或许是更为准确的称呼)的这些人,基本上都不是西亚德政权的正面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前军队军官。同时,嚼着咔特(qat-chewing)的年轻匪帮不断实施这种组织性的暴力,这些人显然就是兰博(Rambo)的角色,在摩加迪沙肆意破坏、抢劫和杀戮。

与东北部和西北部的情势相比,摩加迪沙的政治经济资源(其人口1969年为50万,而1990年已经增长到200万)显然是冲突的诱发因素。"非洲观察"(Africa Watch)估计,西亚德部队杀害的平民高达6万人,数万人被迫寻求庇护,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埃塞俄比亚寻求庇护。1991年,西亚德被推翻后,情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东北部,阿卜杜拉希·优素福(Abdillahi Yusuf)上校领导的米朱提因人的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Somali Salvation Democratic Front)一解放了该地区,该地区以氏族为基础的组织就和平地吸纳了传统部落长老并逐步建立起当地的行政治理机构。虽然从一开始内部就存在矛盾,后来这种矛盾浮出了水面,但最初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是伊斯兰原教旨团结组织(Islamic Fundamentalist al-Ittihad)企图控制日益繁荣的布萨索港(Bossaso)。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成功地将该组织的军事极端分子驱除出米朱提因后,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后,该组织一些人员又在西部和南部进行了重组。

西北部的氏族构成更为复杂,但开始重组的时候还是较为顺利的。索马里民族运动(S. N. M.)的游击队在构造和平的时候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其困难有时主要是索马里民族运动的对手西部迪尔部落和东部达鲁德部落。索马里民族运动游击队成立了政府,该政府反映了伊萨克氏族的矛盾,也不得不依赖于传统氏族首领的支持。领导工作实际

上转到了传统氏族首领的手中,他们动用传统权谋和策略,建立了一系列村级和平会议(Shir,席尔)[4],虽然兼职的武装集团(当地称之为"代代",dayday)曾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威胁安全,但整个地区还是逐渐恢复了和平。

这个转折时期过后,即 1993 年 5 月,在博拉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通过了一部临时国家宪法,并任命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哈巴尔·阿瓦尔人,英属索马里兰的第一位总理,也是索马里最后一任总理)为新总统,接替了阿卜杜拉赫曼·图尔(Abdarahman Tur)。图尔是 1991 年索马里兰宣布独立后任总统的。我们将会看到,虽然伊萨克集团内部有着严重的冲突,野心勃勃的未来领导人后来还威胁到索马里兰独立的最初共识,但整体情况完全不同于南部的混乱状态。与后来主导南索马里的、高调的、国际社会倡导的、很不成功的会议,即被乐观地称之为"和解进程"相比,索马里兰低成本的、以当地氏族为基础的和平倡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那些高调的"和平会议"在后来的十年多时间内成为南索马里政治中一个重要的议程。肯尼亚总统莫伊(Moi,他在索马里南部地区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死后,和平会议被称之为"分派系喝奶的产乳骆驼"。

北方和南方在恢复秩序上的差异表现,当然也反映出北方相对没有南方竞争激烈,垂涎于权力的军事领导人试图组织其所在氏族成员,而没有从更广泛的公众福祉上去考虑。这种差异更是突出反映了外援所造成的分裂后果,在后来的 10 年进程中,外援一直都是导致南部索马里冲突不断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际干预

西亚德被打败并被驱赶出摩加迪沙之后,由于连续不断地发生屠杀,外国使馆和机构,包括联合国都抛弃了索马里,让其自生自灭。1992 年 3 月,曾有一段时间停火,虽然停火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但人道主义救援得以恢复,联合国儿童基金(the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 N. I. C. E. F.)于 1991 年末重新开放了其在摩加迪沙的办公

室。但是,各种民兵组织的政治经济的主要来源为港口和路线,各个派系为争夺港口和运输路线的战斗和抢劫严重地削弱了援助物资的有效运输。

各个派系对运输来的货物征收重税,从进来的援助物资抽取10%—20%的税,并向救援机构索要高额的保护费。这些派系对粮食输送提供武装保护,而他们本身也经常参加到抢劫粮食的队伍中去。当然,这是上文提及的旧有的阿巴安(abbaan)保护制度:然而,在捐赠者看来,这并不是分配援助的有效方式。

援助机构开始宣传索马里的困境,媒体也逐渐开始报道"最新近的非洲饥荒"[5]。国际社会的反应很迟缓,至少也是因为局势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其民众处于绝望中,缺乏粮食和医药供应,而这些物资只能靠配有大量现代武器的、互相敌对的、掠夺的民兵组织保护才能运送到那些最需要这些物资的人的手中。1992年4月,在压力集团的持续努力下,安理会部署了50名观察员并授权他们监督摩加迪沙的停火。经验丰富的阿尔及利亚外交官穆罕默德·萨农(Muhammad Sahnoun)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索马里特别代表。萨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有效的粮食分配:8月,萨农报告说150万人(约为索马里人口的四分之一)处于危机之中,但他缺乏为粮食运输提供必要武装保护的手段。于是,一支看似微不足道的3 500名的蓝盔军最终得到了武力授权。9月和10月中旬,这支可以使用武力的部队开始抵达索马里,并控制了摩加迪沙的机场。此时,由于无法忍耐联合国总部的官僚作风以及从任命他的秘书长那里得不到有效支持,萨农已经气愤地辞了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一个月里,联合国许诺提供1.5亿英镑,展开了一项庞大的索马里救援和发展的百日行动计划)[6]。

但形势在此时已经变得很明显,尽管秘书长热切地想把索马里当作是宣扬联合国宪章的一个案例,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大后勤保障和其他支持,其他成员国并不具备解决这场具有挑战性的新危机所必需的资源,也没有利益或政治意愿去推动一项持续的行动计划。就美国来说,最初也是没有什么兴趣。依据一些材料来看,美国似乎在当时更热

衷于寻求石油利益,索马里并没有这方面的利益驱动。[7] 然而,乔治·布什(George Bush)在美国大选中输给了克林顿(Clinton)之后,他似乎决定为其强力捍卫的"世界新秩序"留下令人不会遗忘的一笔。在国家安全理事会主管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建议下,国家安全理事会决定采取干涉政策。联合国随后在 1992 年 12 月 3 日通过了 794 号决议,依据宪章第七章,在没有索马里冲突各方提出的明确请求的情况下,授权一次人道主义行动。这个历史性的决定得到安理会的一致同意,包括"沙漠风暴行动"(美国发动的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将科威特从伊拉克的侵占中解放出来的行动)后对美国产生怀疑的中国和非洲国家。美国在索马里领导的部队被称为索马里联合军事行动(U. N. I. T. A. F.),并得到了早些时候萨农建立的被称为联合国索马里行动(U. N. O. S. O. M)的联合国部队的支援和补充。

到 1993 年 2 月,这支前所未有的联合国部队共有 3.3 万人,其中的 2.8 万人是由美国提供的。正如其命名所显示的乐观精神那样,"重拾希望行动"(Operation Restore Hope)在通过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决议几天后就立即展开行动。全副武装的美国先锋部队搭载军舰登陆摩加迪沙,这支部队还做了摄影培训,要通过电视向世界转播此次行动,让世界开始关注索马里的灾难。按照五角大楼的最初计划,美国的最主要目标是要将粮食和人道主义物资安全地送达南索马里最需要的地区。由于临近圣诞节,他们尤其强调要尽可能地减少伤亡。如果说他们有时并没有考虑到当地民众的反应[8],因为其庞大的人数和技术优势很容易就会引起索马里人的不安,但是其行动还是小心谨慎的。

此次行动由具有石油公司背景的、经验丰富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领导,他曾在摩加迪沙工作过,且和五角大楼的绝大部分主要官员都很熟悉。他还有一项棘手的任务,即要协调其联合特遣部队与联合国索马里行动部队的关系,联合国索马里行动部队与平民有着更直接的接触,当时是由继穆罕默德·萨农后接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即伊拉克外交官伊斯马特·基塔尼(Ismat Kittani)来领导的。重要的问题是,联合国对索马里联合军事行动施加

压力,要解除军阀的武装,以实现国家和解与正常化。美国政策制定者则强调其行动的短期性,避免重蹈越战的覆辙。

强有力的美国军队干预,成功地开辟道路以运输援助物资带来了最初的平静,但这种平静不久就开始被打破:武器在大街上又出现了,摩加迪沙和基斯马尤又爆发了战斗。正在恶化的局势使得索马里联合军事行动部队巡逻的时候更具有进攻性,解除市民的携带武器并袭击了摩加迪沙臭名昭著的武器市场。艾迪德的一个营地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摩根民兵的一个分队也遭到了袭击以阻止他们夺取基斯马尤。然而,索马里本已大量储备的武器还定期地得到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方面的补充。有人批评奥克利在武器解除上具有选择性,对此奥克利回应说,他正在"拔毛",得一步步来,一根一根地拔。在直接和这些军阀打交道时,奥克利认为,虽然他掌控着庞大的武装部队,但绝不会彻底地打败这些军阀。事实上,在这些军阀看来,尽管在武器上存在落差,但是他们似乎相信,就像过去的情形一样,他们可以让外部干预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后来的事态很快就证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

虽然索马里远远没有实现安全,索马里联合军事行动和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这两个孪生组织还是在一个之前享有主权的国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我们所熟悉的"维持和平"甚至"塑造和平"这两个词,都无法涵盖到底进行了多少实际行动。两大组织还作出努力,动员传统的草根领导人[9] 参与到援助物资的分配和当地重建的准备工作中。

趁强大的美国力量存在所塑造的相对平静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Ghali)提出所谓的"和解进程",借助于联合国会议于 1993 年 3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征集捐助。大量索马里和平组织都参加了此次大会。摩根的民兵组织厚着脸皮侵犯基斯马尤,让索马里本就不稳固的安全形势变得更为不安定。主要军阀和各个氏族运动组织的代表(有些代表地位是值得怀疑的)于 3 月 27 日达成的停火协定承诺,"彻底"解除党派的武装,并授权联合国部队对那些违反协定者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协定的序言充满豪情地用一句俗语来阐释其中的条款:"依照索马里的传统,静谧的树荫处乃是敬畏与和睦之所,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为会议厅所取代。然而,这里所做的承诺是神圣的,也是不可侵犯的。"联合国更具有雄心的一项计划,即尽可能地重组索马里政府,并提供两年的"过渡治理"期,该项计划虽然可以理解,但显得很是急促,也有些误导。过渡期由过渡国民议会(Transition National Council,即 T. N. C.)来领导,该组织由来自 18 个地区的代表组成,这些地区也将建立地方议会(这是一种对"自下而上"战略的妥协)。过渡国民议会是"索马里主权的拥有者",但不包括索马里兰,因为索马里兰代表团在签署协定前就已经离会了。不管怎样,索马里兰本身很快就从索马里脱离了出去。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正在谈判以建立联合国第二次索马里行动(U. N. O. S. O. M. Ⅱ)。联合国第二次索马里行动将接替定于 5 月撤离的、由美国领导的索马里联合军事行动。3 月 26 日安理会第 814 号决议拟成立一支由 2 万人的维和部队、8 000 人的后勤人员和约 3 000 名文职人员组成的多国部队。整个行动将由美国潜艇指挥官豪(Howe)上将领导,豪上将曾是乔治·布什的安全顾问,并被任命为新任的联合国特别代表。多国武装部队形式上由一名土耳其将军指挥,美国人任第二指挥官,很显然,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在需要的时候,美国将继续提供战略支持并派遣美国"快速反应部队"。然而,美国的后勤支持及其提供的特种部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也让人们很难判定,在实际行动中,到底是布特罗斯-加利,还是美国五角大楼在发号施令。

多国部队的这种极其复杂的指挥体系,再加上多国间以及其他内部分歧,给精明的索马里实力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机会。他们不会放过每一个被发现的黄金机遇[10]。

1993 年 5 月 1 日,联合国第二次索马里行动正式接替了索马里联合军事行动/联合国第一次索马里行动,但事实上,在亚的斯亚贝巴达成的所有和平协议,包括过渡国民议会的组建仍然没有付诸行动。新的有效框架搭建的同时,也就意味一种想快速解决问题尝试的开始。然而,军阀们仍然获得了新的武器供应,在解除武装问题上并没有任何

推进的迹象。6 月 5 日，一支巴基斯坦蓝盔军在检查艾迪德广播站(每个军阀都有自己的广播站，这些广播站是非常敏感的目标)附近的军械库的时候，在没有得到任何警示的情况下遭到了伏击。24 名巴基斯坦人遭到杀害，还有一些人受伤。虽然很明显联合国部队的这次行动本身策略上就有问题(这还算往好里说)，但他们却自然而然地认为索马里人的回击犯下了暴行。豪将军没有立即展开调查，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授意展开一系列的猛烈攻击，包括动用武装直升机打击艾迪德在摩加迪沙的基地。”[11] 艾迪德转入地下掩体但还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且艾迪德本人被宣布为通缉犯和战争犯。美国人的行动带有美国西部的风格，艾迪德的人头被悬赏 2 万美元。在索马里人眼中，这个悬赏数额有点好笑。艾迪德对此进行了回敬，给豪的人头也悬赏了同等的数额。

后来的联合国反袭击行动事与愿违。联合国部队没有找到躲藏起来的艾迪德，却造成了如果没有数千，至少也有数百名索马里人的伤亡，其中包括位高权重的哈巴尔·吉迪尔氏族长老(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要与之进行和平谈判的对象)和此时仍然对狡猾的索马里强匪充满敌意的其他氏族人员。索马里人普遍谴责联合国的行动，艾迪德借机宣称他是以伊斯兰教之名，在苏丹人的支持下(这一点对熟悉艾迪德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进行战斗的，他要将国家从外国人占领下解放出来(豪被认为是具有正统派基督教倾向的人)。在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的媒体报道的协助下，艾迪德甚至开始成为一个受到打压的民族英雄，且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名声。艾迪德成功地激发联合国将其妖魔化并让联合国所有的索马里行动都集中于将其抓捕上，[12] 这进一步地强化了他的这一形象。

此时，备受攻击且陷入困境的豪将军指挥下的联合国驻索马里部队和艾迪德及其日益壮大的游击队展开全面战争，而艾迪德的部队总是比装备笨重、情报匮乏的蓝盔军要占有先机。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曾很不谨慎地招募了很多哈巴尔·吉迪尔氏族的人来从事行政工作，尽管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有着尖端的设备，但其情报机构被大打折扣。联

合国行动在技术上是高之又高，而在谋略上是低之又低，而艾迪德和摩加迪沙其他索马里的老百姓却对谋略十分擅长。

这场机智灵活的大卫与笨拙的哥利亚之战，其必不可免的结局很快就见分晓。10 月初，艾迪德的部队成功地射落了几架派来抓捕他的美国直升机，抓住了一名美国空军，并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13]甚至连匆忙赶来救援的美国特种部队，虽然拥有各种最先进的装备，要想确保控制住摩加迪沙的街巷，也不得不承受持续的、令人讨厌和无法接受的伤亡率。毕竟，联合国并没有和摩加迪沙处在战争状态，更谈不上和整个索马里处在战争状态中，虽然情形已经越来越像这么回事了。在摩加迪沙大街上拖拉美国大兵死尸的恐怖电视画面让美国公众深感震惊和恐怖，强烈要求美国从这种非洲灾难中撤离。美国在非洲的这种灾难让美国人很警醒地想起了越战噩梦。艾迪德在美国大军压力下表现出一种轻蔑的姿态，这进一步地增加了他作为非洲英雄的声名，即使这种声名是短暂的。艾迪德打了场“正义之战”，而对豪将军来说，他在索马里算是彻底栽了。

在美国公众的狂怒下（包括军队高层的辞职），美国新总统比尔·克林顿被迫宣布美国所有的军队将在 1994 年 3 月 31 日前撤离索马里，且美国在索马里的军队依然由美国人（而不是联合国）指挥。按照评估，为了避免在撤离的时候再次丢脸，美国需要增加部队、交通工具和一艘航空母舰以及两组可以两栖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在政治方面，曾直接领导早期“重拾希望行动”且并没有造成如此严重伤亡的奥克利大使，被迅速派回到摩加迪沙，以确保释放美国俘虏并将艾迪德从对美国充满严重敌视的态度下带回到谈判桌上来。

就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来说，其结局此时也很明朗。美国宣布将要撤军引发了国际支持的逐步减少，其他国家的部队在适时的条件下也要撤离。而在摩加迪沙本身，这些变化产生了混乱，阿里·马赫迪的阿布加尔人和艾迪德的哈巴尔·吉迪尔支持者发生了冲突。阿里·马赫迪宣称艾迪德趁着美国人撤离之机试图夺取权力，他要重整武装。布特罗斯-加利[14]在 10 月 22 日短期访问了索马里，阐明联合国将继续信

守承诺，并与非盟、阿盟的领导人开启了新一轮的协商。在这新一轮的协商中，埃塞俄比亚的新总统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起了重要的作用。艾迪德回到了谈判中，但和以往一样，谈判的进展极其缓慢。

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尤其是美国人在如此耗钱耗力之后，自然倾向在撤离后留下一些积极的影响。到1994年3月底，原先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的签署方和被联合国强列入会的其他领导人在亚的斯亚贝巴、开罗和内罗毕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之后，阿里·马赫迪和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代表其同盟者和他们自己最终签署了一项新协议。此协议也是联合国官员宣布说60名参会者每天的酒店花费高达15万英镑，不能再拖延了才达成的。协议内容对加剧的暴力进行了谴责，但也是陈词滥调令人作呕，并承诺要重建和平。3周后，参会者自己也做出了决定，要为按照计划安排的5月15日全国和解大会制定规则和程序，5月15日也将成立过渡政府。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的方针也因此从强制和平修正为维持和平：在美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部队撤离后，联合国驻索马里部队只是由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且人数削减为约2.2万人。欧洲国家的部队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的军事构架中有着严重的矛盾，这也反映出这些国家与索马里领导人包括艾迪德在更早期时候即已有的联系与关系[15]。

然而，乐观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政治重建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联合国又回归到早期的实践，即主要和军阀及其同伙打交道，放弃了“赋权”的传统上的氏族长老。人数减少的联合国部队从其在内陆地区的驻地撤离，并集中到摩加迪沙，为1995年3月底就要到期的联合国索马里行动做准备。不出预料，暴力行动不断增加，包括对联合国人员的袭击。新任的联合国特别代表及其领导下的官员致力于游说“派系领导人”组成一个政府——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都将是可以接受的——以便让剩下来的国际部队带着他们能带走的重武器有序地撤离出来。联合国在这些“领导人”身上花了大把的钱，这些“领导人”之前已经从联合国不甚有头脑的慷慨援助和联合国的非官方派送中大捞一把。更有甚者，美国人在账单中要付给当地人的400万美元的酬劳，夜里放在联

合国索马里行动的文件柜里却被神秘地“偷窃”了。[16]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向安理会做了一项不可信的汇报后，即 1994 年 9 月，联合国宣布索马里行动将尽可能早地结束。[17]10 月 31 日通过的第 953 号决议事实上要求在 1995 年 3 月 31 日前撤军。

在摩加迪沙，未来充满的不确定性更是进一步地激发了暴力，当时一个观点显然还是希望美国人重返索马里来挽救这个国家，就像早期的索马里联合军事行动。事实上，在索马里第一次配有高端的、非致命性的人群控制武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海军的支持下，仅仅在监督联合国撤军时执行过暂时性的任务。从之前发生的事情来看，“快速撤离行动”正如其名称一样，在完成行动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意外。[18]这次撤离行动进展相对顺利，也没有人员伤亡。这种情况也得益于撤离行动的最后几天里联合国从索马里招募了人员，为此联合国极其慷慨地付出了每天 100 万美元的报酬。

摩加迪沙的废品商

1995 年 3 月，联合国最终撤离了索马里，摩加迪沙也发生了大量的抢劫事件。庞大笨拙的联合国驻地(其中有精心建造的购物中心和其他为联合国驻索马里的工作人员提供的设备，其中包括采用最先进技术的污水处理系统。所有的这些都是用索马里援助资金修建而成的。)被索马里捡破烂的人给围个水泄不通，他们像秃鹰一样蜂拥在复合闸门周围。联合国撤军几个月后，南索马里陷入混乱之中，耗资 160 万英镑的联合国驻索马里总部则完全消失。这正如那句话，“尘归尘，土归土”，曾自豪地预示着“世界新秩序”的国际行动最终葬身于索马里。与此同时，废品商通过回收废墟中的破烂赚了大钱，在这些钱的基础上，新一代的派系领导人和军阀开始崛起。一个名叫穆塞·苏迪·亚拉豪(Muse Soodi Yalahow)的哈维耶石材商以摩加迪沙北部边缘的巴拉德(Bal'ad)为基地，取代阿里·马赫迪，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阿布加尔的主要领导人。在阿布加尔的敌对方，即哈巴尔·吉迪尔一方，出现了另一个新星，即奥斯曼·阿里·奥托('Osman' Ali

Atto)。和艾迪德一样，他属于萨阿德(Sa'ad)家族，且是其部落的金融家。与其对手相比，奥托是个复杂、有些老练的人物，他成功地创办了好几家修理厂以制造重武器的“零件”。到2002年，这个自力更生的人(其父亲曾是一个养骆驼的)控制了半个杰兹拉(Jezira)机场和通向摩加迪沙南部通道的一个重要检查站[19]。

因此，虽然联合国索马里行动失败了，但它在客观上却在摩加迪沙和南索马里未来的政治经济局面形成上有着重大的影响。联合国总部位于摩加迪沙南部，此时为艾迪德的哈巴尔·吉迪尔氏族部分势力所控制。哈巴尔·吉迪尔氏族中的大部分人，曾在1991年推翻西亚德·巴雷的游击战争期间和之后都开进到摩加迪沙。联合国曾未加考虑就从这个氏族中招募了大量充当助手的索马里人。这个氏族也曾从联合国各个组织租借物业和交通过程中收取贿赂，获得了重要的财政收入。奇怪的是，这些资金却用来资助艾迪德反对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的斗争，也让艾迪德得以利用情报人员来散布错误信息。摩加迪沙港此时为各个敌对集团所封锁，互相敌对的哈巴尔·吉迪尔氏族势力划分了各自控制的机场和跑道。这些氏族势力虽然总体上支持艾迪德，但并不打算同意让他实现全面控制。然而，艾迪德确实以牺牲比马尔氏族为代价，成功地控制了马尔卡的大部分地区，由此得以控制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对香蕉出口具有重要价值。艾迪德所属的氏族则控制了两个小机场，一个机场是位于摩加迪沙以南90公里的巴雷赫·道格雷(Balleh Dogle)，另一个则是小一点的着陆场，位于摩加迪沙以南50公里，该着陆场常停落的是进口咔特的飞机。

国际干预也成为互相矛盾的期望的牺牲品。尤其是在初期，有迹象显示整个摩加迪沙的公众期望全副武装的美国部队能围捕那些毁灭国家的派系领导人，由此就可以为回归文职政府创造条件。然而，正如我们曾论述的那样，这无疑会造成美国人的伤亡，且这个伤亡是无法让美国人接受的。美国/联合国的目标并不包括为索马里人创建一个新政府，后来的事态发展也清楚地显示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理解和耐心，这些为当地的专家所有，而国际当局则没有。另一方面，美国和联

合国部队甚至在反艾迪德运动的高峰期都将他们视为没有危害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只是将急需的援助和救济品运到索马里的人。正如联合国军事发言人在“黑鹰”坠落灾难后辛辣的评论那样:“我们来了,我们给他们带来了食物,而他们则让我们滚蛋。”

双方有着互相无法调和的期待,多国部队的士兵和文职人员压根就不了解索马里文化和当地政治。虽然萨农和奥克利两人以其不同的方式对当地的情况知道一些,并和当地的主要人物进行直接谈判,但他们的继任者则靠助手和代表来进行间接接触,这是一种外交模式,也在他们的对话者心理上产生猜疑。索马里局势非常棘手,每个索马里集团积极地影响联合国的行动以便符合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有高度有序的、高超的和有耐心的外交手腕,联合国也急需胜任工作的特使。联合国在摩加迪沙不断强化的官僚作风使其与索马里当地人产生了距离,这一距离由于联合国没能从各个氏族中召集索马里专家作顾问(这是由联合国雇用的一名说索马里语的顾问约翰·德赖斯代尔[John Drysdale]建议的)而进一步拉大了。由于豪将军在与艾迪德的私人恩怨斗争中日益受到攻讦,陷入孤立的境地,更是需要此类明达的建议。

与此同时,臃肿的联合国驻索马里机构和多国部队(其中一些国家的部队,如意大利),通常有着各自的议程安排,并对指挥体系加以利用。这种指挥体系在后勤方面是与华盛顿的五角大楼而不是纽约的联合国有联系,但效率低下,在指挥上出现误导和混乱的可能性确实很大。(显然,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组建了作战部队,与美国也有沟通联系,但美国人在决定和影响政策上有着特别的优势地位。)要让这一笨拙的指挥体系持续有效地运行,其难度绝不小于让南索马里内讧派系达成政治协议。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怪不得搭伙的事常常是一种代价昂贵的失败![20]体系设计本身就是错误的,时间上也显得那么急促,尽管索马里的主要人物在“和平会议”上热情高涨,但并没有多少迹象显示这些人物,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正认真地为重建其业已破碎的国家而做出努力。联合国、非盟、阿盟和其他国际组织由于各自的原因,认为索马里的这些人物就是这个德行,且这个看法还

有点普遍，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要是认为没有人会从这些代价高昂的干预中获益，那将是错误的。虽然索马里有很多人丧生了，但沿河地区的农耕-畜牧业者此时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们曾由于艾迪德和摩根的民兵组织连续不断的抢劫而饿殍遍野。从这里，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新生的迪吉尔·米利弗雷(Digil Mirifleh，拉汉文人)的民族主义即将出现，一场抵抗运动将会挑战南索马里的其他民兵力量。

联合国针对艾迪德的行动无果而终，但是艾迪德的心腹们很快就巩固了其地位，并在给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提供地方服务和住房上索要高价，且垄断了这一利润可观的行当。这些人曾在西亚德被推翻的时候攻入并控制了摩加迪沙部分地区。当然，他们所拥有的绝大部分财富是从这些财富所有者那里偷抢过来的。后来，当这些财富所有者试图重返家园的时候，这些窃贼拒绝交付给他们，除非缴上大笔的管理费！同样的，要是无辜的民众在保护其财产的过程中打伤或杀死武装的袭击者的话，他们要按照传统方式对攻击者给予血亲赔偿(*Mag*)。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属于强大氏族和家族的人才能成功地保护其生命和财产。血偿制度与氏族制度一起被引入了城市生活，并在一些有意的袭击个人案中成功地运作(势力强大的一方获赔)，但在摩加迪沙频繁发生的武器买卖和冲突中，想要把责任精确归咎到某些个人，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曾在处理城市中新占有者和前主人之间的财产纠纷中做过善意的尝试，这种尝试揭示出很有意思的不同立场。那些现在占有某财物的人宣称这一财物属于国家，是被其前主人偷走的。同时，因为哈巴尔·吉迪尔氏族“现在控制着国家”，因此，其他人的财产现在就属于他们了：其他人都是外来者。这是一种深刻的氏族沙文主义。一些历史更久一点的城市商业社区(阿拉伯人、里尔·哈马尔人等)，其隶属的氏族没有有效的民兵力量，常常遭到欺负，因而跑到国外去了。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发财的路子，在这些受到迫害而定居在也门和东非的人群中，竟然还有人成为偷窃了其商店和财物的人的生意伙伴和代理人。[21]

在更广泛的国际角度上来说，其他国家给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派遣部队，每人每月赚1 000美元，危险工作还有特别津贴。缺乏硬通货的第三世界国家自然很是看重这些收入。捐赠物资的分配也让那些提供运输和其他服务的外国承包商受益。同样，尽管这一时期索马里物资短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有一点是可预料到的，即联合国事业还是获得了蓬勃发展，甚至是低级官员，其中很少有人是经过层层程序纳入进来的，更谈不上什么培训，他们都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收益。到1993年底，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的军事行动配套有160亿美元，估计只有4%注入到索马里经济中去，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入军阀、其他管理者和大商人的手里。[22]因此，这种间接的"外国援助"的不公平分配反而让军阀的活动加剧，进一步地破坏了索马里的局势。联合国索马里行动另一个更为可耻的遗产是后来曝光的虐待和践踏人权，涉及参与联合国行动的一些国家部队。尤其是在一些臭名昭著的案例中，涉及加拿大和意大利士兵。很多高级军事官员被迫辞职。

1995年3月，联合国撤军后，南索马里的情势又回到了干涉前的那种情况。被废黜的马雷汉独裁者，流亡尼日利亚的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于1995年1月死亡，因此也就不存在其返回索马里的风险，如果他返回索马里的话，势必会造成索马里的进一步混乱和破坏，而且他过去一直是这么干的。然而，我们将不幸地看到，巴雷的灾难性影响给南索马里政治投下了长期的、致命性的阴影。6月15日，被阿里马赫迪和其他反对派驱逐出索马里联合国会/索马里民族联盟的艾迪德，成功地自封为"临时总统"，在其周围还出现了一群担任"部长"的心腹，其中包括寻求第二政治生涯的从索马里兰来的叛离者。哈巴尔·吉迪尔人又一次地走向战争，艾迪德成功地将其帝国拓展到内陆沿河地区，并夺取了拜多阿、胡德杜尔(Hoddur)和达娄(Dalow)。在摩加迪沙，他们与阿布加尔部落的冲突进一步地加剧；1996年4月，他们为了控制香蕉出口，与其内部美国和意大利代理人的长期矛盾演变为战斗。1996年8月，艾迪德在阿布加尔部落和哈巴尔·吉迪尔部落之间的一次激烈战斗中受了重伤（有报道说是忠诚于穆塞·苏迪·亚拉豪

的民兵干的,另外一些报道说是奥斯曼·阿里·奥托的部队干的),并于几天后死去。

艾迪德的儿子,侯赛因·艾迪德(Hussein Aideed,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曾参加重拾希望行动)接替其父成为总统。考虑到拥护共和政体的索马里人对家族统治的厌恶,侯赛因·艾迪德在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似乎还算是成功。然而,其领导的"政府"并不比阿里·马赫迪的政府更有力,两个竞争性的政党很快就衰退为"派系"。1991 年,西亚德政权一倒台,阿里·马赫迪首先就搭建了政治平台。与之相比,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也并没有促使南索马里组建一个政府。事实上,艾迪德将军的死让其所属的氏族内部矛盾得以爆发,从而出现分裂。艾迪德具有强有力的个性以及与氏族长老谈判的技巧,这些具有分离倾向的人在艾迪德的统治下长期受到压制。艾迪德的前财政管家也是同一氏族的奥斯曼·奥托此时已经崛起为一个独立的哈巴尔·吉迪尔军阀。这个氏族的其他分支则从事随机的掠夺行为。阿里·马赫迪虽说富有,但作为一个领导者并没有艾迪德所具有的个人魅力,他对阿布加尔人提出了很多吁求,这些吁求成为其独立的象征,并认为阿布加尔人比哈巴尔·吉迪尔人更高级,因为哈巴尔·吉迪尔人是新来城里的人,是从草丛里来的部落野蛮人。按照索马里的分裂方式,一旦一方丧失团结,另一方也会不再具有凝聚力了。在这种环境以及上文已经提到的经济情况下,索马里进入了一个以"土匪横行"的时期,此时不仅仅是民兵,而且还有自由组合的匪帮肆意制造暴力和从事抢劫。这并没有削减(事实上是加强)摩加迪沙里氏族本身的存在,也没有削减人们对家族的忠诚,氏族和家族反而成为这种环境下安全的保护者。正如一些肤浅的媒体报道一样,这种安全环境事实上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就政治倡议来说,联合国此时多多少少让南索马里开始筹划自己的框架了。与此同时,欧盟也已经开始着手一项旨在激励地方发展的政策。欧盟承认地方社区(用联合国和其他发展机构的术语来说,就是"恢复区")在重建中所取得的成就。这是一种自下而上(或"垒石块")而非自上而下的[23]、中央集权的、等级制的方式,后一种方式在前索马

里时期已经令人绝望地失败了，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也认为这种方式已经失效了。除了给一些地区或区域（如索马里兰和东北部地区，这些地区已经是出现了和平，人口也有所恢复）提供援助外，欧盟还在索马里或在其他地方资助了一系列的研究和会议，这些研究和会议主要讨论可能更适合地方环境的地方政府的组建问题。[24]

北部地区的政治发展

上文已经论述过，索马里兰在 1991 年 5 月 18 日宣布从索马里独立出来，并任命阿卜杜拉赫曼·图尔（伊萨克部落哈巴尔·尤尼斯人，是一位西亚德政府时期杰出的前大使）为第一任总统。为了维护其认同，索马里兰共和国宣布其独立地位始自 1960 年 6 月 26 日，并解除其与前意属索马里的合并（1960 年 7 月 1 日）。整个合并的过程较为漫长，也充满了动荡，索马里兰最终还是采取索马里人使用已久的老办法，选择了离开，脱离了索马里。在北索马里人的眼中，这有充足的理由：长期受到忽视、受到残忍的对待，20 世纪 80 年代末西亚德的士兵在哈尔格萨杀害了大量群众[25]，可谓残忍到了极点。北索马里人的家门口和家里其他地方都巧妙地安置了地雷陷阱，更是体现了北方人的那种恐惧。索马里人历来显示出容易原谅政治人物的罪恶，但北方人很难冷静下来，忘记他们所遭受到的一切，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冤屈：这种冤屈是摩加迪沙一手造成的，他们对重建统一的索马里国家也没有表现出热情，认为这只是联合国、非盟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天真设想而已。但是，这并没有让一些具有投机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放弃与南方建立联系的企图，因为这将会进一步地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

独立后的最初几年，索马里兰的日子是很难的，阿卜杜拉赫曼·图尔当局并没能从国内外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以维持政府的有效运行。同时，四处流荡的武装匪帮和部分独立行动的民兵危害着公众的安全。1993 年 1 月 24 日在博拉马召开了民族和解大会，此次大会持续了 4 个月，多个重要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作为投票代表的国家委员会（*guurti*）的 150 位长老，经过漫长的讨论最终达成一致。在此讨论期

间，估计还有2 000多人参加或参与，就像索马里人一样，不停地在讨论和争辩。会议的绝大部分费用由当地索马里人支付，国外援助只占很少的比重。承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索马里国家的联合国索马里行动并没有提供支持。更过分的是，它也没有对索马里兰解除民兵组织武装的项目给予任何支持。相反，它更愿意投身于摩加迪沙的不切实际的复员行动，由于摩加迪沙不存在政治秩序，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自负地寻求重建警察部队，似乎它坚信所需要的就是少量的联合国警察"专家"和大量警察。

博拉马会议至少有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第一，回溯到索马里民族运动的最初计划，博拉马会议产生了一个和平宪章(也是一种民族宪章)，加强了安全并规定了传统地方长老在和平塑造的各个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第二，博拉马会议也制定了一部国家宪章作为国家临时宪法，为期两年。新政府推选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从哈巴尔·尤尼斯人阿卜杜拉赫曼·图尔那里继任了总统)来领导，且要制定一部正式宪法并在两年内进行公投。第三，最具创新之处是两院立法机关的设立，这是一种具有想象力的创新。上院由非选举产生的传统长老组成，下院则是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这是在传统的以氏族为基础的索马里民族运动和急需的现代管理机制之间的调和。博拉马无可非议地成为这些政治成就的聚焦点，一扫索马里兰头两年也即"浪费的两年"所产生的沉闷与沮丧。[26]

索马里兰其他地方的和平会议，也对这种让传统长老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创举[27]加以仿效，其中最著名是在索马里兰东北部的萨纳格(Sanag)地区。在该地区，当地的哈巴尔·尤尼斯、哈巴尔·加洛(Habar Ja'lo)、杜尔巴汉特和瓦尔桑格里等氏族互相间长期不睦，但都参加了"萨纳格和平大会"。这一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大会，汇集了伊萨克部落和达鲁德部落(达鲁德部落的领地已经延伸到以达鲁德人为基础的邦特兰[Puntland]地区)的各个代表，于1993年10月闭幕并签署了地区和平宪章。该宪章对当地畜牧业者和商人尤其有关，它恢复了过去的互惠式放牧，允许自由贸易并规定返还被转让的土地。后

来,长老还亲自监督土地返还给那些在战争期间离开土地的人[28]。

与其前任相比,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还有一份大礼,即他可以从柏培拉的进出口税收中拿到相当的份额放进中央政府的保险箱里,他本人所属的家族和家庭都是来自柏培拉。恰巧,沙特阿拉伯在索马里绵羊出现疫情后颁发牲畜禁运令,这也让柏培拉带来的经济好处有所增加。柏培拉因此也威胁到了吉布提*港,因为吉布提港的关税较高。

博拉马会议之后,由于(虽说在财政上仍然有所限制)解除民兵武装项目的强有力推进,安全总体上有所提升,路障逐渐被移除了,埃加勒逐渐成功地重建了政府的基本架构。原来的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垮台了,后来在第一届索马里民族运动当局手里又没有能恢复起来。按照规定,文职公务员要按时上班,也会按时拿到薪酬。政府还设立了发展规划部,负责和国外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机构联系,并重开了中央银行来监管索马里兰先令,这也是索马里兰通货。主要城市如哈尔格萨、布尔奥和博拉马又重新恢复成立了警察部队(由当地前官员领导),并配有专业装备。同时,还恢复了地区和地方法院。人们生活也恢复了正常,而自西亚德政权最后十年来人们的生活就从没有正常过。

部门间在资金分配上一直强调安全需要:部长们总是在抱怨50%的预算投入到防卫和警察,而卫生和教育总共只能得到17%。1994年末1995年初,伊萨克联盟内的敌对氏族间为了控制哈尔格萨国家机场的收入而爆发了公开冲突,国家发展遭受到了挫折,安全在财政预算上的配额优先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之前时候一样,柏培拉的当地氏族不想让其当地收入被全国分配了,可此时机场当地的伊达盖拉('Iidagalla)氏族却想垄断空运税收和着陆收费。此次争执为当地的反对派(如前索马里兰总统及其支持者,先后任前警察总长和难民专员的贾马·穆罕默德·加里卜)[29]和索马里兰外的政治人物(他们希望能阻止索马里兰从垂死的索马里独立出来)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议题。艾迪德受到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的资金诱惑,搅起了浑水,利用此次冲突借机支持埃加勒的政敌。由于受到怂恿,冲突很快就波及到商业城镇

布尔奥。伊萨克部落哈巴尔·尤尼斯和哈巴尔·加洛数十年来一直在争夺布尔奥的政治权力。成千上万平民逃离了柏培拉和布尔奥,他们主要逃往埃塞俄比亚。讽刺的是,这些人曾在 1991 年索马里兰独立的时候返回到这两座城市。

在埃塞俄比亚的联邦结构中,与索马里在种族和氏族上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区此时被称为"第五区"(即前欧加登地区)。由于与索马里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该地区民众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对索马里兰政策持有积极的态度。这个地区的"超级大国"(即埃塞俄比亚)是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索马里兰)的唯一友邦。我们之前曾论述过,联合国对索马里兰的"国家建设"努力持有异议,也颇为轻视,而索马里兰的这些努力却需要它在道义上的支持。联合国自身的援助协调机构(和联合国的其他行动机构一样,较为安全地设置在内罗毕)放弃了其中立性,固执地支持那些倾向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人物,拒绝建设性地接触索马里兰,也不再强调良治和解除武装[30]。按照联合国的政治目标,似乎这些口头上的目标才是值得在实践上加以支持的。

索马里兰的发展极大考验了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那些建设和平措施的有效性。考虑到国家外的索马里兰人的合作,索马里兰成立了新索马里兰和平委员会,并于 1996 年上半年在埃塞俄比亚召开了会议,设法恢复布尔奥和哈尔格萨的秩序。这一举动导致索马里兰对宪法进行了进一步也更为广泛的讨论。虽然这有点自相矛盾,但对埃加勒来说则是机遇,他可以延长 18 个月的在任时间,因而可以为结束冲突、最终确定宪法和选举准备提供时间。1997 年 2 月 23 日,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再次当选,获得了 223 张票数,是票数最为接近他的对手的两倍多。由于出现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且也厌倦了持续不断的冲突,好战的各方决定接受此结果,伊达盖拉氏族开始迁回哈尔格萨。

邦特兰的发展

现在,我们需要简略地论述一下东北地区的发展,我们在前面已经

提到该地区主导氏族为米朱提因人,我们在前面也叙述过是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将他们从西亚德部队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他们立即就在1991年开始展开治国之术的尝试,他们的方式和索马里兰一样,和欧盟的"积木"(building blocks)政策也相一致。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在博萨索(Bossasso)有力地对付伊蒂哈德原教旨主义者(al-Ittihad fundamentalists)之后,将其相当大的精力用在如下两个方面:建立一个可行的地方性国家;巩固经济,其经济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进出口上,且进出口要通过的港口在不断扩建。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和开始成批从国外回来的米朱提因知识分子,带着令人赞赏的热情重建社会福利事业,包括卫生和教育事业。从一开始,两个高层人物间的关系就比较微妙。一个是阿卜迪拉希·优素福,他是游击队的领导;另一个是穆罕默德·阿卜希尔将军,他是著名的也是受到普遍尊重的前索马里警察局局长。阿卜迪拉希曾在西亚德时期的索马里和门格斯图时期的埃塞俄比亚都遭到政治拘押,直到1991年的4月。穆罕默德在西亚德统治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也曾遭到拘押。这两个人来自米朱提因氏族的不同支系,但是在宽泛意义的氏族内都得到了支持。米朱提因正如伯恩哈德·赫兰德(Bernhard Helander)曾描述的那样,"在三个米朱提因地区只有基本的管理机构",并有一个传统的氏族长(*boqor*),即奥斯曼·马哈茂德[31]。伊蒂哈德原教旨主义者被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击退后,有一部分逃到了索马里兰。[32]而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则要在穆杜格地区与艾迪德的哈巴尔·迪吉尔人组成的萨阿德(Sa'ad)民兵组织对抗,以保卫其在穆杜格的放牧权。萨阿德民兵组织有可能会将整个索马里带入灾难的深渊。

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在所在范围内击退并驱赶走民兵组织后,其领导人决定参加1993年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和平会议,并在相关协议上签了字。在与穆杜格的哈巴尔·吉迪尔人等问题上,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领导层分裂为两个派别。第一个派别为"军事派",由阿卜迪拉希·优素福上校领导。阿卜迪拉希·优素福赞同和哈维耶部落的哈巴尔·吉迪尔人组成的萨阿德入侵者结成同盟,以便巩固新近在穆杜

格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这是一项长远战略。作为索马里境内的战争结果，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艾迪德和阿卜迪拉希有着共同的经历，年轻时都是军校学生(都是来自加勒卡约，母系方面有着联姻关系)，后来被关押的时候，所关押的地方又都是西亚德“高度戒备”的监狱中的同一个地牢。另一个派别被称为“文人派”[33]，由前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主席穆罕默德·阿卜希尔·穆塞领导，他可不是艾迪德的朋友。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长期支持其在基斯马尤的亲族，但常常受到挑战。在与南部领导人交往的整个过程中，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从没有显示出要像索马里兰所做的那样，要坚决地脱离索马里。其内部冲突还有一个重要的焦点，这一点和索马里兰的博拉马与哈尔格萨间的冲突类似，也就是怎么分博萨索的收入。1996 年夏，各方达成协议，将收入的28%给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用于防务，穆杜格和努加尔(Nugal)各得12%和 10%，剩下来的 50%则分给博萨索所属的巴里(Bari)地区。

与索马里兰一样，由于索马里地区缺乏正式的现代政府机构，地方世系的长老(统称为 *isimadda*)，尤其是那些主导血亲复仇集团和直接管理习惯法的长老的职责和权力有所强化。与索马里兰以及索马里其他地区一样，这些长老的权力无疑也会强化其所属氏族的重要地位。今天在阐释氏族认同的时候，正如赫兰德所记录的那样，通常首先指涉的是更低一级的家系和支系，这可以从“我们已经到底层了”(*hoos bann u tegneey*)的短语中体现出来。低层领导较深入地参与到现时代问题的解决上，更有力的、更高层的协调需要强化了氏族最高领导人(即 *isimadda*)的地位。这些氏族最高领导人是由最高传统权威，即阿卜杜拉希·博克·穆塞(Abdullahi Boqor Muse)来任命。此人又被称为“金刚”(King Kong)，在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代表大会中有着主导性地位。这又加强了这一倾向，即更小些的世系提供在更高层的氏族中代表他们的伊辛(*isin*)，再由他们产生“传统”领导人。索马里兰也有着这样的倾向。正如赫兰德敏锐的观察，“一旦地方自封的‘政治家’无法与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就会出现新的‘领导人’以代表日益碎片化的群体”。对任何一个不了解这些没有中心权威的碎片式社会的人来

说，这种地方政治运作方式是极为令人困惑，也是高度不可信的，就是索马里人有时也难以理解。

在此期间，米朱提因地界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曾被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驱除出去的伊蒂哈德极端分子在南索马里(以及索马里兰)又重新组织起来，且卷入到米朱提因的地方事件中。多年来，这些极端分子和埃塞俄比亚的极端组织联合起来，袭击第五区的军事基地。1996年夏又出现了新情况，即这些集团对亚的斯亚贝巴的著名酒店和旅馆发起了炸弹袭击。埃塞俄比亚军队立即展开报复，对位于朱巴河畔盖多州(Geedo)的伊蒂哈德基地展开强有力的袭击。与此同时，政府间干旱和发展管理局①(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rought and Development)的国家对索马里事态发展进行了谴责，并在政府间干旱和发展管理局的旗帜下召开了一个志向远大的和解大会，其目标是要成立一个新政府。此次会议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府南部，怡人的索德雷(Sodere)温泉度假村召开。这次领导人会议经过数周讨论后，产生了一个救国委员会，下设一个拥有41个成员的理事会和一个轮值主席。

阿卜迪拉希·优素福(在伦敦做完一次成功的移植手术后刚刚恢复过来)和穆罕默德·阿卜希尔同意分担职责，阿卜迪拉希担任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驻救国委员会的代表，穆罕默德·阿卜希尔继续担任无可挑战的主席一职，并获得宗教尊号“伊玛目”[34]。1998年3月，全米朱提因人大会在加洛韦(Garoe)召开，索马里兰的达鲁德代表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成立了地方自治机构，即新的“索马里邦特兰国家”(Puntland state of Somalia)，阿卜迪拉希担任选举出来的首任总统，而穆罕默德·阿卜希尔并不承认(但是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承认)这一结果。与关于索马里新政府的很多倡议一样，全米朱提因大会的实体机

① 该组织成立于1986年1月，初衷为东非政府间在抗旱及发展上加强协调与合作，成员为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苏丹、索马里、乌干达和厄立特里亚等七个东非国家。1996年3月，该组织改名为“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简称伊加特，并将工作重点从抗旱转移到防止地区冲突和扩大经济合作上。——译者注

构事实上也没有建立起来。穆罕默德将军继续认为他是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的主席，1998 年 1 月，他再次当选这一职位。

邦特兰[35]并没有像索马里兰那样单方面宣布独立，正如我们曾论述的那样，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的米朱提因氏族人生活在索马里南部港口基斯马尤。在索马里兰东部还存在达鲁德部落的杜尔巴汉特部落和瓦尔桑格里部落的地位问题，这两个部落还形成了一个将索马里西北部和东北部联系起来的氏族。然而，基斯马尤是邦特兰人的阿喀琉斯之踵，也是民兵组织间产生不休止冲突的根源。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阿卜迪拉希和穆罕默德·阿卜希尔在后来的索马里局势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长时间没有讨论的、接壤索马里阿法尔人的小国吉布提[36]再次陷入争斗之中。

吉布提的新一代掌权者

1997 年，由伊塞氏族主导的吉布提执政党大会再次选举令人尊敬的哈桑·古莱德(Hassan Guled)为总统，虽然他年事已高。哈桑虽当选为总统，但是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Ismail ‘Omar Geele)为了能继任他而在不断努力。盖莱担任内阁长官多年，为了给自己前途铺路，他强化了与阿法尔人的政党争取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the Fro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Unity and Democracy，简称 F. R. U. D.)的联系，该党新近与执政党结成联盟。1991 至 1996 年期间，吉布提经济严重恶化，其国外净资产减少了 40%。卫生和教育加起来只占政府预算的 14%。世界银行的估计结果非常令人沮丧，并给予了严厉批评，尤其是吉布提在令人衰弱的咔特(qat)上的过度消费。欧盟宣布将拨款约 1 500 万美元以资助吉布提开发资源，让吉布提成为服务和通信业的地区中心。这一发展战略也得到吉布提的阿拉伯湾通信部门的支持。

1998 年 3 月，并不稳定的阿法尔-索马里联盟遭到考验。争取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的游击队袭击了边境哨所。4 月，法国宣布将其驻军规模从 3 500 人缩减到 2 600 人。法国还有一小支海军舰队和半支幻影 2000 中队驻扎在吉布提。法国军费占到吉布提 GDP 的 33%至

50%,因此,这些费用对吉布提来说也是相当大的。吉布提政府打算裁减行政机构,虽然其铁路早就需要大修了。由于经济出现困难,吉布提政府对 16 名军官(有几位是高级军官)进行了延期判决,他们涉嫌“组织国内反抗运动”。这次运动显然是一种警醒,也要在短期内来解决问题。

1999 年 4 月,哈桑·古莱德最终退休,不出预料地由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接替,盖莱获得了 17 万张选票的 70%多。而在反对派看来,这是通过“大规模欺诈”获得的。伊斯梅尔长期非正式地代理总统,如今在 52 岁之际终于成为总统了。一些政治犯被释放也验证了此次吉布提的权力向年轻一代领导人的和平过渡。在被释放的政治犯中,有一位是阿法尔的人权律师,此人的释放部分地是由于法国的压力。盖莱继承了古莱德的衣钵,并宣布将在“坚持中有所变革”,这句话事实上也成为盖莱的座右铭,即继续强调氏族联系在整个索马里地区的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间爆发了严重的边界战争,战争已经延续了一年多,且没有结果。由于大量的埃塞俄比亚贸易要经过吉布提港,吉布提自然要对其邻国施加影响。厄立特里亚因此指责吉布提支持其敌国。吉布提新总统最不希望的就是这场战争蔓延到吉布提境内,但埃塞俄比亚境内有索马里伊塞人,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又有阿法尔人,他们的存在让战争有可能会蔓延到吉布提。为了摆脱困境,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总统发表声明,论及“吉布提在红海和印度洋安全上的历史地位。所有的红海沿海国家都有责任维护红海地区的安全,必须协调立场,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以确保红海地区的安全,红海地区的安全也是这些国家自身安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00 年 1 月,盖莱政府与阿法尔人的反对党(即争取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经过谈判,成功地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后,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便着手一项更具雄心壮志的计划,即一项新的、在诸多方面有所创新的索马里和平计划。此项和平计划受到其他直接相关的伊加特

国家(埃塞俄比亚、埃及、苏丹和乌干达)的欢迎,很快也得到了美国、意大利、埃及和利比亚(索马里政治中经常性的参与者,往往是非正式的)的赞成。伊加特组织最初成立于 1986 年,总部设在吉布提,该组织已经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欧盟和联合国立即认可其所见到的一切,无论是否有争议,这是一种适时的调停。联合国派出其驻索马里(其实安全地驻在内罗毕)特别代表[37]戴维·斯蒂芬(David Stephen,他是一名具有公共关系背景的联合国官员)到吉布提,他在吉布提花了至少 2 个月的时间去筹备和组织会议。代表们参加会议的地点为吉布提市西部阿尔塔(Arta)的一个山坡上的小型度假胜地。在某种程度上,此次会议与索马里兰的会议类似。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些草根"代表"和"代理人",这些代表和代理人覆盖了所有的氏族,也覆盖社会各个领域(说得好听点就是"市民社会")。也就是说,参加会议的是传统长老、宗教学者、知识分子[38]、艺术家和妇女。据称,这将使得各个领域的人士承担起支持"和解进程"(此概念与"市民社会"一样有问题)的责任。军阀显然不是和平的制造者,也不被视为代表的合适人选,但也包含了进来。为了克服障碍取得和平,会议让其代表,即代表各个氏族的长老们与其同事按照传统方式在一个大树荫下进行谈判。

无疑,此次会议是关于南索马里问题迄今为止最为激进的方案。此次会议是在索马里境外召开的,尽管讨论的内容有利于索马里问题的解决,但还是会给批评者留下口实。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代表权的问题,这也一直是有关索马里问题谈判的问题。该方案将索马里民族各个组成部分的人汇集起来,包括班图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来吉布提参加会议者,有的是自己掏钱来的,有的是得到了联合国的资助,有的则是获得了其他来源的支持,都宣称代表其部族或世系。但是,组织者并没有对参会者真正的代表性做过全面的考查。因此,出席此次会议的一些来自索马里兰氏族的代表,尽管他们宣称是真正的代表,但遭到了索马里兰这些人所代表的那些氏族以及索马里兰政府的否认,这些氏族和索马里兰政府并没有出席,并拒绝参加此次会议。一些移居国外的索马里人也从欧洲或北美赶了过来。

情况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即联合国官方宣传的出席此次会议各个分会的 2 000 多人中，很多“代表”事实上是自封的，只代表他们自身而非其他任何人，有些人只是来摸底的，看看此项事业是否值得支持而已。这些代表中有六个是西亚德时期的将军，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可能就是摩根和贾阿尼(Gaani)。经过数月令人精疲力竭的谈判后，马拉松式的阿尔塔会议掀起了高潮，阿里·马赫迪并不光彩的政权中的主要成员很快成为会议的主角，他们在处理来自多个来源的基金，并且阿里·马赫迪本人也在长期流亡埃及后返回来露了面(在他没有出席会议期间，其自己的民兵组织还抢劫了其本人的住所)。奥克利大使在会议快要结束前曾短暂地查看了一下，他开了句玩笑，挖苦道：“西亚德在哪里?”事实上，据估计，此次会议的 245 名会员约有 60%都是西亚德精心挑选组建而成的议会的前议员。大会会员是基于氏族和性别进行配额的：达鲁德、哈维耶、迪吉尔、米利弗雷和迪尔部落各有 44 席；少数族裔有 14 席；妇女有 25 席；作为平衡还有 20 席是吉布提总统提名的(参见下文)。当然，虽然身处怡人的阿尔塔，其中有些参与者还是被沿海地区的湿热天气折腾得精疲力竭，失去兴趣退出了会议，但绝大多数参与者还是参加完了此次旷日持久的会议。

2000 年 8 月 13 日，会议最终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任命了一个临时国民议会，还产生了一位总统，由他组建一个过渡国民政府(transitional national government，T. N. G.)，负责在三年内筹备举行选举。为了能有足够成员以壮声势，策划了这个会议的吉布提总统匆忙中从街上找回了一些“议员”。有消息来源称，这些人都是精心挑选的警察(也包括出口糖料到摩加迪沙的一位重要出口商)，借以保护吉布提总统的商业利益。

由于有这么多的缺陷，如果阿尔塔会议果真能像其组织者希望的那样取得成功的话，那就是一种奇迹了。尽管索马里兰没有参加此次会议，而邦特兰的立场较为矛盾(阿卜希尔将军表示支持并参会，而阿卜迪拉希·优素福的立场则相反)，会议还是产生了一部临时宪法，该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亚德高度中央集权政府的复制，且没有承认

在索马里兰(更谈不上承认在邦特兰)现存的自发出现的国家。这种排他性而非包容性的方案让人想起了西亚德政权,这一立场得到那些过渡国民政府主导者的进一步确定。虽然遭到阿里·马赫迪及其他哈维耶重量级人物的挑战,但过渡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选最后还是落在了阿卜杜勒卡西姆·萨拉特·哈桑(Abdulqassim Sald Hassan)的身上。他曾是西亚德科学社会主义的热情拥护者,并在后来成为西亚德政权的内政部长。他的高度乐观精神为一些索马里人所熟知,并有个绰号"沙拉男孩"。作为哈巴尔·吉迪尔人(他们支持哈维耶部落的团结),人们可能认为他有能力领导其在摩加迪沙的充满仇恨心理的民族。

人们对他的希望似乎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他在1993年曾成功地召集其哈巴尔·吉迪尔氏族的领导人,当时这些领导人遭到了联合国索马里行动部队的猛烈袭击,艾迪德则是一个被搜捕的流亡者。阿卜杜勒卡西姆曾试图劝说其氏族民众与联合国索马里行动实现和平,结果7月12日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无缘无故地用武装直升机袭击了("Operation Michigan",即密歇根行动)哈巴尔·吉迪尔长老会议,造成73人死亡[39]。联合国/美国的此次错误最终导致了10月3日灾难性的黑色星期一,即直升机遭袭事件,并决定了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的命运。阿卜杜勒卡西姆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袭击的时候正好在哈巴尔·吉迪尔长老会会址的附近,他极其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屠杀。

阿卜杜勒卡西姆则选择阿里·哈里发·盖莱德(Ali Khalif Galayd)担任总理。阿里曾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因财政问题,受到指控后仓皇逃离了索马里。他是一名"知识分子",曾担任西亚德政权的副部长。后来,阿里移居美国,曾在位于锡拉丘兹(Syracuse)的大学母校教过一段时期的公共管理,还建立了相当成功的以迪拜(迪拜是索马里商业利益的一个重要中心)为基地的通讯事业,并在索马里东部和邦特兰地区开展有业务。尽管阿里·哈里发·盖莱德为了适应这个具有挑战性的新职位带来了很多有才干的人,但因为他属于拉斯阿诺德(Las Anod)的杜尔巴汉特氏族(属于达鲁德部落),其任命在索马里兰领导人看来肯定是一种挑衅。更宽泛点,就关注此次和平努力的索马

里批评家来说，这一任命可以这样来看，即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想给索马里兰造成损害，抵冲柏培拉从吉布提港吸引走的贸易。阿里在选择其相当大规模的内阁的时候(最终包括83名部长，占了原定的议会会员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选择了同一氏族来源的、也是邦特兰领导人的竞争者阿卜迪拉希·优素福上校为国防部长。这一任命定然会点燃那个自治地区的冲突。索马里兰和邦特兰都有理由发怒，这种怒火后来更为加剧了，因为过渡政府的总统和总理伙同联合国一道用恶意的言辞攻击这两个地区，贬低它们的成就。

阿尔塔所体现出来的和解精神在阿卜杜勒卡西姆违反会议达成的(为了确保迪吉尔·米利弗雷人的选票)将未来的首都迁往拜多阿的决议后，遭到进一步的打击。事实上，首都还是摩加迪沙，贸易还是如常。在通过这份决议上，值得一提的是对南索马里领导人来说，作为主权中心的摩加迪沙具有重要的象征含义。意大利人也持这种看法，他们似乎很难想象一个摩加迪沙不是首都的索马里国家。

在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索马里时事评论员看来，商业事实上是过渡国民政府的根本目标所在。其头面人物在吉布提有着利益关系，是与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有共同利益的商业伙伴。一位资深部长公开夸口说他加入过渡国民政府就是为了钱，不久之后他就遭到关于腐败的指控，并导致了总理的辞职。总理与总统之间明显不和，其他原因姑且不提，他们都想决定政策，主导国家的内外活动，这一点就够激起矛盾的了。

在阿尔塔和平计划推进的过程中，很难得知联合国的建议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采纳，但有一点很清楚的，即联合国的支持毫无疑问是强有力的。

索马里人在后来的几个月内开始抱怨，这也能从驻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特别代表提供的关于阿尔塔协议进程的联合国官方报道中察觉到。事实上，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坚信其倡议是成功的，并没有考虑到阿卜杜勒卡西姆及其部长们是否会成功地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以维持所谓的“政府”。很明显，阿卜杜勒卡西姆才开始就失误连连，首先是建立

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架构，然后又没能信守诺言，迁都拜多阿。为了较快地让阿卜杜勒卡西姆羽翼未丰的新政权具有合法性，联合国犯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即立即给予过渡国民政府外交承认，并欢迎索马里派代表来联合国大会坐上索马里席位。虽然一些阿拉伯国家（与索马里新领导人有着伊斯兰教和商业联系）也如法炮制，但美国和欧盟（尽管面临意大利的持续施压）则都在谨慎地等待着要看看阿尔塔和会是如何在索马里走下坡路的。由于索马里过渡国民政府在其诞生之后就有这些难题，所以过渡政府两年后没能实现其最热心支持者的期望，似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阿卜杜勒卡西姆的命令甚至在摩加迪沙都没有得到充分贯彻，更别提更远的地方了，他也为此被嘲讽为"摩加迪沙市长"。阿卜杜勒卡西姆的前任即西亚德在其最后期间也被加封了此称号。

阿尔塔和会之后

索马里人厌倦了战争、混乱和公共设施的破坏，他们无疑从各个角度上来说都对"一个政府"或他们称之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政府"都表现出热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高涨的支持能削弱军阀的破坏性权力，这些军阀中很多人都拒绝参加阿尔塔和会。先前在哈巴尔·吉迪尔和阿布加尔氏族的头面人物（双方都有一些人是过渡国民政府议会议员）间的氏族间矛盾依然残存了下来。哈巴尔·吉迪尔的军阀侯赛因·艾迪德（Hussein 'Aideed）和奥斯曼·阿里·阿托（'Osman 'Ali 'Atto）都不支持其哈巴尔·吉迪尔氏族出身的"总统"，且并不承认。虽然阿里·马赫迪被吸纳到过渡国民政府议会，但阿布加尔氏族总体上敌意未减，且倾向于聚集在阿布加尔强人穆塞·苏迪·亚拉豪的旗下。他是一名成功的废品商，是从摩加迪沙废墟中挖掘出的石材的批发商。他的顾客群体广泛，其机构不但在公路关卡对其顾客进行征税，还在其辖区对那些房屋修补事项进行征税。摩加迪沙的邻里关系此时是一个带有黑手党色彩的重叠网络，每个群体都是在某位强人及其氏族民兵组织的保护下生活的。试图扩展管辖区常常导致地盘争夺战。

尽管摩加迪沙在政治象征意义上依然地位显赫，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受到了限制，其过去所拥有的公共资源也彻底丧失。事实上，在与外部地区联系和超越氏族方面，唯独伊斯兰教有更为宽泛的共有情感基础。穆斯林神职领导人和商人往往倾向于借助他们所资助的民兵组织、建立沙里亚法庭(Shariah courts)来促进公共秩序。这些宗教和商业领导人常常与当地的军阀发生冲突，他们是恢复本地法律、秩序最为有力的也是最为虔诚的倡导者，此外，他们也是为了能保证其货物运输的安全和畅通。这些人支持和平的、更受欢迎的秩序，包括政府重建，然而，他们也带有某种局限性，因为他们是出于经济动机，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他们得以自由地在海外印刷货币，以此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操纵价格，他们除了支付给民兵组织领导人费用外并不要付税。2002 年 1 月，摩加迪沙贸易委员会“主席”对冒险而来的法国年轻记者杰罗姆·蒂比亚纳(Jerome Tubiana)说道：“我们仅仅要支付给控制港口进出口的派系，然后我们通过公路将货物转运到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我们在通过边界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困难，因为索马里人占领了边界地区。因此，我们的衣服、电视要比肯尼亚、乌干达商人卖得要便宜些。”虽然没有政府意味着缺乏安全、缺乏公共卫生教育服务，但对商人来说，利润还是能补偿这种损失的。这些商人有其自我形成的道义，也是支持恢复法律和秩序的强有力的游说人士。繁荣的咔特、其他毒品、香蕉、牲畜和建材贸易，以及诸如茶叶、大米、糖、布料、家具和技术装备进口贸易，让摩加迪沙的索马里哈维耶人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之后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百多位“百万富翁”！由于破坏和暴力，摩加迪沙成为商业活动的繁忙之所，成为武器和其他装备的兴旺的公开市场。尽管主要的港口和机场长期关闭(事实上关闭了 10 年)，但是外部世界流入的物品决没有削减。通讯业也兴旺发达：索马里有大量的当地广播电台(常常和报纸、网站连接在一起)，甚高频和特高频广播系统覆盖了索马里的绝大部分地区。除此之外，索马里还有六个以上私营手机运营系统，两个电视网，分别有 22 个、6 个频道。录像厅也较受欢迎，国际电话费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就武器供应

和使用来说,索马里几乎不是一个落后国家。物质文化也有不错的发展。

在摩加迪沙北部,阿里·马赫迪为了应对其阿布加尔派系内的反对派,在得到广泛支持下,鼓励设立伊斯兰法庭。然而,这一行动很快就遭到另一个阿布加尔派系的反对,他们控制了伊斯莱(Iselay)北部着陆场和埃尔马安海港(El-Ma'an,由穆塞·苏迪开辟的)。后来,摩加迪沙南部没过多久也有了类似的发展,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在氏族内的伊斯兰法庭,渐渐地也就不局限于此了,并开始应用索马里习惯法调和后的沙里亚法。这些商业和宗教领导人(他们在索马里的作用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情况一样,商业领导人往往也就是宗教领导人)是阿尔塔进程在当地的最为重要的支持力量。他们为吉布提会议以及后来的政府、议会议员提供了资金和设施。政府成员和议会议员住在摩加迪沙的时候,主要是住在酒店(包括会议室),这些费用和场所也是这些商业和宗教领导人提供的,这些领导人依靠民兵组织的保护。

这些发展只是伊斯兰力量更大扩展的一部分而已,这些伊斯兰力量提供了卫生、教育和对穷人的救助等急需的社会福利事业,而这些是新政府无法提供的。索马里世俗机构瘫痪得如此严重,这自然会增强当地伊斯兰教中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如改革派),这些倾向大体上在性质上属于先前的苏菲派[40]。这些倾向由于得到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的财政支持而得到了激励。伊斯兰因素的强化发生在一个极度碎片化的社会,仅有的社会团结基础就是氏族和氏族支系认同,人们效忠于一个掌有部队的强有力保护者。这些新伊斯兰力量尽管在理论上带有泛伊斯兰主义的特征,然而与传统宗教组织兄弟会(*tariqas*)一样,并没有规避业已存在的氏族联系纽带,对这种氏族联系纽带来说是一种补充而非破坏。

在经济层次上说,摩加迪沙拥有数百名小规模经营者,他们尽可能地抓住任何一个机会,其中与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的合同通常最有赚头。摩加迪沙的危险局势使得国际机构无法派出本国员工,只能从索马里本地招来人员。这里面也有风险,即与联合国索马里行动

时期(当时可获得的外国资源非常多)一样,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常常只是为了吸引外国资金而设立的,并不会完成其宣称的目标。正如我们曾论述的那样,虽然在整个西亚德时代,索马里并不缺乏大型发展项目,但是索马里的主要经济动力是非正规力量,私营和秘密商业有着较高的地位。在所谓的"劳力流失"数量最多的时期,移居到海湾国家的索马里劳动力成为因为私营商业而进行国际汇兑的主要来源。1974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发生欧加登战争后,劳力迁移有所下降,欧加登难民则蜂拥而至。国际难民援助于是成为索马里外援的主要来源,这些援助主要都是通过西亚德国家机构来实行的,但高级官员拿走了很多的回扣。1991年国家垮台期间和之后,军阀派系间不断发生的冲突和长期的不安全导致了大量难民,他们在除索马里外的东非、波斯湾部分国家和整个西方世界寻求政治避难,似乎这种现象还会延续下去。[41]

大量的索马里人(估计有100万之多,大概占索马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离开了索马里,一方面减轻了索马里国内的资源压力,另一方面这些移居者寄回来的汇款成为他们留在索马里国内亲人经济援助的新的重要来源。这种来自移居者寻求政治避难的国家的间接援助估计每年达到8亿美元之多,根据一些研究表明,这种援助占了索马里平均家庭收入的20%至40%[42]。这些宝贵的汇款不但补助了索马里家庭生活费用,而且通过对这些汇款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征税,也有一定数额进入到了军阀派系的保险箱里,在维持这些派系的战争基金上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移居者依然利用氏族和氏族支系的联系,从制度上和物质上有助于维持派系暴力的循环,而他们本身就是南索马里的受害者。

所有的这些情况强化了索马里社会传统的非中央集权特质和自助的民族特性。在索马里,每件事最后要依靠个人能获得的防御性(或进攻性)武器。在这样一个满是匪帮和企业家成为派系领导人和军阀的成功故事的世界里,兰博对年轻人来说具有吸引力,是偶像。虽然摩加迪沙涌现出大量的私营学校,数量多得惊人,甚至还建有所谓的"大学",但是教育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成功通行证的作用。这种情况在西亚德时期就已经出现,现在进驻这个废墟般首都的阿尔塔政府中有些最

为显赫的头面人物本身就是文盲。

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起来，人们虽然——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广泛期盼政府回归，但还不足以实现阿尔塔政府的初衷，当时人们曾认为过渡国民政府在摩加迪沙会得到充分的支持。据报道，虽然政府领导人从一些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相当多的捐助，但是其他外国政府和机构还是非常谨慎的。同时，政府也无法立即从当地募集财政收入。政府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开始实行一项遣散民兵的计划，并要重建警察队伍，但这些旨在恢复公共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措施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内还是很少取得成效的。阿尔塔会议召开两年后，政府的主要成就是拥有一支民兵。这支民兵主要操控在阿卜杜勒卡西姆所属的哈巴尔·吉迪尔氏族埃尔(Ayr)世系男性亲属的手中，且远远称不上一支国家军队。这样有限的军力远远不足以清除大小民兵组织日常在交通道路上进行掠夺而设置的路卡，而且所有的大企业仍然控制在军阀和往往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商人的手中。

令人沮丧的情势与过渡国民政府自身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自身形象得益于联合国对它的日常宣传和它与外国政府建立的良好关系，虽然外国政府并不清楚索马里现实情况，但通常还是给予了外交上的承认。在联合国非正式活动(也是联合国公共关系的工具)下，南索马里真实的混乱情形在强调成就的宣传中被和谐掉了，成就当然也是有的，但是这种宣传所呈现的并不是客观的情势。

阿卜杜勒卡西姆似乎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报道中也同样幸运。全世界的索马里听众抱怨说，阿卜杜勒卡西姆通过其在英国广播公司索马里站(艾迪德时期建立起来的)的氏族纽带，以一种绝对讨喜的方式展现了他及其同事的活动。由于摩加迪沙的记者缺乏分析的新闻报道，这种片面认识——阿尔塔圈子外的人士也持这种看法——甚至还传播到海外机构的英语节目中去了。当然，索马里人对索马里站进行了辛辣的讥讽，称之为“阿尔塔之声”。熟悉索马里语节目的历史、知道该节目是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外交部为了应对纳赛尔宣传而精心设立起来的人，很是惊讶于这种调转回来的讥讽。[43]

新政治联盟

讽刺的是,在第二年,在其批评者眼中,过渡国民政府已经只是又一个"派系"而已。政府领导人正式开始尝试说服那些顽固的军阀。然而,这种尝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一些头面人物加入进政府,其他一些头面人物又离开了政府,政府在支持率下降的趋势中维持着某种平衡。事实上,2001 年 3 月,一些主要军阀成立了与政府竞争的索马里和解和恢复理事会(Somali Reconciliation and Restoration Council)。该组织总部设在拜多阿,而拜多阿是个拉汉文农业-畜牧业者占据主导的地区。拜多阿在埃塞俄比亚的支持下,由成立于 1995 年的拉汉文抵抗军从艾迪德(哈巴尔·迪吉尔氏族)控制下解放了出来。拉汉文抵抗军富有传奇色彩的指挥官哈桑·穆罕默德·努尔(Hassan Muhammad Nur)被称为"红衫"(Red Shirt),他会让人想起意大利著名自由战士加里波第(Garibaldi)的形象。(拉汉文抵抗军有较大的抱负。它不但要保护拉汉文人的心脏地带,还寻求恢复他们在谢贝利河下游以及远至沿海地区的领地,而哈巴尔·吉迪尔民兵组织在联合国的纵容下已经控制了这块领地。)

在邦特兰领导人阿卜迪拉希·优素福的积极参与下,这一新成立的索马里政治理事会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Awasa)举行仪式,提议召开索马里人内部和解大会,敦促阿卜杜勒卡西姆以平等的身份而不是军阀拒绝承认的"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大会。更让过渡国民政府焦虑的是索马里兰的政治发展。2001 年 5 月 31 日,索马里兰精心准备并举行了一次引起广泛注意的民族公决,使得新宪法(最后得到议会的批准)得以生效,并确定了索马里兰的独立。南非和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派出了观察员,他们观察认为,尽管当地情势困难,但是公决还是极其小心谨慎地得以举行,结果也是有效的,有 97%的投票支持新宪法和索马里兰的独立。这一广受支持的决定似乎清楚地表明索马里兰就是在最民主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自封"的共和国(充满敌意的联合国官员和过渡国民政府支持者轻蔑地赋予了这一带有轻蔑意涵的

称号,他们对当地的民主缺乏兴趣,也拒绝派出观察员)。过渡国民政府的外交使节们事实上很是愤怒地要求阿盟对公决及其结果给予谴责。虽然索马里兰争取国际承认的努力没有立即获得成效,但得到了民众较高的票数支持,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热情参与很显然大大提升了政府的士气。邦特兰的事态发展则没有那么顺利。有个不错的开端之后,阿卜迪拉希·优素福的任期在 2001 年 6 月结束了。虽然他寻求延长两年任期,但遭到强烈的反对,尤其是来自一个与过渡国民政府有着联系的竞争者的反对。这种对抗很快就造成了互相竞争的政党间的公开混乱和冲突。与此同时,更南边的阿卜杜勒卡西姆试图在摩加迪沙建立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开始征税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更别提要建立一支军队了。袭击警察分队、绑架个别领导人、偷盗警察制服然后再装扮为警官,一段时间竟成为当地民兵组织从事的一项竞赛。摩加迪沙外的盖多、拜伊(Bay)和巴科勒地区面临着粮食危机,暴力行为又呈上升趋势。早些时候离开基斯马尤的摩根及其民兵组织在 7 月底袭击了城镇。8 月,摩根又和索马里和解和恢复理事会结成同盟,后来在哈巴尔·吉迪尔氏族埃尔(阿卜杜勒卡西姆所属的世系)民兵组织的支持下,被马雷汉"朱巴联盟"所取代。

一个月前,过渡国民政府及其商业伙伴国组织的一次粮食护送在通往摩加迪沙的路上遭到了奥斯曼·阿里·阿托的民兵组织的埋伏和洗劫。这一事实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过渡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所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毫不奇怪,阿卜杜勒卡西姆处于胚胎中的警察部队据报道无法压制摩加迪沙的暴力升级浪潮,这种暴力升级已经阻碍了非常不合时宜的联合国"和平建设"代表团的到来。过渡国民政府指责这些威胁(这是一种夸张式的说法)背后有埃塞俄比亚的因素,并哀怨地呼吁外国军队的支持。(很显然,尽管联合国实行"武器禁运",但没有哪一方在实施,过渡国民政府已经动用阿拉伯救济中的一部分来购买武器了。)

阿尔塔集团由于自身的不称职,其成员有了相当大的减少,现在又因为内部分歧出现分裂。2001 年 10 月,即"凯旋"回到摩加迪沙后的

一年,出现财政丑闻并因未能促进安全、应对通货膨胀、未经批准印制纸币而遭到议会议员严厉批评的"阿里·哈里发"政府倒台了。也是10月,总统宣布哈桑·阿卜希尔·法拉赫(Hassan Abshir Farah)为新总理,法拉赫曾是西亚德政权时期众多"摩加迪沙市长"之一,也是一名前外交官。前总理的任命是针对索马里兰的,现在的目标则是针对邦特兰。因为新总理是米朱提因人,也是阿卜迪拉希·优素福上校的反对者,因此会加剧邦特兰地区的当前乱局。这也有助于证明阿卜迪拉希的强烈谴责,即阿卜杜勒卡西姆及其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同道们在试图造成北方自治国家的混乱。过渡国民政府通过支持阿卜迪拉希的反对者加以回击,至少在言辞上是这样做的,并指责他是埃塞俄比亚的代理人。埃塞俄比亚支持拉汉文抵抗军和索马里和解和恢复理事会以及其他干预,这使得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公敌。

此时,索马里意外地发现自己成为继纽约"9·11恐怖袭击"后世界的焦点。先前的国际行动——1974年与埃塞俄比亚爆发的欧加登战争、"重拾希望行动"以及联合国后来的行动(1991—1993)的人道主义干预——由于索马里的战事而得到加强。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对袭击纽约的回击,美国以及国际"反恐战争"猛烈打击阿富汗的基地(al-Qaida)组织,然而这也将波及索马里,因为索马里作为一个"失败国家",被视为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四处逃窜的游击队的潜在避难所。盖多州伊斯兰原教旨团结组织的早期活动,新近在摩加迪沙伊斯兰法庭外发生的小规模亲本·拉登的示威活动更是直接地揭示出,恐怖组织得到了索马里当地的一些支持。南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似乎使得该地区很容易就成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潜在避难所——虽然这些人的安全在这块缺乏权威、派系主导的地区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在听到从美国方面传来的媒体威胁性声明和谣言后,互相斗争的派系各自宣布它们与原教旨主义者没有联系,并指责其他派系则有这样的可能。过渡联邦政府总统阿卜杜勒卡西姆宣布在搜寻恐怖分子上(而且还按美国人的口味,甚至还真锁定了四五个并不太可信的伊拉克厨子作为嫌疑犯)乐意与美国合作。索马里和解和恢复理事会甚至

更进一步，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军事干预以对付激进的伊斯兰集团，将矛头指向阿尔塔集团。当然，正如我们曾论述的那样，过渡国民政府和摩加迪沙的其他地方确实有一些原教旨主义人物，摩加迪沙也遭到了美国飞机具有威胁性的低空飞行监视。索马里人打趣地报道说很多居民已经突然剃了胡须躲进灌木丛中去了。最后，德国承担了特别侦查的角色。在刚开始的时候，德国想在柏培拉建立基地，但发现似乎无法实现之后，便在吉布提建立了一个基地。同时，索马里兰依然没有得到承认。

最为实际的、也是最具有打击性的后果是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关闭了索马里在迪拜的汇款银行(*al-barakat*)。美国怀疑该银行为伊斯兰恐怖组织招募基金，虽然这种指控遭到该银行负责人的极力否认。索马里兰人则较为幸运，他们在南部开办时间更早些的银行服务(*dahabshil*)则幸免于美国人的行动(虽然在埃塞俄比亚的银行曾遭到短暂的关闭)。南方的汇款立即减少了 50%，据报道大批的商人离开了摩加迪沙而将其活动转移到其他地方。索马里政治局势则大体如常。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支持下，又一次将于 2001 年底在内罗毕召开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和平会议正在筹备中。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也是预料之中的小冲突，此次会议还是在 2002 年 6 月召开了。这表明过渡国民政府将要以并不比其他派系更高的地位来参加会议，这种压力让阿卜杜勒卡西姆头疼不已。

此时，阿卜迪拉希宣传已经掌控了权力，经过氏族长老的努力，邦特兰的局势已经不再像早前那样混乱，但依然不稳定。索马里兰也出了大事：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埃加勒总统健康不佳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2002 年 5 月 3 日猝死在南非的医院里，享年 74 岁。

在西亚德政变前，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埃加勒在 1967 至 1969 年期间担任索马里总理，自 1993 年开始任索马里兰总统，他是硕果仅存的文职政治领导人。他的死自然引起人们对索马里兰未来的关切。然而，哈尔格萨议会两院领导人按照宪法进行投票选举，立即任命达希尔·里亚尔·卡辛(Dahir Riyaleh Kahin)为临时总统。这一及时行动

避免了可能的宪政危机,并第一次将一名加达布尔西氏族(迪尔部落)的政治家推上了总统宝座,卡辛是处于排外的伊萨克领导人圈子之外的人物。与吉布提的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一样,卡欣还有一个优势,即年纪只有五十来岁,代表着新生代。

随着部分牲畜出口禁令的取消,索马里兰日益繁荣,首都被广泛报道为非洲最安全的城市,社会生活也恢复了正常,商业也兴旺起来。哈尔格萨的人口(就像博萨索的人口一样)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加,新的商业机会给内陆游牧地区的年轻人提供了就业,这些年轻人的畜牧职责常常委派给了来自不太繁荣的欧加登地区的雇佣者。哈尔格萨街道上交通灯的出现和非常成功的结婚登记处的设立也验证了索马里兰的良好发展态势。索马里兰还有两所大学,这两所大学在规格上几乎和意大利人在摩加迪沙创建的大学机构相当。在卫生领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建立的埃德娜·阿丹(Edna Adan)妇产医院,这所医院是以其创立者来命名的。埃德娜·阿丹是反对妇女割礼运动的先锋(也是穆罕默德·哈吉·易卜拉欣·埃加勒的前妻)。

索马里兰通过扩建柏培拉港口而加强了与世界贸易的联系,且每周有六班以上的国际航班。索马里兰依然不参加南索马里日益成为闹剧的"和平会议",绝大多数政治家普遍持有与这些会议无涉的立场。如果南部出现一个可靠的政府的话,那时再讨论索马里和索马里兰间的适当关系。

奇怪的是,2002 年夏,虽然摩加迪沙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但那个名存实亡的政府却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和暗中扶持;相反,依靠自身力量,通过民主选举运行良好的索马里兰政府依然没有获得承认。这一荒唐的现实对南索马里的元气恢复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这种局面从很多方面上来说阻碍了南索马里的发展。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联合国机构(及其附属的职业和平建设者)众多规划者的利益,为了延续意大利人的怀旧情结。这种对现实的歪曲宣告过渡国民政府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掩盖南索马里的真实情势。从这个角度来展望未来,这也有一个好处,即索马里的新战略提出应当对当地

的政治局势有更好的了解和更深层的理解。

更大政治环境下的抱残守缺

索马里兰(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邦特兰)已经表明索马里人自己能够建立起来容纳传统机制的有效国家。尽管(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南索马里引起了如此大的国际关注,但它十年来一直处在动荡之中。2002年6月,阿卜杜勒卡西姆孤注一掷地维系着过渡政府的残躯,人们也难以看到过渡政府能够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倡议。由于缺乏对这些民兵组织领导人进行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分析[44],诸如揭示这些领导人的长期目标(如果他们有这样目标的话)的分析,人们无法对南索马里的局势进行预测,而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历史领域所能做到的。

当然,除了一些富商和宗教人物偶尔提出倡议(也是模糊不清的)外,也很少有证据表明人们有广泛的意愿要在摩加迪沙和南索马里恢复政府(最宽泛意义上的政府)。对一些政治上正确的外国专家来说,冲突和战争将是索马里接下来年份里的常态。虽然这似乎有点奇怪,也难以接受,但这本身就是索马里问题的一部分,此时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人们尤其是摩加迪沙新近的游牧闯入者要对失序和暴力持有较强的耐心。

这并不是说人们不知道如何构建和平或达成政治妥协,这是一个动机问题。在南方,在大部分地区,当前的利益相关者有着其他的目标。按照废品商的估计,和平与政治解决的成本太高。这些商人已经地位显赫,显然要维持和提高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地位。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哈巴尔·吉迪尔氏族在南索马里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他们不想将它们返还给这些土地和财富的前主人。2002年6月中旬,虽然阿卜杜勒卡西姆所属的埃尔亲族公开表示他们对阿卜杜勒卡西姆政府缺乏信心,但这些亲族中有很多人一定感到他们需要他(或另一个哈巴尔·吉迪尔人)来保护其盗窃来的财富。

我们曾反复论述过,前意属索马里(通常也被认为应包括索马里兰)恢复政府的大部分压力来自外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埃及(迫

切地想阻止埃塞俄比亚权力的扩大)。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与索马里有着漫长的边界,也有着早期索马里人的"民族主义"经历,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都深深地卷入到索马里氏族民兵组织间的冲突中。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论述过,并不久远的埃塞俄比亚的帝国主义部分地刺激了索马里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化,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1977 年的欧加登战争中有着最为激进的表现。

2002 年仲夏,也是我们研究索马里的结束时间,局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埃塞俄比亚的新联邦体系将欧加登并为第五区,并设有地方政府。尽管该地区由埃塞俄比亚控制,但这一结果似乎被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索马里族人口所广泛接受。当然,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人可能会掀起民族主义运动很敏感。2002 年,全球政治力量都进入到该地区并使得局势复杂化。埃塞俄比亚主要焦虑的是保护国家免于以索马里为基地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如伊斯兰团结组织)的袭击。在这一方面,埃塞俄比亚获得了美国布什政府以及美国盟友的,常常是不加区分的全面支持。在西方看来,由于南索马里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所以它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天然温床。美国和欧洲全神贯注于应对恐怖分子的威胁,肯定让南索马里的伊斯兰组织沮丧,这些组织的对社会有益的积极活动似乎为南索马里恢复当地秩序提供了唯一的现实的可能性。

联合国和欧盟对过渡国民政府提供的部分支持应该是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没有一个现代的中央集权政权,索马里人将无法生存。但这却与实际情况相悖。当然,一个现代中央集权政权对国际关系来说肯定是更有利的。就欧盟和北美国家来说,一个更为直接的动机是与难民引起的棘手的政治问题相关的。2002 年夏,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面临着难民所带来的政治问题。一些国家像丹麦在吸纳索马里难民上存有困难,难民问题也对右翼政党产生了影响。因此,这些国家强烈希望能限制寻求政治避难的索马里人的数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遣送回国。不管怎样,这种压力一定程度上也让国际社会在促进索马里组建政府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虽然这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事,但索马里还是需要更多的"和平会议"。然而,这些外部国家中很少有国

家会赞成，在这种无中央权威和粗鲁的利己主义环境中，将这些难民"推回"到索马里脆弱的国境线内。因此，当前尽管外国政府似乎不愿意正式承认索马里兰共和国，但索马里兰事实上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索马里地区出现的唯一的有效政府。因此，我们有必要承认，在这一点上以及在其他诸多情况下，有总胜于无。

注　释

第一章

1　索马里共和国在1961年6月举行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显示，仅索马里共和国本土人口就有400多万。由于没有可靠的普查数据，我们无法对索马里总人口做出精确的统计。

2　这里指的是肯尼亚前北部边区的东部，这一地区的索马里人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带。

3　这是阿法尔人的阿拉伯语名称，外界通常知道的就是这个名称。不过，索马里人通常称他们为澳达利人（'Awdali）。吉布提共和国约有15万阿法尔人。

4　关于索马里语在含族和闪族语系中的地位，近来最好的论文参见：B. W. Andrzejewski，"The position of Galla in the Cushitic Language Group"，*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1964，pp. 135 - 138。

5　1972年，索马里军政权惹人注目地让民众使用罗马文字进行读写。第九章将讨论这一情况。在这之前，索马里人也创造出多种文字。以其创建者命名的奥斯曼尼亚文字是最为流行的一种，在某些特定地区奥斯曼尼亚文字与阿拉伯文字有着竞争，但通用性上还是有限的。阿拉伯文字也是书写索马里语的工具。关于这些早期文字的讨论，参见 I. M. Lewis，"The Gadabursi Somali

Scrip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58, pp. 134 - 156。也可参见下文第 115 页。

6 有代表性的索马里诗歌选集,参见 B. W. Andrzejewski and I. M. Lewis, *Somali Poetr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64。

7 关于索马里人传统婚姻与家庭生活的更详细讨论,参见 I. M. Lewis,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n Northern Somaliland*, East Af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Kampala, and London (Kegan Paul), 1962。

8 参见 K. L. G. Goldsmith and I. M. Lewi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Blood Groups of the 'Sab' Bondsmen of Northern Somaliland", *Man*, Vol. 58, 1958, pp. 188 - 190。

9 关于索马里社会状况的这一方面即其他方面的详细论述,参见 I. M. Lewis, *A Pastoral Democracy: A Study of Pastoralism and Politics among the Northern Somali of the Horn of Africa*, London, 1961。

10 I. M. Lewis, "Conformity and Contrast in Somali Islam", in Lewis (ed.),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1966.

第二章

1 这一重要史料的一个文本是 1923 年在基斯马尤发现的,不久前由意大利学者恩里科·切鲁利翻译和出版。参见 Ceruili, *Somalia: Scritti van editi ed inediti*, *I*, Rome, 1957, pp. 231 - 357。

2 当时有一些资料记载过奥罗莫人从西南方对阿比西尼亚的大举入侵,其中较为杰出的记载是阿比西尼亚修士巴雷(Bahrey)大约在 1593 年写的《盖拉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Galla*)。关于盖拉人,参见 G. W. B. Huntingford, *The Galla of Ethiopia*, London, 1955. H. S. Lewis, *A Galla Monarchy*, Madison, 1965; A. Legesse, *Gad a: three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society*, New York, 1973。索马里人与奥罗莫人的祖先

都是属于东库希特语系,他们被认为起源于紧邻埃塞俄比亚湖区的高原。现代历史语言学家的研究揭示,索马里人先祖离开起源地后,迁到了东北部地区,在约公元 1000 年或更早些时候占领了东非之角的一部分地区(参见 H. S. Lewis, "The Origins of the Galla and Somali",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7, 1, 1966; B. Heine, "The Sam Languages. A History of Rendille, Boni and Somali", *Afroasiatic Linguistics*, 6, 2, 1978; U. Braukamper, "Oromo Country of Origin: A Reconsideration of Hypotheses" in G. Goldberg and B. Podolsky [eds.], *Ethiopian Studies*, Rotterdam, 1981, pp. 25 - 40)。因此,这里讨论的个别索马里氏族向西南迁徙似乎是在伊斯兰教传入后的第二次人口迁移。

3 对伊本·萨义德的证据的解释,切鲁利在《索马里亚》(*Somalia*)第 1 卷第 93—95 页中有批判性的评价。

4 除了前引的切鲁利作品外,关于该王朝出现独立货币的证据的研究,参见 G. S. P. Freeman-Grenville, "Coins from Mogadishu c. 1300 to c. 1700", *Numismatic Chronicle*, 1963, pp. 179 - 201 和 M. H. Yusuf, *Numismatic inscriptions National Museum*, Mogadishu, 1970。关于阿朱兰人,也可参见 L. V. Cassanelli, *The Shaping of Somali Society*, Philadelphia, 1982。

5 根据一个流传于埃塞俄比亚的传说,艾哈迈德·格兰是一个哥普特基督教教士与一个穆斯林妓女所生的儿子。近来一个作家比较严肃地认为,这位伊玛目可能是属于贝贾(Beja)部落的一个支系。

6 参见 Shihab ad-Din, ed. and trs., R. Basset, *Futuh al-habasha*, Paris, 1897 - 1909。

7 这些城市今天都已成为废墟,虽然居里(Curie)少校在 1940 年对其中的大多数作过初步勘查,但尚未系统地加以发掘。如果进行彻底的发掘,应能颇为清楚地说明这一时期的情况。近来,一份极好的研究参见 N. Chittick, "A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in the Horn: The British-Somali Expedition, 1975", *Azania*,

1976, pp. 117 – 133。关于阿比西尼亚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历次战争的最好的通史是 J. S. Trimingham 的 *Islam in Ethiopia*, London, 1952。

8　1624 年,耶稣会传教士德·瓦列斯科(de Valesco)神父访问了佩特与马林迪,并听到了摩加迪沙被征服的消息。索马里还有一些关于此事的其他记载。

9　1625 年的一份葡萄牙文件证实了各族居民的这种分布情况。这个文件也记述了从摩加迪沙进入阿比西尼亚的商业路线。

10　理查·特恩布尔爵士(Sir Richard Turnbull)在肯尼亚北部州工作期间所进行的研究对后来的这些迁移有过很多阐释。关于这些迁移及移入肯尼亚的整个经过,参见 I. M. Lewis, "The Problem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District of Kenya", *Race*, 1963, pp. 48 – 60。关于整个索马里族的扩张情况,也可参见 I. M. Lewis, "The Somali Conquest of the Horn of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960, pp. 213 – 230; E. R. Turton, "Bantu, Galla and Somali Migrations in the Horn of Africa: A Reassessment of the Juba/Tana Are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6, 4, 1974; G. Schlee, "Clans in Northern Kenya", *Africa*, 55, 1, 1985, pp. 17 – 38。

11　冯·德尔·德肯的船沉没后,他被巴尔德拉地方的宗教团体中一些怀有敌意的人杀害,但是他的一些同伴逃了出来,并设法带着探险队的科学记录安全地到达了海岸。

12　"盖拉"一词称来源不明,最早的记载是在 16 世纪。在埃塞俄比亚,该词指的是传统"臣服"的各族人民,不一定专指那个种族。盖拉人自称奥罗莫人(Oromo)。

13　Richard Burton, *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 Everyman edition, 1943, pp. 288 – 289.

14　该地区南起朱巴河河口北到伊塔拉的沿海地带,包括巴拉韦、马尔卡和摩加迪沙等港口。

15　来自沿海遇难船只的抢夺物在此期间已经成为米朱提因贸易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利于促进一个更加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的出现。参见 W. K. Durrill, "Atrocious misery: the African Origins of Famine in Northern Somalia, 1839 – 1884",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2, 1986, pp. 287 – 306。

16　吉兰估计 1847 年约有 1 000 名织布个人，每年约产 3.7 万块布，每块布长 3 码。这些产品在当地消费，也向北部出口到斯瓦希里海岸和索马里。一部分还远销到阿拉伯、波斯湾、红海和埃及各港口。巴拉韦和马尔卡也有小规模的布匹生产。参见 C. Guillain, *Documents sur l' histoire, la géographie, et le commerce de l'Afrique Orientale*, 3 vols., Paris, 1856。也可参见 E. A. Alpers, "Muqdisho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Reg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4, 1983, pp. 441 – 459。

第三章

1　埃及总督宣称，在 1865 年和 1866 年土耳其皇帝把萨瓦金和马萨瓦等红海港口交给埃及的敕命中，这些港口也包括泽拉港和索马里海岸。但是实际情况并非这样。马萨瓦是 1875 年的第三个敕令才交给了埃及。关于埃及时期的最好论述，参见 G. Douin, *Histoire du Regne du Khedive Ismail*, Cairo, Mi, Vol. Ⅲ。

2　在 1884 年到 1885 年 6 月期间，意大利对英国施加压力，要英国同意它占领泽拉和哈勒尔。1885 年 6 月，格兰维尔勋爵表示，虽然土耳其对这两个港口有法律上的主权，但英国将不反对意大利取得它们。然而，当时意大利议会不同意意大利占领。基于充分的文件，对当时意大利外交活动做出卓越分析的，可参见 C. Giglio, *L'ltalia in Africa: Etiopia-Mar Rosso, 1857 – 1885*, Rome, 1958。

3　哈巴尔·加尔哈吉斯是北索马里哈巴尔·尤尼斯和伊达加尔勒这两个不同氏族的联盟。唯一与英国缔结了保护关系条约的东部部

落是哈巴尔·托尔·贾洛。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的东部有瓦尔桑格里和杜尔巴汉特两个氏族,保护条约中不包括它们。它们分布在当时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即哈勒尔-泽拉-柏培拉地区以东很远的地方。

4 这些条约可以方便地在《索马里半岛:对帝国动机的新认识》(*The Somali Peninsula: A New Light on Imperial Motives*, London, 1962)中查到。这份重要的由索马里共和国出版的官方出版物还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英-索关系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分析。

5 L. P. Walsh, *Under the flag and Somali Coast Stories*, London, n. d. , p. 311.

6 优素福·阿里在同世袭的米朱提因苏丹伊斯曼发生争执后,约在1870年自立为霍比亚苏丹。在霍比亚内陆地区居住的是哈维耶和米朱提因部落。在此之前,英国曾在1839年同米朱提因部落签订过商业条约。

7 孟尼利克此时已经正式废除了与意大利签订的《乌西利亚条约》,并偿还了意大利的贷款。但是,不同于法国,英国拒绝接受孟尼利克的主张,继续与意大利打交道,尽管当时意大利明显不能控制阿比西尼亚对索马里的政策。

8 当时在欧加登地区并没有意大利的行政官员,而且除了欧加登部落与意大利的一些探险家签订的若干非官方协定外,意大利提出的各种权利要求是以它对阿比西尼亚的“保护关系”为依据的,归根到底,也是以阿比西尼亚部队对该地区的入侵为依据的。

9 关于对这一时期俄国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渗透和利益的全面分析和卓越研究,参见 C. Jesman, *The Russians in Ethiopia: an essay in futility*, London, 1958。

10 R. Rodd, *Social and Diplomatic Memories, 1894 -1901*, 1923, p. 173.

11 在比约卡博巴的哨所,是“一座由松散的石块建成的、顶上覆盖有茅草的并不结实的碉堡……由7个人驻守……这是一群难以形容

的、衣衫褴褛的索马里和苏丹的地痞流氓——其中没有阿比西尼亚人……这些可怜的家伙并没有薪饷……只是依靠过路的商队来生活……”(随同罗德一行前往的情报官格莱申伯爵[Count Gleichen]: *With the Mission to Menelik, 1897*, London, 1898, p. 27.)在英属领地内另一个地方阿罗拉也建立了阿比西尼亚临时哨所。1897 年,该哨所已经无人驻守。因此,阿比西尼亚的入侵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但是阿比西尼亚这种有名无实的压力,却使得英国感到英属索马里的疆域超过了它的实际需要。

12 这一重要之点也反映在罗德发给伦敦的电报中,参见 *The Somali Peninsula*, pp. 55 - 58。

13 R. Rodd, *Social and Diplomatic Memoirs*, 1894 - 1901, p. 187.

14 如果在本书中讨论俄国在法、意、英在红海海岸和内地的三角斗争中的利害关系,那就离题了。但是有必要提一下,俄国曾作为调停人参与阿杜瓦战役后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和平谈判。

第四章

1 关于伊斯兰教在索马里的资料,参见 I. M. Lewis, *A Pastoral Democracy*, London, 1961, pp. 213 - 228; E. Cerulli, *Somalia, scritti vari editi ed inediti*, Rome, 1957; B. G. Martin, *Muslim Brotherhoods in 19th century Africa*, Cambridge, 1976。

2 在 19 世纪 90 年代,哈尔格萨居民点只不过是几百座草房、四周有较高的篱笆、里面大约有 1 平方英里的高粱地。这个地方,赤贫者和残废人通常靠行乞以取得救济和食物。马达尔舍赫的声望深入到欧加登,他与周围大多数索马里氏族的领袖有联系。1893 年,德拉梅尔勋爵在内地打猎探险时被狮子咬伤后,那位舍赫协助救了他的命。为了报答他,德拉梅尔把他在这个居住区附近修建的一座壮丽的石头房子送给马达尔舍赫。经常有人到马达尔舍赫在哈尔格萨的墓地去朝拜祈福,而且每年都在那里举行一次纪念仪式。关于马达尔舍赫生前这一居住区的最详尽叙述,参见 H. G.

C. Swayne, *Seventeen Trips through Somaliland and a Visit to Abyssinia*, London, 1903。

3　这一时期及许多其他关于赛义德个人生活和萨里赫教派运动的材料,是以他的儿子阿卜杜拉-拉赫曼·谢赫·穆罕默德('Abd ar-Rahman Sheikh Muhammad)舍赫及其兄弟哈桑·谢赫·阿卜迪勒(Hassan Sheikh 'Abdille)舍赫所存有的家谱为根据的。我也从赛义德的一些现在还健在的亲密伙伴、索马里萨里赫教派现任首领伊斯曼·谢赫·乌玛尔('Isman Sheikh 'Umar)舍赫以及杜尔巴汉特历史学家哈吉·努尔·伊塞(Haji Nur Tse)收集了一些材料,并加以广泛地利用。索马里历史学家的第一本关于德尔维希运动的权威性著作为 Aw Jama 'Umar 'Ise, *Taariikhdii Daraawiishta*, Mogadishu, 1976。这本书是对这位历史学家另一本关于西亚德诗歌总集的补充,参见 *Diiwaanka Gabayada Sayid Maxamad Abdulle Xassan*, Mogadishu, 1974。还有一本书对赛义德及其诗歌做了全面研究的是 Y. I. Keenadiid, *Ina 'Abdille Xasan e la sua attivita letteraria*, Istituto Universario Orientale, Naples, 1984。关于赛义德在索马里民族主义发展中对演讲及诗歌的使用的更多讨论,参见 S. S. Samatar, *Oral Poetry and Somali Nationalism*, Cambridge 1982。

4　"咔特"叶生长于埃塞俄比亚。叶子多汁,新鲜时含有类似于芥末兴奋剂的刺激性成分。卡迪尔教派的舍赫在夜间工作的时候常常咀嚼这种叶子以提神。

5　Swayne, *op. cit.*, pp. 6, 7, 128, etc.

6　转引自 D. Jardine, *The Mad Mullah of Somaliland*, London, 1923, p. 43。

7　之前引用的贾丁的著作对这场战争有最为全面、详尽的记叙。贾丁是一位官员,在这一时期曾一度担任索马里政府秘书长。关于初期阶段,可参见英国政府的官方记载:*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rising of the Mullah Mohammad Abdulla in Somaliland*

and consequent military operations, 1899 - 1902, London, 1903。关于个别时期的英国军事行动和细节以及埃塞俄比亚所起的作用,以下作品也值得参考: M. McNeill, *In Pursuit of the Mad Mullah*, London, 1902; J. W. Jennings, *With the Abyssinians in Somaliland*, London, 1905; 关于这次圣战尤其是这次圣战在意属索马里所产生的影响,可参见一本较有代表性的意大利著作: F. S. Caroselli, *Ferro e Fuoco in Somalia*, Rome, 1931。

8 关于这个补充协议和伊利格条约的条款,参见 *The Somali Peninsula*, *cit.*, pp. 118 - 122。这些条约以及直到 1908 年为止的其他一切有关"非洲之角"的条约,都可以在下面的著作中查阅: E. Hertslet, *Map of Africa by Treaty*, 3 vols., London, 1909 - 3rd edition。

9 关于当时英属保护领地情况,曾有过一段不寻常的记载,参见 F. Swayne, A *Woman's Pleasure Trip to Somaliland*, London. 1907。

10 这封信的译文,参见 Jardine, *op. cit.*, pp. 184 - 185。

11 赛义德·穆罕默德的这首诗和其他诗篇的全文及译文,参见 B. W. Andrzejewski and I. M. Lewis, *Somali Poetry*, Oxford, 1964。关于科菲尔德及其组建的骆驼保安队,下面的一本书中曾带着同情的心情记载过: H. F. Prevost Battersby, *Richard Corfield of Somaliland*, London, 1914。

12 Jardine, *op. cit.*, p. 249。赛义德与英国专员的来往信件是用阿拉伯文写的,但赛义德的诗歌形式的信件通常是用索马里语写的。

13 H. G. C. Swayne, *op. cit.*, p. 117.

14 贝纳迪尔公司统治下的地区继续保留奴隶制曾引起公愤。这促使意大利派去了一个由古斯塔沃·基埃塞(Gustavo Chiese)和埃尔内斯托·特拉韦利(Ernesto Travelli)率领的调查团。1904 年,这个调查团在米兰发表了题为《贝纳迪尔问题》(*Le Questtoni del*

Benadir)的报告。该报告很能说明问题,完全证实了该公司确如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即对废除奴隶制漠不关心。意大利政府也不是无可指责。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成材料,且持有反对意大利的立场的著作,参见 E. S. Pankhurst, *Ex-Italian Somaliland*, London, 1951, pp. 38 - 83。

15 显然,当时意大利当局很少招募索马里人到"绥靖"部队服役。但是,那时意大利也有少数索马里籍雇佣兵,主要来自北部地区。后来,意大利人大量吸收索马里"臣民"补充警察和武装部队,法西斯统治时期的意大利报刊常常特别赞扬索马里北部牧民的优秀素质,把它们称之为"武士种族"的优秀代表。

16 T. Carletti, *I Problemi del Benadir*, Viterbo, 1912, p. 270.

17 关于费兰迪在卢格时的生动记叙,参见他的作品:*Lugh Emporio commerciale sul Giuba*, Rome, 1903。这是有关意属索马里为数不多的几本经典之一。

18 这个条约的全部内容,参见 *The Somali Peninsula*, *cit.*, pp. 107 - 110。除了政治目的外,这个条约还列有商业和经济目标,以及三国在非洲这个地区的利益范围,其中包括:法国将吉布提铁路从迪雷达瓦延长到亚的斯亚贝巴(在一家有英、意、埃三国代表的法国公司的管辖下);英国和埃及控制塔纳湖和青尼罗河;意大利通过埃塞俄比亚把意属厄立特里亚意属索马里连接起来。

19 当时意大利外交大臣托马索·蒂托尼(Tommaso Tittoni)向意大利议会解释道,这个条约为意大利保留了"应该给我们的部分,并对两个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前途予以必要的保证"。该大臣的演说的正式文件,参见 Baron Quaranta, *Italy's Foreign and Colonial Policy: Speeches of Senator Tommaso Tittoni*, London, 1914。

20 意属索马里总督里瓦里在 1916 至 1920 年期间的官方报告,转引自 G. Corni, *Somalia Italiana*, Vol. ii, Milan, 1937, pp. 21 - 22。

第五章

1 更具体的内容参见卡勒蒂总督对其任内情况的记载,参见其本人的著作 *I Problemi del Benadir*, Viterbo, 1912, pp. 187 ff。

2 关于德韦基在任期间的情况,参见其本人的著作 *Orizzonti d'Impero: Cinque Anni in Somalia*, Milan, 1935。

3 对意索农业公司和阿布鲁齐公爵的事迹有较好的综合研究,参见 C. Maino, *La Somalia e V Opera della Due a degli Abruzzi*, Rome, 1959。

4 关于这些规则和合同的详细条款,参见 G. Corni (ed.), *Somalia Italiana*, Milan, 1937, Vol. ii, pp. 412 – 418; P. Barile, *Colonizzazione fascista nella Somalia Meridionale*, Rome, 1935, pp. 179 – 181。

5 对劳动力缺乏问题进行有益探讨的著作,参见 M. Karp, *The Economics of Trusteeship in Somalia*, Boston, 1960, pp. 104 – 110, and 117 ff。此外,就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以意大利文出版的著作。

6 相关典型的评论参见 Barile, *op. cit.*, pp. 149 ff。

7 关于这一时期意属索马里警察和军队的构成和发展的详细情况,参见 Corni, *op. cit.*, pp. 185 – 236。

8 约在 1910 年,这个地区的马雷汉和奥利汉(Awlihan)氏族之间的矛盾有所激化,当时英国还在塞伦利(Serenleh)设置了一个哨所。1912 年,英国曾企图从这个基地把马雷汉人置于有效的统治之下。然而,进一步的摩擦使得英国当局在 1913 至 1914 年间派出皇家非洲来复枪队(King's African Rifles)进行远征。这两个氏族的矛盾,似乎是英国当局雇用的奥利汉族著名头人阿卜杜勒-拉赫曼·穆尔萨勒('Abd ar-Rahman Mursal)的活动所挑起来的。英国人选他来做代理人看来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在 1915 年正式访问内罗毕回到本地区后,便大肆宣扬说,瓦季尔(Wajir)和塞伦利

之间的领土已归他统治。这就推动奥利汉人向马雷汉人挑衅，并在随后出现的紧张状态中完全拒绝英国当局的调解。1916年，在奥利汉人对马雷汉人进行了一次野蛮进攻之后，事态发展到了顶点。阿卜杜勒-拉赫曼收到警告说，除非把在袭击中抢走的骆驼送还，否则就要被解除公职和监禁。但是，他没有被吓退，并且对塞伦利的英国哨所发动了一次大胆的进攻，杀掉了当地的英国官员和大部分卫兵。由于夺得了武器弹药，塞伦利便落在奥利汉人手中，直到朱巴河对岸巴尔德拉的意大利驻扎官率领非洲雇佣军过河来把他们驱逐了出去。

从此以后直到1917年前，英国没能派出讨伐队。但是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追随者已开始减少，因此后来讨伐队到来时，轻易打垮了奥利汉人的抵抗。这个氏族的大部分武器都被上缴，并被课以2.5万头骆驼的重罚。除此之外，它的大部分主要长老被逮捕入狱。

因此，尽管还没有被全部解除武装，但到1924年，这个动乱地区的氏族已经渐渐地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行政当局。同年签署的伦敦条约把朱巴兰移交给意大利。在这项新决定的宣布和执行之间的时间内，各个氏族没有机会发表意见，并分裂为反意派和反英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慎重地加以处理才能预防发生暴乱。这段简短的记述或许可以为了解当时朱巴兰的一般形势提供一些材料。

9　D. Jardine, *The Mad Mullah of Somaliland*, London, 1923, pp. 316 - 318.

10　关于英属保护领地该地区的农业耕作的详细情况，参见I. M. Lewis, *A Pastoral Democracy*, London, 1961, pp. 90 - 127。

11　关于这一时期各种事件的详细情况，参见官方年报：*Colonial Reports: Somaliland*。有本书生动地记述了一个区专员的工作，参见H. Rayne, *Sun, Sand and Somalis: Leaves from the Notebook of a District Commissioner in British Somaliland*,

London, 1921。另一本书对当时情况和氛围也进行了生动的记述,参见 M. Perham, *Major Dane's Garden*, London, 1926。当时的一个总督关于议论英属保护领地的需要和潜力问题,参见 H. B. Kittermas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mali", *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 31, 1932, pp. 234 - 244。帕特里克·卡克文兹雷的研究揭示,自德尔维希战争后,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停滞期,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促进了英属保护领地的繁荣,在卫生保健、兽医和农业服务等方面也有着适当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参见 P. Kakwenzire, "Resistance, Revenue and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Somalia, 1905 - 193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19, 1986, pp. 659 - 677。

12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 55 至 56 页[①]。

13 参见 H. M. Clifford, "British Somaliland-Ethiopian Boundary", *Geographical Journal*, 97, 1936, pp. 289 - 307。意大利雇佣军指挥官罗伯托·齐马拉塔(Roberto Cimmaruta)少校曾记叙过意大利人对瓦尔瓦尔事件的看法。参见 Roberto Cimmaruta, *Ual-Ual*, Milan, 1936。

14 Corni, *op. cit.*, pp. 34 - 37.

15 一些材料引自科尼的著作,其他材料来自索马里本地。埃塞俄比亚人的观点,可参见 S. Pankhurst, *Ex-Italian Somaliland*, London, 1951, pp. 99 - 103。

16 参见 M. 佩亨姆(M. Perham)杰出的综合性的著作: *The Government of Ethiopia*, London, 1948, pp. 336 - 338。

17 参见第四章,第 88 页。

18 关于埃塞俄比亚人对这些谈判的讨论,参见 Pankhurst, *op. cit.*, pp. 99 - 111, 以及 A. de la Pradelle, *Le Conflict Italo-Ethiopien*,

---

① 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下同。——编者注

Paris, 1936。英国人对在这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参见 C. Hollis, *Italy in Africa*, London, 1941, pp. 141 - 203。也可参见 E. M. Robertson, *Mussolini as Empire-Builder, Europe and Africa, 1932 - 36*, London, 1977。

19 有本书热情洋溢地描述了欧加登人在反对埃塞俄比亚中所起到的作用,参见 H. de Monfried, *Les Guerriers de L'Ogaden*, Paris, 1936。

20 例如,参见 R. R. de Marco, "The Italianisation of African Natives", in *Government Native Education in the Colonies, 1890 -1937*, New York, 1943。也可参见 R. L. Hess, *Italian Colonialism in Somalia*, Chicago, 1966。

21 T. Carletti, *I Problemi del Benadir*, Viterbo, 1912, p. 274.

22 参见一本很是有用的索马里史纲: M. Pirone, *Appunti di Storia dell'Africa*, Ⅱ, *Somalia*, Rome, 1961, pp. 140 - 141。

23 关于索马里民族主义政党的兴起的一般情况,参见 I. M. Lewis, *A Pastoral Democracy*, London, 1961, pp. 266 - 296; 和 "Modern Political Movements in Somaliland", *Africa*, 1958, pp. 244 - 261; 344 - 363。

24 这些事件在我的一篇文章中有更为全面的讨论,参见 I. M. Lewis, "The Gadabursi Somali Scrip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58, xxi, pp. 134 - 156。也可参见下文第 216 页。

第六章

1 关于英国官方对意大利在意属索马里的崩溃以及盟军在意属索马里的占领情况,参见 George Steer, *The Abyssinian Campaigns. The Official 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Italian East Afria*, London, 1942。关于意大利人对意大利失败的看法,参见 R. di Lauro, *Come Abb'tamo D'tffeso L'lmpero*, Rome, 1949。

2 该协议的详细内容,参见 *The Somali Peninsula*, *cit.*, pp. 122 - 125。

3 英国政府新闻部编辑、1944 年由伦敦皇家文书局出版的小册子《第一个解放的国家》(*The First to be Freed*),对这个时候的及意大利崩溃后不久的意属索马里情况有生动的描述。要对 1947 年以前英国军官当局统治下的情况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参见 Lord Rennell of Rodd,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ies in Africa*, *1941 -47*, London, 1948。戈登·沃德菲尔德的《早晨即将来临》(*Morning Will Come*, London, 1945)介绍了英属保护领地刚刚收复后的气氛,写得相当有趣。德格拉斯·科林斯(Douglas Collins)的《为索马里泪流》(*A Tear for Somalia*, London, 1961)是半自传性的作品,生动地叙述了英国军官当局及其警察和政府官员的生活与活动。杰拉尔德·汉利(Gerald Hanley)的小说《日落时的领事》(*The Consul at Sunset*, London, 1951)对这一时期作了深刻的观察。

4 Rennell of Rodd, *cit.*, p. 153.

5 这里的数据与其他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军官当局的多份官方报告。

6 参见英国军官当局的正式公报,参见 E. S. Pankhurst, *cit.*, pp. 224 - 225。

7 阿卜迪拉希·伊萨,1922 年生于穆杜格州。1938 年被雇为意大利当局的书记官,1941 年辞职从商;1945 年参加索马里青年联盟,1947 入选该联盟的中央委员会,1948 年担任青年联盟在四大国调查团意见听取会上的主要发言人;1949 至 1952 年担任驻联合国代表。

8 这两人都是天主教徒,马里安诺的天主教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在索马里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

9 参见四大国对前意属索马里进行调查的代表团的报告:*Report on Somaliland*, Vol. ii, London, 1948。该报告全文在英国没有公开发表,但可以在外交部图书馆查阅。这个报告记录了前意属索马里各个政党团体的意见书,以及英国军官当局时期在各方面所实行的改革情况。该报告中有一大部分内容发表在潘克赫斯特

(E. S. Pankhurst)的《前意属索马里》(*Ex-Italian Somaliland*)一书中(参见该书第222页以后的内容)。还可参见四大国调查团英国委员的文章：F. E. Stafford, "The ex-Italian Colon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xxv, January, 1949, pp. 47－55。

10 阿卜杜勒-拉希德·阿里·舍马克(1917年出生于米朱提因),在意大利与英国的行政机构中当过书记官。1948至1949年任索马里青年联盟的书记,并是该联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11 关于联合国的辩论情况,参见 Pankhurst, *op. cit.*, pp. 260－269, 298－354。也可参见 B. Rivl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talian Colonies*, New York, 1950; 和 G. H. Becker, *The Disposition of the Italian Colonies*, Annemasse, 1952。意属索马里的前途由于意大利所有殖民地的整个问题而复杂化,特别是由于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提出强烈要求而复杂化。参见 Pankhurst, *cit.*,以及 Pankhurst, *Eritrea on the Eve*, London, 1952; 偏见较少的观点,参见 G. K. N. Trevaskis, *Eritrea: a colony in transition, 1941－52*, London, 1960。简要地说,贝文-斯弗尔扎的折中方案,建议利比亚由联合国托管10年;厄立特里亚由埃塞俄比亚与英属苏丹分管;前意属索马里则仍然由意大利不定期地托管。但是,这个方案在几次投票的时候都没有通过,直到联合国第四届大会才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妥协的建议,把前意属索马里交给意大利托管10年,此建议附加有重要的条件以保证联合国能在很大程度上实行监督。

12 埃塞俄比亚和著名的埃塞俄比亚支持者,如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女士则提出相反的看法。总的来说,这是没有根据的。有人认为欧加登曾是"古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组成部分,也同样没有根据。从前文的内容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对该地区提出主权要求的根据,只是因为它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入侵并征服过这个地区,它的这种要求只是通过1897年和1908年的意埃协定才在国际法上有了某种认可。当然,欧加登的索马里

人中也是有亲埃塞俄比亚的人。索马里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及其采取的态度,常常部分地因为内部派系矛盾和索马里当地政治情势的迫切需求而受到影响。索马里青年联盟和独立立宪党对恢复意大利统治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部分地就是因为这两个集团的支持者间存在分歧。

13 D. Collins, *A Tear for Somalia*, 1961, pp. 170, 177.

14 D. Collins, *A Tear for Somalia*, 1961, pp. 59 - 61.

15 英属保护领地由于受到肯尼亚北方边区州安全部门的影响,并没有接受前意属索马里的英国军官当局安全部门的观点。英属保护领地当局原先认为索马里青年联盟即便不是一个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组织,也是一个危险的左倾组织。这种错误的看法在好几年后才逐渐没有了。因此,索马里青年联盟虽没有被彻底取缔,但它早期在英属索马里吸纳追随者的活动肯定没有得到当局的鼓励。

16 参见 H. Deschamps, *et al.*, *Côte des Somalis*, *Réunion-lnde*, Paris, 1948; *Notes et Etudes documentaires*, *Le Côte français des Somalis*, 29th April, 1961。

17 在法国人对这些索马里问题的看法方面,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参见 R. Lamy, "Le destin des Somalis", in *Cahiers de L'Afrique et I' Asie. Mer Rouge-Afrique Orientate*, Paris, 1959, pp. 163 - 212。

第七章

1 关于联合国在索马里亚(somalia,即前意属索马里)的重要作用,目前还没有出版过相关的综合研究。然而,有一些有价值的评论,参见 A. A. Castagno, "Somalia",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ew York, March, 1959, pp. 395 - 400。

2 1954 年以后,意大利当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在原意属索马里南部开办了三所基础教育中心。两所设在丁索尔(Dinsor)和维拉布卢齐(Villabruzzi)的从事半农耕的部落中,第三所设在阿

弗马杜(Afmadu),专门照顾完全从事游牧的部落。这所教育中心的成效最小,两年后就关闭了。

3 关于教育的总体情况,尤其是原意属索马里和英属索马里的情况,参见 A. A. Castagno, "The Somali Republic", in H. Kitchen (ed.), *The Educated Afric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62。

4 参见 A. F. I. S., *Plans de Developpement Economique de la Somalie, Annees 1954 - 1960*, Rome, 1954; G. F. Malagodi, *Linee Programmatiche per lo sviluppo economico e sociale della Somalia*, Rome, 1953。对七年计划做出批判性探讨的作品,参见 M. Karp, *The Economics of Trusteeship in Somalia*, Boston, 1960。

5 Karp, *op. cit.*, pp. 87 - 104.

6 关于这两个政党的情况,即索马里民主党最终并入到自由党的情况,参见 I. M. Lewis, *A Pastoral Democracy*, London, 1961, pp. 283 - 290。

7 关于原意属索马里在整个托管时期的进展情况,意大利托管当局的年度报告中有很好的文献资料,参见 *Rapport du gouvernement italien a VAssemblee generat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Administration de tutelle de la Somalie*, Rom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要了解直至 1958 年的更全面的情况,也可参见 I. M. Lewis, *Modern Political Movements in Somaliland*,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Memorandum XXX, London, 1958;以及 Castagno, *cit.*, 1959。关于 1956 年选举进程方面的详尽报告,参见 A. F. I. S., *Le Prime Elezioni Politiche in Somalia*, Mogadishu, 1957。

8 负责该项计划的工程师的妻子对该时期英属保护领地的情况有着独特的个人看法,参见 M. Laurence, *The Prophet's Camel Bell*, London, 1963。

9 关于"地方官"的社会含义,刘易斯在著作中有较为充分的论述,参

见 Lewis, *cit.*, 1961, pp. 200 - 203。

10 1956 年埃塞俄比亚新闻出版局出版了皇帝演说的阿姆哈拉文、阿拉伯文和英文版的小册子。

11 进一步的探讨,参见 Lewis, *cit.*, 1958, pp. 346 - 349。

12 参见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Unofficial Representation o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Government of the Somaliland Protectorate, Hargeisa, 1958。

13 政府任命了一位负责索马里化的长官。1959 年 4 月,政府研究了他的报告。同年 7 月,政府成立一个"文官制度咨询委员会",负责挑选出国留学的人选,推荐应予提升的公务员人选,对公务员的录用条件提出建议和处理其他有关事务。这个委员会由总检察官们主持,总检察官包括两名官方成员和两名非官方的索马里成员。

14 参见 G. A. Costanzo, *Problemi costituzionali della Somalia nella preparazione all' independenza*, Milan, 1962。

15 G. A. Costanzo, *Problemi costituzionali della Somalia nella preparazione all' independenza*, Milan, 1962, p. 152.

16 1957 年 3 月,政府曾发行了一份索马里新闻通讯《索马里信使》(*War gey ska Somaliyed*),稿件用的文字是简单的但准确的罗马字母拼写而成的索马里语。但是,公众反映并不怎么理想。因此,只发行了两期就停刊了。

17 参见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Council for the Trust Territory of Somaliland under Italian Administration* (1 April, 1958, to 31 March, 1959), document T. 1444, 1959, pp. 24 -31。

18 参见 *Report of the Somaliland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London in May 1960*, Cmnd. 1044, London, 1960。

19 该组织取代了之前的"保护领地咨询委员会",但实质上依然是一个咨询性组织,相当于上议院。

20 与英国的协定参见 *Agreements and Exchanges of Letter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Somaliland in connexion with the Attainment of Independence by Somaliland ,cmnd. 1101, London, 1960;与意大利的协定参见 *L'Amministrazione fiduciaria della Somalia e i Rapporti dell' Italia con la Repubblica Somala*, Rom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61, pp. 127 – 206。这项报告还包括一份完全托管时期的报告摘要。

第八章

1 参见 Lewis, *A Pastoral Democracy*, *cit.*, pp. 266 – 296; 以及"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eadership and loyalties in the British Somaliland Protectorate and U. N. Trusteeship Territory of Somalia", *Civilisations*, 1960, pp. 49 – 62。

2 1957 年,英属保护领地的立法议会曾要求政府着手对废除部落制度进行调研。随后,政府也进行了调研,但一直到独立时还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同样,1959 年 3 月大选后组成的索马里青年联盟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团来研究部落问题,并考虑传统的部落联系如何才能最好地适应现代国家的需要。

3 参见 S. Santiapichi, *Appunti di Diritto penale delta Somalia*, Istitut. Universario della Somalia, Rome, 1961; P. Contini, *The Somali Republic, an experiment in Legal Integration*, London, 1969; M. R. Ganzglass, *The Venal Code of the Somali Democratic Republic*, New Brunswick, 1971。

4 为了给本国语言推荐最为合适的文字,1960 年 10 月,索马里成立了以索马里诗歌著名权威穆赛·加拉勒(Muse H. I. Galal)为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使用罗马拼写文字,但共和国在当时并没有做出决定。

5 北方地区估计有 65 万人,但只有约 10 万人参加了投票,这说明至少有一半选民抵制投票。所有的成年男女都有权投票,这也是北

方地区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投票。

6 1961年8月25日《索马里新闻》(*The Somali News*)全文刊发了总理的政策声明。

7 关于这次灾害以及为克服灾害影响而采取的各种措施的详细情况,参见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drawn up by the Committee set up by His Excellency the Prime Minister to recommend measures essential to repair damages caused by the flood*, Somali Republic: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Mogadishu, 1962。

8 关于这个案件的审理情况,参见1963年2月出版的《索马里新闻》。这些尉官在1964年春曾英勇地与埃塞俄比亚人作战。

9 1962年末,索马里成立了国家文官编制委员会,该委员会按照前英属保护领地的制度来调整官员的任命和升迁。

10 后来在夏天的时候,索马里对全部区、州的专员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重新调配。

11 北方地区的汽油税被提高到南方地区通行的税率,这使得北方地区的汽油价格上涨了一倍。同时,政府降低了北方地区的柴油税和烟酒进口税,使得北方地区的价格和南方地区的价格持平。降低相关税收是为了弥补汽油价格的上涨。然而,不幸的是,政府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认识到北方地区的机动车几乎全部用汽油而不是柴油。北方地区的人们对政府在当时的情况下降低烟酒价格并不满意,并认为是可笑的一件事。

12 马哈茂德·穆罕默德·法拉赫舍赫(欧加登)作为一个妥协的候选人,曾在两年前担任此职。1959年,马哈茂德舍赫任索马里青年联盟政府的司法部长。

13 政府报纸刊发了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强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参见1962年12月21日和28日的《索马里新闻》。

14 "公共秩序法"得到了72名议员的支持,10名议员反对,1名议员弃权;其他议员则退席以示抗议。新法案包含有78个条款,强化了对公共集会结社的控制,授权最高法院勒令违反共和国宪法的

政党暂停活动或加以解散。反对派的批评意见是否恰当,要看政府用什么办法来实施该法律。过去,一些反对派对共和国的民主权利的滥用已经达到了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

15 参见前面的注释,北方地区的妇女曾参加了关于共和国宪法的公民投票。

16 *The Somali Peninsula: a new light on imperial motives*, London, 1962, p. vi.

17 宪法第 6 条第 4 款写道:"索马里共和国将以合法的、和平的手段促进索马里所有领地的统一,支持世界各民族的团结,尤其是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各民族的团结。"

18 参见 *A Pastoral Democracy*, *cit.* pp. 303 – 304。

19 详细情况参见 1958 年 12 月 8 日的《索马里新闻》。

20 关于法属索马里的详细情况,参见 S. Touval, *Somali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3, pp. 123 – 131;以及 *Notes et Etudes Documentaires: La Cote Franqa'tse des Somalis*, La Documentation frangaise, Paris, 1961, No. 2, p. 774。

21 关于这些没有结果的谈判的简要总结和联合国有关文件的参考资料,参见 A. A. Castagno, "Somalia",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 522, New York, 1959, pp. 386 – 391;关于埃塞俄比亚观点的声明,参见 *The Ethio-Somalia Frontier Problem*,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mperial Ethiopian Government, Addis Ababa, 1961。也可参见 A. A. Castagno, "Somali Republic" in J. S. Coleman and G. C. Rosberg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Berkeley, 1964, pp. 512 – 559。

22 埃塞俄比亚方面最初宣布,英属保护领地获得独立后,北方地区各部落在豪德地区的放牧权利将被取消。然而,不久后,即在独立前几天,埃塞俄比亚的另一个声明却向英属保护领地的索马里政府

保证,只要索马里人承认 1897 年的边界线,放牧权将继续保持。自索马里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情势的不稳定曾引起了一系列的事件,但双方实际上都尊重现有边界线。参见 *The Danot Incident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omali Republic, Mogadishu, 1961。关于法律方面的讨论,参见 D. J. Latham Brown, "The Ethiopia-Somaliland Frontier Disput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56, pp. 245 – 265; 和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Ethiopia-Somaliland Dispute", *ibid*, 1961, pp. 167 – 178。

23 1902 年的"边区法令"和 1934 年的"特区管理法令"限制人们进出该地区。对该地区城镇间往来的限制,并不比南非的"通行证制度"弱多少。

24 参见 *Report of the Kenya Constitutional Conference*, 1962, Cmnd. 1700. London, 1962, p. 11。

25 参见 *A People in Isolation: a call by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District of Kenya for Union with the Somali Republic*, London, 1962。在这个小册子中,三个主要的分离主义政党,即北方州人民进步党、北方边疆民主党和北方州人民民主联盟,陈述了索马里方面的观点。

26 详细报道参见 1962 年 3 月 23 日的《索马里新闻》。

27 该讲话是在 1962 年 7 月 28 日为乔莫·肯雅塔举行的国宴上说的。关于这次访问的详细情况,参见 1962 年索马里共和国在摩加迪沙出版的纪念画册《索马里共和国与非洲统一》(*The Somali Republic and African Unity*)。

28 *Kenya: Report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District Commission*, Cmnd. 1900, London, 1962.

29 *Kenya: Report of the Regional Boundaries Commission*, Cmnd. 1899, 1962.

30 对索马里共和国与英国多次谈判进行出色且详细的描述,参见很有价值的作品: J. Drysdale, *The Somali Dispute*,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关于这方面的更多情况,也可参见 I. M. Lewis, "The Problem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District of Kenya", *Race*, 1963, pp. 48 - 60。

31 这是 1962 年 7 月 28 日的讲话。总统 8 月 16 日在罗纳德·恩加拉(Ronald Ngala)访问摩加迪沙期间的有一次讲话中,更清楚地阐述了这些观点。阿丹总统当时在谈到关于共和国的民主实践时说,他觉得遗憾的是,很多其他非洲国家"由于民众由不同种族组成,肯定会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存在",为了把大家团结起来不得不建立一党制政府。他接着说,"另一些国家还完全禁止政治活动"。参见 *The Somali Republic and African Unity*, cit.;以及 I. M. Lewis, "Pan-Africanism and Pan-Somalism",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63, pp. 147 - 161。

32 参见 Dennis Austin, "The Ghana-Togo Frontier",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63, pp. 139 - 145。

33 这个讲话全文刊登在 1963 年 5 月 31 日的《索马里新闻》上。关于到 1963 年 12 月为止的共和国大事记,参见 Somali Government, *Government Activities from Independence until Today (1st July 1960 - 31st December 1963)*, Mogadishu, 1964。

34 参见 J. Markakis, *National 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Horn of Africa*, Cambridge, 1987, pp. 187 - 191。

35 参见 I. M. Lewis, "Developments in the Somali Dispute", *African Affairs*, 1967, pp. 104 - 112; V. Thompson and R. Adloff, *Djibouti and the Horn of Africa*, California, 1968; P. Oberle, '*Afars et Somalis: les dossiers de Djibouti*, Paris, 1971。

第九章

1 1969 年军事政变后发布的一份正式声明宣称,埃加勒总理在 1969 年 1 至 10 月期间动用了 50 万英镑支付给了议员。

2 参见努尔丁·法拉赫(Nuruddin Farah)1974年的小说《裸针》(*The Naked Needle*),这部小说生动地展现了首都摩加迪沙那种腐朽的气息。

3 早在1969年前,这一短语就由英国广播公司索马里语节目的制作人员提出来了,指的是欧洲和中东地区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4 这一表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在英属索马里保护领地广为流传。在英属索马里,英国的行政人员极力支持诸如学校建设、农业和其他发展项目的自助计划。

5 在索马里-苏维埃协定执行最好的时期,苏联人对此做出了综合性分析,参见 P. Kuprijanov, "Somalian Village: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3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fricanists*, Addis Ababa, 1973。

6 详尽的论述参见 B. W. Andrzejewski, "The Introduction of a National Orthography for Somali", *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1974, pp. 199 - 203; 以及"Five Years of Written Somali: A Report on Progress and Projects", *Bulletin of African Studies: Notes and News* (supplement to *Africa*), 1977。也可参见 O. O. Mohamed, *From Written Somali to a Rural Development Campaign*, Mogadishu, 1975。对采纳书面索马里文的政治意义的有趣分析,参见 D. Laitin, *Politics,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Somali Experience*, Chicago, 1977。

7 这是政治科学家广泛赞许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民族主义简洁定义之一,如参见 K. Minogue, *Nationalism*, London, 1967, p. 154。

8 参见 I. M. Lewis (ed.), *Abaar: the Somali Drought*, London, 1975 和 Somalia Directorate of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Revised Programme of Assistance Required to the Drought Stricken Areas of Somalia*, Mogadishu, 1975。关于对这个为受到旱灾的游牧民而建立的渔业合作社的较好论述,参见 J. M. Haakonsen,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Self-Reliance*, Bergen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Bergen, 1984。

9 参见 I. M. Lewis, "From Nomadism to Cultivation: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Solidarity in southern Somalia" in M. Douglas and P. Kaberry (eds.), *Man in Africa*, London, 1969; "'The Dynamics of Nomadism: Prospects for Sedentar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 Monod (ed.), *Pastor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1975。也可参见 L. V. Cassanelli, *The Shaping of Somali Society*, Philadelphia, 1982。

10 参见第四章,第 63 - 91 页。

11 这些以及其他讲话被收录在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Selected speeches of Jaalle Major-General Mohammad Siyad Barre*, Mogadishu, 1974。

12 对这些问题更全面的研究,参见 A. Wolczyk, "II 'socialismo' Somala: un industria per il potere", *Concretezza*, Rome, January, 1972, pp. 23 - 26; L. Pestalozza, *Somalia, Cronaca della Rivoluz 'tone*, Bari, 1973; B. Davidson, "Somalia: Towards Socialism", *Race and Class*, 1975, pp. 19 - 38; I. M. Lewis, "Kim II Sung in Somalia; The end of tribalism?", in P. Cohen and W. Shack (eds.), *The Politics of Office*, Oxford, 1979。

第十章

1 P. Gilkes, *The Dying Lion*, London, 1975.

2 1977 年,埃塞俄比亚军政府宣称发现一份文件,说的是索马里人的联合运动要将国内动乱扩展到埃塞俄比亚的东南部地区。这一可疑的索马里人阴谋被冠以"非洲之角的战争阴云"之名。与 T. J. 法雷尔(T. J. Farer)的专题论文标题离奇地巧合,参见 *War Clouds in the Horn of Africa: a crisis for Detente*, New York, 1976。这一有趣的研究考察了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在欧加登地区

的冲突背后的大国因素，该研究建立在这一假定上，即美国依然支持埃塞俄比亚，而苏联则支持索马里。在这一问题上，有一本用新马列主义语言表述的、带有倾向于埃塞俄比亚的书，参见 M. Wolde Mariam, *Somalia: the problem child of Africa*, Addis Ababa, 1977。也可参见 C. Legum and B. Lee, *Conflict in the Horn of Africa*, London, 1977。更多关于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及其与奥罗莫人运动如索马里阿博解放阵线(SALF)的关系的内容，参见 I. M. Lewis, "The Western Somali Liberation Front and the Legacy of Sheikh Hussein of Bale" in J. Tubiana (ed.), *Modern Ethiopia, from the accession of Menilek II to the present*, Rotterdam, 1980, pp. 409 - 416; J. Markakis, *National and Class Conflict in the Horn of Africa*, Cambridge, 1987, pp. 223 - 232。后一本书详细也论述了这些运动与索马里共和国政府在欧加登战争前及期间的关系。

3 参见 C. Jesman, *The Russians in Ethiopia: an Essay in Futility*, London, 1958。

4 对这些整体情况做过有益调查的文章，参见 H. Christensen, "Survival Strategies for and by Camp Refugees in Somalia", *Horn of Africa*, vol. 5, no. 4, 1983。

5 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些亲族关系的详细情况，参见 M. Hassan, "S tatus of Human Rights in Somalia", *Horn of Africa*, vol. 3, no. 2, 1980, pp. 3 - 11。另可参见作者后来关于西亚德"裙带关系"的书信和文章。

6 对西亚德总统的个性做出极其杰出的、有见识的评估，参见 D. D. Laitin and S. S. Samatar, *Somalia: Nation in Search of a State*, Boulder, 1987, pp. 158. ff。

7 参见 I. M. Lewis, "Literac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Somali Case" in G. Baumann (ed.), *The Written Word: Literacy in Transition*, Oxford, 1986, pp. 133 - 149。

8 参见 A. I. Samatar, "The Predatory State and the Peasantry: Reflections on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Somalia" in A. I. Samatar (ed.), *Africa Today: Somalia Crises of State and Society*, 32, 1985, pp. 41－56。

9 A. Hoben et al., *Somalia: A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Profile*, Boston Africa Studies Center working paper SP－1, 1983, p. 68。也可参见 D. R. Aronson, "Kinsmen and Comrades: Towards a Class Analysis of the Somali Pastoral Sector", *Nomadic Peoples*, no. 7, 1980, pp. 14－33。关于早些时候此类贸易的情况,参见 C. Geshekter, "Anti-Colonialism and Class Formation-the Eastern Horn of Africa before 195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18, no. 1, 1985, pp. 1－32。

10 1987 年 7 月,西方政府和多边组织宣布同意将索马里尚未偿付的外债(1986 年估计有 17 200 万美元)支付又延长了 20 年。

11 例如,参见 V. Jamal, "Nomads and Farmers: Incomes and Poverty in Rural Somalia" in D. Ghal and S. Radwan (eds.) *Agrarian Policies and Rural Poverty in Africa*, Geneva, 1983, pp. 281－311。

* 作者的朋友兼同事乔斯·库蒂莱罗(Jose Cutileiro)博士代表葡萄牙政府与西亚德在早前有过接触。我曾接触过当时索马里外交部长奥马尔·阿尔特('Omar Arte),他曾咨询过西亚德总统。"老头子"(奥马尔·阿尔特对西亚德的亲热称呼)说他最想接见的是库蒂莱罗博士(他之前曾是伦敦经济学院我所在的系里的人类学讲师,当时则是葡萄牙的一个巡回外交官)。库蒂莱罗曾访问过摩加迪沙,并摆脱了索马里秘密警察的监视,很是全面地探访过摩加迪沙的繁华地区。多年后,库蒂莱罗在索马里的官方联系人曾开玩笑地问我"我的那个葡萄牙朋友过得怎么样"。葡萄牙首相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uares)与西亚德正式会谈时采纳了库蒂莱罗事前预备的建议。当然,葡萄牙的外交努力的确是成功的。

** 关于索马里民族运动的历史，参见 I. M. Lewis, *Blood and Bone*, New Jersey, 1994, pp. 177－219; Gérard Prunier, "A Candid View of the Somali National Movement", *Horn of Africa*, vol. xiii, nos 3－4, 以及 vol. 14, nos 1－2, 1991, pp. 107－120; D. Compagnon, "The Somali Opposition Fronts", *Horn of Africa*, vol3, nos 1－2, 1990, "Somalie: de l'état en formation à l'état en pointille", in J. Médard (ed.), *Etats d'Afrique noire*, Paris, 1991, pp. 205－240, 以及"The Somali Armed Opposition Fronts" in C. Clapham (ed.), *African Guerrillas*, London, 1998, pp. 73－90。

第十一章

1 在西亚德政权的最后十年，索马里的外部援助占到国家财政的四分之三。1984 至 1987 年，意大利援助了 10 亿美元之多。当然，这笔钱中有多少事实上绕开腐败的意大利政治家和西亚德及其亲信而注入到索马里经济是另一个问题了。参见"The Italian Connection: How Rome Helped Ruin Somalia", *Washington Post*, 24 January, 1993。前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Craxi)最终逃到突尼斯。他与索马里事务有着较深的牵连。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少访问过索马里一次，并在一次特殊旅行中飞往他认为是贝莱德文的地方进行访问。根据我的朋友让·哈康森博士(Jan Haakonsen，他当时在场)的说法，在克拉克西短暂的访问期间，他发表了加强意大利人对其前殖民地的感情的演讲，这次演讲内容也只是一般意大利政治家的套话而已。当克拉克西离开后，其所属的政党才意识到他实际上去的是哈尔格萨(英语区北部的首都)而不是贝莱德文(位于南部)。在哈尔格萨，克拉克西颇为狼狈。不清楚这是西亚德开的一个玩笑，还是意大利顾问所犯的一个错误。

2 参见 *Somalia Beyond the Warlords*, Africa Watch occasional

report, March 1993, p. 5。关于在此期间摩加迪沙生活的生动叙述,参见 Hassan Osman Ahmed, *Morire a Mogadiscio*, Rome, 1993; Abdirazak Y. Osman, *In the Name of Our Fathers*, London, 1996。

3 一些信息匮乏的研究者无法拿出任何真实的证据就断言,艾迪德和西亚德的部队被调动过来袭击这块肥沃地区的并不好战的农民。虽然游牧民传统上往往看不起农耕者,但由于这些民兵组织想要抢夺牲畜和谷物,并想控制这片肥沃的土地便发起了袭击,毕竟这片土地是南索马里的粮仓。在更上一层的、以民族为基础的民兵组织和火力的支持下,他们的侵袭取得了成功。C. 贝斯特曼(C. Besteman) 和 L. V. 卡萨内利(L. V. Cassanelli)混淆了手段与目的,简单地认为这些因素并没有降低氏族和世系在这些掠夺成性的民兵组织中的重要性。也可参见 G. Schlee, "Regu larites dans le chaos: traits recurrents dans l'organisation politico-religieuse et militaire des Somali", *L'Homme*, no. 161, 2002, pp. 17 - 50; M. H. Mukhtar, "The plight of the agro-pastoral society of Somali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2, no. 7, 1996, pp. 543 - 553。

正如伯恩哈德·赫兰德(Bernhard Helander)准确而又简洁地说道,在索马里人的战争的研究上,两种互相矛盾但又同样混乱研究方式近来会师了:一些研究者认为氏族压根就不起任何作用(A. I. Samatar [ed.], *The Somali Challenge: from Catastrophe to Renewal*? Boulder, 1993),其他研究者则认为氏族确实起作用,但是这只是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构建起来的"(A. J. Ahmed [ed.], *The Invention of Somalia*, Lawrenceville, 1995)。第三种观点有点不可理解,它认为氏族并不存在,如果它们存在的话,那也是英国人类学家和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创造物,掩盖了真正的、阶级和宗教问题。参见 Catherine Besteman, "Representing Violence and 'Othering' Somalia",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11, no. 1, pp. 120 – 133 和"Violent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mali Nation State",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23, no. 3, pp. 579 – 596。对这种基于肤浅研究之上的这些怪论做出的批判性研究,参见 Bernhard Helander,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a Critique of Besteman",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7; 也可参见 I. M. Lewis, "Doing Violence to Ethnography: Some Comments on Catherine Besteman's Distorted Reporting on Somalia",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13, no. 1, 1998, pp. 100 – 108。

除了赫兰德的著作(很多还没有出版)外,迄今只有一位会说索马里语的职业人类学家出版了对南索马里社会进行大量分析的著作,这就是弗吉尼亚·鲁宁(Virginia Luling)的重要研究, *Somali Sultanate: the Geledi City-State over 150 years*, London, 2002。这一研究基于深入的长达 30 年的不间断的田野调查,它集中考察了摩加迪沙市外的谢贝利河畔的阿弗戈伊小镇,证实了传统政治组织和亲族以及它们在城市定居点的独特形式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4 参见 A. Y. Farah and I. M. Lewis, *Somalia: the Roots of Reconciliation*, London, 1993。

5 参见 I. M. Lewis, "Misunderstanding the Somali Crisis", *Anthropology Today*, vol. 9, no. 4, 1993, pp. 1 – 3; Hussein M. Adam, "Somalia: Militarism, Warlordism or Democracy?",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o. 54, pp. 11 – 26。

6 穆罕默德·萨农已经出版了他自己对这些事件的记叙: *Somalia: the Missed Opportunities*, Washington, 1994。也可参见 John Drysdale, *Whatever Happened to Somalia?*, London, 1994; I. M. Lewis, *Making History in Somalia: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a Stateless Society*, Discussion Paper 6, L. S. E. Centre for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1993; 以及 A. M. Issa-

Salwe, *The Collapse of the Somali State*, London, 1996。

7 如参见 M. Parenti, "The Myth of Good Intentions', *Peace Review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vol. 8, no. 4, Oxford, 1996。

8 摩加迪沙上空的直升机投了很多表达美国军队善意的传单,这种方式并不好。这些愚蠢的做法是美国军方心理作战部策划的,也遭到了索马里人的嘲笑。它没有注意到与索马里人建立对话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广播!

9 总部设在瑞典的"咨询小组"(其小组组员在联合国的请求下,在行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在推动成立)曾强烈地敦促联合国索马里行动重视索马里被重新赋权的传统地区领导人的重要性。这个由索马里专家组建而成的国际社会科学小组不停地先后与穆罕默德·萨农、其他联合国官员会谈。我们要强调的是,要认识到索马里分散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非中央集权特征。在我们看来,要理解索马里局势,需要采取"从下而上"而非"从上而下"的立场。联合国官员及其庞大的等级体系很难理解到这一点,更谈不上在实践上加以应用。最好的方式是联合国在短期内要集中建立一些地方委员会,特别代表团的成员有时要通过直升机到地方去协助。关于咨询小组的作用及其与瑞典生命与和平研究所(Swedish Life and Peace Institute,此机构主要致力于在索马里的"和平建设")的关系,参见 W. Heinrich, *Building the Peace*, Uppsala 1997。关于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最好的、最重要的批评性评论的出版物是伯恩哈德·赫兰德博士(Dr Bernhard Helander)的《索马里即时新闻》(*Somalia News Update*),这是作者在乌普萨拉(Uppsala)出版的一份时事通讯,有时一天发布两期还要多。

10 在《星期天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一篇备受关注的文章中,以及在作者与英国当时的外交大臣德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的一次谈话中,作者坚定地认为单个国家的部队在后勤和实际上的费用要比联合国第二次索马里行动要少的多得多。我认

为,由于有吉布提基地的分队,对索马里环境有实践经验,甚至在索马里还受到一些欢迎,法国外籍军团领导的部队是最为合适的。参见 I. M. Lewis, "The Land of the Living Dead", *Sunday Times*, 30 August 1992, pp. 8 – 9。

11 这一行动激发了诸多负面批评,并在好几周后还导致了一次由汤姆·法雷尔教授(Tom Farer)领导的司法调查。汤姆·法雷尔教授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法律专家,恰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也曾是索马里警察部队的顾问。8 月 12 日出版的报告得出,艾迪德对巴基斯坦蓝盔军的埋伏袭击是有意的,也是精心策划的。当然,这并不能让信息匮乏的摩加迪沙作战总部免于罪责。也可参见 J. Drysdale, *Whatever Happened to Somalia?* London, 1994。

12 参见 I. M. Lewis, "Ambush in Somalia", *Guardian*, 7 October 1993。

13 这次重要的战斗被认为是"美军自越战后最引人注目的军事行动",并被拍成广受欢迎的美国电影《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该电影改变自战地记者迈克·波顿(Mark Bowden)的同名著作。与恐怖的战争电影不同,这本书有着细致的分析,记叙也相对公正。这本书的写作素材既有此次行动中很多美国幸存者的口述,也有索马里方面的一些材料。关于对这本书的评论以及斯科特·彼特森(Scott Peterson)的亲历记叙,参见 Scott Peterson, *Me Against My Brother: At War in Somalia, Sudan and Rwanda*, London, 2000。联合国索马里行动对南索马里的更长远的影响,参见 I. M. Lewis, "Why the Warlords W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8 June 2001, pp. 3 – 5。

14 作为埃及前外交部长,联合国秘书长较为关注索马里局势。然而,索马里则认为他是基于埃及人在尼罗河水资源以及对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长期担心,来追求埃及利益的实现。

15 如参见克劳迪奥·帕奇菲科(Claudio Pacifico)大使高度私人性质

和非正式的叙述,他也是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在摩加迪沙任职的意大利最高级别外交官之一。Claudio Pacifico, *Somalia: ricordi di un mal d'Africa Italiano*, Edimond, 1996; A. del Boca, *Una sconfitta dell'intelligenza: Italia e Somalia*, Rome, 1993。

16 参见 Robert G. Patman, "The U.N. Operation in Somalia", in Ramesh Thakur and Carlyle Thayer (eds.), *U.N. Peacekeeping in the 1990s*, Boulder, 1995, p. 100。

17 *Report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Concerning the Situation in Somalia*, 17 September 1994.

18 斯科特·彼特森有着生动的亲历叙述,参见 Scott Peterson, p. 166。

19 Jerome Tubiana, *La Tribune*, Paris, 9 February 2002.

20 1992 年 4 月至 1994 年 7 月,单单美国政府的花费就约为 23 亿美元。参见 John G. Summer, *Hope Restored? Humanitarian Aid in Somalia, 1990 - 1994*, Washington, Refugee Policy Group,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Refugee Issues, November 1994。

21 R. Marchal, "The Somali Private Sector: Its Role in Governance", ms, Rom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iornata di reflessione sulla Somalia", 15 February 2002。这篇有趣的文章基于作者在摩加迪沙的"社会学"研究,即使给人的印象不深刻,但也算做了较为有用的记叙。

22 参见 Rick Atkinson, "For U. N. Force in Mogadishu, the Comforts of Hom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5 March 1994。

23 参见 M. Bryden, "New Hope for Somalia: the Building Block Approach",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6, no. 79, 1999, pp. 134 - 140。这篇文章深刻地揭示了索马里政治机构的这种发展模式。

24 紧紧围绕该主题的第一项研究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展开的多学科研

究。这一研究由一名人类学家(I. M. 刘易斯)和一名国际关系专家(J. Mayall,即J. 梅奥尔)和来自法律、政治学、管理学和发展研究等诸多领域的同事。参见 I. M. Lewis and J. Mayall (eds.), *A Study of Decentralized Political Structures for Somalia*, London, 1995。这里的分化点是1995年7月,前索马里共和国至少分裂为三个自治单元:“索马里兰共和国”、东北地区和迪吉尔-米利弗雷自治区。当然,我们也意识到摩加迪沙和贝纳迪尔可能会是又一个自治地区,但该地区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行政机构。我们的报告还被翻译为索马里语,并将报告纲要制作成录音带在索马里广播中播出。我们希望这或许会激发对我们的议题以及如何让分散的机构适应于索马里人需求的进一步讨论。

后来的会议是政治学家与前索马里官员在东非召开的。虽然索马里兰和邦特兰已经走上了不同的独立道路,但在2002年,索马里人在未来政府形式上的争论依然还在继续。

25 参见 *A Government at War with Its Own People: Somalia*, Africa Watch, New York, 1990。

26 Patrick Gilkes, *Two Wasted Years: the Republic of Somaliland, 1991–1993*, London, 1993.

27 详尽的研究,参见 Ahmed Yusuf Farah (with I. M. Lewis), *The Roots of Reconciliation*, London, 1994。

28 参见 H. A. Yusuf,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in Sanaag/Somaliland*, ms, ActionAid, London, 1996。

请注意,本章用的是“Djibouti”,而之前的章节里使用的是“Jibuti”。

29 此人曾为部长和警察总长,后来对西亚德政权的腐败有过有趣的记叙,参见 J. M. Ghalib, *The Cost of Dictatorship: the Somali Experience*, New York, 1995。还有一本同样对这种腐败进行揭露且更为详尽的著作是:‘Abdillahi Dool, *Failed States*, London, 1998。

30 M. Bradbury, *Somaliland*, London, 1997.

31 他在其氏族中是个富有、有权势的人物,被称为“金刚”。

32 参见 Patrick Gilkes, above, p. 56。

33 这两个派别的主要领导人曾利用其在索马里外的联系、也得益于其与右翼基督教道德重整运动(Christian Moral Rearmament Movement)的联系成功地组织过一次国际专题讨论会。参见 M. A. Salih and L. Wohlgemuth, *Crisis Manag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nciliation in Somalia*, Uppsala, 1994。

34 在此感谢伯恩哈德·赫兰德,其未出版的手稿对所有这些政治动员有着杰出详尽的分析,参见“Rumours of Rain: Ideas of Centralization, Social Fragment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ower in Post-Government Somalia”, Uppsala, 1998。赫兰德博士的索马里语流利,19 世纪 80 年代期间在拉汉文人间开始其研究,在他还没有完成这项独特的、深入的研究前,死于癌症。他的研究是基于多年在索马里(包括邦特兰)的田野调查。

35 此名称指的是神秘的“邦特之地”,古埃及探险队曾为了没药和乳香经常来到此地。“邦特之地”的位置也不是说毫无争议。讽刺的是,字母“p”在索马里语中是没有的,且发音为“b”。参见 A. Y. Farah, *The Milk of the Boswellia Forests*, 1996。

36 1990 年前的情况,包括政治发展,有一本优秀的导论性作品,参见 P. J. Schraeder, *Djibouti*, World Bibliographical Series, vol. 118, Oxford, 1991。阿法尔社会科学家新近对阿法尔人政治史的分析,参见 A. A. Adou, *The Afar: a Nation on Trial*, Stockholm, 1993。

37 这些联合国高级官员来自不承担此任务的国家,这样的身份在财政上是有利的,因为会带来更多的资金。

38 索马里“知识分子”通常都是自封的,其实就是一些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有读写能力的索马里人。这些“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认为他们那些不识字的游牧民兄弟会有一些在智力上极其优秀的

人,甚至还不如那些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自封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39 参见 J. Drysdale, *Whatever Happened to Somalia?* Revised edition, London, 1995。

40 参见 I. M. Lewis, *Saints and Somalis: Popular Islam in a Clan-Based Society*, New Jersey, 1998。

41 统计数据(通常是近似值)参见 2001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度国别报告。关于难民是如何逃离以及他们在其寻求庇护的国家里是如何被接收的,请参见小说家努尔丁·法拉赫的电影剧本:*Yesterday, Tomorrow: Voices from the Somali Diaspora*, London, 2000。该剧本对此有着充满人性光辉的记叙。关于全世界难民生活环境的报告汗牛充栋,但关于难民家庭生活的科学研究却凤毛麟角。但,有一个特别的例外: C. F. el-Solh, "Somalis in London's East End", *New Community*, vol. 17, no. 4, July 1991。

42 U. N. D. P. report, *Human Development in Somalia, 2001*, p. 104; Ismail Ahmed, "Remittances and Their Economic Impact in Post-war Somaliland", *Disasters*, vol. 24, no. 4, 2000, pp. 380 - 389.

43 此项目由英国纳税人买单,也获得了外交预算的资助。但是英国外交部很是明智地没有直接操控这些节目。据说,相关广播员的专业标准保证了新闻报道的中立性。索马里语节目在过去通常是由一位非英国广播公司的会说索马里语的人监制,B. W. 安杰耶夫斯基(B. W. Andrzejewski)教授曾一度担任此职。但是,这一明智的做法没能持续下去,可能是为了节省钱。

44 R. 马卡尔(R. Marchal)的文章《索马里的私营成分》(*The Somali Private Sector*)。他就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摩加迪沙的"商业阶层"(他的叫法,不过带有一点保留)写过多篇有价值的报告,但遗憾的是还没有出版记叙军阀生平的详尽的社会学案例史分析,这些案例史会有助于分析此处所提出的问题。

索　　引

（索马里人和阿拉伯人的全名按照书中所出现的名称编入索引，例如'Abdi Hassan Boni 放在 A 部分。如果姓名前通常加有尊称，则也按照顺序编入索引，例如 Sheikh Isma'il 和 Sheikh Isaq 放在 S 部分。其他姓名则按照姓氏的首字母加以编排。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B

C

D

I

J

K

L

M

N

Q

R

S

T

Y

Z

译后记

这本中文版的《索马里史》是在著名的索马里研究专家刘易斯先生的最新英文版本的基础上翻译而成的。国内曾在1973年出版了《索马里近代史》，此中文版是在刘易斯的英文第一版基础上翻译的，译者为钟槐先生。只不过囿于写作时代的限制，《索马里近代史》只写到20世纪60年代初，而之后的索马里历史进程则没有展现。最新版本的《索马里史》补充了自20世纪60年代到2002年左右索马里这一最新阶段的历史。此次中文版的翻译也借鉴了钟槐先生的译作，在此特致谢意。

本书的翻译之所以得以顺利完成，要感谢以下诸位：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的信任；感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刘鸿武教授和徐今雅教授，感谢两位领导为我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感谢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在部分术语翻译上给我的指教；感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肖玉华博士，他在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的翻译上，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明英博士，她对我的译稿进行初读并对部分译稿进行了润色；最后，我也要感谢非洲研究院的两位研究生：陶慧和赵红亮，两位研究生初读了译稿，并给出了修改的意见。尤其是陶慧，还帮助我校对了索引部分。当然，囿于自己水平的限制，文中可能有一些错讹之处，责任由我自负，也希冀能得到读者的指正与批评。

赵　俊

2011年8月31日记于骆家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索马里史
作者=作者:（英）刘易斯著
页数=341
SS号=13081213
出版日期=2012.08
出版社=上海市：东方出版中心